



# 京氏 易 傳 解 讀

卢央 著  
(汉)京房 原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氏易传解读/卢央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10  
(九州易学丛刊)  
ISBN 7-80195-127-1  
I. 京... II. 卢...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5911 号

## 京氏易传解读

---

作 者 / 卢 央 (著)                      点 校 / 周易工作室

---

出 版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2192/3/5/6  
电子信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

总 经 销 /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 各地书店  
法律顾问 /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 / 北京毕诚彩印厂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22.5  
字 数 / 60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7-80195-127-1/B·96  
定 价 / 48.00 元 (全二册)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总 目

京氏易传解读.....	(1)
京氏易传 .....	(433)
京氏易.....	(525)

# 目 录

第一章 京房生平 .....	(1)
一 京房的时代背景 .....	(4)
(一) 汉代振兴儒术的开端 .....	(6)
(二) 邹衍的“五德终始” .....	(10)
(三) 董仲舒的改制设计 .....	(17)
(四)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	(25)
(五) 封禅和改历 .....	(32)
二 京房的出身和求学 .....	(36)
(一) 京房故里 .....	(36)
(二) 京房家世 .....	(40)
(三) 京房求学 .....	(45)
三 京房入朝为官 .....	(49)
四 京房之死 .....	(65)
五 京房的著述 .....	(77)
第二章 京房易学 .....	(81)
一 汉代易学的传承 .....	(81)
二 西汉易学状况 .....	(87)
三 京房八宫卦序 .....	(95)
(一) 关于卦的排列 .....	(96)
(二) 京房关于八宫的思想 .....	(99)
(三) 京氏八宫卦 .....	(101)
(四) 游归、贵贱、世应 .....	(103)
四 京氏纳甲 .....	(108)



(一) 干支五行 .....	(108)
(二) 卦纳干与爻纳支 .....	(113)
五 卦爻五行 .....	(120)
(一) 八宫卦的五行 .....	(120)
(二) 卦与爻的五行关系 .....	(124)
(三) 亲属和飞伏 .....	(126)
六 建候积算 .....	(134)
(一) 京房建候积算的思想 .....	(134)
(二) 京氏建候 .....	(138)
(三) 积算 .....	(144)
七 星宿和气候分数 .....	(150)
(一) 星宿 .....	(152)
(二) 阴阳之气 .....	(156)
(三) 成卦之主 .....	(160)
(四) 气候分数 .....	(163)
第三章 京房的卦气说 .....	(167)
一 孟喜易学 .....	(170)
(一) 十二消息卦 .....	(170)
(二) 孟氏卦气 .....	(173)
(三) 六日七分 .....	(180)
二 以风雨寒温为候 .....	(186)
(一) 魏相易学 .....	(186)
(二) 天文与风雨寒温 .....	(190)
(三) 卦气与风雨寒温 .....	(194)
(四) 八卦卦气之应 .....	(197)
(五) 风雨寒温入占 .....	(202)
三 京房卦气说的补充 .....	(208)



(一) 谷永与《京氏易》 .....	(210)
(二) 《易纬》与《京氏易》 .....	(215)
(三) 郎顗与《京氏易》 .....	(223)
<b>第四章 京房星占及灾异占</b> .....	(231)
一 京氏日占 .....	(234)
(一) 京房日面变色占 .....	(235)
(二) 京房日面观测 .....	(237)
(三) 京房日旁气占测 .....	(243)
二 京房日食占及月占 .....	(249)
(一) 京房日食占 .....	(250)
(二) 京房月占 .....	(258)
三 京氏杂星占 .....	(265)
四 京氏气候灾异占 .....	(280)
(一) 关于蒙气 .....	(281)
(二) 虹蜺之占 .....	(285)
(三) 风和地震之占 .....	(289)
五 京氏物占 .....	(297)
(一) 京房岁时占 .....	(297)
(二) 京房物占 .....	(298)
<b>第五章 京房音律、风角和考功课吏法</b> .....	(305)
一 京房音律的历史背景 .....	(306)
(一) 《管子·地员》对五音的描述 .....	(307)
(二) 《吕氏春秋》对十二律的描述 .....	(311)
(三) 其他典籍中关于音律的叙述 .....	(318)
二 京房六十律 .....	(324)
三 京房风角 .....	(342)
(一) 京房风角与音律 .....	(343)



(二) 京房的五音风占 .....	(347)
(三) 京房八卦八方风占 .....	(354)
(四) 六情风占 .....	(358)
四 京氏考功课吏法 .....	(367)



# 第一章 京房生平

在西汉王朝宣帝和元帝时期，先后出现过两位易学大师，他们都叫京房。这两位京房在《汉书·儒林传》上都作了介绍。前一位京房主要活动时间是在汉宣帝，甚或在昭帝时期，后一位京房则主要活动于汉元帝时期。

对前一位京房，由于他是汉宣帝时著名易学家易博士梁丘贺的老师，故在《儒林传》中由介绍梁丘贺而引荐出来：

梁丘贺，字长翁……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  
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

由此可知，梁丘贺在拜田王孙为师前曾师承京房。此京房师承杨何，曾任太中大夫，又出为齐郡太守。对于后一位京房，《儒林传》上写道：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主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



幸，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

这里指明此后一位京房所治的易学与田何所传的易学相异。当时易学大师们所治易学，大体均属于田氏易学系统，是当时易学主流。所以《儒林传》要特别指出这一点。而且说这位京房还另有他的本传。

从以上引的《儒林传》的两段记载来看，这两位同名的易学大师并不难分清楚。但是由于古籍记录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笔误，从而会把事情的次序弄得含混不清，因此后世论及京房或京氏易学时，都要适当加以指明。例如，近代易学大师杭辛斋先生，在其所撰《读易杂识》中<sup>①</sup>，撰有《汉有两京房》一目，云：

汉易师称京房者有二。一为太中大夫，《汉书》：“梁丘贺从太中大夫受《易》。”颜师古注曰：“别一京房，非延寿弟子也。”又云：“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此京房系汉宣帝时人。至延寿弟子京房，字君明，本姓李，因吹律自定为京氏，以明灾异得幸元帝。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是前京房为梁丘贺所师事。而延寿之易实受之梁丘贺，岂能更为延寿之弟子，与京君明绝非一人，可知矣。

他为了辨明这两位京房，所引资料均精确明白，只是在具体说明时，却误写为：“延寿之易实受之梁丘贺。”其本意当是写“延寿之《易》，实受之孟喜，而孟喜与梁丘贺同师事田何，岂能更为延寿之弟子”。此虽笔误，但却可能导致误解。

<sup>①</sup> [清] 杭辛斋《学易笔谈》之一。

杭辛斋先生将前任太中大夫，后出为齐郡太守，曾授易于梁丘贺的京房，称为前京房。颜师古则称之为“别一京房”。将焦延寿（焦贛）弟子的京房，称为后京房。而本评传的传主正是这个焦延寿弟子的后京房。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如果要作辨明时，只将前京房指明。

本评传传主京房，除了以上《儒林传》对他的介绍外，还有他的本传。当然比《儒林传》的介绍要详细得多。其本传在《汉书》卷七十五《睦两夏侯京翼李传》中，较详细地记述了他 33 岁，即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 45 年）举孝廉为郎以后，即他进朝廷为官之后的一些细节。本评传对京房的介绍自然应该更为详细，首先应介绍他的生平。



## 一 京房的时代背景

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种“郡国制”。所谓郡国制就是：既有中央直辖的郡县，又有分封给诸侯统治的封国。封国中有同姓诸侯，还有异姓诸侯。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大约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诸侯封国占了三分之二。诸侯封国中大的如齐、楚、吴等，占地多达数郡数十县，如楚王有砀郡、薛郡、郯郡 36 县之地；齐王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诸郡 73 县。这些大的封国地域广袤，且擅山海之利。中央对诸侯国除委派丞相外，其余官吏都由诸侯自署，其宫室百官都与帝京同制。

诸侯国的势力膨胀，就必然不断发生与中央的对抗。汉高祖建国后最忙的一件事就是“剪除功臣”，就是对付各异姓封国。贾谊在《新书·亲疏危乱》中说，汉高时“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不能以是一岁为安”。诸侯的分裂割据，漠视皇帝，使汉朝皇室政权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对汉皇朝固然不利，对苦于连年兵战，亟待休养生息的全国人民来说也很不利。因此汉初中央采用各种措施，令诸侯国用汉法，都能有效地贯彻，汉高祖去世之前，基本上消灭了异姓诸侯，只长沙王吴臣（原衡山王吴芮之子）一个为异姓封国。

汉高祖去世之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并未稍有松懈。当时著名的文臣，如贾谊、晁错都向皇帝提出过削弱诸侯国的力量，使其听从中央王朝的指挥的建议。贾谊曾建议要建立制度，使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有序。对于诸侯，要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贾谊《新书·五美》）。晁错则提出削减诸侯土地的“削藩”建议，又定法令三十章以制裁诸侯，非如此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汉书·晁错传》）。汉文帝和景帝对这些建议加以采纳。文帝时诛济北王刘兴居，废

淮南厉王刘长。定《兵制》，加强中央对各郡国军队的控制。临终时，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周亚夫治军严明，善用兵。《史记·绛侯世家》说：孝文且崩，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后来吴楚七国反叛朝廷，正是周亚夫率兵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既平，虽还有如梁国那样的大国，但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势，中央集权势力得以加强，中央王朝的威望也大大提高。

在与“削藩”和约束诸侯王国的同时，汉王朝还推行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在长时间连续战争之后，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创伤，黎民百姓亟待喘息之机。汉王朝此时推行“无为之治”，经过数十年安定和生息，到汉武帝时，虽不能算是繁荣昌盛，但却是“中外乂安，公私富溢”。《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初年的情况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种富庶的情况，应该看作是全国性经济好转的表现，却远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都是“人给家足”。因为《平准书》又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暴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说明当时贫富之分相当严重，富者争于奢侈，而广大平民百姓或许生计较前有好转，仍是穷蹙不可终日。

但是就总体而言，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之大势已趋稳固，经济上也已有了好转，在此形势之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者要求建立一种适应于这种统治的政治制度、方略乃至礼仪，同时也要求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儒家的大一统思想，讲求礼仪和道德的思想都与这种需要合拍。因此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盛行不衰。但倡导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本人却是非常奢



侈，经常外出巡游，好大喜功。又惑于神仙家言，搞封禅活动，起明堂，立畴庙等。似乎他并不真懂得儒学，但儒学却自他的提倡和推行而兴盛起来。这正说明汉代儒学的兴盛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非帝王或统治者的个人选择。

本书传主京房出生也迟，他是在汉武帝去世后十年才出生，那时汉家儒学独尊的大势已经形成，所以他成长后是在独尊儒术的氛围中学习和进行学术活动的。他与西汉后期的儒学发展有较多的联系。事实上京房的一生正是探讨儒术及其与宇宙和人类社会关系的奋斗历程。

### （一）汉代振兴儒术的开端

儒学之兴虽说是始于武帝，其实在汉文帝时已开其端。当时一些学者，从秦王朝的灭亡中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就已经提到要推行一种新的统治方法。例如汉文帝初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提出秦朝之所以速亡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即秦朝恃武力和形胜，依靠严酷的刑法是不可能维持政权的，应该考虑仁义之治。而汉文帝时，汉兴二十余年，秦之“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仪，捐廉耻日甚”。并提出“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亲，六亲有纪”的政治主张。即将儒家的明礼仪，定制度，重教化等基本主张，提出来加以实行。

大概要具体付之实行，首先要将皇帝的至高地位以一种制度确定下来。汉王朝初年，由于一切草创，无暇多顾，多袭秦朝旧制。贾谊认为这时应是开始考虑这些根本大计的时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

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绌、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当是孝文帝即位后一二年之事。贾谊 33 岁死，时当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故这时贾谊只有二十二三岁。故诸大臣说他“年少初学”，而谈论国家之根本大计，则自然是“专欲擅权”。故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汉文帝实际上很想采纳贾谊的建议，但因诸国家重臣（绌即周勃，当时还是丞相；灌婴为太尉，后接替周勃为丞相，东阳侯张敖是汉高祖十一年封的功臣侯，位次居第一百一十八位，食邑一千三百户，冯敬为御史大夫。）反对，汉文帝也无能为力。

贾谊死后两年，即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又有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此事。《汉书·郊祀志》说：

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尚黄。”时丞相张敖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sup>①</sup>，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是。罢之。

但次年，即文帝十五年，春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拜公孙臣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更元年。

贾谊之受黜，是由于当时人们还习惯于汉初黄老之学贵重清静无为的思想氛围中。年轻气盛的贾谊却想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立制度，定乐律等国家大政。朝廷重臣们自然认为这是“纷乱诸事”，不能予以考虑。汉文帝出于当时的形势，也只好作罢。大概当时皇帝的权力和声威也不像后来那么大。公孙

---

<sup>①</sup> 服虔曰：“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也。”（《史记·封禅书》注引）

臣的建议则是遭到丞相张苍的反对。公孙臣根据战国时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即按土木金火水的次序，依次转移。也即是按照五行相胜的次序，如金克木，故金代木而兴。新的朝代兴盛，必因其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因为汉朝是接替秦朝而王，秦为水德，克水者土，故汉当为土德。大概贾谊也是据此而提出汉为土德。但张苍以为汉得水德，其所以认为汉仍为水德，论据有二：一是河决金堤，二是年始冬十月。张苍不论五德转移的原理，而强调符应。河决金堤是水德的符应。这是发生在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故即文帝十二年的第三个月），黄河在故魏地酸枣县决口（后属陈留郡，位于黄河南岸），东溃金堤。据《汉书·沟洫志》讲：“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即是汉立国以来39年，黄河首次在酸枣决口，这一自然现象，正是水德旺的符应，可证明汉得水德。另外“年始冬十月”也应属于一种符应。按五行，水与冬季对应，孟冬建亥，故当水德旺时，斗建亥，为十月。即是说一年开始于孟冬十月。这正是秦朝的历法。为什么汉朝还承接秦朝“年始冬十月”的旧制呢？张苍解释说是汉高祖恰好是十月进至霸上，因而立为汉王，所以这是汉朝取十月为年首的符应<sup>①</sup>。由于张苍提出了符应，公孙臣没有得志。但一当黄龙见成纪的符应出现，汉文帝立即支持。《汉书·律历志》云：“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这反映了汉文帝还是很乐于采纳公孙臣的建议，以前只是没有符应出现。现在有了符应，他就立即着手进行。可是他低估了这些建议实际推行起来的复杂性。特别是改历，定礼法制度等。因而在出现了新

<sup>①</sup> 《汉书·郊祀志》：“汉兴，高祖初起。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杀者赤帝子也。’……遂以十月至霸上，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色上赤。”



垣平（一个望气占吉凶的术士）的事件之后，就似乎对改正朔，定服色等事懈怠下来。所谓新垣平事件是一个望气术士新垣平，向文帝说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彩，如同人戴着冠冕。他说，东北方是神明之舍，西方是神明之墓。现在天瑞降下，应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文帝听了他的意见，果然作渭阳五帝庙。而且于次年夏四月文帝郊见渭阳五帝，封新垣平为上大夫，累赐千金。这年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献文帝。并对文帝说“阙下有宝玉气来者”。果然有献玉杯者，杯上刻曰：“人主延寿。”他又说：“臣候日再中”，果然不久日却复中。大约这些很使文帝高兴，遂“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即以十七年为元年，史称文帝后元年。可是不久，即后元年十月，有人告发了新垣平之所言皆诈，新垣平怕被诛，起而谋反，于是夷三族。这一事件对汉文帝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他那么相信符应，以为这是天的意志，但结果有些符应只是术士者流的伪作。这大概也引起了汉文帝更多的怀疑，甚至怀疑公孙臣的黄龙见于成纪的真伪。可是张苍提出的“符应”却是不可能造假的，黄河在酸枣决口可不是一件可以造假的事实，刘邦进军咸阳，十月抵霸上，而封为汉王则也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汉文帝却相信了那些造伪的符应，所以再提改正朔易服色，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可是儒学的兴起是一种趋势，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虽然汉文帝的早期努力没有什么进展，但潜在的潮流却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着。似乎改正朔，易服色，协音律，定礼乐制度等都只是形式化的内容，但却是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要依据一定的理论原则。如果缺乏其思想基础，或者一定的理论指导，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就无法建立。贾谊的建议那么容易地被否定，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公孙臣那样说黄龙将会出现的符应。而张苍振振有辞地对公孙臣加以否定，是因黄龙还没有在成纪出现，一旦成纪出现了黄龙，张苍所据的符应就不那么有力量了，只好辞去丞相。这种“符应说”，就是一种思想基

础或理论原则，这种思想基础就是皇帝是天子，他的一切都出于天命。天降祥瑞表示天对皇帝的任命、支持和嘉奖。天降灾荒则是对皇帝的警诫、劝告和惩罚。不过在汉文帝时代，这种理论还不如后来那么精致、完善。那时这种理论还较简单，如《吕氏春秋·应同》篇中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这段话，被认为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原意。但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却不被认为属于儒学，而是被列为阴阳家之学。不过儒学也论天命，邹衍的学说也归结于“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这又正是儒学的要害内容。所以，汉代在建立儒学独尊的过程中，是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开始的。这一点似乎并非无关紧要的事实。

## （二）邹衍的“五德终始”

贾谊与公孙臣都认为汉得土德。汉之所以得土德是因为汉朝取秦而有天下，而秦得水德，土胜水，故汉得土德。这正是遵循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张苍认为汉得水德，则不是根据邹衍

的“五德终始”原理，他似乎主要依据“符应”。前已说明，他提出了两条符应作为汉得水德的理由，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条根据，由于这一条根据，他得出了另一种五德传变的方式。这条根据是《史记·历书》记载的汉初历法状况：“汉兴，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而汉高祖所以说“北時待我而起”，据《史记·封禅书》所说：“二年（即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丙申），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张苍所持的这个根据是有权威性的，他据此而反观秦朝的水德之依据。据《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从秦文公出猎获黑龙这一事件断定为秦获水德，大概张苍内心并不相信。他所认为的符应都是一些事实俱在的实际事件，如河水决金堤，年以冬始等。当他进一步考察秦国的历史时，他发现秦国一直重视祭祀白帝。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秦国在襄公时已经建了祭祀白帝的西時：“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这是在春秋前的事，约当公元前777年到765年间的事）到战国时期，即在公元前384年秦国传到了秦献公。献公立后大约十年，徙都城到栎阳，从此秦国逐渐强盛，据《史记·封禅书》说，当时“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時栎阳而祠白帝”。大抵秦立国于周朝都城之西，祀西方之大帝。秦襄公以攻犬戎救周有功，被列为诸侯，作西時而祠白帝，这是秦得金德的表示，而秦献公由于栎阳雨金，又建畦時祠白帝，更以为秦得金德之符应。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事件也表明秦得金德之符应。而在张苍看来，从符应的显示而言，刘邦十月入霸上得封为汉王，建北畤祠黑帝而后为帝，河决金堤，自应是得水德。若从邹衍的“五德终始”来说，“德从所不胜”，则从秦到汉的符应与此五行相胜原理不合。不过张苍并不关注邹衍的理论对不对，他从符应来看，秦传变至汉实际上应是金生水，即五行传变的一般原则应据五行相生说。不过他还没有作这个推论或说明。但《汉书·律历志》却说过，黄龙在成纪出现后，“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其所欲论著者，很可能就是有关他的这种五德传变说，即依五行相生的转变方式。

虽然汉文帝因新垣平事件而停止了改制活动，但是这种改制的思想却在当时社会上发展着。后来到汉武帝元封年间改制有了结果，其实都是本着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的思想和原理。关于邹衍的著述，史籍上记载的很多，《汉书·艺文志》上著录了两部：《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共有一百零五篇之多。当时邹子名声很大，著作又丰，在社会上自然流传颇广，及至汉世已流传近二百年，所以对汉世学者有很大影响。但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邹衍的主要资料只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提供的那一段话：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制度，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从司马迁的这一介绍中，可知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是基于一个关于世界的广阔的思考之上，并不只是简单的五行转移的规则。

邹衍关于世界的思考是从人们已知的或经验过的世界类推出来，即是他以为人类经验到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远为广阔得多的世界。从空间上说，人们所知的或所经验的世界，只是这个广阔的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从时间上说，人类所知的从当时到黄帝的这一段时间领域，只是一个五德传变段中的五分之四，还不是整整一个五德转变过程。可见构成邹衍对世界思考的主要出发点是无论从空间上或时间上都是当前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的推演，对当前世界的充分了解，可以推出远为广阔的空间情况，可以推出绵远的过去和未来。即邹衍说的：“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在空间上则是：“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在时间上则是“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邹衍将他的这一基本观点，贯穿在他的整个体系之中。这个“推”的方法，由已知推导出未知，由经验事实推导出还未经验的世界，并将之运用于一切领域，从方法论而言其局限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邹衍及其稍后的时代，人们尚不可能对其局限进行有效的批判，只能说“其语闳大不经”。但是他提出的这个“推”法，尽管很不完善，却是基于已知事实来推求未知世界，

使得他的推论并非徒托空言，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邹衍注意到这种类推法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史记·平原君列传》注，《集解》引刘向《别录》记录的一段关于邹衍经过赵国，在平原君那里谈及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平原君问邹衍的意见如何。邹衍说：“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这里谈的是关于辩的见解，但他指出要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只有两者属于同类才有可能，即“别殊类使不相害”；又指出作推论时要将事物排列好次序，每一步传递要有根据，不能搞乱，即是“序异端使不相乱”。所以邹衍的推法并非依托空想，他体现出一种对未知世界积极探索的客观的科学精神。所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所撰《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认为他是“自然哲学家和阴阳学派的创始人”（第一卷）以及认为他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真正创始者”（第二卷）。

邹衍的这些“推”的方法，是由于他“深观阴阳消息”的结果。他的深观阴阳消息是从当时人们所共知的空间域和时间段出发，是从这一空间域和这一时间段所有事件的变化情况来作论证的基础，所以其事物的变化即是阴阳消息。

他从时间角度论述阴阳消息的情况记载得比较多，也比较容易理解。除了前面引述的之外，《史记·历书》还说：“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当时各诸侯国正处于紧张的纷争状态，无暇顾及制订一个有效的历法，但是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似乎可以提供了一个可敷应用的历法。从历法来说，不同的季节昼夜长短不同，气候冷暖有异，物候景象有差，即一切自然现象均随季节、月令而变化。从

阴阳家的观点看，这些随时间而作周期变化的现象，正是阴阳消息的具体表现。当白昼变长，气候变暖，万物繁茂时，是阳息阴消（即阳升阴降）的表现。反之白昼变短或气候变冷是阳消阴息（即阴升阳降）的表现。其“散消息之分”就是能把随时间而变化的阴阳消长情况随时表明清楚。所以在邹衍看来，阴阳消息是天道运行的法则，他认真地研究了 this 法则，即“深观阴阳消息”，使得他在列国争战的情况下，还能相对有效地掌握历法的递变。当然他的散阴阳消息之分并不仅仅限于历法方面，还作了更广阔得多的推论。五德终始的原理就是这一法则的推论。五德终始虽然说的是五行的转变，特别强调五行传变依照五行相胜（相克）的法则。但是本质上说的是朝代的消长，也就是朝代随时变化的阴阳消息。五德的转变，只是这种阴阳消长的必然结果。他用五德的转变来说明朝代的更递，是根据他对从黄帝到他所处的时代这一段历史作了仔细研究的结果。他认为后一朝代之所以取代了前一朝代，正是因为这后一代的政治力量能注意到针对前一朝代的弊政，采取了对应的强有力的措施，革除了前朝弊政而取得的。所以邹衍不同于一般儒者那样，希求一个远远高于前朝的更为英明的政治力量，宽泛地讨论如何政治清明，讲究仁德或如何取得民心等等。他强调要针对前朝的根本弱点所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他或许考察过各朝被取代的主要原因，用五行来作对应，而导致他采用五行相胜的原则来描述这一阴阳消息的过程。《汉书·严安传》曾引过邹衍的佚文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这说的正是五德之运随阴阳消息而不断流转，要针对当时的情况采取适当的对应措置以顺应阴阳消息的流转。由邹衍的佚文可知，他与保守的儒者确有不同的政治见解。

汉代的儒家深受邹衍的影响，他们注意到邹衍的这一精神。汉初大儒陆贾和贾谊就注意总结秦朝政治的得失。陆贾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陆贾《新语·无为》) 他以为秦朝想通过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 但刑法太严, 而举措又对人民过于暴虐, 而造成其政治之失败。贾谊在《过秦论》中讲秦朝之衰败, 是: “坏宗庙与民, 更始作阿房之宫, 繁刑严诛, 吏治深刻, 赏罚不当, 赋敛无度。” 也指出秦朝苛虐百姓, 繁刑严诛。秦朝何以会如此衰败, 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 以为周得火德, 秦代周, 德从所不胜, 方金水德之始, 改年始十月朔, 衣服旌旗皆上黑, 数以六为纪, 六尺为步, 乘六马, 更名河曰德水。刚毅戾深, 事皆决于法, 刻削毋仁恩和义, 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 久者不赦。” 秦朝尚法, “事皆决于法”, 故急法刻削, 毋仁恩和义, 这些正是水德的核心, 而发展到繁刑严诛, 赋敛无度的程度正是水德的弊政和衰败。所以贾谊首先提出要改正朔, 易服色, 法制度, 定官名, 兴礼乐。要色尚黄, 数用五, 为官名, 悉更秦法。就是针对秦之水德而提出的。贾谊根本上是依照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来规划汉代的政治改革。但是张苍却强调符应, 因为他认为朝代的更递是由于天命, 天降祥瑞或灾异形成符应, 是一种天命, 例如黄河决堤可以算这一类。有时是一种事件, 例如汉高祖十月至霸上, 因而定年始十月, 张苍认为这也是一种符应或天命。公孙臣和贾谊一样认为朝代的更递是五德传变, 但是他还认为要有天命, 有天命就有相应的符应, 所以他预言有黄龙出现。如果邹衍是阴阳家, 张苍也是阴阳家, 那么阴阳家内部就有差别。虽说《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 必先见祥乎下民。” 都以为是邹衍的原意, 即邹衍也有符应之说。可是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看来, 这在五德终始中不是主要的, 或者只是一种符号, 一种五德的形式化表示。而在邹衍那里, 甚至五德还只是阴阳消息的某种符号, 符应只能是与所代表的德的符号相应的自然现象或社会事件。邹衍或贾谊注重的还是具体的历史演变, 邹衍从阴阳消息的角度来考察朝代的五德传变, 贾谊没有提到阴阳消息, 但是他注意五德传变。张苍则将注

意点转到符应上去，似乎他对于符应与五德传变间的关系作了重点的转移，从符应观点看，邹衍的五德传变未必是可信的。而公孙臣本人似乎还是以五德传变为主，符应只是次要的，但是汉文帝却更加看重他的符应。

关于邹衍的其他方面暂不深入考察，但上述邹衍的思想对本评传传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以后的章节中就会看到这一点。

### （三）董仲舒的改制设计

汉朝前期实行清静无为的政治，其结果是社会经济繁荣了，使整个统治阶级过着极其富饶的生活。汉景帝灭了吴楚等七个封国的联兵反叛，从此结束了西周以来合法的诸侯割据制度，加强了汉朝廷中央集权的力量，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帝国的局面。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完成的全国统一，要开始有所作为了。

汉武帝登帝位之初，当公元前140年，即武帝建元元年，在这年的头一个月即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朝廷受策问。武帝亲自出题，连下三制，策问古今治道。在对策的一百余学者中，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对策受到汉武帝的赞赏。他对策的结论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之后，丞相王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董仲舒为汉武帝提的治道，基本上是沿袭着汉初儒家和阴阳家的观点，但是他作了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和内容深刻的扩展，

形成了汉代特有的思想特色。一般认为董仲舒的学说主要就是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的结合。陆贾在汉高祖时作《新语》，其《明诚》篇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贤君智则知随变而改，缘类而试思之，于□□□变。”贾谊在其《新书·大政》篇中也说：“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而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由此可见其天人感应之说已先见于陆贾和贾谊。至于阴阳五行之学，前面已述，在邹衍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董仲舒则更向前发展，《汉书·五行志》序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可见董仲舒将阴阳五行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董仲舒的学说的出发点还是基于汉代取代秦朝而统治天下这一实际，因此他也和陆贾和贾谊一样，重视吸取秦亡的教训，从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中提出现在朝代的治国方略。他也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推行法家政治，刑罚残酷，而不注重教化。他说秦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sup>①</sup>他又认为汉朝是建立在秦朝的废墟之上，而秦朝这块废墟犹如朽木粪墙，在第一次与武帝的对策中他就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前已述及他三次对策之后，王绾建议将所举贤良中的法家和纵横家悉皆罢去。而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更化”，在第一次对策中就说：“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

<sup>①</sup>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第二次对策。

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sup>①</sup>因此他认为要以仁德教化为主代替严刑峻法，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更化”本身是一种应时而变的观念，他与邹衍的“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的观点是相通的，因此在本质上他的思想含有邹衍阴阳消息的意思。在董仲舒看来，上古尧舜禹三代都是治世，天命不变，故三圣同守一道。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但是三代之后情况有了变化，殷继夏，周继殷都是承乱世而治。天命改变，王道就应随之而变。所以他说：“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所以董仲舒的“更化”，就是要改制，主观上要建立一种适应当今的汉家制度。他不仅为此要作出尽可能完整的设计，而且要提供一个设计的理论依据。他全部改制的基本点是王者必受命于天，他在对策中就已经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他还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sup>①</sup>

从这一改制的基本点出发，董仲舒就必然是符应说者。贾谊提汉得土德，主要还是从政治形势出发，是针对秦朝政治之敝的改革而言。公孙臣是基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提出汉得土德，他相信会有土德的符应出现。张苍则强调符应而不拘泥于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但是还有皇帝们，汉文帝和汉武帝都很相信符应。汉武帝在他第一次策问中就说：“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之强调符应，却有他的一番道理。他在《春秋繁露·符瑞》中写道：“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与不正之间，而明改

<sup>①</sup>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把西狩获麟作为受命之符，即把“春秋”当作一个朝代，获麟作为孔子受命作《春秋》之符。郑玄解释说：“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春秋》家说孔子作《春秋》是制一代之法，董仲舒是《春秋》家，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等于是受命而王。孔子既是受命而王，所以就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只是在具体历史事实中，如何来安排一个抽象的“素王”呢？为此董仲舒下了一番工夫，他对三统说作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他的一整套体系。由于它涉及到广阔的方面，这里只将其关键的三统说作一简要的说明。

所谓三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说：“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式，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这一段话是说，王者受命改制，要当十二色。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的物色各不相同。在这十二色中，有三个正色，对应于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三月（翌年正月）。这三个月称为三微之月，三微之月的物色比较明显，容易识别。二月之后各月的物色不那么容易识别。据《白虎通·三正》说：“三微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万物动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受命之王必奉三正之一为一年的开始，并以这三正的颜色来确定其得何统。如夏奉人正，即以十三月（翌年正月）为一年之始，色尚黑，故夏得黑统。《白虎通·三正》还强调了朔，如说：“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即夏得黑统，殷得白统，周得赤统。至于何以只

选这三微之月为正，《白虎通·三正》认为：“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这三微之月的三正是轮流当值的，所谓：“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白虎通·三正》）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夏以十三月孟春为正，黑统，继夏者殷以十二月季冬为正，白统，继殷者周以十一月仲冬为正，赤统。往前推也是这个轮值次序，即夏前一代应是赤统，夏前二代是白统等等。再往后推，继周者当复以孟春月为正，亦为黑统筹。这样一排即可知董仲舒所说之“逆数三而复”的具体意义。由于董仲舒以夏商周三代定三统，三代以前云“绌”，故说“绌三之前曰五帝”，五帝者，何谓也？《白虎通·号》篇说：“《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每帝取一色，依五行而定，如黄帝得土德，土色黄，故以黄为首色。第二大帝颛顼如依邹衍五行相胜的规则，当是青为首色等等。至于“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之句及其后面的话，则要在进一步阐述其改制思想后才能明了。

董仲舒接着说：“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董仲舒以夏商周三代作为三统轮转的基本模式，将三代以前的五代称为“五帝”，又追前一代（按其原理似是前三代）为“九皇”，一共九代。所以殷商的丑正白统，与其前二代夏和虞组成“三代”，称为“亲夏故虞”。将虞之前一代唐列为五帝之最后一帝，即“绌唐谓之帝尧”。于是虞、夏、商为三王，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帝尧为五帝，神农之前一代伏羲为九皇。之后周代殷，子正赤统，则以夏、商、周为三代，即

“亲殷故夏”。夏的前一代虞绪为五帝，称为帝舜。而原来五帝之首的神农为九皇，轩辕黄帝为五帝之首。再从周往下推，按董仲舒的意思当是《春秋》，他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春秋》尽管是孔子所修，可毕竟只是一部书。因此把鲁国取来作为新王的化身，意指孔子在《春秋》中赋予鲁国以王的地位，但鲁国这个王并非是鲁国国君，实际上只是孔子“素王”之所依托。《春秋》既为一代新王，故有“绪夏、亲周、故宋”。此处说“故宋”，而不说“故殷”（或故商），是由于周公在平武庚、管、蔡之后，立殷后微子于宋，以继殷祀，故宋即为殷（商）。<sup>①</sup>而孔子本是宋人<sup>②</sup>，故说“故宋”。总之三统以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相继，周而复始。三统之具体表现就是三正，三正就是三微之月，黑统以正月（建寅之月）为岁首，白统以十二月（建丑之月）为岁首，赤统以十一月（建子之月）为岁首。这样他就否定了其他月作为岁首的可能性，而秦朝自以为得水德，以十月（建亥之月）为岁首，是不符合三统说的原则的，因而秦不能算为一统，也就不能算为一代。汉代就不存在继秦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春秋》虽为新王，定了一代的制度，却未曾实际行用。所以《春秋》虽继承周代，实际上应是施行《春秋》之法的朝代，才是真正继承周代的。因而董仲舒以三统说说明汉是直接继承周代，即汉应得黑统。

董仲舒立三统说实际是从五德说蜕化出来的。其循环相继，终而复始的朝代相继的理论是二者一致的。无论五德或是三统均强调颜色，五德之色是按五行之色，三统之色取冬日（三微之月）物应之色。三统之三色与五行之五色相同，即取五行色之黑白赤，略去青黄二色。五德说以当令之五行作礼乐制度的标准，

① 《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② 见《穀梁·桓公二年》传，范注：“孔子是宋人。”

如秦得水德色尚黑，以六为制等等。而三统说则以三统四法作礼乐制度的标准，而其取“四法”也是根据邹衍的文质互救的观念。所谓“四法”，即夏、商、质、文（注意这里夏商不是朝代名，是四种法制中的两种）。这四法也跟三统一样循环相继。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这里所说之不易者就是“道”之不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谓“再而复”者就是文质轮替。《逸周书·周月解》说：“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王充在《论衡·齐世》篇中说：“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独今也。何以效之？传曰：夏后世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当教以忠。”王充引用三王之教循环的说法，目的在于说明各时代均有文有质，有盛有衰，因而文质交替。董仲舒在对策中又说：“今汉继大乱之后，宜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所谓“三而复者”，是指正朔之改变，按三统循环之法。所谓“四而复者”，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又说：“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对此《白虎通·爵》说：“爵

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刘向《说苑·修文》说：“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是说商为质而夏为文，一商一夏再而复，实即一文一质再而复。但董仲舒却将其列为四，即其在《三代改制质文》中列出的：“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主天法质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质爱……”以及“主地法文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礼文……”又说：“故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返本。四法之天施符授圣人，王法则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将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锡姓为姚氏。……天将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锡姓为姒氏。……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锡姓姬氏。”这四法之循环，接替周的当是主天法商而王之法。在董仲舒心目中，汉代就是要主天法商而王。

如果依照董仲舒的设计，汉代改制的方式即应依黑统和法商。其关于黑统者是：“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迎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妊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赤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这就是董仲舒大略言之的黑统的制度。配合的还有汉代应天法商的制度。其说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宫明堂员，其屋高严侈员，惟祭器员。玉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员。釜舆尊盖，法天列象，



垂四鸾。乐载鼓，用锡舞，舞溢员。先毛血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于尚位。”这是法商的制度。汉若继周为王，那么就应按上述黑统和法商的制度进行改革。

董仲舒的设计是基于他的一整套阴阳五行哲学。他的三统理论从主张符应说开始，但他的符应却不简单地见什么黄龙、黑龙，或是发什么大水，天上落下什么金子等等，而是将其符应建立在他的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关系哲学系统之中。他的天人感应说的基本核心就是天任命一个君王来对人民进行统治。

#### （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当汉高祖趾高气扬地说“北時待我而起”的时候，他实际上对自己得水德王已经十分满意，不然张苍的汉德水德的理论就不可能一直维持到汉文帝时贾谊等起而反对。直到他的曾孙汉武帝，对汉得水德王才根本上被废除。

汉武帝却不满足于五帝中的一帝的符应，而是采用了方士亳人谬忌的建议，更立比五帝更高一等的太一，亦称太乙，谬忌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于是在长安城东南郊建了一座祠坛高为三阶的太一祠，五帝祠坛环居其下，这样就显示了太一的尊贵。这个太一当是帝中之帝。据曾国藩在其《求阙斋读书记》卷五论述《淮南子·泰族训》的泰字说：“始而又始曰泰始，一之又一曰太一，伯之前有伯曰泰伯，极之上有极曰太极。”所以太一是一之又一，若太一为帝则当是帝上之帝。在哲学上，道家用“一”来代表万物的根本，百事的起源。《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万物生。”《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又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由上述可见太一是阴阳未分时的状态，是阴阳的合体。《易·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定大业。”《易·系辞》将太一称之为太极，即表明太一概念的产生与天极概念有关。特别是星官家总是在天北极处要找一颗明亮的天体作为天北极的指示星，如果天北极处没有，就在靠近天北极处找一颗天北极的指示星。对于这个指示星，总是给予与天极或天帝有关的星名。而这颗星又与太一相关。如《史记·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汉书·天文志》则写作“太一之常居也”。当然方士们则认为太一是一位最尊贵的天神，高居于天极附近的紫宫里（星官家将北极附近永不下落的星区称为紫宫和紫微宫），总管宇宙间的一切。太一下面有五帝辅佐。

董仲舒在构建“三统”说之时，已经强调新的一代君主受命必改正朔，定制度，易服色等。所有这些改正都是表示受天命，所以他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这里“奉元而起”的“元”在董仲舒的体系中是很重要的。他在《春秋繁露·重政》中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还认为元“乃在乎天地之前”。由这些话看来，董仲舒的元也具有太一的意思。“太一”是阴阳的合体，是阴阳未分前的存在。而“元”是天地的合体，是天地未分之前的宇宙。在汉武帝极力崇拜太一时，董仲舒提出了元，从而使元与太一天帝结合了起来。这个“元”在《史记·历书》里说得十分清楚：“王者易姓受命，必谨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义。”即元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一切事物都深深地根系于元。即如国家的根本建构就系于元。他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二端》）

所以元既是天地的本原，又包涵着天地。而天地又是元的具

体体现。另一方面元是抽象的“宇宙原理”，而天地却是宇宙的具体模式。从宇宙结构观点看，董仲舒以为元是宇宙的本原，而天地是宇宙的实体，在思想上可能有将宇宙和天地分开来的倾向。不过他关心的是从这一套宇宙和天地的理论中，论证人间君主的统治。

董仲舒首先强调人间最高统治者是上天赋予他的权力和地位，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受命于天的帝王又称天子。而天下受命于天子，故一切人等均是君王的臣民。因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杯》中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因此君王的一切行为政令都得取法于天。如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说天：“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那么人间君王如何效法呢？应当像天一样使自己尊贵，这就要给贤能者以爵位，让他们去具体执行贯彻政令，而自己不去劳于具体事务。汎爱众生，不以喜怒赏罚，这就是施仁了。而且使自己深居隐处，住在深宫高阁，不轻易让人看到，这如同天无常形那样神秘。任用能人贤人观听四方，这就是如天之明。按照各人的才能授以适当的官职使贤愚有别，如同天上星体排列明暗相承。将贤人养在身边，以备发挥作用，这就如天不断积聚阳气而显其刚健等等。更具体一点如他在《春秋繁露·官制像天》中说：“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官员的这种数目，并不是按当时君王事务的需要，而是根据一个传说，黄帝曾经教导颛顼说：“有大圆在上（指天），大矩在下（指地），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因为圆是径一围三，方是径一围四。故而这个传说是说明三和四这两个数是以天地为准的。故董仲舒说：“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起而成是指三个月成

为一时（一个季节），四时而终是指一年四季而终。所以三人为一选是仪于三月为一时；四选而止是仪于四时成一岁。选的意思是同类中之上乘。所以三人为一选是指天子有三公，每一公有三卿相佐，故有九卿。每一卿又有三个大夫辅佐，故有二十七大夫。每一大夫又有三个元士下属，故有八十一元士。这些官共分四等，即公、卿、大夫、元士，所以“四选而止”。这些官员数目总加起来为一百二十。因此王者法天在董仲舒那里是相当严格的。关于各官职所应有的作用，也不是随便说说，也是根据天的阴阳五行的法则。即其政制象天，政事亦必须与天的阴阳五行法则相应。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是以天地之道实在于阴阳五行。

首先是阴阳。董仲舒在第一次对武帝的对策中就强调：“天道之大者在阴阳。”（《汉书》本传）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又讲：“天地之常，一阴一阳。”即是强调天道中以阴阳为主。阴阳在天地这个体系中似乎是两个气团，《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中说：“天之道，初薄大冬，阴阳各从一方来，而移于后。阴由东方来西，阳由西方来东，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别而相去，阴适右，阳适左。适左者，其道顺；适右者其道逆。逆气左上，顺气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见天之冬，右阴而左阳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对于这一段，如果把阴阳看作两个气团，就好理解了。即开始进入冬季，阴阳两个气团各从一方来北边（例如说子位），即来到观测者的后边。在中冬之月正好两气团同时到达子位（天的北边或观测者的后边），两个气团在此合而为一，就叫做至。至后两气团相别而去，阴气团往右（西）行，阳气团往左（东）行。往左行的为顺行，往右行的叫逆行。而这时，阳气团在下面，阴气团在上面，所以下暖

而上寒。然后这两个气团各自运行，“冬月尽，而阴阳俱南还。阳南还出于寅，阴南还入于戌。此阴阳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阴阳二气团会于子位，而后分行。阳气团至丑而后至寅位，开始由地下出地平；阴气团至亥而后至戌位，本来在地平之上而到戌位开始没入地平。接着“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仲春之月，斗建卯，即农历之二月。公历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左右交春分，正是其时。董仲舒认为此时阳气团在卯位（正东）而阴气团在酉位（正西）；而阳气团应已在地平之上，阴气团应已在地平之下。接着又说：“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日至。别而相去，阳适右，阴适左。适左由下，适右由上，上暑而夏寒。”大夏之月当是五月，此时阳气团由卯位至辰、巳二辰而至于午，阴气团由酉位历申、未二辰而至于午，故二者相遇南方，合而为一，是为夏至。这时阳气团在地平之上，而阴气团在地平之下。然后就是这两个气团在夏至后又别而相去，阳气团向西，阴气团向东。接着又说：“夏月尽，阴阳俱北还。阳北还而入于申，阴北还而出于辰。此阴阳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至于仲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阴阳均而寒暑平，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气团过夏至后往西至申位，开始降至地平；阴气团过夏至后往东至辰位，开始升出地平。阳气团到酉位降入地平一半；而阴气团到卯位也出地平一半，这时是秋分。秋分之后，阳气团继续北行到戌位，全部到地平之下；阴气团继续北行至寅位，全部出地平之上。而后又回到冬至。由此可见二气团都有一定的体积。

根据以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中所说，实际上描述的是太阳周年视运行，只不过他仿效了古代天文家的故伎，将太阳化为雌雄，在董仲舒是化为阴阳两气团。古代天文学本以岁星行至那一星宿来纪年，但因岁星运行不均匀，且与斗柄之运转方向相反（即逆行），因而假想了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



反，但运行速度相同而且均匀的太岁来纪年，则较直接观测岁星为佳。可能这种设想与阴阳观念相切，所以《淮南子·天文训》又说：“北斗之神有雄雌”，即真（雄）北斗左行，而雌北斗右行，但两者的运行速度相同。可能古代阴阳家将阴阳观念提高到宇宙原理的地位，正是借助于天文家的这种办法。

董仲舒将阴阳二气的运行作仿效于太阳周年视运行的描述方法之后，就将阴阳二气主要的作用或功能作了说明。首先说：“故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发于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是。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阳尊阴卑》）阴阳在季节和相应的物候上的表现，实际是那两个气团运行法则的必然效应。由此他“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再进一步，推出：“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又说：“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从而又进而提出“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最终得出：“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因而可知“刑之不可任以成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由此他从阴阳说到刑德，由刑德而说到治道，从而论定秦朝刻意刑法之治违犯天意。秦之灭亡盖由于违反天意，并非仅仅纯用武力就可以推翻的。

董仲舒将阴阳之说用于治道，尤其关注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他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中最要紧的是君臣和君民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正常，即王道正，那么就“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即天会示人以吉祥。如果王道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即天会变色，示人以灾殃。鉴于此，董仲舒强调符应，强

调天垂象于日月星辰风雨，示命于禽兽虫鱼草木，强调灾祥等等。所以其阴阳五行说乃是其灾祥符应的理论基础。

关于五行，董仲舒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他的五行的这种排列与《洪范》不同，《洪范》五行是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洪范》五行，郑玄以为是本阴阳所生之次序。即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等等。而董仲舒的五行则是以四时更迭休王为序。即所谓播五行于四时。所以他进一步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五行之义》）这里所说的授受之义，如《国语·周语》所说：“颛顼之所建也，帝尝受之。”韦注：“颛顼水德之王，立于北方。帝尝木德，故受之于水。”因此朝代转变时王权之授受据于五行，而一朝中之政事也须据此五行法则。从五行相生言，东方为木，木为农之本，司农所主，尚仁。耕种五谷，家给人足，仓库充实。于是“司马实谷”。司马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司马所主，尚智，能“昭然独见存亡之机”，能辅其君以定天下。天下既宁，以安君者司营也，司营者土也，故曰火生土。中央者土也，司营所主，尚信，至忠厚信，以事其君。“应天因时之化，威武强御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尚义，故“兵不苟克，取不苟得，义而后行，至廉而威，质直刚毅，伐有罪，讨不义”。是以百姓附亲，边境安宁，寇贼不发，邑无讼狱，则亲安。执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北方者水，司寇所主，尚礼。礼治既立，上下有序。于是“百工维持，以成器械，器械继成，以给司农”。司农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从五行相胜而言，若五官失

职，则五行失序，相生不起作用，而转为相胜。司农为奸，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农民叛乱，司徒诛之，故曰金胜木。司马为谗，反言易辞诬陷别人，离间君臣骨肉，专权擅政，薄国威德（自树权威，牢络民心，故薄国君之威德）。司寇诛之，为水胜火。司营失职，则寻主以邪，陷主不义，上奢下叛，民弑其君，为木胜土。司徒为贼则士卒不用命，兵弱地削。司马诛之，为火胜金。司寇为乱，巧言令色，阿党不平，诛杀无罪，司营诛之，故土胜水。

因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实际上是为符应说及改制说建立了一个理论基础。而这一点对汉代学术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 （五）封禅和改历

董仲舒创立三统说和天人感应说之后，其符应和改制都有了理论依据。于是他就建议汉武帝进行两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这就是封禅和改制，而改制最根本的一环就是改历。

董仲舒强调真正的帝王是受天命而为的。其所以能成为帝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的一种力量使之成就，这就谓之天命。而天命必有其表现，这就是符应，就是“天命之符”。因而在董仲舒看来，帝王是依仗上天的超人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当帝王应天命而立时，就必伴随着各种符应，诸如日月星辰风雨的示象，禽兽虫鱼草木的变异等等。这就是“法天”原则的具体表现。当被天任命为新的帝王者，理应进行封禅活动，即举行一个向上天报告自己受命的礼仪，也表明帝王的至高无上。因此封禅活动是一种向普天之下昭示帝王受命于天，非任何人所能反对亦非任何人所能妄图者。而其证明就是一种符瑞或吉祥的符应。

汉武帝从事封禅活动是很认真的。在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即开始了这项活动。这年开始，即冬十月（其时尚未改历，仍袭秦制，以冬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武帝行幸雍，祠五帝

時時，获一角兽，象麋，《汉书·武帝纪》说“获白麟”，这就被认为是一种祥瑞，说明“符应合于天”。为此武帝除对五畤加重祭礼外，还赐诸侯白金。当时大家都以为酝酿已久的封禅活动就要付诸实行了。济北王以为获此符应，天子即将封禅，因而上书献上他封地中泰山附近地邑，以备封禅大礼之用。武帝也将这年改为元狩元年，开以符瑞来纪年的先声。此后又在公元前116年，在汾水掘得宝鼎，这又是一项祥瑞，因而汉武帝又改年号为元鼎，这年为元鼎元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立太一五帝祠于甘泉，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亲郊见，自是三岁一次。到次年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亲自主持讨论封禅仪式及诸事宜。次年即公元前110年，这年改为元封元年，汉武帝登封泰山，又禅于梁父的肃然山。这次大规模的封禅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帝王受天命，天赐符应的思想牢固地树立起来。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以后，汉武帝几乎年年出外巡狩。但在董仲舒思想指引下，还是积极进行改制活动，而改制的重点是改历。封禅后不久，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及太史令司马迁等提出“历纪废坏，宜改正朔”。汉武帝据此将在封禅活动中立大功，后升任御史大夫的倪宽找来，要他“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倪宽与博士们讨论后回报说：“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惟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武帝立即下诏修历，并说：“其以七年为元年。”<sup>①</sup>即要以今元封七年为改历后的元年，也就是今年改历完毕。于是立即招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议造汉历。为了分天部，运算转历等又选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

<sup>①</sup> 见《汉书·律历志》。

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等参与。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使得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整历法制定下来。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五月，武帝正式颁布《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并因此“定官名，协音律”。太初历相当严格地贯彻了董仲舒的三统说。董仲舒明确指出过：“《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又说：“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其说“时正黑统”，“斗建寅”，“行夏时”等等都是三统说的具体体现。

京房是在董仲舒学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在他一生的著述中，都深受其影响，处处表现出董仲舒的那种天人相应的原则精神。但也有与董仲舒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天人关系上。董仲舒认为人世的一切是“法天”的，因而天像大神一样控制着人间的一切。但京房并不将天或宇宙当作天神，更不将宇宙或天地与方士系统的“太一”天帝等联系起来。他认为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是宇宙或天地自身的结构或组织，因而以阴阳五行机制为基础的天人关系，不是一种神坛与众生的关系，也不是某种天神与其统治下的万民的关系。人天关系只是宇宙或天地结构的外在表现，即宇宙或天地深层结构中的某种变化在宇宙或天地中的万物，也就有着相应的变化。所以他认为各种现象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也反映了宇宙和天地间深层结构的变化。如果天地间阴阳调和，五行有节，则万物繁荣，人丁兴旺，社会安定；反之，天地风雨错谬，灾异频繁，人民贫苦，社会动荡，政教不立。这种阴阳不协，五行乖乱只要帝王在政治上进行有效的调节，就可以消除或改善。比如对于符应，京房就认为“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sup>①</sup>即认为人主只要任用贤人，去佞人就会有符瑞之应。符应只不过是宇宙或天地深层结构变化的各种反映，他认为宇宙

<sup>①</sup> 《汉书》京房本传。



或天地间的阴阳五行机制是可以被帝王掌握而加以调节的。他更进一步认为宇宙或天地的深层结构可以用《易》学中的八卦系统来表示，或者他认为八卦系统就是一种天地宇宙结构的符号系统。京房一生就是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由于他把摊子铺得太大，而且死得又早，最后似乎只留下了一大堆零散的资料。关于其治学的大略在后面章节中将作详细的叙述。

## 二 京房的出身和求学

《汉书》本传清楚地交代了京房死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死时41岁。由此可推知京房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即公元前77年。他在三十三岁时，即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举孝廉为郎，进入宫廷为官。不过他做官的时间不算太长，前后共八年。所以在京房不算太长的一生中，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汉元帝初元四年为界。前一时期，即在三十三岁入朝为官前，主要是求学和研究学问时期。后一时期是入朝为官时期，似乎这一时期主要是为皇家预报灾异，推行考功课吏法等，其实主要还是从事学术探讨。综观其一生，并非做了什么大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和功名，主要是他在当时的学术探讨中做了一些工作，对后来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的研究工作涉及面较广，如考功课吏、易学、星占、灾异、音律、风角，均有所涉猎。在这些领域中不仅仅是一般的涉猎，而是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由于主要是从事学术探讨，不娴于政治，一入朝廷为官，却卷入了政界的斗争，所以最后被“弃市”了结此生。

### （一）京房故里

对于京房的悲剧的一生，还得从他的故里说起。按其本传所载，他是汉时东郡顿丘（今河南省清丰西南）人。汉时的东郡顿丘，是个著名的地方。其所以著名，不仅仅是那里物产丰茂，逸豫声色，主要是古代三皇五帝中五帝的第二大帝颡顼和第三大帝帝啻都在这里生活和活动过。直到现在，那里还有颡顼大帝和帝啻大帝陵墓的遗迹。关于颡顼大帝的陵墓，《山海经》上作过记载。其《海外北经》中说：“务隅之山，帝颡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其《大荒北经》中又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

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宾葬焉。爰有鸥久、文贝、离俞、鸾鸟，皇鸟，大物、小物。有青鸟、琅鸟、玄鸟、黄鸟、虎、豹、熊、羆、黄蛇、视肉、璿、瑰、瑶、碧，皆出于山。卫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按清郝懿行说：“《海外北经》作务隅，《海内东经》作鲋鱼，此经又作附禺，皆一山也。古字通用。”<sup>①</sup> 这里还明指这山的出产品类甚丰，又点出了卫丘的地名。顿丘在周时为卫国地域。晋代注《山海经》说：“颛顼号为高阳，家在今濮阳故帝丘也，一曰顿丘。”据《河南通志》载：“颛顼、帝喾二帝陵，在滑县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因此务隅，鲋鱼、附禺山当即是后来的土山。《明一统志》载：“滑县东北七十里为古帝丘城。”又说：“开州西二十五里有颛顼城。”《大名府志》载：“颛顼城在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今滑县东北界，去清丰县西南五十里许，盖旧本顿丘地。”上述滑县，开州、清丰三地，滑县仍为旧制，汉时称为白马；开州即濮阳市，清丰亦仍旧制。但要说明的是清丰建置于唐朝。唐大历七年割顿丘、昌乐二县界置。所以后来言古顿丘，均指在清丰县西南。但若按诸方志综合观之，即居于滑县东北七十里，濮阳西二十五里，清丰县西南五十里许。则当如李白林所撰《古顿丘怀古》一文中所说：“古顿丘遗址：今河南省内黄县梁庄乡，位于黄河故道之大城村也。”（见《中原文献》二十六卷三期）据李白林调查，据当地的有识之士谈，原来大城村分为东西两个大城，中间相隔二里许，村各长里许，东西共长四五里。东西大城之间有一座城隍庙。原来城隍庙树有庙碑。碑文说：“古之顿丘，卫邑也。”

从历史上看，顿丘早就有名。《诗经》中就曾提到顿丘。在《卫风·氓》中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止于顿丘。”一个农民来到朝歌（现在的淇县）做丝绸生意，结识了一位姑娘，二人相爱。临别那姑娘送他过了

<sup>①</sup> 见袁柯校译《山海经校译》第十七《大荒北经》之注〔一〕。

淇水，直达顿丘。可见顿丘当时已是一个地区的中心，亦为繁茂之地。周武王克殷纣后，将殷商遗民封了一个诸侯国，由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来统率。后来武庚禄父和管叔、蔡叔联合叛乱。周公平息了这次叛乱后，封康叔为卫君，来治理武庚禄父统领的殷商遗民，在河淇之间建立卫国，作为周王都的屏藩。卫国建立之后平稳了一段时间，传至卫懿公时，狄人入侵，杀了爱鹤的懿公。接替君位的卫戴公，率领臣僚渡过黄河，流亡到了曹丘，后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到了楚丘才安顿下来。这大约是公元前660年左右的事。又经历三十余年，到卫成公时（公元前624年左右）卫国又由楚丘迁到帝丘。前引郭璞所说，帝丘一名顿丘。清代学者毛奇龄《春秋传》中说：“帝丘卫域，即毛诗所云顿丘。”所以这个帝丘即是顿丘，曾做过卫国的国都。《竹书纪年》载：“晋定公三十一年城顿丘。”似乎是说这时（当在公元前481年），顿丘才建城池。从此由丘墟转为城市。按《汉书·地理志》说：“《春秋经》曰：‘卫迁于帝丘’，今之濮阳是也。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后十余世，为韩魏所侵，尽亡其傍邑，独有濮阳。”顿丘和濮阳两地，一东一西，相距不过二十五里，故古代往往将此二地一并写来。如《史记·五帝本纪》注中，《皇览》云：“颛顼陵在濮阳县顿丘广阳里中。”《集解》云：“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汉书·地理志》说明卫国被邻国韩魏等所侵食，卫国国君及其臣僚只能躲在濮阳城中。看来距濮阳城二十五里的顿丘亦被其吞没。所以才会有晋定公三十一年在此建筑城池的记录。虽则使用的是晋定公的年号，实则是韩魏等所为，因其后六年魏赵韩三家分晋，晋亡。秦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即置东郡，顿丘入秦域。但是卫国并未消亡。《汉书·地理志》说：“后秦灭濮阳，置东郡，徙之于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犹独置卫君。二世乃废为庶人。”汉高祖始置顿丘县，属东郡。所以京房本传说他是东郡顿丘人。

按《汉书·地理志》说：“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

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按《礼记·乐记》所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吉联抗在他所注《乐记》<sup>①</sup>中说：“慢”可作“绝对放纵”解释。所以郑卫地区的音乐，一直被看作是纵情声色的黄色音乐。“桑间濮上之音”则更为严重，据说殷纣王就是因为爱听这种音乐，而导致亡国，所以是亡国之音。据《汉书》注引应劭说：“桑间，卫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声。”桑间濮上正是京房故里。也许京房对人们这样看待他家乡的音乐有不同的看法，而导致他后来对音律作深入的研究。吉联抗先生在其对《乐记》的译注中也说到郑卫之音未必就是黄色音乐的古代典型。由于郑卫之音当时是一种新的曲调或是一种新的声律，这种新声一出现，即吸引人们的注意，很快就熟悉其特点，而特称之为郑卫之音。由于与传统的音乐体系不一样，遭到人们的批评或反对是很自然的。然而有理由相信，这种郑卫新声肯定与当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有关，与声色货利等物欲追求相联系，令人趋于耽逸，趋于声色之乐。趋于声色之乐必然竞逐繁华。京房的热情奔放，追求新奇，常常显露锋芒等性格特征，或许与此种风气的影响有关。

又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其地慕勇士之为人，崇尚争于气力的刚武民风，使得这地区的人民往往表现为好勇斗狠，不畏权势。对于过甚的压迫，往往敢于反抗。所以汉朝廷对于东郡地区的治理，主要是采取残酷镇压的方法。因而派往东郡地区的官员，大多以“杀戮为威”。京房性格中的豪放不羁，不受约束和倨傲，当与受此种民风的熏染有关。

---

<sup>①</sup> 人民音乐出版社《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1987年印本。

## (二) 京房家世

京房本人大约出身于一个豪富的家族。对于他的家世情况，目前尚知之甚少。有关他家族的直接记载，只有东汉的王符在其所撰《潜夫论》中略有一点记载。在该书的第一篇《赞学》中写道：“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这里所说的景君明，就是京君明，即本评传传主京房。清代学者汪继培撰《潜夫论笺》，注云：“京房字君明，《贤难》篇及《考绩》篇并称京房。景、京古通用。”这则记载显示了京房出身于富豪之家和他又是一个精勤的学者。

说到京房的家族当必先论及京房的姓氏。按其本传说：“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因此对李氏和京氏的情况要先大致了解一下。按郑樵《通志·氏族略》说：“李氏，嬴姓。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元和姓纂》作女莘），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因官命族为理氏。夏商之季，有理徵，为翼肆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何氏，携子利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利贞十一代孙老君，名耳字伯阳，以其聃耳，故又号为老聃。居苦县赖乡曲仁里。”《元和姓纂》与此同。罗泌《路史》亦基本相同，惟由理改李则说：“李与理通，《周语》‘行理以节逆之’，孔晁本作行李。昔晋文公命李离为李，以为皋陶之后，并其证也。”因此可见，谈及李氏的关键有二，一为皋陶之后，二为与著名的老子相关。但是李姓可能非仅此一脉。罗泌《路史》又说到：“徐广云：‘河内平皋有李城，李阪，今温县城。是昔李同却秦兵死，封其父李侯即其地。’即除了在苦县的这一支李姓外，还有在河内郡的一支李姓。大概还有其他的李姓，这里就不去深入探讨了。再说京氏。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佚文《姓氏篇》说：“京氏，郑武公子段，封



于京，号京城大叔，其后氏焉。汉有京房，本姓李，字君明，后推律自定为京氏。”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京氏又作了一些补充，说郑国后裔的京氏所在地是：“旧荥阳京县是其地，后齐废入荥阳，在故城县东南二十里。又李氏改为京氏，望出谯国。”郑樵在此又说了有从李氏改为京氏者，但望出谯国。而谯国即沛国谯郡，即今之安徽亳州附近。与老子的地望苦县很近。即京氏与老子这一支李姓有关。按以上诸说，京氏应有两支：一支是郑武公的后裔，因地名而得姓；一支是老子那一支李姓的后裔，望出谯国的京氏。如果论及本传主京房与这两支京氏有什么关系的话，则由于他本姓李，自然会联想到老子李氏之后的那一支京氏，而不会联想到郑武公之子京城大叔之后的京氏。老子李氏之后的京氏是“望出谯国”，而京房却出身于东郡顿丘，属于古代卫国地域，这两地并不相连，且相距较远。如果一定认为他与老子李氏有关，或者从他开始姓京，那么就应说老子之后的京氏，望出顿丘或东郡。所以京房原姓的李氏，可能根本不与老子李氏相关，而更可能与前述《路史》所说的河内郡李氏相关。因为河内郡与东郡紧邻，亦为古之卫地。而且河内郡之平皋与顿丘亦可谓紧邻。所以京房原是这支李姓之后，自己吹律定姓，改原来自己的李姓为京姓。

京房的李氏家族，虽王符说是一个富豪的家族。可能在西汉年间还算不上是十分显赫的家族，所以有关顿丘李氏的史料几乎阙如。有关京房家族的情况就更难找到。但是在汉朝以后，直到唐代，据《嘉靖开州志》和《清丰县志》记载，顿丘人人朝为大官大吏者，大多为李姓。特别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王朝，其国之重臣中有不少出于顿丘李氏。如御史中尉兼度支尚书的李彪，其子李志，也是北魏朝重要文官，其女则立为婕妤，一家俱是皇室亲贵。另有袭彭城公，吏部尚书，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僕射的李平，其子孙等十多人都在朝为官，有些是国家重臣。特别是北魏文成皇后李氏，其父李诞，其兄李崇，其侄李世哲，李神

轨等均是北魏王朝的柱国大吏。如李崇除袭陈留公，领荆州等三州郡刺史，还拜为镇西大将军。这些顿丘籍李姓豪强与北魏王朝关系如此密切，说明在北魏王朝建立之前，即已是豪门望族。这是由于一向在北荒游牧的鲜卑族拓跋部人，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旧习惯，往往乘中原混乱，以武力入侵，掠夺一些财物后又退回北荒。若要有效地在中原地区立足，要有效地统治中原百姓，除了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制度外，还要任用汉族士人为官来指导政治。公元386年，拓跋珪为王，开始建立具有规模的北魏王朝，就大量从北方豪门大族中选拔官吏，并与豪门大族联姻。公元399年称皇帝（魏道武帝），这时的北魏王国已是北方最强的国家，与南朝的东晋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到宋文帝元嘉年间（公元424年），统一了黄河流域。短短几十年间，文化极其落后的鲜卑族拓跋部，进入了中原，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帝国。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鲜卑族的统治者深知，必须取得中原豪门大族的支持，要通过联姻，封官等与他们结成联盟，使之参与统治。在拓跋氏拉拢的中原豪门望族中，顿丘李氏是重要的一支。这些后来的顿丘李氏豪门望族与京房李姓有什么关系，现在当然很难弄清楚。但是可以设想，如果他们之间有某种关系，那么这些显耀的顿丘李氏豪族的前辈们与京房的李姓家族当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京房出身于富裕家庭，但他并没有沾染上富豪子弟的纨绔习气，也没有富家子弟的优越感。他却更加努力学习，王符说他“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描述了他关门读书，钻研圣人经典的苦学精神。王符对于董仲舒和京房两位家庭富有的学者，和对于倪宽和匡衡两位家庭贫困的学者进行了分析对比，认为：“夫此四子者，耳目聪明，忠信廉勇，未必无俦也。而及其成名立绩，德音令问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经典，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倪宽和匡衡二人由于家贫，奋发努力，在学业上下功夫以求得发展，是一种有志气的表现，

王符将他们作为有志者的典型。家庭富有的董、京二人，也能如此锐精于学业，那又是何故呢？王符认为这是有才识的表现。所以王符将他们作为有才识者的典型。即所谓：“董、景之才，倪、匡之志。”王符对京房的才识是赞赏的。但他没有进一步分析京房何以会有如此的才识。

京房年轻时除锐精于学业外，还做了一件事，在他一生中较为重要，即他自己通过吹律定姓的方法，改李姓为京姓。据其本传记载，他跟焦贛（焦延寿）学习时，焦贛常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焦贛称其为京生，当为他已改姓京之后。所以吹律定姓一事是他年轻时所为。汉代改姓大概不是什么稀奇事。例如著名的大将军卫青，以同母姊子夫得幸武帝而冒姓为卫氏。《汉书·灌夫传》说：“父张孟，尝为颍阴侯灌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灌氏姓为灌孟。”即张孟改姓为灌。又如《汉书·夏侯婴传》说：“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即滕婴的曾孙滕颇与公主结婚，公主随外家姓孙，其子孙即改为孙姓。特别是原卫国地区的河内郡，颍川部分地区，由于是殷纣王之故都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说：“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又《汉书·地理志》说：“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这种“好生分”和“好争讼分异”，即家庭富有而子女长成，就有财产争讼，而通过分家改姓氏以告终。这种情况古人认为这些地区风俗褻薄所致。但是古代士大夫家族，多为亲族聚居，凡一家族聚居而兴旺者必为世所称道。如汉高祖谓诸功臣：“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又如后汉蔡邕，其传说他：“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古代分异，往往伴随着改姓氏。因此再来看京房之改姓。前已述及，顿丘李姓可能是河内郡平皋李姓生分而来，这一支还保留了李姓。这种生分在那时那个地区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但是应该是

士大夫出身的京房家族，对改姓的做法应是有所顾忌的。可能是由于京房改姓的方式，使他得以顺利进行。他吹律定姓的根据，据《潜夫论·卜列篇》述俗人之说云：“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随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木精，承岁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角。神农火精，承荧惑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徵。黄帝土精，承镇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宫。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商。颛顼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羽。”不过王符认为这些是“今俗人不能推纪本祖，而反欲以声音言语定五行，误莫甚焉。”但京房时代的情况可能稍有不同。据隋朝肖吉《五行大义》引《乐纬》说：“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这显然是五行说盛行之际，以五行配五音，又将姓氏按五音分为五姓的一种五行配当。由于其说与音律有关，故《乐纬》神其说，托之以孔子。《乐纬》之说虽是附会，但自战国以来，这种五行五音之说在社会上十分盛行。按饶宗颐先生的研究，秦简中保留有当时的纳音占和纳音说。他在其所撰《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载《中国语文研究》第七期）中证明，云梦秦简日书中的《禹须臾》即依纳音择日之立成法。这说明在京房之前，以五音分为五姓和纳音占均已流行。而《乐纬》所说之“一言得土曰宫”等等，即为纳音说之表示方式。可能在京房时代看来，吹律定姓是出于夫子之遗教，因而他认为吹律定姓是对孔子经典的尊崇。由于这样，即或是有人反对他改姓，也不好再说什么。附带说一下，顿丘曾经是夏后之世，昆吾氏所居。昆吾行夏政，因此《禹须臾》应当是在顿丘地区流行的择日之术。

若仔细考察京房吹律定姓的根本原因，则可能有二。一方面望出谯国的李氏之后的京氏，当在京房之前就已有。比如前京房就是在本传主之前姓京。可能出于谯国京氏，也可能出于荥阳京氏。在顿丘的李君明可能羡慕这一支源于著名学者老子之后，因其后有京氏，由李改姓京，则只能是老子之后，而李氏却不见得

都是老子一脉。故他以改姓京强调其与老子的渊源，从而提高之士人心目中的身价。而其所师事的焦贛，虽说是梁人，但焦氏却本出于谯国。焦贛可能对谯国李氏之后的京氏有所了解，京房听其说而受到启发，起了吹律改为京姓的心思。这些都只是推测，不能作为定论。但是另一方面，却要注意到京房的一个特点，即他对本氏族的地望十分重视。从本氏族的地望出发，导致他吹律定姓，改为京氏。顿丘是以“丘”为其地邑的特色，《山海经》说这个广阔三百里的大丘上盛产各种物类，以富庶闻名。而且这里还埋葬着颛顼大帝和帝喾大帝，这两位大帝的业绩还留传在这个大丘上。《说文》云：“丘，土之高也。”而丘中最高最大而丰伟于众者称之为“京”。《尔雅》云：“丘之绝高大者为京。”应劭《风俗通义》说京，“谓非人力之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因此他改姓为京，是取丘之绝高大者为义。这一方面显示他出身于顿丘名门，更显示己之志向高远。另一方面则表明他欲穷通天地自然之性，俨然以掌握天地宇宙之大道为己任，超绝于众而拔于群者也。就京房的思想性格而言，他的吹律定姓是他自己对世界的内心表白。改姓不是一件什么大事，这一事件所透露的京房内心世界却对本传传主的一生相当重要。他眼界高远，志向深沉，但却自视甚高，不与世俗相容，无视世俗的一切，显示出独往独来的性格特征。他这种不合时宜的性格，在他后来的老师焦贛面前会不时地表露出来。凭焦贛的人生经验，当然明白这种性格和人生态度在仕途中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他常常慨叹他的这个学生的才智，也更慨叹他的性格和处世态度，并为此为他担心。焦贛作了前面已经引述过的那一句可怕的预言：“得我道以亡生者，必京生也。”

### （三）京房求学

少年时代关门苦读了圣人的经典，造就了他良好的治学基

础。大约为了求得深造，他离开家乡顿丘去从任小黄令的焦贛学习。从顿丘到小黄并不很远。因为顿丘在那时与内黄是紧邻，小黄也称为外黄，即取内外二黄隔河相对之意。小黄其时属陈留郡，而后是陈留县的一个市镇，现在在河南省杞县东北。对于从未出过家门的京房来说，不啻是一次远行。在横渡大河的旅行中，真使他获益匪浅。原来聪明好学而有点孤傲不群的青年京房，在旅行中增益了对广阔世界的认识，使他的心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的良好基础，使他跟随焦贛学习显得很轻松，大概他也常跟焦贛作一些深入的学术性的讨论，使得焦贛认为京房会“得我道”。而从与外界越来越多的接触中，其心智得到开发后也有了深刻的变化。

京房对夫子之道的追求，如果说在少年时代是从努力阅读经典中“结心于夫子之遗训”（王符《潜夫论》），那么在来到小黄随焦贛学习后，就是着力于挖掘典籍叙述中的深层意义。从他对儒学中天道本质意义的追求和对战国时代以来快速发展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入探讨中，可以判定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形成了一种虽然还很模糊，但却是相当坚定的关于天地宇宙的观念。在京房看来，圣人经典中的一切教义都应该在天地阴阳的宇宙机制中有其适当的表达方式。这时在京房的心目中，整个宇宙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力量，这种根本力量既支配着宇宙间的天体及其运行规律，也支配着大地万物的生长收藏的法则，还支配着人类社会各种行为意向乃至各类个人所应遵循的规则。他正是想从这里契入到圣人所遗经典的本质中去，也从这里真正理解圣人和对他们遗下的经典作出有效的诠释。这对于京房来说，无疑是一种刺激，鼓舞着他对圣人经典研究的热情。但对于这个志大才疏的青年而言，却起了误导的作用，使他陷进了一种悲剧性的结局。从近期而言，迫使他一步步落入死亡的圈套中去。这一点焦贛作过预言。从长远角度看，他那时的许多努力，造就他成为后世术数术迷信的始作俑者，使他成为一个可疑的学者。



不过跟随焦贛学习的京房还是意气风发的。据其本传上说他从焦贛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即是说以占验灾异为主。但是在关于焦贛本人的叙述中，又说他治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贛。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这似乎指明，焦氏除明阴阳灾异之外，也很精通“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之术。大概京房也从焦贛学习此术，而且深得其精髓，更有所发展。焦贛预言京房得其道而亡身的道，当是指此，而非言阴阳灾异预测。此术能先知奸邪，实际是一种督责之术。施行此种督责之术，自会开罪于群小，容或有杀身之祸。而预测灾异虽或不精，但毕竟难有亡身之灾。

除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之外，其本传还说京房“好钟律，知音声。”按《后汉书·律历志》说：“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说明京房在音律上也曾从焦贛处学习过。但这时他对音律研究的兴趣，并非是音乐声色的探讨，而想探讨音律和天地四时的关系，特别努力于探讨风的五音分类等等。从他在阴阳灾异预报、督责之术和音律三方面的学术研究看来，似乎这三者是完全不相同的三个领域，但京房却从三者的内在联系上，看到三者本质上的某种一致性，因而他似乎感觉到许多外部看来无关的事物，却在深层结构中有着惊人的一致。

京房从焦贛处得到的启示和他自己刻苦的学习使他觉得摸索到了一条真正深入理解经典的路子，对此他无比兴奋。正在这时，新登上大位的汉元帝却正面临着十分棘手的自然灾害。在他做上皇帝后的四个月他下了一道诏书，说：“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又说“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

乏。”并明令：“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还规定了许多拯救灾民的措施。对于这道说明灾情，对各级主要官员提出救灾任务的诏书，还未能有效执行，又在这年九月发生“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为此又下诏书，削减朝廷开支来拯民于水火。可是他登大位的第二年，即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灾异仍然不断，这年三月又下诏说：“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要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来指出朝廷的错误，解决当前灾难。可是又未过多久，“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汉元帝七月又下诏问道：“岁比灾害，……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焦虑中的汉元帝在初元三年，又碰上“珠厓郡山南县反”，“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不得不又下诏书自责。到六月又下诏自责外，还再次要求百官言其过失，省不急之费，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要求百官节省费用。明确要求“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大概就是这道诏书的反应最强烈。立即就出现“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因为这道诏书提供了官额，提供了爬上去的有效机遇。

### 三 京房入朝为官

大概京房也就是在这道诏书下达之后，获得了进入朝廷的机会。至于具体如何举的孝廉，如何进入朝廷等细节目前已不得而知。但其本传上却只说了一句：“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三十三岁的京房，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朝廷，接近了皇帝，这时他是踌躇满志的。他进入朝廷后，果然不负皇帝的期望，他对当前的灾异作了解释。其本传言：“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悦）之。”他的预测和占验受到汉元帝的赏识。因而汉元帝也进一步召见他，除向他询问有关灾异的事外，也还向他征询有关消除灾异的政治措施，这就是有关国家事务的意见了。

在京房还未进入朝廷和刚进入朝廷，正是灾异频仍，连年灾荒之际。汉元帝曾向他的丞相和御史大夫恳切地讨论过灾异问题。那时丞相是于定国，他从汉宣帝甘露三年接替黄霸做丞相后，一直是明习政事，谨慎审慎，尤重经术士。当时的御史大夫是陈万年，本传说他：“廉平，内行修，然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陈万年特别谄事权贵，对史高则格外逢迎巴结。他对他耿直而不惧权贵的儿子陈咸很不放心，经常教训他不能开罪于皇室近臣。有一次他卧病于床，唤其子陈咸至床下，训诫到半夜。陈咸打瞌睡，他大发脾气，要杖责陈咸。陈咸赶紧叩头谢罪，说：“您的教训我全都听懂了，就是要我‘谄’。”陈万年才不再训诫。陈万年如此重视逢迎阿谀，固然有他本身的原因，大概更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过陈万年的“谄”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他能与丞相于定国“并位八年，论议无所拂”（《于定国传》）。二人常常意见一致，间或有不一致，也不会互闹别扭。这种丞相御史的配当关系，平时大约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一当国家发生大的灾难时，就可能难以应付。果然在

元帝登位后出现连续不断的灾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灾害。严重的是面对这场灾害，各级政府和官吏不仅不能组织人民抗灾救灾，而且一切平时被掩盖的腐败现象却暴露出来，造成了一时全国性的荒乱。《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了皇帝对丞相和御史的条责说：“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寢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贪官污吏捉不到盗贼，就将良民捉来抵数，以致良民无辜死亡。有了盗窃事件，官吏不去缉拿盗贼，反而将被盗窃者捉起来，此后人家遭盗窃也不敢告官，浸染成风。人民的冤苦，州郡官吏不理，于是有冤者只好上书朝廷，使得朝廷冤章交奏。由于二千石等国家重臣大官，选拔官吏严重不负责任，所以当位的官员大多不能称职。当人民田园有灾，官吏不仅不肯减免其租税，反而怕他交不起租，就更加催促其快速完租。这样使人民面临的困难上面又加重一层困难。这些腐败现象，在一场自然灾害面前就造成人民流离逃亡，造成大面积的“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对此汉元帝也说：“亦极乱耳，尚何道！”（《汉书·京房传》）因而当汉元帝多次召见丞相御史，除具体讨论如何应付灾荒外，更切责他们要明令和督责各级官吏负起责任来，并要求他们针对政府机构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意见。可是于定国和陈万年却什么也不能做，所能做的就只是上书谢罪。一次汉元帝有点愤怒地对他们下诏条责，说：“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谬至是？欲知其实。”（《汉书·于定国传》）这次是直接对他们二人责难。从东方回来的郎将，说关东人民已是父母将幼弱子女转卖，青壮年不赡父母。由于灾荒饥谨而致此。但是这事皇帝不知道。是丞相、御史的属官藏匿不报呢？还是郎将添油加醋呢？何以会有如此之错谬，要他们认真查清楚。但是他们仍然只是进一步

“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连弄清情况都似乎无法去做。对于“明习政事”的于定国是一种反常表现，即是对于“内行修，然善事人”的陈万年来说，也不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种反常，这种不可理解，是由于朝廷内部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害怕当时任中书令和中书仆射的两个宦官，弘恭和石显。他们何以会害怕两个宦官呢？因为就在元帝即位以来，最大的政治迫害事件就是萧望之之死，而丞相于定国正是萧望之的好友。萧望之所以被迫害致死，按《汉书·萧望之传》说，在宣帝临终时，曾将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周堪召入禁内，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但是宣帝一死，元帝即位，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即与车骑将军史高相为表里。论议事情只依旧例，并不尊从事理和实际情况。对受遗诏辅政的萧望之，周堪根本不买账。但是他们自己所论议者，都不能拿出台面，言语不正，又于事无益。皇帝常给以斥责。因此萧望之以为中书为施政之根本，国家之枢机，宜以贤明之人当之。自从汉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立中书谒者令，置仆射。这不是国家固有的建制。而且又违背古训“不近刑人”之义。这就加剧了他与史高，弘恭和石显之间的矛盾。弘恭、石显利用了两个小人，这两个小人原想巴结受遗诏辅政的萧望之和周堪爬上去。但因他们德行太差，萧、周不予提拔，二人怨恨。于是转而投靠许史。弘恭、石显指使这两人告萧、周等阴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国戚许史等。待到萧望之休假日，让两人上告。元帝令弘恭二人问状，即查明情况回报。二人向元帝回报说：“望之，堪，更生（刘更生，后改名向，时为宗正）朋党相称举，多次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元帝当时不明白“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就批准了这个“谒者召致廷尉”。未几，元帝又召周堪，刘更生。回说两人在狱，元帝大惊，即下令二人出来办事。弘恭、石显就使乐陵侯史高向元帝说项，因史高的祖

母和父亲曾受养过汉宣帝，所以宣帝视史高为手足。史高不免以上辈口吻开导元帝，说帝“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已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即既已将他们下狱，总要有个交代，不如免去他们职务后放出来。于是“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弘恭、石显一举制倒了政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权势。刚刚做完这件事，二月即发生大地震。据《汉书·刘向传》在当年冬地又震时，刘更生使其外亲上变事中说：“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二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这年五月客星见昴分，居卷舌东可五尺。冬又发生地震。刘更生辩解说，地震为在位之执政者太盛。《汉书·天文志》说客星见昴分，居卷舌为有人妄言。元帝对这两种自然现象当然非常关心，占测之言又如斯。他立即决心下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下一步就想提他为丞相。恭、显等立即找到一个机会，来制止元帝对萧望之的提拔。因这时萧望之的儿子萧伋上书为其父入狱事辩白，恭、显等立即奏说萧望之是他自己有罪，没有人诬告他。而他教子上书，失大臣礼，请逮捕。同时又针对萧望之素来高节，不受屈辱的性格，向元帝说萧望之想排退许、史国戚，专权朝政。幸而皇帝宽恕他，还赐他爵邑。他不但不服罪，还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为是皇上的师傅，终究不会有罪。若不将他下于牢狱，塞其快快之心，那么就无法对他施恩。皇帝说：“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石显等说：“人命至重，望之所生，语言薄罪，必亡所忧。”元帝又批准了他们的奏章。于是萧望之自杀。这一刚发生的事，对于定国和陈万年的震动是很大的。因此他们只能上书谢罪，乞骸骨。萧望之事件是整个西汉王朝统治阶层彻底衰败的表现。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事件，就要从汉元帝尚是太子时的一件事说起。这件事不大，但至为重要，《汉书·元帝纪》开头在介绍元帝时就以这件事作引。

原来太子时的汉元帝，见其父汉宣帝所用多为文法吏，以刑



名绳下。曾向宣帝从容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者，太子也。”这段对话之后，宣帝产生了改立太子的想法，他很爱淮阳王，说“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而他又与元帝母许皇后俱从微起，不肯背她，所以元帝才保住太子位。虽没有改立太子，但他在中枢预为设立明习文法，故事之官，以防太子登位后纯用儒士之备。宣帝选中了弘恭和石显等。汉宣帝出身于民间，本性近于刻薄，喜欢柔媚之人，却不能容骨鲠之士。而弘恭和石显不仅善柔媚，尤善迎上意。并与内廷及国戚有较深的结纳。这二人，特别是石显，更喜于乘机弄权，谋为私利，尤视公正廉直之士为仇敌。他们的这些表现并不好，但却是汉宣帝选中的重要依据。至汉元帝，虽然能用廉正儒士或耿直大臣，对宦官者流也并不喜欢。但他却坚持认为宦官内臣等虽无治国之才，但却可信任，所谓“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对恭、显二人，更认为他们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于事尚有可用之处。所以虽已明知恭、显奸佞，也不能决然斥逐。石显尤“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旨，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sup>①</sup>。他能探得主子的内心动向，自己又机深心贼，又能行诡辩借机中伤对手，且睚眦必报，常陷人于危法。对于这种阴险小人，自是人人侧目。石显除与贵戚乐陵侯史高，平恩侯许嘉深相接纳外，又与中书仆射牢梁（弘恭死后，石显升任中书令，牢梁接替石显为中书仆射），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朋党，与他们相勾结的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此外他还与社会豪强结帮拉党，如与长安豪侠万章相勾结。万章得显权势，门车常接毂。即万章藉石显的权势，广泛交接宾客，趋奉者众多，平时门前停车之拥挤程度，

<sup>①</sup> 以上均引自《汉书》石显本传。

直若车轮相接。石显后被罢黜，罚返故郡。将搬不走的笨重物件，都留与万章，即直数百万钱。而石显本人的家财超过一万万钱。石显在萧望之事件中的表现，阴险狠毒，势焰熏天，使得“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汉书·佞幸传》）。萧望之是当世名儒，闻萧望之被杀，天下匈匈。石显就又拉拢贡禹，向皇帝推荐贡禹，贡禹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他以此向天下学士表示他尊重读书人，并令人称赞他不妒忌士人，当然也就认为他不妒谮萧望之了。他这样放肆地玩弄权术，即对汉元帝而言，也由此而致下陵上替，威柄倒持。在自然灾害面前，皇帝这一最高统治者竟陷于那样无能为力的局面，正是这种朝廷内部关系的集中表现。

京房步入宫廷的时候，朝廷政治形势是非常险恶的。不过开头京房还不了解这种形势，他全力以赴地研究如何对付灾异。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向汉元帝建议的对付灾异的办法。既不是他“用之尤精”的阴阳灾变的学说，来对当前灾异所以发生作出精当的解释，并从而提出调整阴阳的措施，也不是按通常方士和儒生的办法，搞一点什么形式的祭祀活动来禳解灾难，也不是建议皇帝派出得力的官吏深入灾区采取应急措施安定民心。他却是直接提出了“考功课吏法”。并且把对官吏的考功提到与自然界的表现直接相关的程度。他向元帝建议说：“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sup>①</sup>应该说皇帝对京房的这一建议是将信将疑的。一方面在他心目中的京房是“明阴阳灾异者”，即使不是调和阴阳的术士，也应该从调和阴阳的角度提出一些措施，使当前的灾异平息。但是京房的建议中却没有这些内容。而所提对百官进行考功就能平息灾异，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宽容的汉元帝还是让京房有机会实施他的考功课吏法；热情奔放

<sup>①</sup> 引自《汉书》京房本传。

的京房也相应地积极地投入他做官以来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当皇帝认真地听了京房的考功课吏法之后，立即意识到实行好考功课吏法，实在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导致大治的基础。立即下令让公卿朝臣跟京房一起讨论。对于一个认真的研究者来说，总是喜欢将自己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一些精微的见解，详细向他的听众介绍。可是京房并不具备讲演的才干，却有深刻的见解和诲人不倦的劲头。对于高官厚禄的公卿朝臣，他们很难打起精神听京房的演讲，特别是京房的考功课吏法中提出要“上下相司”，即下级也要监督上级，更使他们恼火。因而他们坚决不接受这个“考功课吏法”。皇帝也知道要这些尸位素餐者能理解治国根本大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找另一个机会，再让京房讲解一下他的建议。恰好那时各部刺史来京城奏事，元帝就让京房在各部刺史面前讲“考功课吏法”。西汉时代全国只有十二部刺史，加上一个司隶校尉共十三个方面大员，是封疆大吏，当然是国家的重臣。然而遗憾的是十二部刺史也认为不可行。两次演讲之后，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反对，京房心中的沮丧情绪是可想见的。但是带给他一些安慰的是有两位大员也是两位名儒周堪和郑弘，一开始也反对他的考功课吏法，但仔细研究后却认为确是利于根本大计的好方法。不过京房从这里感觉到，这不是他的考功课吏法的好坏，而是跟人们的利害关系相连。确实也是如此，他后来也无意中牵进了宫廷的政治漩涡。由于郑弘当时正任右扶风，不久就升为御史大夫，周堪正为光禄勋。或许由于这两人的支持，京房的考功法才能进一步试行。

京房进入宫廷后的第一个活动基本上是失败了。而第二个活动就是阐述他对《周易》的研究。《易》以道阴阳，即他对阴阳灾变学说的研究是从易学角度入手的。因而当他系统地讲述阴阳灾变时，就要论述到他关于易学的见解。可能与他讲述考功课吏法的情况一样，他建立的易学体系就他的时代而言，是精详而系统性很强的。与当时通行的以占测为主，加上一点对于占测的解

释的易学是不尽相同的。因而他要对他的听众详细说明他的易学体系，就会因烦琐而遭否定；若一般地论述一下关于易学的见解，那就会造成一些无意义的争论。他恰恰碰上了这两种情况。当时是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死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就是五鹿充宗，而五鹿充宗也是以治《易》而知名于世的。他是著名的易学大师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的学生。而梁丘易在汉宣帝世是炙手可热的。京房想在宫廷中宣讲他的易学时，正好遇上这个同行。所谓同行是冤家，果然五鹿充宗与京房二人论议相非。看来五鹿充宗更加注意学术争议中的非学术性的矛盾方面，本来只是在学术上与五鹿充宗意见相左，可是却更明显地是严重得罪了石显一伙人。可能当时京房还没有弄清这里面的深刻原因，只是出于古代卫地强悍民风的熏染，对于石显一伙对他的歧视，以及对他们权势熏天的做法感到痛恨，就作了反击。当然他的反击只是口头上的愤懑和讥刺。但石显一伙对京房的痛恨，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利害关系。首先是五鹿充宗，他本来在宫廷是首屈一指的易学大师，是先帝宠信的梁丘易的传人，又是现任皇帝的宠臣，与最有权势的中书令是党友，而且还被任命为少府。他对也是治易学又明阴阳灾异的京房进入朝廷，本来就不是太舒服；又当京房向皇帝作了一些“所言屡中”的预测，受到皇帝赏识，五鹿充宗就已满怀妒意了。当然在学术争议中，五鹿就带着仇恨的心情，使得尚不明白内中原因的京房气愤有加。而对于石显来说，自京房进入朝廷以来，他就密切注视着这个年轻人的动向，特别注意汉元帝对他的态度。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之后，凭石显最善揣摩人主心理的禀赋，敏感到元帝对京房的建议是内心向往的。因此他并不发作，只是随着大员们讲京房议论烦琐，不能采用。但他内心对京房的建议却痛恨至极。因为课功考吏本质上是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此就不再只是注意考察这个青年人的动向，而是有意设法将他除去。五鹿充宗当然支持这个设想，于是也凭着石显的权势，处处与京房作对。迫使京房宣讲《周易》，又故意挑

起争议，凭着他能说会道和善于逢迎，常常弄得言辞不那么麻利的京房被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会有人向京房透露一些朝廷内幕或者朝政掌故。例如大儒名臣，皇帝的老师萧望之的冤死等等。因而京房也就抓紧机会对这一伙人攻击。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皇帝反映这一伙的恶劣情况。他相信至高无上的皇帝会对他们加以制裁的。京房本传上报导，他利用一次皇帝饭后闲暇之际，他问皇帝：“周朝幽王和厉王何以会碰上危亡？他们当时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呢？”皇帝回答得很干脆：“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京房就说：“是知道是巧佞之人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是贤人而任用的呢？”皇帝回答说：“当然以为他们是贤人而用之。”京房又问：“那么现今何以知其不贤呢？”皇帝说：“因为这些人被任用时，时乱而君危，以此知之。”京房抓住皇帝的話头，说道：“如果这样，那么任用贤能，国家就得到治理；若任用不肖者，国家就会变乱。这是必然之道。那么幽王、厉王为什么不觉悟，进一步任用贤能，而是一直信任小人，以至于危亡呢？”皇帝说：“临乱之君各贤其臣，如果都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危亡之君呢？”京房却说：“齐桓公和秦二世也知道幽厉亡国的教训，但是他们还是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小人，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为何他们不吸取幽厉之教训呢？”皇帝说：“只有有道者才能从过去吸取教训，从而掌握未来。”京房说至此而免冠顿首向皇帝说：“《春秋》记录了二百四十二年灾异，示于各代君主。现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是治呢还是乱呢？”皇帝沉重的回答道：“亦极乱耳。尚何道！”京房紧接着问道：“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呢？”皇帝说：“总以为现今之灾异及政治还未至于幽厉之际那样严重，又不觉得与现时用的人有什么关系。”京房说：“前世的君王也都是这样想的。我恐怕后代来看我们这时，

亦犹如我们现在看前代之君王。”皇帝良久才说：“今为乱为谁？”京房说：“明主应该自己明白。”皇帝说：“确实不知道，如果知道，还能用吗？”京房道：“皇上所最信任，和他在寝殿之中商量事情，能进退天下之士者就是。”京房指的是石显，皇帝也很清楚，所以说：“已知道了。”这一段对话，京房是用了心机的，讲话的方式也是有点戏剧性的。可能这次谈话是当时打击石显一伙的最有效的举动。按说，元帝应该考虑到石显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然而奇怪的是谈话之后，汉元帝仍然不动声色，不仅按兵不动，似乎对石显一伙还信任有加。对此京房有点想不开，他还在不断地上书奏事，不断地向皇帝进言，还怀着某种希望。但是老臣于定国就不同了，他想得开，所以只是一味地求骸骨，上谢罪书。大概陈万年也很想得开，他在“谄”上下功夫，表现得那么露骨，固有其个人的品质因素，但也不外是想得开的一种表现。这所谓想得开，就是他们已知道这正是“汉家制度”。若将石显个人的品质因素排除不论，他表现出来的也多少体现汉宣帝的精神。观其向元帝建白，将萧望之投入牢狱，煞煞他的怨望之心。否则“圣朝亡以施恩厚”。其逼死萧望之之后，倾心拉拢勾结贡禹，以消除士人的怨恨。这都体现了汉宣帝的精神，也正是“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对于在宦海沉浮中过来的于定国来说，他想得开，所以他在元帝永光元年得到皇帝“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而那个陈万年做了八年御史大夫，在任上病死。都得善终。只有血气方刚的京房，还得再加历练一番才行，如果历练得过的话。

汉元帝其实也深深地陷入矛盾之中。他想真的摆脱掉石显一伙，但他却更深深地依赖他们，犹如他摆脱不了史高、许嘉等内亲贵戚。他想真的提拔朝士，但被他提拔起来的朝士，却一个一个地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等被废为庶人。他想真的惩办小人，但陷害萧望之和周堪等的小人郑朋却提到黄门郎的位置。他提拔了由石显推荐的贡禹，劝他节省开支，

减轻徭役，还不准朝廷官吏经商贩卖与民争利，但绝口不谈朝中政治。而且贡禹干了不到半年的御史大夫就咽气了。这时汉元帝想来想去，大概只有考功课吏法还可一试，如果果然行得通，就有可能将目前的一局死棋下活。于是他命令京房将他弟子中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提出一个名单来，想加以试用。京房报了任良和姚平两个人。但立即向元帝表示，希望这两人能“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京房的这个建议或希望，可能是试行考功课吏法的最佳方案。然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空子，即京房想让任良和姚平任州刺史，在州县试行，他从中调拨。这个空子只有石显和五鹿充宗这样的人会利用。因为他们最怕的是京房与元帝的关系密切，所以极力想疏远元帝与京房。这时机会来了，元帝想试课功考吏法，京房又提出到州郡先试，就乘机提出让京房做一个郡太守，直接在一个郡内先试成功，再推广到其他郡国。汉时郡守是方面大吏，为司牧之主，所以汉元帝以为封京房这个大官也够可以了。于是就“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大概京房也懂得这个官位不小，如果推辞不干，以后再找这种机会试行考功课吏就难了。他没有真正看透石显等人的真正用心，更不用说汉元帝了。不过京房还是冷静的，他即向皇帝提出：希望不属任何刺史部或司隶部管辖，直接属皇帝管辖，他也只对皇上负责；要求有权除用它郡人士，对于郡县各级官长有权任用；还有就是“岁竟乘传奏事”。就是可直接面见皇上奏事。对于这三条要求，皇帝当时就一口答应下来。

即将离开皇帝的京房，心情是沉重不安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几年来在朝廷的论议，无论是考功课吏法，还是阴阳灾变学，都没有什么好的反应，反而得罪了不少人，与权势熏天的石显和五鹿充宗结下了仇恨。还有就是皇帝曾专门派了太子太傅韦玄成等就音律问题与京房作过讨论，京房提出了六十律，但似乎也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反应，或许更糟。因为京房对韦玄成的评论不



佳，说：“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并把他与石显和五鹿充宗列为一类人。可能韦玄成对京房的音律也没有什么好评。此外他也知道如果其考功课吏法果然推行，首先不利的就是这些尸位素餐的朝士。当他有皇帝做倚靠时，这些人对他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如果他一旦离开皇帝，这些人也会向皇帝进有关他的谗言。虽然他心情沉重，对是否赴魏郡上任，实在有点犹豫不定。魏郡对他来说并不生疏，因为魏郡古亦属卫地，春秋时入晋，战国时入魏，到汉朝魏郡与东郡是紧邻。其风俗习尚与东郡基本相似，对京房来说应是相当熟悉的。但考虑到离开皇帝后可能产生的麻烦，不禁使沉重的心情转为焦虑而至忧惧。于是他于建昭二年（公元前 37 年）二月朔，向皇帝拜上封事，说道：

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sup>①</sup>

按建昭二年二月朔为甲子日，则最靠近二月朔之前的辛酉日当是该年正月二十八日，即在二月朔前三日。从所述事情过程和辛酉日后面日子的安排看来，似应是越前一个干支周的辛酉日，即是建昭元年（公元前 38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辛酉日。这个辛酉日之后的己卯日当是建昭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即这一天他受命为

<sup>①</sup> 见《汉书·京房传》。

魏郡太守。这段封事中有一句话不很明了，就是“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而阳平侯凤者是元帝王皇后之兄也。当其妹封为皇后时，其父王禁封为阳平侯，这是元帝初登大位时的事。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薨，长子王凤嗣阳平侯，为卫尉侍中。王凤与元帝的关系不会很好，因为王皇后不得元帝的宠幸，她生的儿子虽立为太子，元帝却很不喜欢。元帝宠爱傅昭仪，很想将傅昭仪生的儿子定陶共王代替太子。所以这时“王凤在位，与王皇后、太子同心忧惧”。就尽力拉拢任侍中的史丹保住太子的地位。史丹就是为石显五鹿充宗做靠山的乐陵侯史高的儿子。史高和于定国一齐在永光元年罢职，不久就死去。于是史丹就成了皇帝内亲中史家的代表，他本人又与元帝的关系十分亲密，而且依旧保持着对石显等人的扶持与依赖。因此当皇帝打算以京房为主施行考功试吏法时，就搞了个将京房下放为魏郡太守的阴谋。执行这种阴谋，以往都是仗史高出面，现已不能利用史高，当然就得让史丹出面。可能史丹资历和官位都不太适于承担这种角色，或者史丹本人有所考虑。史丹这个人据《汉书》本传上说：“丹为人足知，恺弟爱人，貌若傥荡不备，然心甚谨密。”他知道汉元帝正热衷于试行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如果出言不当，得罪京房事小，与皇上闹得不愉快却是很不妥当。他考虑推荐王凤来出面向皇上说，他从旁促成，利多弊少，而王凤于资历官位等足可以向皇帝提出这项建议。就王凤而言，要保住自己外甥的太子地位，要保住自己妹子的皇后宝座，还得大大依靠史丹，依靠石显等一伙内臣。所以在这些事上为史丹等承担一点，也有点义不容辞之意。于是在京房下放魏郡太守的事件上，王凤插了一脚。王凤插这一脚于京房当然不利，京房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上封事中将王凤点出，并将王凤欲见未得一事与“少阴倍力而乘消息”对应起来。这里谈到少阴，就要稍微说一下京房易学。将六十四卦分配于一年中，提出坎离震兑四卦为四方伯卦，主一年之二十四节气。坎主冬至到雨水（在京房那个时代惊蛰在雨水前，后世将雨

水置于惊蛰前)，震主春分迄芒种，离主夏至到白露，兑主秋分到大雪，其余六十卦，以中孚卦起冬至。每卦主六日七分。每五卦一月，分公卦，辟卦，侯卦，大夫卦和卿卦五等卦。这五卦共主六候，两气一节，一节即一个阳历月。六十卦共十二个阳历月，三百六十五有四分之一日（每日分为八十分）。在六十卦中，又提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为十二辟卦，亦称十二消息卦。这十二消息卦分消卦和息卦两大类；自复卦至乾卦六卦为息卦，亦称太阳。自姤卦至坤卦六卦为消卦，亦称太阴。消息卦领公侯大夫卿连自身五卦。非辟卦之四卦称为杂卦，按其所属分为少阳卦或少阴卦。息卦所领之杂卦称为少阳卦，消卦所领之杂卦称为少阴卦。大约元帝决心试考功课吏法是在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该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乙卯冬至，中孚卦历六日七分，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复卦，复为十一月辟卦，再历六日七分，到屯卦，屯为侯卦，此时已是十二月初四晨；然后就是谦卦，谦为大夫卦，应是十二月初十上午起，其中十二月初六庚午为小寒。再就是睽卦，睽为卿卦，已到十二月十六中午。而谦卦结束之昨日为己卯日，京房发为魏郡太守已成定局。这从屯卦至睽卦皆为少阳卦。所谓“少阴倍力而乘消息”即是指十二月初以来，在诸少阳卦值日期间，内臣（少阳少阴皆为臣下，而阳主外，阴主内）必极力蒙蔽君王。至己卯日正当谦卦（大夫卦）覆太阳时，作出了京房出为郡守之令。这说明内臣还在起着蒙蔽君王的作用。这里应说明，若从少阳少阴的定义，则屯卦，谦卦，睽卦皆属辟卦复卦所领，应是少阳卦。但原文为少阴，似特别指内臣之意。不过京房是纯从卦气而论事。<sup>①</sup> 由此他感到他去魏郡后，可能皇上为用事之臣

① 由于京房以正月为首，自正月至六月为上半年为阳；于辟卦为自泰卦至遯卦。自七月至十二月为下半年为阴；于辟卦为自否卦至临卦。复卦为十一月辟卦，亦在阴属。可能京房据此而说少阴。

蒙蔽，而自己虽身死功亦不成，所以向皇帝提出“岁尽乘传奏事”，蒙皇上允准。可是到了辛巳日，即任命他为魏郡太守之后两天，“蒙气复乘卦，太阳浸色”。蒙气，最简单地说，就是久阴无雨。《后汉书·郎顗传》引《易内传》说：“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似乎是说蒙本谓君臣上下相冒乱，久阴不雨是乱气弥漫，可类比于蒙，是蒙的一种表现。《易纬·稽览图》郑玄注云：“蒙，气也。比非一也。邪臣谋覆冒其君，先雾从夜昏起，或从夜半，或平旦。君不觉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复不觉悟，下为雾也。”<sup>①</sup> 这里说蒙是一种气，以蒙类比者不仅此一端。奸佞之臣阴谋蒙蔽其君，则会表现为从黄昏到夜半再到平旦这一段时间内先有薄雾起，这时君王就要考虑到臣下是否有什么阴谋，如果君王没有觉悟到，则第二天白昼起到日中一直昏蒙，至此有奸佞阴谋蒙蔽君王事已可肯定。若君王还不觉悟，就会下雾，但不会下雨。因而蒙的本义应是蒙气，君臣上下冒乱也称为蒙。说蒙之起先是雾，一种薄薄的雾，就是要区别于古代天文观测中的“晨昏蒙影”，是指平旦或黄昏时，太阳出没地平之际，均有一种蒙气在地平附近，这种蒙气与这里所说的蒙气不是一样的。另外在下雨前后，天气阴沉昏蒙，雨后不久即告退去，这也是正常现象。所以蒙气生于夜，至白昼仍然不退，又无下雨之征候，这就是蒙气。故《晋书·天文志》说：“凡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乱风四起，名曰蒙，臣有谋。”若依此，则不仅一天两天天气阴沉无雨，尚不能谓之蒙，要连续十天才称为蒙。总之所谓蒙，于气候而言，长时期（至少一天以上）阴沉不雨，乱风四起，此为乱气为蒙；于人事之比，因君王为阳，臣下为阴，蒙气发生就意味着阴浸阳或阴覆阳，所以可比为臣下蒙蔽君王之象。如从卦象而言，即是杂卦当事，杂卦覆于辟卦。故于气候，若无蒙气，则天气清明，亦谓之太阳精

<sup>①</sup> 引自清·惠栋《易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 版。

明；于卦象则辟卦当直；或是杂卦当直，却没有覆或乘辟卦之危；于人事则是君主英明，奸佞无所乘。京房卦事中所说建昭元年十一月底和十二月上半月间事，其时是什么天气情况未有说明。但由其占测思路可推知辛酉日起，其后数日天气清明，所以说“太阳精明”，正当辟卦（复卦）直日。以后几天就逐渐起了薄雾，虽然起初不很明显，以后稍稍加重，但基本上还是晴天，只是带点薄雾。而到了辛巳日，蒙气与杂卦同时当令，即这一天蒙气十分明显，而且是杂卦睽卦开始用事。按京房上封事中说是“大夫卦覆阳”，据前面推算，谦卦为大夫卦，自十二月初十上午当直，历六日七分，当至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时分（距冬至日二十四日二十八分）止。辛巳日是十二月十七日，其时已是睽卦当令。这里的差别，可能是推算方法有差异；也可能是蒙气自十二月十六日黄昏开始明显浓重，故仍算谦卦当直。出现杂卦当令时蒙气突然出现，则表明佞臣之谋尤急，致使皇帝对自己的决定已有所疑虑。京房推断，就在他提“岁尽乘传奏事”被皇上批准后的当天（己卯日）或第二天（庚辰），就有人向皇上进谗言要隔绝他与皇上的联系，不得乘传奏事。京房用占测的方法向皇帝上了这份封事，其目的是希望皇帝警惕佞臣要隔绝他们间的联系的阴谋。但是对此封事，似乎皇帝没有答复。记住，这一封事是在建昭二年二月朔日呈上皇帝的，讲的却是去年十二月间事。中间隔了一个多月，是不是这期间过年，因而过完年后京房再将这事提起，已难以知晓。但从《汉书·元帝纪》载：“建昭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这差不多是汉代自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祠于甘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后，各帝王隔几年总要在正月来行祭祀的地方，据此或可推测。

## 四、京房之死

二月朔上封事以后，京房就得打点出发赴任所了。就在这个时候，阳平侯王凤以受皇帝命“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京房希望不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京房开始恐慌了。他到新丰（京兆所属之县）时，就邮传上封事，说：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而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京房从“止无乘传奏事”的诏谕中感觉到了可怕的后果，因此刚出京城就上封事。他首先提起以前自己一次有效的占测，在前时六月说遯卦不效，遯卦是六月辟卦，遯卦不效，就是说辟卦或消息卦不起作用。遯卦（其下两爻为阴爻，上面四爻为阳爻）是二阴卦，天气正热，遯卦不效指天气当热反冷，而且有涌水为灾。按人事则是道人始去。所谓道人，指有道术之人。结果果然七月有涌水出。对此京房弟子姚平对京房说，这只可以说是懂得道术，而不能说相信道。说从占测灾异而言，我（京房）未尝不中，六月占遯卦不效，后涌水已出可证占测成功。但于人事则为道人始去，言有道术之人当被逐去而死。这还有什么话说？我

说，皇上一向仁爱，对我尤其深厚，虽然向皇上陈说这次占测我可能会死亡，但是我还是要向皇帝说明。姚平又说，我只可称得上小忠，不可谓大忠。秦朝时奸臣赵高用事，有一个博士正先，因反对并批评赵高，而被赵高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的淫威建立起来。后来赵高的奸佞，造成秦国大乱，以至灭亡。可以说是由正先促成。京房接着说，臣如今去魏郡出守，当努力作出成绩，但恐怕尚未作成绩就死掉，望皇帝不要使我当涌水出现的灾变之应，更不要让我当正先之死，而为姚平所笑。因而京房用自己的恐惧，讲述了一个关于忠的故事。如果忠心得过分或者说不合时宜，那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京房在他预测的生涯中，还有一次占测过自己的死亡。那是在永光年间，有人向皇上献雄鸡生角者。京房就占测说，鸡知时，知时者当死。而京房以为自己知时，这时献雄鸡生角，大概要当这一变异。但是结果京房未死（《汉书·五行志》）。刘向对此作评论说，鸡是小畜牲，主司时辰，使人知起居，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应是主小臣将利用君威，以害政事，如同石显之流。另外在这之前还有两次鸡的灾异，一次是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即元帝即位那一年，宫内有雌鸡化为雄。一次是初元年间，即京房入宫前后，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京房可能在永光中，由于论议，开罪于石显一伙，又因论议音律与丞相韦玄成闹得很不愉快，心情是很沉重的。正值这时发生鸡变之异，京房联系近来黄龙元年宫内的鸡变，元帝登位后不久的丞相府史家鸡变，再加上占法所说的“知时者当死”。所以京房作了自己当此鸡变之灾应的占断，刘向认为他错了。其实京房并没有占错，因为永光中之鸡变，距京房死只三年多，这且不论。京房所以占自己当之，正因为他同刘向一样，认为小臣将秉君威，害正事，正是代表石显一伙之所为。而他与这一伙积怨已深，很可能被他们所害。而鸡之知时报晓也，他之知时预言灾变也。所以“知时当死”之占，联系他所处的宫廷人事复杂的关系，难免产



生死亡的恐惧，和将灾变与自己的安危相关的过分敏感。所以在新封上封事，竟因“止无乘传奏事”而谈到死亡，不是得自于某种预测，而是几年内他处于一种政治漩涡之中，处于某种势力的威胁之中，但他又恰恰不善于应付这种局面，也不会挣脱这一局面，他终于成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这时凭他的敏感，只能发出这种哀叹！

京房在上任途中心情无比沉重，离开京兆，就到了弘农。弘农郡的陕县是出京兆往东到关东去的大道，陕县当此大道上弘农郡与京兆的交界处。在这里京房又上了封事，说：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旋）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sup>①</sup>

语气相当悲壮。这里所说的丙戌日，当是建昭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次日二月二十四日丁亥春分。自春分日蒙气去，因丙戌日下

<sup>①</sup> 见《汉书·京房传》。

了小雨，雨后晴明是正常现象，所以丁亥日应是晴天。然而晴朗仍有薄雾濛濛，这即所谓“少阴并力而乘消息”的天气状况。若从卦气说言之，则二月辟卦是大壮卦，为四阳当令。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交冬至起公卦中孚，至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好九十一日，则对应于二月公卦解卦当直。从每卦六日七分计算，则历九十一日二十五分（一日为八十分）。历 91 日，则当 2 月 23 日，再加 25 分，则应为 2 月 24 日辰初。解卦于 24 日起当令，但解卦是杂卦，《后汉书·郎顗传》引孔子说：“雷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即要特别注意杂卦并力乘消息卦。而解卦当直后，丁亥之次日戊子（2 月 25 日）下午未末申初，蒙气就明显地起来。这时还远未黄昏，就出现了蒙气，表明杂卦之党盛，君王虽要振作，但臣党并力而争，而君王不能胜。次日己丑夜，有还（旋）风。还（旋）风大概不是好风，其作用不仅不能令蒙气退去，还可能更加加重蒙气。按《易纬·稽览图》关于风有几句话，说道：

降阳为风，降阴为雨。昇气上，降气微。是故阳还，其风必暴；阴还，其雨亦暴。降阳之风，动不鸣条；降阴之雨，润不破块。还风者，善令还也。

对于这段话，每一句郑玄都有注。其注云：“卦效后一百二十日降为卒风；其不效也，后九十一日降为灾风。天恶气不得上天中，九十一日为灾风，其阴不时。”又注云：“君弱臣强，不得以时升降。昇气喻君，降气喻臣也。”又注云：“君弱臣强，君令不得行。降气积后，一百三十日内，阴（按张惠言认为当为阳）得同类并下，故薄，故必暴也。”又注云：“还，暴也。君弱臣强，还而不行，阳气道积，不以时降。后得同类并下，故暴也。故曰令还也。”由此可知，这股还（旋）风是一种暴风。但这种暴风

并不表现出那种发屋折木，飞石扬沙的特征，而是表现出动不鸣条，和适而不迅疾，以至吹动树枝而不发出声音。不过却使阳气不得行，使蒙气更为增深。而京房所言之还风，不仅是使蒙气增深之暴风，而且是大约九十一天前的辛酉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不效的反应。而且据其灾异预测，一百三十日内会有阴阳相薄的现象。所以京房封事中说己丑夜还风至辛卯日止，距昨年十一月辛酉正好九十一天。而且己丑夜之前三日丙戌有小雨，这小雨之后丁亥日那一天，蒙气去，则应视为太阳卦胜杂卦的表示，可是蒙气并未全散去，戊子日下午蒙气又生，次日即有还风。这一天气比拟于人事，就是元帝欲行考功，有意对京房多加照顾，但被用事者所否。所以封事中说：“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而当己丑夜还风来，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而日月相薄，京房见大势已去，知道“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即以为皇帝对他起了疑心。是什么疑心呢？以后还会讲到，此处暂且不论。且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日月相薄。按《汉书·京房传》注引《京房易传》云：“虽非日月同宿之时，阴道盛，犹上薄日光如此，但日无光，不食也。”《唐开元占经》卷九引《京房易传》曰：“日月不交而食曰薄。”因为日月相薄之时为三月初一朔日，日食当于朔晦之日，此日未发生日食，而月之阴气与日相薄。《唐开元占经》卷五引京氏曰：“日者，太阳之精。”日月相薄，自必太阳侵色，乃至太阳亡色。京房一路上观测天气变化，推算从解卦当事到大壮卦当事时阴阳的变化，又分析着这些与人事的对应，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得出了相当悲观的结论。这次上封事的时间不是三月初一就是三月初二。正当卦气由解卦转大壮卦，月份由二月进入三月。在说完这些之后，就回过头来，回忆他曾向元帝说过：“九年不改，当有星亡之异”，说这句话的背景和具体所指已不甚分明，但其所说的意思尚可推测，即太阳侵色或日月相薄，蒙气太重的现象长久不能改变，就会有“星亡”的灾变。而“星亡”的灾变对于国君来说是

非常严重的。为此他曾向元帝建议由他的弟子任良来试考功，而自己居朝廷内联系，那么“星亡”的变异可以不发生。虽然在形式上他采取了玄虚的星占术，但由当时汉元帝所处的情况看来，京房认为真正要解决元帝面临的困难，实在是要赶紧整顿吏治，和在朝廷内有一个敢于开展工作而且也能够开展工作的班子。这虽是京房的书生之见，但却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而要实现这一点，京房坚定地认为一定要实行考功课吏法。京房知道实行考功课吏法的结果，首先就是得罪皇亲国戚的史丹和王凤，更要得罪皇帝左右的中书班子石显等一伙。所以京房说：“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他向皇帝陈述星占术时，并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发表议论加以阻拦。可是一当他提出试行考功课吏法，论议者就立即起而干扰阻拦。而当京房提出他居朝廷中联系协调时，他们就更加怒不可遏了。因为他们可以蒙蔽皇帝，却无法蒙蔽京房，非得把京房支开或调走才行。于是他们建议，使弟子试考功课吏法，不如直接让老师去试更有效。本来可以考虑让京房当一名刺史，但是考虑到刺史又能直接面向皇帝奏事，因而这些论议者又说：“当刺史要与郡守配合得好才行，恐怕郡守不一定肯与京房同心，事情反而难办，不如干脆当太守。”于是，京房说：“就这样使我与皇帝隔绝了，但皇帝却不省其用心而听之。这就是自昨年十二月己卯以来，蒙气所以停留不去而太阳亡色的原因。”京房自被任命为魏郡太守以后，一直争的就是“岁尽乘传奏事”，说得简单点就是要直接跟皇帝见面说话的机会。石显等就是这一点不肯让步，因为他们不愿意有不听他们话的人在皇帝身边，特别是一个要行考功课吏法的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明习文法故事者也有他们的原则。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京房要任良在外试行考功法，自己居中在朝联系协调，显然是京房想赖在皇帝身边，挤进中枢，其弟子在外与之呼应，这是断乎不可接收的。京房不得已又想当一名部刺史，部刺史是方面大吏，国家重臣，京房不够格。前京房做了大中大夫

后，才出齐郡当了太守，京房只是一个郎，竟然想当刺史。虽说巴结皇帝也不行，封为太守已是破格超荐，不想皇恩浩荡，还要讨价还价，当了太守还想要有刺史的权力，乘传奏事能允许吗？因此石显等一伙从这个角度来向仁柔的汉元帝辩说时，汉元帝也不得不考虑这个年轻的星占家能否承当得起。京房的上封事中最后说道：“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他似乎在警告皇帝，他离皇帝愈远，太阳侵色愈甚。他要皇帝不要因为难于让他返回而轻易违逆天意。要知道邪说虽然说来头头是道，使人相信，但天气必然有变，人可欺，天不可欺。这一封事上去后，京房就再也没有上封事了。

如果说汉元帝仁柔，容易受蒙蔽，从史丹、王凤、石显等屡进谗言，而改变了任用京房试行考功课吏法的初衷，那也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元帝对试行考功课吏法的决心，不会因这些人的进谗而作罢。而且元帝除与史丹稍稍亲近而外，对王凤、石显等并无好感。但是石显自有他暗害政敌的手法，他在对萧望之一帮人下毒手时已经有所表现，现在他们要对京房下手了。如果只靠向皇帝控诉京房有野心，这从汉元帝与京房的关系和对京房的了解，是难以奏效的。因此要设计一个有效的使元帝对京房怀疑的事实。因此石显和王凤进行了合作，正是由于他们同时痛恨京房又痛恨元帝才促成了这个合作。但在讲述他们进行合作之前，应先说一下京房生平中的一些细节。大约京房进京入朝之前，尚未婚娶。进京后，由于明阴阳灾变得元帝的信任，常召见言事。朝官和宫廷人员中也有一些王室子弟及其亲属，想跟京房拉拉关系和向京房学习点预测阴阳灾异的本领。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张博。张博是宣帝时得宠的妃子张婕妤的兄弟，张婕妤生的儿子刘钦封为淮阳宪王。在宣帝时，淮阳王刘钦甚受宠爱。宣帝几次想改立钦为太子。而且几次嗟叹宪王，说：“真我子也。”后来由于元帝的母亲与宣帝同起于民间，后又被杀死，不忍心将元帝的太子位

废去。由于韦玄成曾经装疯将父亲传下的侯位让给其兄，宣帝还特别将韦玄成提升为淮阳中尉，作淮阳王的部属，以此感谕宪王，以推让之臣来辅佐他，从而使得元帝太子之位得安。因此张博本来是很有可能成为皇帝的淮阳宪王的舅舅。张博向京房学习的过程中，二人关系搞得不错，最后京房成了张博的女婿。这一婚姻本身到底如何，现在已无从考察，但是从他们二人的密切往来中可推测这一婚姻尚称完满。张博虽是淮阳王的舅舅，但他大约还想借这层关系干点什么，或者还想谋求点什么。京房以半子之亲，常常向张博讲一点自己的境遇和困难，比如他诉说与石显和五鹿充宗等人的矛盾，诉说他提出的考功课吏法推行的艰难，当然也会谈到皇帝的情况，特别是皇帝向他征询些什么意见，和做些什么占测。张博对京房所谈的朝廷事务和皇上的言论是很有兴味的。因而常常也主动向京房打听更多朝廷的消息。他对这些消息的兴趣，很大程度是用来向他的外甥淮阳宪王炫耀，而且他记录京房所说的灾异预报及皇帝召见京房时所说的“密语”，作为他对朝廷情况十分了解的证明。张博通过几年来对朝廷情况的了解，向淮阳王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他说道：“我听说皇上还不到四十岁就已发齿堕落，而太子还幼弱，奸臣佞人用事。阴阳不调，灾变不断，百姓疾疫，饥馑而死者几乎一半。帝尧时代大洪水泛滥而形成的灾害也不过如此。如果王爷有心救世，建立功德，这可不能怠忽。我已与大儒且知道术者约好得机会为您上奏，向皇帝陈安危，指灾异，让您朝见陛下。先口头向皇帝陛下讲述，然后上奏章，皇帝必然很高兴。一旦大王事成功立，而有周公召公的名望，邪臣散亡，众臣拥护，功德无比，外家必然跟着富贵，何须再望大王的赏赐！而且已与中书令石君见过，通上了关节，如能朝见，许以金五百斤。”《汉书·淮阳王传》中的这段话，是先说许给石显五百斤金以求朝见，所以全部建议前面加上了“诈言”二字。这是明显地为石显开脱。淮阳王回张博的信上说：“求朝，义事也，奈何行金钱乎？”张博又回报说：“已许

石君，须以成事。”然后王以金五百斤予博。看来，淮阳王对要给石显五百斤金是有怀疑的，因此石显就以为加“诈言”二字就可以开脱。所以这一建议中的所说情况确实不是虚构的，而且这一建议中的目标和手段都说得非常明确而具体。其目标，不是想唆使淮阳王篡位或进行什么谋逆之事。只不过是敦劝淮阳王乘王朝目前面临困难时，求得皇帝的任用和宠信，驱散邪臣，建功立德，能在历史上留下周公或召公那样的名望。而作为策划者张博，是淮阳王的舅父，也可随着淮阳王地位的显耀，取得水涨船高的富贵荣华。当然张博还有更大的奢望，就是随着淮阳王建功立德之时，自己也可取得高一点的官职或荣封。这一谋划中的手段，其实要动用的关系，只是两个人。一个是中书令石显，对这一关系只是用钱拉拢，花费五百斤金。另一个是“大儒而知‘道’”的京房，只要他在被皇上召见时，乘便上奏，指安危，陈灾异，并建议召见淮阳王。如果这两个关系发动成功，张博的计划也就成功了。但是这个建议中却不直接提京房的名字，可能是淮阳王不知道京房与张博的关系，甚而不知道京房其人。或许是京房是他的女婿，不便把他扯进来，而故意掩盖他的名字。大概他也顾虑到京房与石显的关系紧张，把京房扯进来后，影响整个计划的完成。对于石显的发动实际上也较为简单容易，而对京房的发动，似乎并不顺当。按京房本传，京房将皇上要采纳其考功课吏法，但遭朝臣反对，又受石显、五鹿充宗的排挤等情都向张博详细谈过。张博对京房的劝说，即从这一情况出发。他对京房说：“淮阳王是皇上的亲兄弟，敏达好政，欲为国忠。现在想让王上书求入朝，可以帮助你一把。”但京房却回答说：“恐怕不行。”张博说，在皇上面前支持你有什么不可以？由此可知，张博是用淮阳王入朝可帮助他试行考功课吏法为诱词，以便打通京房这一关系。但是京房并没有答应。而京房却对张博分析情况说：“石显与五鹿充宗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侍候官家十余年。及丞相韦玄成皆久无补于民，可谓无功。正是这些人最不喜欢行



考功课吏法。淮阳王如能朝见皇上，劝得皇上行考功法，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劝皇上实行考功，但能向皇上说明，丞相和中书令任职时间已很长，但并没有什么治理之功，可休去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做其他什么官，以钩盾令徐立代之。这样一来，考功课吏法就得以施行。”大概京房这段话，张博并不十分同意，但要京房为淮阳王作求人朝奏章，就含糊而应。而事实是他向淮阳王的建议中只有一句，就是“驱散邪臣”。张博之所以那么要京房为淮阳王写奏章，就是要利用京房明阴阳灾变的特长，向元帝“陈安危，指灾异”，以天变来促使元帝容纳淮阳王入朝。因此在张博看来，京房的星占学，京房灾异阴阳只是一种可以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对汉元帝这样的人有威胁性作用。这与京房的观点却是大大不同的，京房以为星占学反应某种人世的政治状态，他想推行的考功课吏法，正是针对当世政治的混乱和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的状况。如果果然实行他的考功课吏法，那么这两者都会缓和，而且会导致一种“万化成，瑞应著”的太平盛世局面。

张博的阴谋及京房参与其阴谋的程度就是如此，但是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杀身之祸。大概问题还是出在京房身上。由于京房和石显等人乃至史丹、王凤等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如果汉元帝不真的想试行京房的考功课吏法；不向京房要求直接向他本人推荐通晓考功课吏法的弟子，并开出这些人的名单；京房不向汉元帝直接提出自己留在朝廷以便“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那么这个原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尚不致那样激化。前面且不说，当京房赴任上路之际，他们赶紧向京房宣诏“止无乘传奏事”。京房刚离京城，一到新封就上封事，到陕县又上封事，其中心问题就是这个“乘传奏事”。而石显等就是不让皇上知道，就是不能让京房与皇帝有任何联系。其中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京房本传上所说的，当张博为其外甥淮阳王谋划与京房沟通关系时，石显已经微有所觉，“以房亲近，未敢言”。即因为皇帝与京房关系甚密，石显不敢向皇

帝报告。但更重要的是张博的谋划，与他自身也有干连，他怕如果告发了京房，连自己也被拖下水，因为京房是不好蒙蔽的。京房是不是知道张博也与石显有联系，实际是很难说的，但是石显不能不作这样的考虑。因此他自然不能让京房有向皇帝说明的机会。而京房似乎对淮阳王奏章寄予幻想，他果真希望淮阳王奏章一到，就能免去韦玄成的宰相，调开中书令石显，而他得以无阻碍地试行其考功课吏法。而石显却是考虑挤走了京房，就好从容来处理张博跟淮阳王这档子事了。由于他深知汉家故事，知道元帝与淮阳王的关系，也知道元帝仁柔，心肠软，而淮阳王的五百斤金也比不上弄掉京房重要。因此他以为乘京房刚走，赶紧下手为好，否则夜长梦多，京房又会不时来个什么封事，引起新的麻烦。所以他控告“京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诬误诸侯王”。果然元帝很愤怒。因为他为太子时不得先帝所宠，太子之位几乎被淮阳王夺去，现在张博，还有京房等帮着淮阳王搞阴谋反对他。这种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于是立即将京房、张博逮捕下狱。按京房本传说，这是他在魏郡上任以后月余之事。从三月初一他还在陕县看来，那么当在三月中旬或下旬才能到任，因为他一路等候着皇帝对上封事的反应。又过月余，当是五月初中旬，被逮捕下狱，又数月，秋后处决弃市。从他被逮至弃市，时间不长，可见当时非常急急忙忙。这一案中还将御史大夫郑弘坐免为庶人。这是外戚和宦官集团的一次胜利，但这次胜利的后果是这时地位岌岌可危的王凤取得了更大的权力，这是后话。但是京房之死还有一个故事。三国时吴武陵太守谢承的《后汉书》中说到京房之死，云：“吴郡周敞，师事京房，房为石显所潜，系狱，房谓敞曰：‘吾死后四十日，客星必入市，即吾无辜之验也’，后果然。”大概当时论议多认为京房冤死，所以有此传说。但对京房之死，王符在其《潜夫论·贤难》篇中说：“京房数与元帝论难，使制考功而选守。晁错雅为景帝所知，使汉法而不乱。夫二子于君也，可谓见知深而宠爱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错既斩，而帝乃悔。”由此观之，京房弃市之冤，元帝似乎并不知

道。王符此说，未知所据。但这正反映在后汉时，士阶层认为京房纯为石显等所诬杀。诸如萧望之等人狱，周堪、张猛等被斥逐，元帝似乎不太知情。因而人们往往推测石显等奸佞之害人，不通过人主或蒙骗人主而诬害之。其实京房与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等一样，在好儒的元帝那里被重视，被提拔，这固然是为了巩固汉家王权，统治人民。但在“久典枢机，习于文法”熟悉汉家故事的石显等人那里被仇视，被打击，也是汉家为巩固王权自有的制度，这正是“霸王道杂之”的根本。

京房之死，石显、五鹿充宗、丞相韦玄成最为高兴。但是其中格外得意的要算五鹿充宗，因为当元帝令其与诸《易》家论辩其所学的《梁丘易》与其他各家《易》的异同时，他侃侃而言，“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使他达到了得意忘形的程度。石显也有暗中得意之事，就是将还有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的御史中丞陈咸髡为城旦，即将他毛发剃光去为奴隶。陈咸是京房刚入朝时的御史大夫陈万年的儿子，他父亲那样严厉地教他学会“谄”，但他学习不佳。陈万年已经故世了，石显来对他进行了惩戒。另外待诏贾捐之，是贾谊的孙子，也因为向皇帝反映过石显的问题，遭到石显的毒手，弃市。还有一个郑令苏建，由于他得到石显的私人书信，向皇帝奏明，石显也找了借口将他论死。石显自此可谓权倾天下，即所谓：“自是公卿以下，重足一迹。”当然石显的死党们也会得不少好处。只有汉元帝在其自身思想与行为矛盾的发展中，在京房死后不到四年也逝世了。他活得比京房大一些，京房死时四十一岁，他死时四十三岁。京房的一生正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中人生生的一个典型，充满着悲剧性成分。

有关他生平中的许多重要内容，由于资料缺乏，无法作更多的推测。例如他的家庭情况，除知道他的妻子是张博的女儿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当然在以后的叙述中，偶尔会碰到京房生平中某些细节，但都不怎么重要。

## 五 京房的著述

在此还要说一下京房生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他的著述。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汉书·艺文志》易京氏凡三种八十九篇，《隋书·经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种七十三卷。《唐书·艺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易占候存者五种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见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书。今传者曰京氏积算易传三卷，杂占条例法一卷，或共题易传四卷，而名皆与古不同。今所谓京氏易传者，或题曰京氏积算易传者，疑隋、唐之错卦是也。杂占条例法者疑唐志之逆刺占灾异是也。错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谓积算杂逆刺占灾异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八卷。元祐八年，高丽进书有京氏周易占十卷，易隋周易占十二卷是也。”<sup>①</sup> 由于晁公武所录京氏著述多已亡佚，所以有必要考察一下他著述的一些情况，使其著作有一些较深的印象。

按《汉书·艺文志》关于京房著述列出：

### （一）《孟氏京房》十一篇

按宋王应麟引《释文序录》云“孟喜章句十卷。京房章句十二卷。”又云“十卷，录一卷，目（一卷）”。晁公武说：“今其章句亡，乃略见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书。”清王先谦说：《新唐书·历志》云：“十二月卦出于孟喜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这书似是将孟喜和京房二人的易章句，合成一部，因二人易说相同。或者是京房将其易说与孟喜易说放在一起，以资人们比较。

### （二）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汉书·儒林传》云：“房受易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

<sup>①</sup> 引自《京氏易传》卷下。

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或许由于京房之易与孟氏易有渊源，故古人将京易冠以孟氏。

杨树达说，按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皆京房述孟喜之学者也。按此说则京房对孟氏学确作过深入研究。

### （三）京氏段嘉十二篇

《汉书·儒林传》说：“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所说段嘉当即是殷嘉，因殷段二字形近而误。清沈钦韩以为是京房弟子所撰，所以冠以京氏。

以上三书，合共三种八十九篇，与前引晁公武所说同。这是《汉书》所说京氏易著的情况。

《隋书·经籍志》云：“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其所立京氏易著目录有：

（一）《周易》十卷，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二）《周易错》八卷，京房撰，（注谓梁朝有此书）。但《隋书·经籍志》中，将京房的一部分著作归于五行类中。归于五行类的京房著作，不仅有易类著作，也有其他杂占类。其目录为：

（三）《逆刺》一卷，京房撰，（以下京房撰诸字省）

（四）《周易占》十二卷，

（五）梁有《周易妖占》十三卷，

（六）《周易守林》三卷，

（七）《周易集林》十二卷，（《七录》云伏万寿撰）

（八）《周易飞候》九卷，

（九）《周易飞候》六卷，

（十）《周易四时候》四卷，

（十一）《周易错卦》七卷，

（十二）《周易混沌》四卷，

（十三）《周易委化》四卷，

(十四)《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  
此外尚有非易类著作，其目录为：

(十五)《风角要占》三卷，梁有八卷，京房撰，

(十六)《五音相通法》一卷，梁有《风角五音占》五卷皆京房撰，

(十七)《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

(十八)《占梦书》三卷，京房撰，

关于这部分书目，有些可能并非京房所撰，例如《周易集林》十二卷，《七录》就说是伏万寿撰。有些如《京君明推偷盗书》，就可能是后人集某些材料编成。周寿昌说：“《通志》有京房、崔元、周宣占梦书三种，志未录，殆后来伪托也。”即《占梦书》亦后来伪托。

《隋书·经籍志》中所集京房著述目录，还有在兵家类和天文类。属兵家类者凡一种，即：

(十九)《京氏征伐军候》八卷，

此书亦当如《占梦书》之类。其属于天文类者有：

(二十)《京氏释五星灾异传》一卷，

(二十一)《京氏日占图》一卷。

此两书或可能是它人集京房之散佚而成，当然亦可能是伪托。属于上两类之外，还有在晋志历法类中的《京氏要集历术》四卷，题姜岌撰。大约是姜岌将京房有关历占的内容集在一起，由于有撰者之名，故不列为京房的著述。

大约以京房题名的著述，有不少散佚。例如《晋书·天文志》所说的：“汉京房著《风角书》，有《集星章》。”这无论《汉书·艺文志》或《晋书·经籍志》均未收录。不过以上所说京房著述目录，基本上都已经亡佚，所以收录与否也就不那么重要。

除《汉志》和《隋志》所载京房书目外，《唐书·艺文志》也录有京房的著述目录，有《周易京房章句》十卷等六种，已大大少于《隋志》。郑樵《通志·艺文略》亦载京房著述书目共二

十种，其中有《周易飞伏例》一卷为以上三志所未有，其余则大体略同。此外《太平御览》引京氏著述有：《京房易传》、《京房易说》、《京氏律术》等十种。《乾象通鉴》引京房著述等九种，此处皆不一一细列。

现今京氏易学尚存者，按清严可均说，有无锡王保训所辑《京氏易八卷》，《汉魏丛书》有《京氏易传》三卷。严可均于王保训《京氏易》八卷序说：“易以道阴阳。有阴阳即有五行，孟喜爱易家阴阳，立十二月辟卦。其说本于气，以准天时，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隐士之说五行消息，复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长于灾变，布六十四卦于一气之中，卦值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独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东汉末，费直行而京氏衰。晋代犹有传习者。至隋唐，历宋入明，而汉志之八十九篇，仅存三卷。盖京氏学久废绝矣。今辑易传，易占、飞候、五星、风角等篇，虽京氏占候不尽此，亦大端具矣。然余为之深惜者，京氏章句亡于唐宋，今辑章句，仅寥寥五十五事，曾不如占候之大端具也。所谓望古而怅然者也。”



## 第二章 京房易学

《汉书》于京房本传说，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因此咸以为京房易学与焦延寿即焦贛有密切关系。但是从现在还保存的《京氏易传》三卷来看，和其本传上所说的从焦贛之所学，即“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的易学有较大的差别。京房易学当不只是从焦贛所学而来，而可能还另有所承。本章所论京房易学主要是将其《京氏易传》作一简介，而其从焦贛所学将在以后的章节论述。

### 一 汉代易学的传承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几乎一直处于“六经”或“十二经”之首的地位。然而《周易》原本只是卜筮之书。《周礼·春官·太卜》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有四。”即是说，太卜执掌着三种易的卜筮方法，就是《连山》、《归藏》和《周易》。《连山》和《归藏》没有流传下来，但它们与《周易》实为一类，也可以称“易”。这表明“易”是古代卜筮之书的统称。《左传》和《国语》中保存的大都是春秋时期的史料，其中涉及“易”的共有二十二处。其中属《左传》的十九处，属《国语》的有三处。这二十二条与“易”有关联的史料中，有十六条是用“易”来占筮人事吉凶的，有六条是用易的卦爻辞来论证人事的。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人们主要还

是从占筮的角度来利用和看待《周易》的。但是出于占测的需要，也同时开始了将《周易》哲理化的进程。宋朝学者朱熹也认为《周易》的卦爻辞中包含了许多古代卜筮实例的记录，他说：“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朱子语类·七经·易》）这即是说不仅卦象，即卦辞，爻辞都是为占筮而写，十翼也是就占筮而发展得来。十翼现在统称《易传》或《易大传》，包括《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翼”是羽翼，为辅助张扬之意，表示它们既解释《周易》之经文，也阐发《周易》之义理。朱熹就说：“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也是为占筮设。到了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朱子语类·七经易二》）

汉代易学的传承，据记载是本于田何。《汉书·儒林传》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辕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汉兴，田何授《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这四人皆著《易传》数篇。王同除著《易传》数篇外，又传授易于杨何等人。周王孙也传授易于蔡景君。丁宽虽然直接从田何学《易》，但又跟同学周王孙学习，即受“古义”，所以周王孙的“古义”又称“周氏易”。丁宽本人则“作易说三万言”，又传授《易》于田王孙。服生所著之《易传》数篇为《宓氏易经》传于世（宓与服同）。这是田何传授《易》的大致情况。大约除田何外，还有韩婴也曾传授过《易》。韩婴在学术门类上属于《诗》家，他主要是传授《诗经》，但也传授《易》。汉宣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的盖宽饶就曾学习过韩氏易。据说韩婴所修习的易是来自《子夏易传》。

这里所说的田何四名弟子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以及王同所传授的杨何、周王孙传授的蔡景君，再加上韩婴的韩氏易，共有七家。这七家均有传《易》的著作问世。当是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前《周易》传承的主要脉络。但除上述七家易外，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还有《古五子书》18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古杂80篇中包括杂灾异35篇，神输5篇，图1篇等有关易学的材料。

关于《古五子十八篇》，沈钦韩说：“《初学记·文部》引刘向《别录》云，所校讎中易传古五子书，除复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施之勉《〈汉书·艺文志〉集释》引）姚振宗又说：“本书历志（《汉书·律历志》），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惟甲寅无子，故有五子’。”又说：“古人说易，未有以甲子配卦爻者，至汉艺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同上）关于《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书。沈钦韩说：“《初学记》引刘向《别录》云，所校讎中书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三篇。”（同上）姚振宗说：“刘向《别录》所校讎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同上）因此《淮南道训》亦名《淮南九师书》，《艺文志》作二篇，但刘向《别录》作十三篇或十二篇。所以其篇数不定。关于《古杂八十篇》，沈钦韩说：“此即乾凿度、稽览图之类。”（同上）全祖望《读易别录》说：“古杂易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之类，皆通说阴阳灾异之属。”姚振宗说：“按《汉书·儒林传》，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此杂灾异三十五篇，盖即其类。汉时传授，有孟喜、焦贛、京房及沛人高相诸家。”（同上）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而“图一者，

即神输图，亦即祥瑞图。”（同上）

其后，丁宽的一支大盛。丁宽的弟子田王孙传《易》于孟喜、施雠、梁丘贺三人。这三人对《易》都有著述及传授，并成为西汉后期易学三大家，为西汉易学三大博士。其中的梁丘贺本是跟太中大夫京房（即前京房）受易，后来这个前京房出为齐郡太守，梁丘贺才转到田王孙门下学易。田王孙的三个弟子中，孟喜又传授《易》于白光、翟牧，这二人后来也成为博士。孟喜传下了白氏易学和翟氏易学。施雠传授《易》于张禹、鲁伯和梁丘临。张禹在元帝时也成为博士，成帝时做官到丞相。最初是梁丘贺的门人，而后转到施雠门下。鲁伯官至会稽太守。梁丘临是梁丘贺之子，宣帝时任黄门郎，参加石渠阁会议，元帝时任少府。梁丘贺曾传《易》于其子临和张禹，前已说明这两人后从施雠受《易》。

再下一代的传授情况是，张禹授《易》于彭宣、戴崇。鲁伯传授于毛萁如、邴丹。梁丘临授王骏，又传授于五鹿充宗。彭宣为淮阳人，成帝时为博士，任光禄勋，右将军等大官。哀帝时为左将军、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后为大司空。戴崇在成帝时做到少府。或许由于这二人都是大官，故“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鲁伯的学生毛萁如在哀帝时为常山太守，邴丹则做了博士。梁丘临的学生王骏，在成帝时做到御史大夫，代丞相，官位相当隆崇。另一学生五鹿充宗在元帝时做到少府和尚书令。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宣元之时，有博士白子友以《易》授朱云，朱云为萧望之的门人，萧望之是治《齐诗》的，大约萧望之自杀之后他就改从白子友。但白子友之传承不详。戴崇传授其子戴宾，宾传授给梁孝王后人刘昆。刘昆在西汉末年教授弟子五百余人。五鹿充宗又传授于士孙张、邓彭祖、衡咸。“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元帝时又有东郡京房一家。京房治易，事梁人焦贛。《儒林传》说他“受易梁人焦延寿（即焦贛）”。故认为京房易来自焦

赣。如果这样，那么焦赣亦当为一家，但是无论《儒林传》或京房本传乃至其他有关记载，均不以为焦赣为《易》家。《儒林传》又说：“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在京房从焦赣学习期间，焦赣也传授了《易》学方面的内容，并说曾问过孟喜《易》学方面的问题。从京房后来整理出的《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等书看来，京房确实对孟喜易，特别是孟喜关于《易》家候阴阳灾变方面下过工夫。而京房之所以对孟氏易下工夫，则可能得自焦赣的启迪。然而《儒林传》又说：“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丁宽），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这一说法之本质在于否认孟氏易中包含《易》家候阴阳灾变的方面，也就否定了孟喜的卦气说等等。大抵京房易学有他独特之处，不与各《易》家雷同，且也不与焦赣所传授之易学完全一致。这可能在青少年时代，足不出户的勤苦学习和殚精竭虑，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易学观念。当然也可能受其家庭的影响，形成他独特的易学思考。而当京房因为明灾异得幸于元帝时，人们对京房本身的易学成就方面却未予注意，而是对京房易学的了解偏于其测灾异方面，以致对京氏易的来源只能说“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京房易学立博士前，汉儒诸易学博士皆出于齐田氏之传授，因而京氏为异。至元帝时立京房为博士，于是汉易除施、孟、梁丘三大家之外，又有京氏一家。京氏这一家，也有其后继者。京房授殷嘉、姚平、乘弘、任良、周敞等，殷嘉、姚平、乘弘皆为博士。任良元帝时任中郎，周敞在成帝时为侍御史。应该说，淮阳宪王的舅父，即京房的岳丈张博也是从京房受易的。

《汉书·艺文志》说：“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其所说十三家，当是指：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杨何，蔡公，韩氏，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本评传传主），古五子，淮

南九子。或许因为古杂 80 篇主要是材料，尚不能算一家著述，不算作十三家。其实《艺文志》列出不止十三家，还应有：白光、翟牧、张禹、彭宣、五鹿充宗、士孙张、邓彭祖、衡咸八家，连同前十三家共二十一家。《艺文志》虽记载了二十一家，但还有许多家未能列入。其中有些可能是没有易学的专门著述，有些可能是其主要工作不在易学，诸如前京房、严均平、扬雄、刘向、刘歆父子，还有做丞相的魏相，曾从杨何受易的太史令司马谈等。还有著名的《费直易》和《高相易》亦未记录下来。费直所传授的《费氏易学》号古文易，“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解说上下经。”（《汉书·儒林传》）即以《易传》的文意解经，注重其中的义理。《高相易》学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费氏易在东汉后期最为兴盛，其主要传人为王璜。高相易传其子高康，毋将永。由于费氏易和高氏易未立学官，属于民间易学。

随着西汉经学的发展，易学也分成今文经学系统和古文经学系统。《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所以施孟梁丘三家自属今文经学，而费氏学为古文经学。西汉时把属于今文经学系统的诸家易立了博士，成为官方易学。而以费直为代表的古文经易学，未得立博士，排除在官方之外，故是民间《易》。京房《易》经刘向判定与施、孟、梁丘为异，托之孟氏，不相与同，但仍立为博士，亦成为官方易学，为汉易的主要代表。后来东汉末古文易费氏兴而京氏衰，可见京氏易亦当是今文经《易》的主要代表。

易学在汉代是一门重要的学术门类，是士子进入宦途的通道。有一批人从《易》而得至大官。如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旦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由此可见汉代易学的盛况。

## 二 西汉易学状况

汉初从田何开始的易学，大体上是继承传统的以占筮为主，以及对所占事件加以一些解释为辅的路子。但在汉朝社会进一步发展而趋于稳定之后，对占筮的解说就更加重要。如果对占筮事件解释得更加符合实际同时又能讲出深刻的道理，那么不仅占筮是成功的而且解释也会令人信服。由此易占者也就扬名。田何传授的四名弟子都是朝着占筮准确，而更主要是解说深刻而有理致的方向努力的。首先是周王孙。《汉书·儒林传》记载，丁宽从田何学易，“学成，东归，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这一事实说明，周王孙《易》学已非纯田氏《易》，而丁宽从受古义，丁氏易也就不是纯粹的田何传授。学《易》者向师门之外广求艺业的现象，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至于周王孙所传授的周易古义与田何传授的易学有什么差别，古籍未有记载。但从费直以《彖》、《象》、《系辞》等来解说易上下经看来，其周易古义可能与在汉代已取得“经”的地位，且被人们看成是《周易》的组成部分的《易传》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丁宽授于田王孙的易学就不是纯粹的田何易学，至少杂加了周王孙的古义。《汉书·艺文志》说丁宽有《易》八篇，《汉书·儒林传》说他“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小章句》是什么内容，现在也难以知晓。

看来王同的易学似乎更接近田何的真传。他的弟子杨何是个有名的人物，汉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年至前129年）曾徵为太中大夫。他传授了一大批做大官的学生，即前面提到的即墨成、孟旦、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但他有两个重要的弟子，使杨何的名声增色不少。一个是著名的太史公司马谈，还有一个就是前京房。他作为司马谈的老师，使得在《史记·儒林传》中写下了：“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后来在《汉书·儒



林传》中却改为：“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他作为前京房的老师，使得他有一个成为易学博士的徒孙梁丘贺。而梁丘贺在宣帝时任少府，在易学上也是有很大声名。前京房与本评传传主同名，因而也就使杨何增加了重要性。只有服生的情况不那么清楚，虽然《艺文志》上说有易学伏氏二篇，其内容却未提及。

丁宽传授给田王孙，田王孙传授给施雠、孟喜、梁丘贺。后来这三人都立为博士，成为汉代官方易学的代表。现今我们称之为“汉易”的易学系统，就从这三人的发端。《儒林传》是首先说施雠，次孟喜，次梁丘贺。但这里似乎先讲孟喜更为恰当。

孟喜是东海兰陵人，他字长卿，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他的父亲孟卿，是治《礼》和《春秋》之学的，传授给后苍和疏广，后来所传的《后世礼》和《疏氏春秋》，都是出于孟卿的传授。孟喜出身在这一学术传统的家庭，受父亲的影响，应是有家学渊源的。可是孟卿却不让儿子跟自己学，他认为他所研究的《礼经》太多，而《春秋》又太繁杂，叫儿子到田王孙那里去学《易》。孟喜之为人大概年轻气盛，聪明好学，喜欢自我称誉。所以当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时，立即向外宣布，并且声称是他的老师田王孙临死前，头枕着他的膝盖向他单独传授的。大概当时孟喜抛出的候阴阳灾变书既新奇，又涉及众人所关心之事，所以儒士们都以为孟喜确实有一套，才能得此奇遇。但是同门的梁丘贺却起而反驳说：“田王孙临死时是施雠在他身边，孟喜当时正回东海兰陵家中，怎么会有单独传授孟喜的事呢。”于是同门之间就出现了分裂。孟喜大概并不太在意梁丘贺对他的攻击，他还继续对《易章句》的解说，支持非传统的说法。当时有一位从蜀地来京城的学者赵宾，对《明夷卦》六五爻爻辞作了一种新的解释。《明夷卦》六五爻辞是：“箕子之明夷，利贞。”传统的解释是箕子为商纣王之叔父，由于箕子对纣王有所批评，得罪于纣王，于是纣王将他囚禁起来，要将他杀掉。箕子只好装疯为奴而得以免死。这说明在碰到大难，处于至暗之地，碰上至昧

之君时，要能正其志，行韬晦之计才能免于难。<sup>①</sup>但是赵宾却解释说：“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荏兹也。”<sup>②</sup>这样一来，明夷六五爻辞的箕子不再是一个贤臣，甚至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只是一种气候、物候现象。这种违反传统的解说自然引起了普遍的反反对，咸认为赵宾是妄说。但是对赵宾的解说，当时诸易家却不能作有力的批驳。于是有人就揭发赵宾好小数书。用“小数”来说《易》，当然不是阐释《易经》章句义理的正道。所谓“小数”，《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云：“其法也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寤以相乱。”即是将阴阳五行生克之理，用于勘测风水，择日，推人行年命运等等。将小数之术用于阐释《易》理，是以细事惑乱大道，这为学者们所不齿。赵宾却又能“持论巧慧”，使易学者们难以批驳。但易学家们却坚持认为赵宾“不合古法”，只是布辞妄说。而他却进一步宣告说他的这些持论是从孟喜那里受教得来，孟喜并不否认，而且还支持赵宾的这种违反传统的解说。孟喜自己抛出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由于梁丘贺否认他从田王孙处传授得来，已陷于困境，而且候阴阳灾变也与传统易学有违碍之处。再加上对赵宾说易的支持，使得他很被动。他不再受到皇帝的信任。本来他出身是举孝廉为郎，已做到“曲台署长”。西汉宣帝时的郎，属光禄勋职掌守宫殿，出充车骑，是贴近皇帝的内殿官。而曲台署长则是一个殿的主要官长，是这个宫殿的诸郎之头目，是个极有前途的职位。这时就因他有病免去，改任为丞相掾。这就不再是朝廷内官，而是调离皇帝身边成为丞相下面的属员。从做官或仕途而言，孟喜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不过对孟喜似乎并不怎么太要紧，因为他还在从事他的易学的研究。可是对他的打击却是接踵而至。这时正好宣帝要补充立一名《易经》

① 可参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明夷卦的注解。

② 《汉书·儒林传》引。

博士，尽管孟喜受到攻击，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推荐他担任这一职位。可是皇帝不答应，理由是孟喜“改师法”，意思是他背叛了师门。所谓“师法”，是指经学传授中老师所传述的经学内容、经传渊源和说经方法之类。就易学而言，汉兴以来，以田何所传为主，田何治《易》的特点，可从其弟子丁宽的著述中大致看出，不过是“训诂举大谊”而已。所以周王孙就有易古义之学，丁宽又求学于周王孙。严格说来也改了师法。而梁丘贺本是从前京房受易，又改从田王孙受易，也并非纯从师法。因此孟喜因改师法而不能立为博士，肯定是汉宣帝接受了梁丘贺的观点所致。这一次对孟喜的打击，后果比较严重，此后孟喜没有就他的阴阳灾变说作更详尽的阐述。后来在孟喜逝世后，京房从焦延寿那里听说他曾向孟喜讨教过关于易学的问题，就以为他从焦延寿所学即孟喜易学。可是却遭到孟喜弟子翟牧和白光的反对。由于京房得自焦延寿之学主要就是明灾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与孟喜的候阴阳灾变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而这正是孟喜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故其弟子对此十分忌讳，当然不肯承认。原来孟喜本人对他的候阴阳灾变这一套是信心十足的，即使是在同门及某些学者严厉的反下，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学说，并不因改官而有所气馁。可是引起皇帝的过问，而且反对他当博士，使他产生了顾忌。不过无论别人怎样攻击，无论仕途怎样失意，孟喜的易学仍成为汉代官方易学的代表，事实上，并没有多久，孟喜还是立为博士。不过孟喜死后，从他本身弟子员系统中，他的候阴阳灾变这一套似乎“去向不明”。

汉宣帝时官方立了三个易学博士，最有权势的当是梁丘贺。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他与孟喜不同，是很有心计的人，《儒林传》说他“以能心计，为武骑”。开始他跟太中大夫京房（即前京房）受易。后来太中大夫京房出为齐郡太守，他就拜田王孙为师，而与孟喜、施雠成为同门。梁丘贺在宣帝初年任都司空令时犯了事，本应将他免为庶人，但他在待诏黄门时，有好几

次为诸侍中讲授《易》，可能因此延缓了他免为庶人的处分。正好这时汉宣帝听说太中大夫京房（前京房）精通《易经》，很想听这个前京房讲论《易经》，可能这时太中大夫京房已出任齐郡太守，远离京都，于是宣帝嘱咐物色他的门人。待罪的梁丘贺有此际遇当然十分重要。所以在皇帝召见他时，就在宣帝面前充分表现了他对太中大夫京房易的娴熟，很得皇帝的好感，立即任命他为郎。汉宣帝时，士人的仕途大都是先被推为郎，从而获得与皇帝亲近，然后在郎的职位上有所表现，能被皇帝赏识，就会做到大官。出为齐郡太守的京房，就是由郎而为太中大夫而得为太守。孟喜也就是由郎而提升为曲台署长，后出为丞相掾。几乎免为庶人的梁丘贺，由于过去老师的余晖，幸运地取得郎位，当然懂得这一封赏的分量，他会尽力来保持这一位置，而且如果幸运的话，再由此步步青云。果然梁丘贺的好运接踵而至。由于汉宣帝在一次祭祀活动中碰到了意外事件，梁丘贺却由此进一步获得了皇帝的宠信。这一意外事件是当皇帝仪驾出行时，一面旌旗上的旄头掉落下来，旄头的剑尖堕入泥中，而剑刃正对着皇帝的车驾，惊动了皇帝。受到惊吓的汉宣帝要占卜一下这一偶发事件到底预示什么吉凶。于是召来梁丘贺对此事进行占筮，他的占筮结果是：“有兵谋，不吉。”果然有一个因谋反罪被杀了的大臣的儿子，流亡在皇帝将去进行祭祀活动的地区。他乘黑夜混入将行祭祀的庙中，穿着黑色的衣服混杂在穿黑色制服的郎众之中，和众郎一样持戟守于庙门，伺机谋刺皇帝。由于梁丘贺的占筮，事先提醒了众郎卫的警惕性，这个刺客很快被捉获并处死了。梁丘贺这次占筮有应，使得本来就赏识他的汉宣帝，对他更是恩幸有加，立刻擢升他为太中大夫，接着就提拔为给事中，而后做到九卿之一的少府，都是接近枢要的职位。本来工于心计的梁丘贺，这时就更为小心周密，以求得皇帝长久的看重和信任，果然他直到年老终官。梁丘贺还为其子梁丘临作了妥帖的安排，一方面将自己毕生所学加以传授，同时又将梁丘临派去施雠处学习。在宣

帝甘露三年举行的石渠阁会议上，梁丘临也表现了对齐郡太守京房易学的娴熟。《儒林传》说他“专行京房法”。

梁丘贺在西汉儒林中有一特别之处，就是汉儒做官的很多，但都不放弃教学。可是梁丘贺做了少府之后，就不进行教学，将他的儿子和门人张禹等派到施雠处学习。将自己的儿子和学生托付与施雠，表示梁丘贺对施雠的尊重和信任。奇怪的是施雠很不情愿承担这一教学任务，称自己学业荒废，不能任教。甚至躲藏起来，避开梁丘贺的尊敬。可是梁丘贺偏偏要请施雠来教其子弟。最后实在推脱不过去，不得已才勉强承担下来。施雠承当这一教学任务后，梁丘贺立即推荐施雠为博士。他推荐施雠说：“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似乎只是夸赞施雠年轻时就从田王孙学习，与田王孙师生关系数十年。可是这一理由却似乎很有力，果然“诏拜雠为博士”。由此可见，施雠之立为博士，孟喜之开头不能立为博士，梁丘贺都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梁丘贺治《易》所表现的事迹和其子梁丘临在石渠阁会议上的讲论，可以充分看出梁丘易主要是属于杨何门人前京房所授的易学系统，而不是田王孙传授的易学系统。或许由于两者差别不大，不太引起外人注意。不然就是由于梁丘贺的权势和为人，别人不敢对此置喙。但是对于田王孙《易》学的直接传人施雠来说，要他对杨何系统的前京房易的门下孙进行教学，就显得很不自然了。这或许是施雠不愿承当教授梁丘贺门下弟子的一个原因。而梁丘贺却是有心计的，他与孟喜之间的矛盾似乎已不可调和，就得更加与施雠搞好关系。他肯定认为让施雠代其教授弟子，就可保证他及其子弟确实属于田王孙系统的形象。因为事实上属于今文经学的田王孙《易》学，已成了官方易学。施雠在三个同门中很少说话，他从不批评梁丘贺，但他对梁丘贺一贯谦让，甚至躲着；对孟喜在孟喜候阴阳灾变一事中则既不批评，似乎也不来往。特别他当了博士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什么。

田王孙这一系统的易学，虽然号称有施孟梁丘三家博士，但

当孟喜宣扬了他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时，实际他已经改变了田王孙的易学传统。梁丘贺不能接受孟喜关于田王孙临死时独传于他的说法，是不是事实无关紧要，而是孟喜的说法整个改变了田王孙《易》学的形象。而梁丘贺自己本来就算不上是田王孙易学系统，他只是要这个名分。施雠可能是田王孙的真正传人，但他与梁丘贺的微妙关系，使他总是过分谦让而不讲话。

至于他们的弟子中，孟喜的两个学生白光和翟牧当了博士后似乎再无下文。施雠的两名弟子张禹和鲁伯，鲁伯的情况不清楚，张禹后来却做到丞相。张禹虽出身于梁丘《易》和施氏《易》，但他后来是以治《论语》出名。当然他也会占筮，但他为天子占筮“得吉卦则献其占，如有不吉，禹为感动忧色”。这样他与梁丘贺一样得到皇帝长久的近幸。而他本人，在《汉书》本传上说：“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又“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莞弦”。不过他仍是著名的施雠《易》传人。大约施雠和梁丘贺的传人中只有梁丘临一支较为活跃。梁丘临参加石渠阁会议，他有一个可能的弟子五鹿充宗。五鹿与其师祖梁丘贺一样做到少府。梁丘临的另一弟子，即是能通五经的王吉的儿子王骏，王骏也做到御史大夫的高官。王骏对易学有什么贡献不太清楚，但五鹿充宗却著有《略说》三篇，其内容如何现已不得而知。但五鹿在当时是声名显赫的，他能言善辩，又得内廷权贵的赏识。西汉时代论学，常常是当场辩论以决是非。这对五鹿充宗来说，正是他能发挥其长处的好机会。他也果然善于利用这种机遇，能利用其官职权势来发扬他善辩的名望；又能利用善辩的名望加强他的官声和权势。所以《汉书·朱云传》说：“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朱云大概发现了五鹿充宗的诀窍，知道他是利用职权强化了他能言善辩的能力，并不是他在学术上真有什么精到的见解。于是在一次廷辩中朱云被召入，乃“摄齋登

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五鹿充宗只因能言善辩，取得了盛名高位，朱云一次辩论战胜了五鹿充宗就成为博士。这就更加鼓舞着士子们“务于徇外”，然而“此等徒耸观听之举，可以论学乎”？（吕思勉《秦汉史》）

可见整个西汉易学界当时处于十分空虚的状态，孟喜的《易》家候阴阳灾变受到抨击，传统的易学又没有什么新的气候，对占筮的效应，特别是对筮的解说方面，都还有根本的困难。光靠对经文的解说辩论，不能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因而易学的发展，面临着汉兴以来的关键时刻。

### 三 京房八宫卦序

前已述及，京房在其青少年时代，在家庭中就是勤奋好学而善于钻研的学子，这时他就涉猎了他可能看到的古代书籍，其中有些是皇家规定的儒家典籍，有不少是未被列为典籍的篇章或者是古代遗佚的残卷。可能是京房对易学特别有兴趣，因而在易学上下了功夫；或者是京房的家族世代传《易》，受家族传统的影响，他在易学方面显示了较深的造诣。总之京房在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中，总是与易学相关。可是京房所从事的易学，与当时得行于世的田家易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仍是六十四卦的体系，也讲经传，但是整个《易》的体例却有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设想，京房在他广泛的博览中，接触到了当时传世《易经》而外的有关易学的内容，比如前面述及的《艺文志》上刊列的《古五子书》等等易学书篇。具有特色的京房易可能与这些书关系也相当密切。其时京房或在故乡，或在小黄跟随着焦延寿，还没有进入京都繁华之地，还没有与当时通行的田家易有什么牵连。因而他可能作出一种构思，不顾及通行易学与他的体系有什么矛盾或妨碍。

现在所能见到的京房著作只有吴陆绩注的《京氏易传》三卷。这一节所述的京房易学，也是根据这三卷的内容。《四库全书提要》说它：“其书虽以易传为名，而绝不诠释经文，亦绝不附和易义。”这是从行世的传统《易经》的体例而言，也即是从通常学者注易的形式来说的。如果就京房易学的整体而言，应该说它是附合易义或说是从易义出发的，而且它提供了解释经文的更广阔的方面，使经文的解释更为灵活多样。不过《四库全书提要》对京房易的评论，反映了一般儒者对京房易的看法。《四库全书提要》对京房易传的内容作了最简明的介绍：“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宫，每宫一纯卦统七变卦，而注其世应飞伏，游魂归魂诸例。下卷首论圣人作易，揲蓍布卦，次论纳甲法，次论二十四



气候配卦，与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龙德虎刑，天官地官与五行生死所寓之类。”虽然没有将京房易主要意义说明，却将其外部形式即书写体例大体上都说到了。

### （一）关于卦的排列

在《易经》中，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是按《序卦传》所说的方式安排的。其排列方式同时遵循两条原则。第一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即是按天地、万物、人伦等等的次序。第二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孔颖达说：“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sup>①</sup> 这是基于阴阳相对的原理而建立的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这样建立起来的六十四卦排列次序为：

- |               |                       |
|---------------|-----------------------|
| (1) 乾卦☰。乾下乾上  | } 相变亦称相错              |
| (2) 坤卦☷。坤下坤上  |                       |
| (3) 屯卦☶。震下坎上  | } 相覆亦称相综 <sup>②</sup> |
| (4) 蒙卦☶。坎下艮上  |                       |
| (5) 需卦☵。乾下坎上  | } 相覆                  |
| (6) 讼卦☶。坎下乾上  |                       |
| (7) 师卦☶。坎下坤上  | } 相覆                  |
| (8) 比卦☶。坤下坎上  |                       |
| (9) 小畜☶。乾下巽上  | } 相覆                  |
| (10) 履卦☶。兑下乾上 |                       |

<sup>①</sup> 见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序卦》。

<sup>②</sup> 明来知德称孔颖达的“相变”为“相错”，而“覆”为“相综”。

- (11) 泰卦䷊。乾下坤上 } 相变相覆  
 (12) 否卦䷋。坤下乾上 }  
 (13) 同人䷌。离下乾上 } 相覆  
 (14) 大有䷍。乾下离上 }  
 (15) 谦卦䷎。艮下坤上 } 相覆  
 (16) 豫卦䷏。坤下震上 }  
 (17) 随卦䷐。震下兑上 } 相覆相变  
 (18) 蛊卦䷑。巽下艮上 }  
 (19) 临卦䷒。兑下坤上 } 相覆  
 (20) 观卦䷓。坤下巽上 }  
 (21) 噬嗑䷔。震下离上 } 相覆  
 (22) 贲卦䷖。离下艮上 }  
 (23) 剥卦䷖。坤上艮上 } 相覆  
 (24) 复卦䷗。震下坤上 }  
 (25) 无妄䷘。震下乾上 } 相覆  
 (26) 大畜䷙。乾下艮上 }  
 (27) 颐卦䷚。震下艮上 } 相变  
 (28) 大过䷛。巽下兑上 }  
 (29) 坎卦䷜。坎下坎上 } 相变  
 (30) 离卦䷝。离下离上 }  
 (31) 咸卦䷞。艮下兑上 } 相覆  
 (32) 恒卦䷟。巽下震上 }  
 (33) 遯卦䷠。艮下乾上 } 相覆  
 (34) 大壮䷡。乾下震上 }  
 (35) 晋卦䷢。坤下离上 } 相覆  
 (36) 明夷䷣。离下坤上 }  
 (37) 家人䷤。离下巽上 } 相覆  
 (38) 睽卦䷥。兑下离上 }

- |               |        |
|---------------|--------|
| (39) 蹇卦䷦。艮下坎上 | } 相覆   |
| (40) 解卦䷧。坎下震上 |        |
| (41) 损卦䷨。兑下艮上 | } 相覆   |
| (42) 益卦䷩。震下巽上 |        |
| (43) 夬卦䷪。乾下兑上 | } 相覆   |
| (44) 姤卦䷫。巽下乾上 |        |
| (45) 萃卦䷬。坤下兑上 | } 相覆   |
| (46) 升卦䷭。巽下坤上 |        |
| (47) 困卦䷮。坎下兑上 | } 相覆   |
| (48) 井卦䷯。巽下坎上 |        |
| (49) 革卦䷰。离下兑上 | } 相覆   |
| (50) 鼎卦䷱。巽下离上 |        |
| (51) 震卦䷲。震下震上 | } 相变相覆 |
| (52) 艮卦䷳。艮下艮上 |        |
| (53) 渐卦䷴。艮下巽上 | } 相变相覆 |
| (54) 归妹䷵。兑下震上 |        |
| (55) 丰卦䷶。离下震上 | } 相覆   |
| (56) 旅卦䷷。艮下离上 |        |
| (57) 巽卦䷸。巽下巽上 | } 相变   |
| (58) 兑卦䷹。兑下兑上 |        |
| (59) 涣卦䷺。坎下巽上 | } 相覆   |
| (60) 节卦䷻。兑下坎上 |        |
| (61) 中孚䷼。兑下巽上 | } 相变   |
| (62) 小过䷽。艮下震上 |        |
| (63) 既济䷾。离下坎上 | } 相变相覆 |
| (64) 未济䷿。坎下离上 |        |

根据以上排列次序，说明将 64 卦排成两个一组，共 32 组。如非相变，即是相覆。或说若非相错，即是相综。其中相错者四组，相综者二十四组，又相错相综者四组。乾卦《文言传》说：“六

爻发挥，旁通情也。”陆绩注云：“乾六爻发挥旁通于坤，此旁通之法所由仿也。”故凡两卦旁通，即两卦相变或相错。而两旁通之卦，则卦义互见。复卦《彖传》云：“反覆其道”，即是卦之反覆。观卦《彖传》虞翻注说：“观反临也”，即观卦反覆为临卦。即是孔颖达所谓之覆卦，来知德谓之综卦。这种按照阴阳相对之理和天地万物人伦之大绪而确定的卦序具有经典性。

## （二）京房关于八宫的思想

京房在青少年时代曾在观测天象上下过工夫。当时所谓的天象，除了日月星辰等天体外，也包括风雷雨露等大气现象。他在这一方面有独特的研究，不仅有自成一家的星占学体系，也有自成一家的风角学的研究。在西汉早期即已形成的八方风体系，对他影响至深，他在风角学中特别强调了八方风观念。八方风观念，初见《吕氏春秋·有始览》。后在《淮南子》和《史记·律书》中都用重手笔作了描述。《史记·律书》说：“《书》曰，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七正也称七政，是指日月和五大行星。二十八宿为七政之所舍，即是日月和五大行星在天空运行时的背景星宿。由于太阳月亮五星所舍之星宿与时俱变，即在某一时节，例如冬季，日月五星各居于某个星宿。而到另一时节，例如春季，日月五星又各居于另一些星宿。于是能从观测日月五星所在星宿而知时节，反过来，知时节历日也可推知日月五星之所在。所以观测天体天空的位置而可通五行八正之气。《史记·律书》也依这个原则详尽地排出八方八风，七正二十八宿，律历和五行八正之气。

所谓八方，就是四正四隅方位，四正即东南西北四方，四隅即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四维。配应八方的风就是八风。对应于西北的是不周风，正北的是广莫风，东北的是条风，东方是明

庶风，东南是清明风，南方是景风，西南是凉风，西方是闾阖风。由于古代时间和空间相连续，所以空间的八方与时间的八节也是相连续的。即若北方广莫风行令时，于季节为冬令，于天象，在那个时代冬至时太阳居于虚宿女宿，于历为十二月，于十二子（《史记·律书》称十二支为十二子，称十干为十母）为子，于律则中黄钟。对于这样的宇宙结构，即在天覆地载的六合之中，八方就是八荒、八极，也就是平面型无限延伸的宇宙的八个标志点。

京房对这样的宇宙模式是肯定的。京房易的传人，东晋时的干宝，对《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作注说：“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还。《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系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穀梁传》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后世浮华之学，疆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sup>①</sup>或许东晋时道家盛行，干宝引《老子》、《庄子》之说，论及天地之先和六合之外，不过却是存而不论。所以京房之立说，只就天地之间和八极之内。这与《易传》的思想是一致的。

京房对《易》的一个固有观念是先有三画的基本卦，而后有六画的重卦。即认为《周易》系统的六十四卦是由八个单卦重复组合而得。按《困学纪闻》引《京氏积算法》说：“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农，重乎八纯。”可见京房思想中坚持的八个基本卦，是描述宇宙万事万物的基本符号。京房受八风模式的影响，因此将八个基本卦或八纯卦作为八个基极，而演变出他特有的八宫卦的模式。

<sup>①</sup> 引自〔清〕惠栋撰《易汉学》。

### (三) 京氏八宫卦

八宫卦是以八个基本卦为八宫，基本卦自身重复而成为该宫的本宫卦。例如乾卦，其基本卦由三个阳爻组成，自身重复而变为六个阳爻组成的乾卦，这就是乾宫的本宫卦或称乾宫本位卦。又如离卦，其基本卦由上下两阳爻和中间一阴爻组成，自身重复则成为二五位之两爻为阴，其余初三四上位上的四爻为阳的离卦，即是离宫本位卦。所以京房八宫卦是以八基本卦自身相重而建立起八宫的本宫卦。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引宋人胡一桂的话：“京氏易以八宫为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首乾宫八卦（乾、姤、遯、否、观、剥、晋、大有）次震宫八卦（震、豫、解、恒、升、井、大过、随），次坎宫八卦（坎、节、屯、既济、革、丰、明夷、师），次艮宫八卦（艮、贲、大畜、损、睽、履、中孚、渐）。中卷首坤宫八卦（坤、复、临、泰、大壮、夬、需、比），次巽宫八卦（巽、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颐、蛊），次离宫八卦（离、旅、鼎、未济、蒙、涣、讼、同人），次兑宫八卦（兑、困、萃、咸、蹇、谦、小过、归妹）。盖重八纯卦变六十四卦也。”由此可见八宫卦是将八宫本宫卦以逐爻变化而变出本宫之其他七卦，而得每宫八卦，八宫共得六十四卦。

《易传·系辞下》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京房或受此启发，认为宇宙或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变化与易学上所论述的一切变化在本质上应有某种对应。易学上一切变化的基础是爻变，因此对爻变进行认真而恰当的处理，京房期望由此而得出的易学框架，即以某种爻变为基础的易学构架，应该可能成为宇宙或天地间一切事物变化的模式。因此他首先从八宫的本宫卦出发，逐步改变每一爻。每改变一爻即出现一个新卦，如乾宫本位卦的乾卦，初爻变而成为姤卦，这姤卦就是乾宫一世卦。然后是再将二爻变，即变

成遯卦，是为乾宫二世卦。紧接着变三爻而得否卦，即乾宫三世卦。四爻再变而得观卦，即是乾宫四世卦。五爻再变得乾宫五世卦剥卦。再逐爻变就是上爻变，乾卦上爻也变就成了坤卦，但是坤卦是坤宫的本位卦。京房认为八宫是应该严格区别清楚，不应有任何混淆。那么五爻变了之后怎么变呢。张行成解释说：“若上九变遂成纯坤，无复乾性矣。乾之世爻上九不变，九返于四而成离，则明出地上，阳道复行，故游魂为晋，归魂于大有，则乾体复于下矣。”（《元包数总义》卷一）<sup>①</sup>就是说五爻变后，不继续变上爻，而是返变四爻。当剥卦四爻变而得晋卦，晋卦下面单卦为坤，上面单卦为离，故说上卦成离而明出地上。这就叫做游魂卦。因为四爻还阳后为离，阳道复行，但本质上还没有返回乾卦的全阳之体，只不过是经过逐步变化而快要丧失本性的乾卦的一种返照。再下一步爻变是将下三爻全变，即是下卦变。对乾卦来说是乾体复于下，游魂卦为晋卦，晋卦下三爻均为阴爻，即晋卦下体为坤。下体三爻全变而复为乾体，成为大有卦。大有卦除五爻外，均返变为阳爻，接近于回归到乾体。大有卦当然不是乾卦，所以它是乾的归魂卦。至此乾宫本位卦通过爻变而衍生出其他七卦，连同自身组成乾宫的八卦。其他各宫卦也照此方式推出，从而形成了京房所特有的八宫卦序。

将京房的八宫卦列成一个表以供查阅和参考，也便于进一步说明。

<sup>①</sup>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109。台湾商务印书馆。

京房八宫八卦表

八 世 魂 宫	乾 ䷀	覆 ䷛	坎 ䷜	艮 ䷳	坤 ䷁	巽 ䷸	离 ䷄	兑 ䷹
一世	姤 ䷫	豫 ䷏	节 ䷻	贲 ䷖	复 ䷗	小畜 ䷈	旅 ䷷	困 ䷮
二世	遯 ䷠	解 ䷧	屯 ䷂	大畜 ䷙	临 ䷒	家人 ䷤	鼎 ䷱	萃 ䷬
三世	否 ䷋	恒 ䷟	既济 ䷾	损 ䷨	泰 ䷊	益 ䷩	未济 ䷿	咸 ䷞
四世	观 ䷓	升 ䷭	革 ䷰	睽 ䷥	大壮 ䷡	无妄 ䷘	蒙 ䷃	蹇 ䷦
五世	剥 ䷖	井 ䷯	丰 ䷶	履 ䷉	夬 ䷪	噬嗑 ䷔	涣 ䷺	谦 ䷎
游魂	晋 ䷢	大过 ䷛	明夷 ䷣	中孚 ䷼	需 ䷄	颐 ䷚	讼 ䷅	小过 ䷽
归魂	大有 ䷍	随 ䷐	师 ䷆	渐 ䷴	比 ䷇	蛊 ䷑	同人 ䷌	归妹 ䷵

## (四) 游归、贵贱、世应

京房得出八宫卦时，已经作了一个设计，即两魂卦。对此两种卦必作交代。按惠栋《易汉学》引《京房易积算法》曰：“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京房的这个设计本身是得自于《易传》的说法。首先是《易·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朱熹说：“易者阴阳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



变，天地之道也。”（《周易本义》）精气凝聚而成形体，魂魄游散而生变化，是以得知鬼神之情状。这是自然界的变化，在易学中自然也可以从爻变得其情状。更何况谦卦彖辞还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无论天道、地道、人道和鬼神之道，都一样地喜谦害盈。既然有天道、地道、人道和鬼神之道，那么在易学体系中就会有天地人鬼之易。《京氏易传》晋卦说：“精粹气纯，是为游魂。”陆绩注说：“为阴极剥尽，阳道不可尽灭，故返阳道。道不复本位，为鬼魂例入卦。”干宝《周易注》在《序卦传》注中说：“需，坤之游魂也。云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东西之象也。”又讼卦注说：“讼，离之游魂也。离为戈兵，此天气将刑杀（讼主八月），圣人将用师之卦也。”又乾卦彖辞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荀爽说：“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也。”荀爽的这一注说是基于乾坤两卦的游归而言。乾宫游魂卦为晋卦，归魂卦为大有卦，两卦之上卦皆为离卦。坤宫之游魂卦为需卦，归魂卦为比卦，两卦之上卦皆为坎卦。所以说乾终于离，坤终于坎。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引荀爽注随卦彖辞说：“随者，震之归魂，震归从巽，故大通。”其说为震宫归魂卦为随，而游魂卦为大过。大过下体为巽，随卦则变大过之下体巽为震，故说“震归从巽”。又说蛊卦彖辞云：“蛊者，巽也。巽归合震，故元亨也。”蛊卦为巽宫归魂卦，巽宫之游魂卦为颐卦，颐卦下体为震，而蛊之下体归巽，故云“巽归合震”。凡此皆说明游魂和归魂之卦，确实是自然界的一种阴阳之变的易学描述。

《系辞下》说：“爻有等故曰物”，干宝注说：“等，群也。爻中之义，群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京氏易的要点之一就是以爻变为基础来使易学描述天地宇宙间一切可能事物的变化。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爻变体现了一切事物的阴阳变化。关于阴阳变化，京房则

作了更深入一步的研究。但现在还要先说一下京房关于爻位的贵贱的设计。或许是京房采用了《易纬·乾凿度》所引的现成说法，或许是京房作了这样的设计，而《乾凿度》转述了他的发明。总之京氏易传上确实是按《乾凿度》归结的说法，分配各爻的地位。《乾凿度》说：“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凡此六者，阴阳所以进退，君臣所以升降，万人所以为象则也。故阴阳有盛衰，人道有得失。圣人因其象，随其变，为之设卦。方盛则托吉，将衰则寄凶。”《京氏易传》每卦都要讲到爻位，如乾卦说：“九三三公为应”，姤卦说：“元士居世”，遯卦说“大夫居世”等等，都是以其爻位的等级贵贱而言的。对于爻位的贵贱，不仅在京氏易传承中用来解经，其他家也用来解经。干宝是京易之传人，他的解经当然是京易正传。如对坤六三爻辞：“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干宝注说：“阴气在三，七月之时，自否来也。阳降在四，三公位也；阴升在三，三公事也。”说三爻为三公之位。又如荀爽说讼上九爻辞：“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云：“鞶带，宗庙之服，三应于上，上为宗庙，故曰鞶带也。”即说上爻为宗庙之位。《京氏易传》中已说到世和应，爻位贵贱与世应是连在一起说的，这里荀爽也说“三公应于上”，因而以下要说世应。

一卦六爻，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的设计，是发挥了“列贵贱者存乎位”的说法。占得一卦后应如何根据这卦定吉凶呢？京房根据其八宫八卦的构架，认为应是由其中一爻为主而作判定。《京氏易传》姤卦说：“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而这为主的一爻，如果是一世卦就是以初爻为主，二世卦就以二爻为主，如此至五世卦以五爻为主。京易中无六世卦，只有本宫卦，本宫卦为八纯卦，以上爻为主。游魂卦因四爻变而得，故以四爻为主。归魂卦因是下体全变，以三爻为主。为主之爻称为世爻。再按爻位贵贱来说，就是一世卦初爻元士居世，二世卦二爻大夫居世，三世卦三爻三公临世，四世卦四爻诸

侯临世，五世卦是五爻天子治世。本宫卦是上爻宗庙治世。游魂卦与四世卦同，四爻诸侯临世，归魂卦与三世卦同，三爻三公临世。世爻是为主之爻，用之判定吉凶。但是看吉凶时还要看为主的世爻与卦中其他爻的关系，于是有应爻。《易纬·乾凿度》说：“三画成乾，六画成卦。三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天。易气从下生，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为应。”这个相应的关系，可能是从《彖传》和《象传》的应位说推来。如同人卦彖辞说：“同人，柔得位而得中，而应于乾，曰同人。”“柔得位而得中”是指六二爻，同人卦仅此一爻为柔爻，既得阴位，又得中。“应于乾”是指五刚爻，即是说一个柔爻与五个刚爻相应。这里还未有固定对应的爻。而到京房八宫体系建立后，就自然地突出了世应关系，即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六爻相应。《京氏易传》中以此来解说诸卦的例子很多。如姤卦，说：“元士居世，尊就卑，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九四诸侯坚刚在上，阴气处下。”即说姤卦是乾宫一世卦，所以说“元士居世”，即初爻为一卦之主。其应爻为九四诸侯，为阳爻故云“坚刚在上”。世爻阴气处下，故意味着“尊就卑”。又如否卦说：“三公居世，上九宗庙为应，君子以俟时，小人为灾。”否卦是乾宫三世卦，故“三公居世”，应爻为上九宗庙。君子待时而动，小人则为灾。又如晋卦说：“诸侯居世，反应元士”，即晋卦为乾宫游魂卦，四爻为世爻，所以说“诸侯居世”，应爻为初爻，故说“反应元士”。而乾宫归魂卦大有则说“三公临世，应上九为宗庙”，即归魂与三世卦同。震宫一世卦豫，当是初爻为世爻，而四爻为应爻。其说为：“世立元士为地易，奉九四为正。”又如坎之游魂明夷，四爻为世而初爻为应，乃云：“退位入六四诸侯在世，元士为应，君暗臣明不可止”，后世解说易卦，亦多用世应之说。如荀爽对解卦彖辞：“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说：“解者震世也（震宫二世卦），仲春之月，草木萌芽，雷以动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故甲坼也。”谦卦彖辞说“谦，亨”，九家易注

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谦也。谦者兑世（兑宫五世），艮与兑合，故亨。”丰卦卦辞云：“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干宝注曰：“丰，坎宫阴，世在五，以其宜中，而忧其昃也。坎为夜，离为昼，以离变坎，至于天位（五爻为天子），日中之象。殷，水德坎象，昼败而离居之，周代殷居王位之象也。勿忧者，劝勉之言也。言用德当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都是以世爻来解经。

## 四 京氏纳甲

《京氏易传》卷下说：“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就是说将八宫卦分别配以十干。陆绩注说：“乾坤二分，天地阴阳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阴阳之终始。”又说“庚阳入震，辛阴入巽。”又说：“戊阳入坎，己阴入离。”又说：“丙阳入艮，丁阴入兑。”皆说八宫卦与十干之配。因甲为十干之首，故称此为纳甲。其又说“六位配五行”，实即是说六爻与十二支相配，盖因将卦爻与干支配应起来，即可将干支五行引入其易卦系统之中。

### （一）干支五行

当春秋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发展之际，即已开始考虑如何将干支与五行配当。但是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如何将五行与四季、十二月配应起来。首先是《管子·五行》篇，即试以五行来配应自冬至起至次一冬至的一年。他将一年分为五个等份，按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排列，即将甲配木，丙配火，戊配土，庚配金，壬配水。不过有些学者认为《管子·五行》篇是战国末期阴阳家的作品，因此就不能依此来肯定春秋时已有五行配干的实际。如果考虑到《左传·昭元年》的“分为四时，序为五节”的记录，似可察知春秋时以五行配应一年的办法，已在初步实施。可以设想，其时将十干配五行亦在探索之中。降至西汉，《淮南子·天文训》说：“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可以看出还是将一年分为五等份，尚

不能与人们通用的一年四季相协调。但可以看出已将五行与五色配应，而且呈现了五行与干支相配的苗头。而尤可注意者，其说“壬午冬至，甲子受制”云云，是将冬至日与木用事的起始日甲子拉开。自壬午日至甲子日历时 42 天，自冬至到立春整日数为 45 天，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天文训》的这一段话，反映了战国时代后期已采用了以立春为一岁之始的颛顼历。可见战国中期之后将干支与历法相配，从而将干支与五行相配的努力正积极进行。

《淮南子·时则训》，《吕氏春秋》以及《礼记·月令》等都记录了早期月份与五行相配的情况。将《时则训》抄录于此：

孟春之月，其位东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

仲春之月，其位东方，其日甲乙。

季春之月，其位东方，其日甲乙。

孟夏之月，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

仲夏之月，其位南方，其日丙丁。

季夏之月，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

孟秋之月，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

仲秋之月，其位西方，其日庚辛。

季秋之月，其位西方，其日庚辛。

孟冬之月，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

仲冬之月，其位北方，其日壬癸。

季冬之月，其位北方，其日壬癸。

但《吕氏春秋》等，其季夏之月与仲夏之月相同，只是在季夏之月与孟秋之月之间附加如下之一条，即：“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云云。这种分配法已不是将一年划为五个等份来配五行，而是特意列出一个月配土，称为季夏。这就是“土王季夏”说。土王季夏说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使五

行相生的法则得以顺当地解释四季的转换，从而使中医的“五运六气”说得以顺利地建立。所以在中医系统中仍然采用此一配当，至今仍保留“长夏”之说。不过土王季夏有一很大的困难，就是火行与土行对应的时间偏少，显其力量偏弱，尤以土行为甚，显然处于附属地位。而与最初设想五行应处于均等地位的观念不能相融合。

《淮南子·天文训》提出了一个较为含混的配当，企图避开土行太弱的矛盾。其说为：

东方木也，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日甲乙。

南方火也，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日丙丁。

中央土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日戊己。

西方金也，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日庚辛。

北方水也，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日壬癸。

如此一来，木火金水四行各治一季，而土行只是“制四方”。即在四时十二月无土之专有地位，实即将土排除出五行统四时之配当。董仲舒对此觉得不妥，在其《春秋繁露·五行对》篇中做了一点解释，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他给予土以“五行莫贵于土”的空架子，算是将土排出四时之外的“安慰”。但由此却引出了一种新的配当，按“土制四方”和“五行莫贵于土”的思想而设计出用春夏秋冬四季各季的末月来配土的办法，这就是“土王四季”说。《淮南

子·天文训》说：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申辛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

四季是指四季的末月，即季春、季夏、季秋、季冬之月。月与十二辰配，寅为孟春，卯为仲春，辰为季春，巳为孟夏，午为仲夏，未为季夏，申为孟秋，酉为仲秋，戌为季秋，亥为孟冬，子为仲冬，丑为季冬。所以四季辰戌丑未皆土，而十干戊己配土，故说“戊己四季土也”。这样一配，土行一行配了四个月，其他各行只各占两个月，土行太重。为此又作了改进，只将四季月的后十八日来配土，于是又回复到五行每行七十二日，只不过土行的七十二日散布在四个季月的后十八日。如此一来，保留了“土制四方”和“五行莫贵于土”的基本思想，又使五行与四时的配当趋于整齐，而使“土王四季”的观念得以成立，一直沿用至后世。《白虎通德论·五行篇》说：“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无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正是坚持了土行在五行相生说配四季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土王四季”仍有明显的缺陷。即五行与十二支的配当尚有不洽之处。水火木金四行各配以二支，而土行配以四支。由于一个月三十日，可以取其十分之六（十八日）来配五行之土，但一个支却不能取其分数来与五行相配。从而导致一个季月可取其十分之六的日数配土，而该月之支名却得全部配土的矛盾。此外还有方位上显示的矛盾，戊己二干配土，却配方位于中央；辰戌丑未四支配土，却不配方位于中央，而是配方位于周边。对于这一矛盾，与京房同时的翼奉于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京房入宫前二年）上封事中提出，以辰未配于上方，戌丑配于下方，似乎就是针对此一不妥而提出的改进方案。地上周边方位配以十二支该是基于斗建



的思想。即斗柄所指的方位，正月指寅，二月指卯等等，正如《淮南子·天文训》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又说：“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大概这是最早用支名明确记载周边十二方位的。五行配十干和配十二支的方法，虽不理想，但可算大致解决。唯十干与十二支配对成六十个干支对（俗称六十花甲子）后与五行的配对问题仍然要设计一个办法。就干支对配五行而言，历史上曾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以支为主，即以干支对中支的五行属性决定干支对的五行属性。第二种是由于干支对中干和支的五行关系来确定干支对的五行所属。第三种则是“纳音五行”。在京房那个时代，主要是采取第一种方法。观《汉书·翼奉传》云：“奉对曰‘师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注曰：“假令甲子日，子为辰，甲为日，用子不用甲也。”京房实亦只注目于十二支的五行所属，而以支的五行分配于六十干支对。《京氏易传》卷上乾卦云：“水配位为福德，木入金乡居宝贝，土临内象为父母，火来四上嫌相敌，金入金乡木渐微，宗庙上建戌亥乾本位。”按京易乾卦属金，乾卦六爻由初至上顺次为甲子水，甲寅木，甲辰土，壬午火，壬申金，壬戌土。故初爻为乾之子孙（金生水），所以说“水配位为福德”。二爻甲寅木为乾之财爻（金克木），故云“木入金乡居宝贝”。三爻甲辰土为乾之父母（土生金），故说“土临内象为父母”（九三爻为乾内卦之上爻）。四爻壬午（壬午与甲午同）火，火克乾金，故说“火来四上嫌相敌”。五爻壬申金（壬申与甲申同）与乾金相比为兄弟，金重害木，故云“金入金乡木渐微”。上九壬戌土为宗庙，为乾卦之世爻，所以说“宗庙上建戌亥乾本位”，所以有亥，因戌亥之方为乾之位。可见京房亦遵循“用辰不用日”的方法来处理干支对的五行所属。

## (二) 卦纳干与爻纳支

京房纳甲法的本质在于将干支五行纳入易卦系统中去。将干支五行纳入易卦，本质上就是将西汉时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说与《易》卦联系起来，从而使他建构的八宫卦内在的组织能力增强。以便于操作和增强其解说能力。

京房首先是将十天干与八卦配合。由于天干是十而八卦只有八，就多出两个天干。只要设法将多余的两天干能作妥善处理，即告完成。京房作此项配应所根据的仍是《系辞》所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将数的奇偶分开。奇为阳，偶为阴，即天为阳而地为阴。而十天干亦可视为十数，照着分阴分阳，而有居于奇数位的甲丙戊庚壬为阳，居于偶数位的乙丁己辛癸为阴。将十天干的阴阳与八卦的阴阳相配。而卦的阴阳按《说卦传》所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由此可知，乾震坎艮四卦为阳，坤巽离兑四卦为阴。另外《系辞传下》也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据此说，乾三爻皆阳而坤三爻皆阴，为全阳全阴之卦。而震坎艮三卦皆为一阳爻而有二阴爻为阳卦，巽离兑三卦皆为一阴爻二阳爻为阴卦。于是将八卦的阴阳配应十干的阴阳，阳卦配阳干，阴卦配阴干而有：

阳卦	乾艮坎震	阴卦	坤兑离巽
阳干	甲丙戊庚	阴干	乙丁己辛
	壬		癸

将壬癸两干分别再纳乾和坤。所以说：“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这样的纳甲，看起来只是

将天干的阴阳表征八卦的阴阳。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卦只有八个，其阴阳规则又极易掌握，不必要再加一道天干来作符号表征。可是京房要建构的是一个具有客观性而且是可操作的系统，因此要将干支五行系统地引入其八宫卦体系中。他以为干支五行是一种与天地宇宙情况更加相符，而且对事物的解释和对吉凶的推测有一种内在的机制，不依赖于个人对卦爻辞或卦象的主观的看法。如果干支五行机制得以顺利地纳入八宫卦中，那么就建构了全新的易学体系。

因而京房对纳支作了更深入的考虑。首先考虑到《易·系辞》说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京房在《易传·乾卦》中写道：“降五行，颁六位。”又于其下卷说：“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因此京房认为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就是将干支五行配应于易卦各爻位的根据和原则。由于京房的著述基本上遗失了，很难知道他当时具体是怎么想的。但根据后人的解说，可以大致推知他的某些设想。虞翻对六虚的解释最为接近京房，他说：“六虚六位也。日月周流，终则复始，故周流六虚。谓甲子之旬，辰巳为虚。坎戊为月，离己为日，入在中宫，其处空虚，故称六虚。五甲如次者也。”这就是六甲孤虚法，按裴骃说：“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为孤，辰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为虚。”<sup>①</sup>由此可知，凡与甲乙两干相配的支辰，皆为孤辰；凡与戊己两干相配的支辰，皆为虚辰。如甲子旬中，甲子乙丑之子丑是上一旬甲寅旬的孤辰，而虚辰辰巳相配的干正是戊己。这样周流六虚有了两种含意：一是太阳和月亮明亮地在地际运行，可谓之周流六虚；处于中宫虚空之处的戊己二干，紧随着六甲的虚辰，当然也是周流六虚。《汉书·律历志》说：“天数五，地数六，六为律，五为声，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即说虚既为爻又为律。这样周流六虚又有了两种含意，一种是音律有十二，六律为阳而六吕为阴，当声音自低升高或自高降低要历

<sup>①</sup> 见《史记·龟策列传》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虚”注引《集解》之说。

经此六律六吕（六吕亦称六同），这当然也可以称为周流六虚。还有一种含意就是卦之六位，《周易本义》云：“周流六虚，谓阴阳流行于卦之六位。”朱熹说：“六虚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这个周流六虚可能才是《系辞传》的本义。京房一定考虑了所有这四种含义，虽然他不可能从符号与事物间的关系高度来处理它们，但他以为这四种情形既可互相对应，也可互相说明。在其纳甲系统中，主要突出的是干支五行符号体系和八宫八卦体系二者关系的基础。

在卦爻纳支的具体体现上，首先要按《京氏易传·下》说“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的原则，坚持卦分阴阳，干分阴阳；阳卦纳阳干，阴卦纳阴干的一贯性。在纳支上要阳卦各爻纳阳支，阴卦各爻纳阴支。这是纳支的第一条规则。

纳支的第二条规则是要确立一个起始点。《史记·律书》说：“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其于十二子为子。”由此按生律法可推出十二律与十二月的对应关系：

黄钟	十一月建子	蕤宾	五月建午
大吕	十二月建丑	林钟	六月建未
泰簇	正月建寅	夷则	七月建申
夹钟	二月建卯	南吕	八月建酉
姑洗	三月建辰	无射	九月建戌
仲吕	四月建巳	应钟	十月建亥

《后汉书·律历志》载京房说：“夫十二律之变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戏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又说：“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夏，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可见从历法来看冬至所在之月或建子之月为一年之始，而十二律以黄钟为首。黄钟又自冬至始。所以黄钟当乾之初九。

起点确立之后，就要根据生律规则求得其他各爻所对应的支。生律之法，是所谓三分损益法；如果按十二支位来说，即是隔八生律法。隔

八生律法的意思是律起于黄钟子位当乾初九爻，再从子位起算，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位。这时律中林钟未位，当坤初六爻，于时为六月。又从未位起算，历未申酉戌亥子丑寅，这时律中泰簇寅位，当乾九二爻，时为正月。如此隔八相生，得出全部十二个律及其支位和对应的爻位。可以求得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律（或称六阳律），分别对应于子位乾初九，寅位乾九二，辰位乾九三，午位乾九四，申位乾九五，戌位乾上九。而六吕（或六阴律，六同）之生，则由坤初六爻起于未，律中林钟，时为六月开始。因坤为阴卦，按“天左旋，地右动”的原则，应该右旋，即与六阳律相反方向运转。由未起，历未午巳辰卯寅丑子八位，应得黄钟律在子位乾初九，再右转历子亥戌酉申未午巳，在巳位得坤二爻，应得仲吕律。如此下去得出林钟、仲吕、夹钟、大吕、应钟、南吕六吕，各对应于：未为坤初爻，巳位坤六二，卯位坤六三，丑位坤六四，亥位坤六五，酉位坤上六。京房就是根据生律规则和“天左旋，地右动”的规则确立起乾坤二卦六爻纳支的法则。

其余六卦各爻配支的法则，按律历之相配，十一月和五月为子午，阳支配阳卦各爻，故配长男震。各爻按阳支顺序，即初爻子，二爻寅，三爻辰，四爻午，五爻申，六爻戌，即与乾卦同。十二月和六月为丑未，阴支配阴卦，故长女巽卦当之。故巽卦初爻纳丑，据“天左旋，地右动”，因而巽卦九二爻纳亥，而非纳卯。其余则巽九三纳酉，巽六四纳未，巽九五纳巳，巽上九纳卯，以体现阴爻之变为右行。接着是正月和七月当寅和申，又纳于阳卦，则以中男坎配之。故坎卦各爻由下到上纳：寅辰午申戌子。再接着是二月八月为卯和酉，则以中女离配之。离卦诸爻由初到上各纳：卯丑亥酉未巳。然后是三月和九月，当辰和戌。以少男艮配之，则艮卦诸爻由初至上纳：辰午申戌子寅。最后是四月和十月，为巳和亥。以少女兑卦配之。其六爻由初到上各纳以：巳卯丑亥酉未。

乾	震	坎	艮
——戌	——戌	——子	——寅
壬——申	——申	——戌	——子
——午	——午	——申	——戌
——辰	——辰	——午	——申
甲——寅	——寅	——辰	——午
——子	——子	——寅	——辰
坤	巽	离	兑
——酉	——卯	——巳	——未
癸——亥	——巳	——未	——酉
——丑	——未	——酉	——亥
——卯	——酉	——亥	——丑
乙——巳	——亥	——丑	——卯
——未	——丑	——卯	——巳

于是京房的纳甲法可归结如上图，可称为京氏八卦纳甲图。由这个图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八纯卦每一卦都有对应的干，每一爻都有一个对应的支。因此每爻都有一个干支对。八卦共四十八爻，干支对有六十个，因此还多余十二个干支对无以配爻。于是规定甲与壬同，乙与癸同。即壬午与甲午同，癸丑与乙丑同等等。对这个八卦纳甲图，李淳风作了概括，说：

乾主甲子壬午，甲为阳日之始，壬为阳日之终。子为阳辰之始，午为阳辰之终。

坤主乙未癸丑，乙为阴日之始，癸为阴日之终。丑为阴辰之始，未为阴辰之终。

震主庚子庚午，震为长男，即乾之初九。甲对于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故主子午，与父同也。

巽主辛丑辛未，巽为长女，即坤之初六。乙与辛对，故巽主辛；以母授女，故主丑未，同于母

也。

坎主戊寅戊申，坎为中男，故主于中辰。

离主己卯己酉，离为中女，亦主于中辰。

艮主丙辰丙戌，艮为少男，乾上爻主壬对丙，  
用丙辰丙戌乃第五配。

兑主丁巳丁亥，兑为少女，坤上爻主癸对丁，  
用丁巳丁亥乃第六配。<sup>①</sup>

对于京房纳甲法，鉴于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中说：“案《玉策记》及《开明经》皆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属庚，丑未属辛，寅申属戊，卯酉属己，辰戌属丙，巳亥属丁。”而《玉策记》和《开明经》等都是周秦古籍，所以认为京房之纳甲别有所传。一般之说为京易本之焦贛，焦贛又得自周秦以来隐士之所传。至于京房从焦贛所学的情况，将另外讨论。但京氏纳甲法可能从一些古籍中得到启发却是可能的。在讨论西汉周易之传承时，就曾提到《汉书·艺文志》载有《古五子书》18篇，而且引沈钦韩之说，刘向曾校讎过这部书，说：“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又引孟康说：“古人说易，未有以甲子配卦爻者，至《汉书·艺文志》，有《古五子18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又《汉书·艺文志》载有《淮南道训》，亦称《淮南九师书》。还有《古杂八十篇》，沈钦韩以为即“《易纬·乾凿度》，《稽览图》之类”。所以京房之发明亦有其前导之者。

《京氏易传》中普遍采用纳甲法。如乾宫卦中，乾卦云：“参宿从位起壬戌，即指乾卦世爻（上九）纳壬戌。”又如遯卦云：“鬼宿入位见丙午”，遯卦是内卦艮，外卦乾。下卦艮初、二、三爻各纳丙辰、丙午、丙申；上卦乾四、五、上爻各纳壬午、壬

<sup>①</sup> 引自〔清〕惠栋《易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1版。

申、壬戌。所以丙午是颐卦二爻。遯卦是乾宫二世卦，故丙午为遯卦世爻。又如坤宫三世卦泰卦说：“轸宿从位降甲辰。”因甲辰为乾卦三爻，而泰卦下卦为乾，故泰卦世爻甲辰。所以任取一卦，视其内外卦之纯卦，各爻之干支可由八卦纳甲图求得。从而由干支的五行来进行某种操作，而进行对事物的解释和占测。



## 五 卦爻五行

京房建构了八宫卦，又将卦和爻配以干和支，即以纳甲法将卦爻作了处理。这样就将干支五行渗入了《周易》的卦爻之中，以爻变为基础的易学，就自然地被五行化了。京房时代的五行说，已经发展为一种说明宇宙间一切事物相互关系根本原理的学说。以五行说明万事万物间相互关系的根本原理，基于以下三个要素：（1）五行相胜说，《淮南子·地形训》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胜也称克。（2）五行相生说，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3）五行生数说，即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每一行的生数加五即成为各行的成数。即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这三个要素构成五行推演的基础。将五行运用于易学系统，对《易》的各卦爻辞作出新的解释，无疑大大地开拓了解《易》的新路子。《京氏易传》中强调了以五行解《易》，其说是：“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

### （一）八宫卦的五行

八宫卦和纳甲法确立后，就要将其五行关系理顺，因为八卦的卦象与五行的表象间大致相同，但又不尽同。所以要确定八宫的五行所属，二者之间的对应是：

乾宫卦属金	坤宫卦属土
震宫卦属木	巽宫卦属木
坎宫卦属水	离宫卦属火
艮宫卦属土	兑宫卦属金

这样的配应看起来有些不均匀，木金土各配两宫，而水火只各配一宫。但如果考虑到八宫的八纯卦或八个基本卦（三画卦）原来也代表了自然界的八种基本事物现象，这种配应不均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了。八卦的基本卦象是：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其中的艮山坤地为土，坎为水，离为火，既是八卦固有的卦象，又与五行固有的表象符合。因此土配两卦，坎离各对应于水、火就自然成立。震雷巽风都与木的荣发有关，如《解卦》彖辞说：“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说卦传》曰：“齐乎巽，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风盛于春而雷亦始于春，春之盛德在木。故震巽与木行相配，亦可谓八卦卦象之所固有。乾天兑泽之为金，取二者皆有刚性之义。乾为天，京房时代浑天说已颇行于世，浑天说以鸡蛋比喻天地，故咸以为天似蛋壳，故以为天性刚健。而兑卦上缺，以象言则为毁折，毁折亦为性刚所致。兑又为正秋，秋之盛德在金。故乾兑两卦之属金似亦与卦象的固有结构有关。所以从象言，五行与八卦间实相互蕴涵，从不互相抵牾。

如此将卦与五行配应之后，就使卦与卦之间的五行关系，卦和爻之间的五行关系得以确立。

首先说一下卦与卦之间的五行关系，特别是一卦中上下两卦间的关系。例如乾宫游魂卦晋卦，《京氏易传》说：“金方以火土运用事。”乾宫各卦皆为金象，而晋卦内坤为土，外离为火，火土相生，所以“金方以火土运用事”。又说：“六爻交通，至于六卦阴阳，相资相返，相克相生，至游魂复归本位为大有。”京氏论五行相生相克之语，仅此一见。又如巽宫四世卦无妄卦，《京氏易传》说：“金木配象，吉凶明矣。”又说：“上金下木，二象相冲。”无妄卦上乾下震，乾金而震木，故云“金木配象”。金位于西方，木位于东方；金为秋而木为春，故云金木“二象相冲”。相冲于此亦含有相克之意，因金克木。但以后会看到，京房描述卦与卦的五行关系，往往用相冲、相悖和相刑等说法，几乎不言

生克。以上二例言相生相冲。以下为言相悖者，例如离宫同人卦，离下而乾上。《京氏易传》说：“火上见金，二气虽同，五行相悖。”此处言悖应含有相克之义，因下面之离火克上卦之乾金。但言其相悖，似不完全从生克而言。此处言“二气虽同”者，京易于同人卦云：“同人，二气同进，健而炎上，同途异致，性则合也。”关于相刑的例子如震宫归魂卦随卦说：“金木交刑，水火相敌，休废于时，吉凶生焉。”因随卦上兑下震，兑金震木，故说金木交刑。震兑相冲又相克，用相刑言之。随卦四爻丁亥水，其下潜藏着震卦四爻庚午火，因随卦属于震宫。所以说水火相敌。金胜木，木旺时金休而水废，休废是否合时，自有吉凶相应。又如离宫未济卦，未济上离下坎，故说：“水火二象，坎离相纳，受性本异，立位见隔，睽于上下，吉凶生也。受刑见害，气不合也。”

由上述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京房言五行还涉及五行休王和八卦休王之说。五行休王可以从《淮南子·地形训》所说得知其要，《地形训》云：“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壮即是当令，后来称旺或王。老为衰竭，如水生木，水老无能养木，故后世称休。生者，当令之行所生，如木王时，木生火，故火生，后来称为相。囚者，胜王者囚，如木王时，金胜木，故金囚。死者，王所胜者死，如木王，木胜土，故木王土死。京房将此五行休王说引入八宫卦体系，而有八卦休王之说。

京房关于八卦休王的系统说明早已遗佚，只能将后世所保留的八卦休王说作为参考。例如按隋朝肖吉所撰《五行大义》中所说之八卦休王为：

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囚、乾废、坎休；

春分：震王、巽相、离胎、坤没、兑死、乾囚、坎废、艮休；

立夏：巽王、离相、坤胎、兑没、乾死、坎囚、艮废、震休；

夏至：离王、坤相、兑胎、乾没、坎死、艮囚、震废、巽休；

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

秋分：兑王、乾相、坎胎、艮没、震死、巽囚、离废、坤休；

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冬至：坎王、艮相、震胎、巽没、离死、坤囚、兑废、乾休。

由此可见，八卦休王说和五行休王说两者大体相当，但却有较大的差别。毕竟五行只有五个元素，而八卦却有八个元素。无论是五行休王还是八卦休王都要与时令或方位相联系，所谓当令则王，过时则衰，否则即无休王之可言。而五行休王是基于一年分为五季而言的，无论这五季是均匀的或者是非均匀的。如果按“土王四季”而言，就有可能产生时令与五行休王不合拍的情况。如春季木王，但季春三月或三月的后十八天作为土王，那么这时不是木王而是木囚的情况，这就与时令不相合拍。八卦休王则是基于一年分为八节的情况而言者。它一方面要尽可能与五行休王的基本法则相协，又要考虑到八节时令的转换。八节与八卦的对应是：艮为立春位于东北，震为春分位于正东，巽当立夏位于东南，离当夏至位于正南，坤当立秋位在西南，兑当秋分位于正西，乾为立冬位在西北，坎为冬至位在正北。当立春时，艮卦当令为王，而震卦为相。按五行艮为土，震为木，土不能生木，于

五行法则不能成立。但是从八节时令转换言，艮当冬令与春令的交界，既带有冬季或北方的水性，也带有东方和春令的木性，当然还有它自身的土性。所以当艮为王时，以水生木而得震为相，亦以水生木而得坎为休。而当春分震为王时，它又为休。其他处于四隅方位和四立节令的各卦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巽卦立夏时为王，它既有东方木性，又带有南方火性。因而从木生火而言，有离卦为相；从其属火而言，则有震卦为休等等。居于西南方的坤卦，虽当火金之交，但其自身属土。在五行说用于解说时令之递变时，夏季为火，秋季为金，火克金而不能生金，得有一个为土的中间环节，使夏火生土，而土又生秋金，这就是季夏为土的意义。在八卦上，坤位正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坤的土性是主要的。所以坤为王时，其相为兑，即是土生金，其休为离，即是火生土。就乾卦而言，乾本身即是金，又居金乡，因而他主要表现为金。但也有水性。如立冬时乾王，体现了乾在秋冬之交，又体现了冬令水盛时，乾也有水性才能为王。

总之，京房的八卦休王说，使八卦系统与五行系统连接起来，开阔了易学的思路，也使得易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情况。

## （二）卦与爻的五行关系

前面在介绍干支五行时，说到干支对的五行在西汉后期曾采用过“用辰不用日”的规则。在那里以《京氏易传》中乾卦各爻的五行属性为例，说明其时干支对是用辰的五行属性的情况。现在要再回到这个例子上来说卦与爻之间的五行关系。

乾卦属金，乾初爻至上爻对应的干支应是：甲子，甲寅，甲辰，壬午，壬申，壬戌。干支对的五行属性依支的五行属性而定，支的五行分别是：寅卯为木，巳午为火，辰戌丑未为土，申酉为金，亥子为水。所以乾卦与其初爻甲子的关系是金生水，即卦生爻。按《京氏易传》云：“八卦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

为义爻，福德为宝爻，同气为专爻。”陆绩注云：“天地即父母也，福德为子孙也，专爻同气为兄弟也。”所以甲子水为乾金之子孙，子孙为福德，子孙爻即称为宝爻。故云：“水配位为福德。”

以下再看乾卦与其九二爻甲寅木的关系，此时应是卦胜爻（金克木），故为制爻为妻亦为财，所以说：“木入金乡居宝贝。”乾卦与九三爻甲辰土的关系应是爻生卦（土生金），即爻为卦之父母，故为天地义爻，所以说：“土临内象为父母。”乾卦与九四爻壬午火的关系则是爻胜卦（火克金），故爻为宫卦之官鬼，是为鬼爻或系爻，故云：“火来四上嫌相敌。”乾卦与九五爻壬申金的关系是同气关系，乾申二金相比为专爻，为兄弟。二金相比，则金气太重，金胜木，金重则伤木太甚，故云：“金入金乡木渐微。”乾卦与上九爻壬戌土的关系，应是爻生卦（土生金），为天地义爻。乾卦是八纯卦之一，其世爻为上爻宗庙，故说：“宗庙上建戌亥乾本位。”这里说到戌亥乾本位，要稍加说明。前面在解释八卦休王时，特别提到了艮巽坤乾四卦，因为这四卦正是季节递变之处，而在方位则是处于方位转变之处，叫做四隅方位。由于卦对应于不同的方位，可将卦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应于四隅方位的卦，即为四隅卦，即艮巽坤乾四卦；一类是处于四正方位的四正卦，即坎震离兑四正卦。四个正卦各对应于一个支辰，四个隅卦各对应于两个支辰。四正卦中，坎卦对应于子位（正北），震卦对应于卯位（正东），离卦对应于午位（正南），兑卦对应于酉位（正西）。四隅卦中，艮卦对应于丑寅二位（东北），巽卦对应于辰巳二位（东南），坤卦对应于未申（西南），乾卦对应于戌亥二位（西北）。所以这里说戌亥是乾的本位。而宗庙本身也含有祖先的意思。

《京氏易传》下卷就支的五行说道：“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于中。”即是火生于寅而死于酉，墓

在戌；木生于亥而死于午，墓在未；金生于巳而死于子，墓在丑；水生于申而死于卯，墓在辰。土居于中央而通于四时。土的生死所，后世以为与水同位。隋肖吉《五行大义》说：“五行体别，生死之处不同，遍有十二月、十二辰而出没。木受气于申，胎于酉，养于戌，生于亥，沐浴于子，冠带于丑，临官于寅，王于卯，衰于辰，病于巳，死于午，葬于未。火受气于亥，胎于子，养于丑，生于寅，沐浴于卯，冠带于辰，临官于巳，王于午，衰于未，病于申，死于酉，藏于戌。金受气于寅，胎于卯，养于辰，生于巳，沐浴于午，冠带于未，临官于申，王于酉，衰于戌，病于亥，死于子，葬于丑。水受气于巳，胎于午，养于未，生于申，沐浴于酉，冠带于戌，临官于亥，王于子，衰于丑，病于寅，死于卯，葬于辰。土受气于亥，胎于子，养于丑，寄行于寅，生于卯，沐浴于辰，冠带于巳，临官于午，王于未，衰病于申，死于酉，葬于戌。戌是火墓，火是其母，母子不同葬，进行于丑。丑是金墓，金是其子，义又不合。欲还于未，未是木墓，木为土鬼，畏不敢入。进休就辰，辰是水墓，水为其妻，于义为合，遂葬于辰。诗云‘穀则同室，死则同穴’，盖以敦其义合，骨肉同归，水土共墓，正取此也。”由于土冠带临于巳午，王于南方未土，因而后来术数之士将土的生死所与火同步；由于土墓在辰，有些术家又视土之生死所与水同位。

从五行休王，到八卦休王，又从《淮南子·天文训》所说“火生于寅，壮于卯，死于戌”等说法，发展为五行之十二生死学说。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京房易学的运演操作体系，使得它在后来成为《易》学占验和解释系统的主要角色。

### （三）亲属和飞伏

《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则有父母、夫妇、兄弟及子孙的关系，从而推之官鬼，皆

由此而生。这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父母夫妇兄弟子女是家族之内的亲属关系，家族与社会相系的是官鬼，即表示当时社会与家庭相联系是依靠官府，或主要是靠官府将各家庭联结起来。京房在其时代所观察的社会结构大抵如此。他为了将其八宫卦的构架也能有效说明此种社会结构，就要使其八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其所值干支五行，莫不寓有亲属之象。按卦与爻的关系建立六亲爻，除自己本身之外，有父母或天地之义爻，有子孙之宝爻，有兄弟朋友之专爻，妻妾奴仆和财产的制爻，还有与社会相连的官鬼系爻。再加上京房定出的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为王，上爻为宗庙。就将当时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与基本社会结构压缩在一个模式中。从这个模式出发，京房建立了一个可以运用干支五行操作的社会人事占验系统。京房在论占中，常从这一模式出发，论占君臣关系等等。

对于京房拟制的这一亲属模式，实际上应是社会模式，如从五行关系作一总体的考察，会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卦都诸亲全备。六亲全备的卦大概不足二十个。六亲全备的卦是：乾震坎艮坤离巽兑八纯卦，乾宫大有卦，坎宫节卦，丰卦，师卦，坤宫临卦，大壮卦，比卦，巽宫无妄卦，噬嗑卦，兑宫困卦，萃卦。八纯卦中的乾卦，从前述卦爻五行关系的例子看到它是六亲全备。再看一个坤卦，其初爻乙未土，爻与卦相比，为同气专爻，坤二爻乙巳火，爻生卦，故为义爻。坤三爻乙卯木，爻胜卦为系爻。坤四爻癸丑土，亦为同气专爻。坤五爻癸亥水，卦胜爻，故为制爻。坤上爻为癸酉金，卦生爻，故为子孙宝爻。除自身外，宝义专制系五爻全，故为六亲全备之卦。又如巽宫无妄卦，初九庚子水，为爻生卦（巽属木，巽宫诸卦皆木），故为义爻。六二庚寅木，卦爻相比为专爻；六三庚辰土为制爻；九四壬午火为卦生爻，故为宝爻；九五壬申金为系爻，上九壬戌土又为制爻。此卦也是宝义专制系诸爻皆备，故六亲不缺。除上述大约二十卦外，其余四



十余卦皆为六亲不备，或缺一亲，或缺二亲，当随卦之五行情况而定。各卦所缺亲属，应在其他地方找到他的所在，并对其所在和与原卦的关系作出解释。故而要论及卦之飞伏。

朱震在《汉上易传》中解释飞伏时说：“伏爻何也，曰京房所传飞伏也。乾坤、坎离、震巽、艮兑相伏者也。见者为飞，不可见者为伏。飞方来也，伏既往也。说卦巽其穷为躁，卦例飞伏也。太史公《律书》曰：‘冬至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此论复卦初爻之伏巽也。”朱震这段话是说，《说卦传》对巽卦的解释，是京房“卦有飞伏”的例子，或是京房论卦之飞伏即源于此。巽有顺义，但《说卦》说巽卦终归于急躁，是因为巽卦隐藏着与顺相反的含义。即是说巽卦中潜伏着它终究会躁动起来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巽卦下位（初位）的阴爻与震卦下位的阳爻相飞伏。故《说卦传》又以震卦为决躁，因震卦与巽卦相错，即两者相对立。即指震卦下位是一阳爻，其对立的是巽卦初位的阴爻。所以震巽相飞伏。朱震还想进一步指出京房飞伏的本义，《史记·律书》关于冬至的解释，即是卦爻飞伏的自然界表现。冬至时一阳上舒，由复卦初九爻一阳生表示；而说冬至一阴下藏，即指巽卦的初六爻。震初九为见为飞为舒，巽初爻为隐为伏为藏。对于重卦来说复卦上体为坤，下体为震，一阳爻生于下体震卦之初位；姤卦上体为乾，下体为巽，所谓一阴爻藏于下者即下体巽卦之初位。此即为震巽之互相飞伏。朱震的这个解释是否符合京房的本义呢？《京氏易传》巽宫小畜卦说：“夏至起纯阴，阳爻位伏藏；冬至阳爻动，阴气凝地。”这就是说，夏至一阴生，于卦则为一阴爻在下之姤卦，故这时阳爻于初位伏藏。而冬至阳爻动即是说冬至一阳生，于卦则为一阳爻在下位之复卦，这时阴爻伏藏，故谓阴气凝地。由此可见朱震所说飞伏之义，确符合京房论飞伏之本义。

根据《京氏易传》看来，飞伏之类不一，有卦之飞伏，爻之飞伏。卦之飞伏有以下几种：

1. 八宫卦或八纯卦，阴阳相对者互为飞伏。即是相错之八纯卦互相飞伏。例如乾坤相错，故互为飞伏。其余则震巽、坎离和艮兑皆相错，亦皆互为飞伏。

2. 八宫世卦之飞伏是：一世卦至三世卦与其内卦（即下卦）为飞伏；四世卦五世卦与其外卦（即上卦）为飞伏。如乾宫一世姤卦，与其下体之巽卦为飞伏；二世卦遯卦与其下体之艮卦为飞伏，三世否卦与其下体坤卦为飞伏。四世观卦与其上体之巽卦为飞伏，五世剥卦的飞伏在其外卦，即上体艮。

3. 游魂卦是由五世卦的外卦改变其第四爻而来，即可谓五世外卦魂复于第四爻而为游魂。例如乾宫游魂卦晋卦，是由乾宫五世卦剥卦䷖变其第四爻而得（剥卦䷖变四爻为䷢晋卦），故其飞伏为艮卦。又如坤宫游魂卦需卦，是由坤宫五世卦夬卦䷪变第四爻而得䷄，故需卦与夬卦的外卦兑卦为飞伏。所以游魂卦之飞伏所在与五世卦同。或说游魂与本宫五世卦之外卦相飞伏。

4. 归魂卦则是由游魂卦改变下三爻而得，如乾宫游魂卦晋卦之下三爻全变为阳爻，而得大有卦䷍，因其改变的是内三爻，故与其下体之卦为飞伏。又如震宫归魂卦随卦䷐，是由其游魂卦大过䷛改变其下体而得，故随卦与巽卦为飞伏。即归魂卦之飞伏卦为三世卦之内卦，故与三世卦同。

关于爻位飞伏是由卦之飞伏推求而得，如《京氏易传》离卦云：“阳为阴主，阳伏于阴也。是以体离为日为火，始于阳象，而假以阴气。纯用刚健不能明照，故以阴气入阳，柔于刚健而能顺。柔中虚见火象也。”离为日为火，本是阳象，以阴气贯入阳中，而能明照，故见乎文明（离为文明）。离卦与坎卦为飞伏，其上下二体之中爻皆为阴爻，故其背后隐伏着坎卦之两阳爻。故而可说：“阳为阴主，阳伏于阴也。”这样当离卦为飞（即可见）时，而坎卦为伏（在背后）。而这两卦主要决定于上下二体之中爻。《京氏易传》说坎卦云：“坎积阴以阳处中，柔顺不能履重刚之险，故以刚克柔而履险，而曰阳。”即是坎卦之为阳主要取决

这两阳爻。但这还不是爻位飞伏的规则，只是卦象飞伏的爻变原理。乾宫一世卦姤卦的世爻，即姤初爻辛丑土，按前述姤卦与巽卦相飞伏，则其伏爻当为巽卦初爻，即与其自身相飞伏，而这是不对的。姤卦为乾宫之一世卦，其世爻与乾卦初九爻为飞伏，可体现出飞伏的特征。故陆绩注说：“辛丑土，甲子水”，即说是姤卦初六爻与乾卦初九爻为飞伏。因此在爻位飞伏上，其规则为八宫所辖诸卦世位所当之爻，各与本宫为飞伏。即与本宫宫卦或本宫纯卦为飞伏。如乾宫二世卦遯卦之世爻丙午，与乾九二甲寅为飞伏，乾宫三世卦（否卦）之世爻乙卯与乾九三甲辰为飞伏等等。由于八纯卦六亲皆全，其余大多数卦亲属缺少，都可取与本宫卦为飞伏。姤卦之六爻自初六至上九为：辛丑、辛亥、辛酉、壬午、壬申、壬戌，初爻为义爻，二爻为宝爻，三爻为专爻，四爻为系爻，五爻又为专爻，上爻仍为义爻，而于六亲缺财爻即制爻，故又取与乾卦九二爻甲寅木之制爻与飞伏。因此爻位飞伏有两种，即（1）诸卦世位所当之爻，各与本宫为飞伏；（2）六亲所缺之爻于本宫卦中寻所有之爻与飞伏。即如乾宫二世卦遯卦缺宝爻与制爻，故与乾宫初爻子孙（福德），次爻财禄（制爻）与飞伏。

京房所建立的飞伏观念，最初可能还出于论六亲的需要。如果占妻财方面的事而得姤卦，而姤卦六爻中却无妻财爻，那么就得出一个妻财爻来论占。所以在其本宫卦中找到财爻，作为姤卦之伏爻。但将飞伏观念普遍加于八宫卦后，就使飞伏观念富有深意。如相错之二纯卦，互相都潜伏着其对立的卦象。《京氏易传》乾卦说：“六位纯阳，阴象在中。阳为君，阴为臣，阳为民，阴为事。阳实阴虚，明暗之象，阴阳可知。”因而飞伏与阴阳消长联系了起来。位于明处的或外表显示的卦象，还要看到其背后伏藏的卦象。因而用卦爻象进行占测或解释的能力更为扩展和丰富。例如解释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说：“阴虽柔顺，气亦坚刚，为无邪气也。”由于初六爻与乾卦初九爻为飞伏，因此

在表面阴柔的坤初爻却隐伏着一股阳刚之气，由履霜而至坚冰。又如对坤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说道：“易者变也，阴极则阳来，阴消则阳长，衰则退，盛则战。”坤卦上六阴爻癸酉，它与乾卦上九爻壬戌相飞伏。坤卦至上六爻已是阴极之象，此时伏在其背后之乾上九爻面临兴盛之机，而具龙象，堪与阴战，但亦为亢龙。在京氏易的构架中，飞伏之说渐呈其重要性，经飞伏所作之解说，卦义和内容都更显丰富，从而使易学得到了新的发展。

京房的卦爻飞伏在形式上显示出一些规则，其规则是：

- (1) 每宫八卦，别取三卦为飞伏。
- (2) 每宫所取之三飞伏卦，凡阳宫先取两阴卦为飞伏，后取一阳卦为飞伏；凡阴宫先取两阳卦为飞伏，后取一阴卦为飞伏。
- (3) 每宫飞伏之三卦与其相对立之宫所飞伏之三卦各成对象。
- (4) 每宫飞伏以何卦始，即以该卦终。故飞伏遵循终而复始之道。

对于此四条形式化规则是从飞伏的定义中归结出来的。现以乾宫卦为例。乾宫八卦共取坤巽艮三卦为飞伏。乾宫首卦与坤卦飞伏，一世姤卦飞伏在巽，二世遯卦飞伏在艮。三世四世五世仍取坤巽艮三卦为飞伏。三世否卦与坤卦相飞伏，与纯卦乾同；四世卦观卦与巽卦为飞伏，与一世卦姤卦同；五世卦剥卦与艮卦为飞伏，与二世卦遯卦同。游魂卦之飞伏与五世卦之飞伏相同，乾宫游魂卦为晋卦，晋卦与艮卦飞伏。归魂卦之飞伏卦与本宫纯卦同，乾宫归魂卦为大有卦，与坤卦相飞伏。其他各宫卦亦皆如此推出，故可知每宫八卦，别取三卦为飞伏。

由对八宫每一宫各卦之飞伏可知，震宫八卦别取巽坤坎三卦，坎宫八卦别取离兑震三卦，艮宫八卦别取兑离乾三卦，坤宫八卦别取乾震兑三卦，巽宫八卦别取震乾离三卦，离宫八卦别取坎艮巽三卦，兑宫八卦别取艮坎坤三卦。由此可知，每宫所取之

三飞伏卦，凡阳宫先取两阴卦，后取一阳卦为飞伏，凡阴宫先取两阳卦，后取一阴卦为飞伏。

再细察两两相对之宫，乾宫与坤巽艮三卦飞伏。与乾相对之宫为坤宫，坤宫与乾震兑三卦飞伏。可见相对之宫飞伏三卦亦各自对应，乾与坤对，巽与震对，艮与兑对。故由阳宫之飞伏卦，即可推出对立阴宫之飞伏卦，反之亦然。故相对立之宫的相飞伏之卦亦彼此互相对立。各宫首卦之飞伏卦与对立宫之首卦相对应，各宫末卦之飞伏卦与对立宫末卦之飞伏卦相对应，故每宫终始二卦之飞伏卦相同。

须注意者，《京氏易传》说飞伏只论卦之飞伏，如乾卦与坤卦为飞伏，震卦与巽卦为飞伏。但陆绩注却说两卦之世爻为飞伏，如乾卦飞伏注：“壬戌土癸酉金”，乾卦上爻宗庙壬戌土，坤卦上爻癸酉金，乾伏坤金土相生。又如震卦，《京氏易传》说与巽卦相飞伏。陆注说“庚戌土，辛卯木”，震卦上爻纳庚戌土，而巽卦上爻为辛卯木。由此进而考察一宫各卦飞伏情况。仍以乾宫为例，其一世卦姤卦，京传说与巽卦飞伏，陆注言辛丑土、甲子水，以世爻（初爻）辛丑与本宫卦乾初爻甲子相飞伏。其二世卦遯卦与艮卦为飞伏，陆注言丙午火甲寅木，则以世爻（六二）与本宫卦乾二相飞伏。其三世卦否卦与坤卦飞伏，陆注言乙卯木甲辰土，亦以世爻（六三）与乾九三为飞伏。其四世卦观卦与巽卦为飞伏，陆注言辛未土壬午火，即观卦世爻（六四）辛未与乾九四壬午相飞伏。其五世卦剥卦与艮卦为飞伏，陆注言丙子水壬申金，即剥卦世爻（六五）丙子与乾卦九五壬申飞伏。其游魂晋卦与巽为飞伏，陆注言己酉金丙戌土，游魂世爻为四爻，晋卦四爻己酉，丙戌为艮卦四爻，与艮卦六四爻相飞伏。其归魂卦大有与坤卦为飞伏，陆注言甲辰土乙卯木，归魂卦之世爻为三爻，大有卦三爻甲辰，乙卯为坤卦三爻，故与坤卦三爻相飞伏。即说明游魂和归魂卦世爻之飞伏与卦之飞伏同。其他各宫亦可同样推得，由此可见：乾之初爻伏巽，次爻伏艮，三爻伏坤，四爻伏

巽，五爻伏艮，上爻伏坤。京氏于乾卦只说与坤卦为飞伏，似专就乾卦之世爻上九宗庙而言，而其余之所伏则分别在本宫一世至五世卦中言之。京氏于姤卦说：“与巽为飞伏”，似是指本宫乾卦尚未变动之前，本就伏有巽阴，故一变就为姤卦。而陆绩注则言：“辛丑土，甲子水”，即是乾初爻既变成为姤卦之后，姤卦世爻辛丑土中伏有乾初爻甲子水。推而言之，可以认为姤卦初爻伏有复卦与姤卦相错之初爻。京房以乾与巽为飞伏，陆绩以巽与乾为飞伏。乾初伏巽，巽初伏乾，形式上差别似微。但是后世卜筮之书，除八宫本宫卦外，诸亲不备或五行有缺者皆取与本宫卦为飞伏。实即按陆绩注之思路，此堪可注意者。

## 六 建候积算

《京氏易传》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建候和积算。但是在京易中这是较为混乱的一部分，也是京易较具特色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很可能是京房早年经过研究但尚未完成，而后来从焦贛受易时，接受了以风雨寒温为候的孟喜卦气说。他试图将自己早年的研究与孟喜的卦气说结合起来，或许又受孟喜思想或焦贛的启发，还考虑与星宿、风角等作进一步的联系。但是在他撰写了这一部分及星宿方面的内容后，他似乎已经没有时间来作这种进一步的联系了，他很快获得了进入朝廷的机会，并陷入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很快就被杀害，来不及最终完成他的工作。现存的《京氏易传》中所保留的这一部分，还显得有点混乱，正是他匆促人生的反映。本书以下的叙述可能有点琐碎，但是对京房思想的了解却是有用的。

京房立建候积算之主旨，是将其八宫卦的构架与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乃至七十二候建立起有效的配应关系，从而使卦和易学更能有效地解释甚至预测一年中季节气候的变化，并对不正常的气候或物候的出现作出解释和预测。这就是后世称之为京房卦气的最早构想。或许京房想建立的还要更大，比如使他的八宫卦与天地宇宙的一切事物对应，从而使其八宫卦更趋完美。而建候积算又恰是这个更大构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京房如何具体建构八宫卦与时令节气的配应已难以稽考，只能从一些可能搜集的零散资料中，试作一些分析。

### （一）京房建候积算的思想

黄宗羲在其《易学象数论》中对京民建候和积算作了简要的概括，说：

“曰‘建’，以爻直月，从世起建，布于六位（惟乾坎从初爻起）。乾起甲子，坤起甲午，一卦凡六月也。曰‘积算’，以爻直日，从建所止起日。”

由此说可见，京房的“建”与古代历法上所说的月建不同。从月建而言，是指北斗星之斗柄所指，例如正月建寅，本意是当正月节时，北斗斗杓指向寅位。是从天体在天空的方位而言，即按天度定月建。京房的“建”是建候，候与气特别是阴阳之气有关，阴阳之气多寡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气候和物候。在京房看来，不同的气候物候对应于不同的天度<sup>①</sup>，也对应于不同的卦。天度与气候和卦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关于气候与天度的相应关系，京房在这部旨在言说卦爻建构的书里未及详论，却重点叙述了气候与卦爻的关系。《京氏易传》说道：

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吉凶之道。子午分时，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处暑同用。惊蛰二月节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春秋分同用。清明三月节在戌，艮卦六四，寒露同用。谷雨三月中在酉，离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节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满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种五月节在午，乾宫九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兑宫初九，冬至同用。

<sup>①</sup> 天度是天上日、月、五星运行情况，即指日、月、五星在不同时间在众恒星间的位置。



小暑六月节在辰，艮宫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  
中在卯，离宫初九，大寒同用。

看以上的叙述，京房是打算将卦爻纳干支与月建作某种配应，或是找出其中是否有某种关联。将他的这番话转列成下面的图就可看出。

立春（寅，坎初六）	立秋	惊蛰（子，震初九）	白露
雨水（丑，巽初六）	处暑	春分（亥，兑九四）	秋分
清明（戌，艮六四）	寒露	芒种（午，震九四）	大雪
谷雨（酉，离九四）	霜降	夏至（巳，兑初秋）	冬至
立夏（申，坎六四）	立冬	小暑（辰，艮初六）	小寒
小满（未，巽六四）	小雪	大暑（卯，离初九）	大寒

从这个图可看出，京房将二十四节气分两段作顺序排列，与节气相对应的支辰反序排列。这不像是说子午分行，倒像是说支辰与节气分行，如果其支辰是指月建的话。可是这里支辰明显不是指月建，因为月建是每月一辰，而这里是每气一辰。从立春到大暑历十二辰，又从立秋到大寒历十二辰。如果将“建”理解为斗柄所指，那么他就是认为北斗星一年绕极旋转两周，这显然是谬误的。因此他这段话的意思仍在于卦爻。立春与立秋同用坎初六爻，而坎初六爻纳支为戊寅；雨水与处暑同用巽初六爻，而巽初六爻纳辛丑，故雨水与处暑也纳丑。其余各节气也都如此处理。所以京房试图将节气通过干支与卦爻联系起来。本质上就是卦爻纳干支，节气也纳干支。而节气纳干支的方法，仍是按照卦爻纳干支的方法。孟喜的卦气说中是用坎震离兑四正卦各爻与二十四节气配应，但京房却用乾坤父母卦之外的六子卦，即震坎艮巽离兑。六子卦配二十四节气的顺序，从立春坎卦开始，依次为雨水巽卦，惊蛰震卦，春分兑卦，清明艮卦，谷雨离卦，到立夏又从坎卦开始，依次循卦，到大寒又在离卦。在这个节气纳干支的过程中，京房用阳卦纳节气，而用阴卦纳中气。如四立为节气，纳

坎卦，坎为中男阳，立春立秋用坎初爻而立夏立冬用坎四爻。分至为中气，纳兑卦，兑为少女，阴。二分用兑四爻，二至用兑初爻。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四个月的中气分别为雨水、小满、处暑、小雪皆纳巽卦，巽卦长女阴。雨水、处暑纳巽初六，小满小雪纳巽六四（这四个月的节气即是四立）。二五八十一四个月的气节分别是惊蛰、芒种、白露、大雪皆纳震卦，震卦长男阳。惊蛰、白露纳震初九，芒种、大雪纳震九四（这四个月的中气即是二分二至）。三、六、九、十二诸月的节气分别为清明、小暑、寒露、小寒皆纳艮卦。清明、寒露纳艮六四，小暑、小寒纳艮初六。这四个月的中气则分别为谷雨、大暑、霜降、大寒皆纳离卦，谷雨、霜降纳离九四，大暑、大寒纳离初九。作了这样的节气纳卦爻后，就自然呈现出节气顺排而支辰逆布的对顺顺序。京房或许以为前半年的节气从立春到大暑，是阳气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微到极的过程；而从立秋到大寒是阴气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微至极的过程，表示了“子午分行”之义。以此他设计了十二支的两轮循行，上半年一轮循行示阳气之兴盛，下半年一轮循行则示阴气的壮大。从《京氏易传》看来，他又说：“龙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在午，在离卦右行。”这一说法似本于《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天文训》又说：“北斗之神有雄雌，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这里的“北斗之神有雄雌”，是指与北斗星周年视运行方向相反但速度相同的雌北斗星，与可见的雄北斗星同时从子位出发，历十二辰一周。故说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到五月雌雄二北斗星合于午位。京房的“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的意思，本应就是雌雄两北斗的运行。对于北斗分雄雌，京房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其卦爻飞伏的思想也是从这里受到启发。不过京房在这里却要用龙和虎两种形象的分行来立说。龙为德，

为阳气，在上半年阳气兴盛时运行于世；虎为刑，为阴气，在下半年阴气兴盛时运行于世。这样一来，既体现了阳左行而阴右行，或者进一步说是天左行而地右行的原则，又实现了他的节气纳卦爻的设想。即是说在其卦爻和节气相纳的设想中贯彻了子午分行的原则。

## （二）京氏建候

京房关于建候，从而积算的设想，是紧密地遵循着八宫卦及其纳甲等思想路线的。可是他将这一设想贯彻到建候的具体安排时，还是作了较大的调整。他虽然坚持了他的设想原则，但是在具体的安排时，还是回到历法的斗建安排上来。晁公武于《京氏易传》之卷下概括地说了一下京氏建候积算，说道：

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参乎本数以纪月者谓之建。终之始之，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乾建甲子于下，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有八，盈则三十有六。

对于京易各卦建候作具体的考察，就可以了解晁氏的概括性说法。

首先是乾宫八卦的建候。乾卦为首宫首卦，甲子为干支之首。故而建候始建甲子。京易乾卦云：“建子起潜龙（十一月冬至一阳生），建巳至极主亢位（四月龙见于辰，阳极阴来，吉去凶生，用九吉）。”《易》乾卦初九爻辞云：“潜龙勿用”，上九爻

辞云：“亢龙有晦。”故乾卦建甲子起初爻。卦有六位，建月则六辰。由初爻甲子，二爻乙丑，三爻丙寅，四爻丁卯，五爻戊辰，上爻己巳到亢位；建月则自十一月到四月。如果按节气来说，是由十一月节大雪到四月中小满，因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甲子为刚日，乙巳为柔日，故十一月用大雪节，四月用小满中气。又因“起乎世而周乎内外”，故建始应起世爻，而遍历内外基卦六爻。问题是乾卦为本宫卦，其世爻应为上爻，即建候甲子应从上爻始，而后乙丑在初爻，丙寅在二爻，丁卯在三爻，戊辰在四爻，己巳在五爻。可是京易强调“建子起潜龙，建巳至极主亢位”。由于乾卦为起始卦，又建始甲子，初爻又纳甲子，故而仍应从初爻建子算起。这里要注意卦爻纳干支与卦爻纳建候的区别。

乾宫本卦的建候如此。然后转入下一卦，即乾宫一世卦姤卦。姤卦为一阴生，当在五月建午之时，由乾卦甲子推至午当为庚午，二者相距六辰。根据起“乎世而周乎内外”的原则，则姤卦初爻庚午，二爻辛未，三爻壬申，四爻癸酉，五爻甲戌，上爻乙亥。故京传姤卦云：“建庚午至乙亥（芒种至小雪）。”芒种为五月节，乙亥为十月中气。乾宫诸卦建候情况排列如次：

乾卦，建甲子至乙巳，大雪至小满（自初爻至上爻）

姤卦，建庚午至乙亥，芒种至小雪（自初爻至上爻）

遯卦，建辛未至丙子，大暑至大雪（自二爻至初爻）

否卦，建壬申至丁丑，立秋至大寒（自三爻至二爻）

观卦，建癸酉至戊寅，秋分至立春（自四爻至三爻）

剥卦，建甲戌至己卯，寒露至春分（自五爻至四爻）

晋卦，建己卯至甲申，春分至立秋（自四爻至三爻）

大有卦，建戊寅至癸未，立春至大暑（自三爻至二爻）

以上自一世卦至五世卦建始皆顺次而行。至游魂晋卦，则因其是从五世卦变四爻而来，五世卦剥卦，六五始建甲戌，上九乙亥，初六丙子，六二丁丑，六三戊寅，六四己卯。故游魂晋卦从其四

爻己卯起建候。故说：“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归魂卦是由五世卦之三爻戊寅起建候。所谓“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

再看震宫诸卦。对于震宫本位卦而言，京易说：“运数入丙子至辛巳（大雪至小满）。”按纳甲法，乾卦初爻纳甲子，震卦初爻纳庚子，在纳辰时也用纳子法。故震卦纳乾卦甲子后十二辰之丙子。（震卦亦从子月开始，由乾卦甲子（当十一月）到震卦子月，历十二个月，故当丙子月。）即受气亦当十一月节大雪，自世爻上爻开始。即震上爻建丙子，初爻丁丑，二爻戊寅，三爻己卯，四爻庚辰，五爻辛巳。以后转一世卦豫卦，建丁丑至壬午等等。可将震宫卦之建候排列于下：

震卦，建丙子至辛巳，大雪至小满（自上爻至五爻）

豫卦，建丁丑至壬午，大寒至芒种（自初爻至上爻）

解卦，建戊寅至癸未，立春至大暑

恒卦，建己卯至甲申，春分至立秋

升卦，建庚辰至乙酉，清明至秋分

井卦，建辛巳至丙戌，小满至寒露

大过卦，建丙戌至辛卯，寒露至春分

随卦，建乙酉至庚寅，秋分至立春

再看坎宫诸卦建候情况。坎宫本卦按京易说：“建起戊寅至癸未（立春至大暑）。”从戊寅受气，而戊寅在震卦受气的丙子后二辰。其余各卦皆顺次排列基本上同震宫各卦。坎卦所以从初爻建候，依黄宗羲说<sup>①</sup>坎卦始建在初爻，即戊寅受气于坎之初爻（注意坎卦初爻纳支亦为戊寅）。故其建候为：初爻戊寅，二爻己卯，三爻庚辰，四爻辛巳，五爻壬午，上爻癸未。然后转一世卦节卦。由于坎卦建候从初爻始，而节卦建候亦从初爻始（节卦为坎宫一世卦初爻为世爻），故两者始建相差六辰。坎宫诸卦建候情况如下：

<sup>①</sup>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一。

坎卦，建戊寅至癸未，立春至大暑（自初爻至上爻）

节卦，建甲申至己丑，立秋至大寒

屯卦，建乙酉至庚寅，秋分至立春

既济卦，建丙戌至辛卯，寒露至春分

革卦，建丁亥至壬辰，小雪至清明

丰卦，建戊子至癸巳，大雪至小满

明夷卦，建癸巳至戊戌，小满至寒露

师卦，建壬辰至丁酉，清明至秋分

艮宫诸卦建候情况与震坎二宫基本类同。艮宫本位卦始建于庚寅，距坎卦始建于戊寅十二辰。而乾卦始建甲子，震卦始建丙子与乾之始建相距亦十二辰。又乾坎二卦建始不在世爻而在初爻。可见，此中自有京氏并未展示的想法。艮卦建始庚寅，起世爻上九，则初六辛卯，六二壬辰，九三癸巳，六四甲午，六五乙未。艮宫诸卦建候情况排布于下：

艮卦，建庚寅至乙未，立春到大暑（自上爻至五爻）

贲卦，建辛卯至丙申，春分到立秋

大畜卦，建壬辰至丁酉，清明到秋分

损卦，建癸巳至戊戌，小满到寒露

睽卦，建甲午至己亥，芒种到小雪

履卦，建乙未至庚子，大暑到大雪

中孚卦，建庚子至乙巳，大雪到小满

渐卦，建己亥至甲辰，小雪到清明

以上乾震坎艮四阳宫三十二卦之建始和建末均已列出。由四阳宫可见京房对建始的布置为：乾震同在子，坎艮同在寅。乾坎建始起初爻，震艮建始起世爻（上爻）。以下转入讨论阴宫各卦建候之情况。

首先是坤宫。坤宫本宫卦建起甲午，是根据“子午分行”的原则，与乾卦首建甲子相望。京易坤卦云：“建始甲午至己亥（芒种至小雪）”，建始当在坤宫世爻上六。即坤宫各卦建候情况

如次：

坤卦，建甲午至己亥，芒种到小雪（自上爻至五爻）

复卦，建乙未至庚子，大暑到大雪

临卦，建丙申至辛丑，立秋到大寒

泰卦，建丁酉至壬寅，秋分到立春

大壮卦，建戊戌至癸卯，寒露到春分

夬卦，建己亥至甲辰，小雪到清明

需卦，建甲辰至己酉，清明到秋分

比卦，建癸卯至戊申，春分到立秋

坤宫各卦的排列，从首卦建甲午到一世卦进一辰，到二世卦复进一辰直到五世卦。游归二卦之建始与前面乾卦之说相同。

再说巽宫各卦之建候。巽宫本卦建始辛丑，与坤卦建始甲午相距七辰，这似乎采取了爻纳支的原则，即坤卦自初爻至上爻纳未巳卯丑亥酉，而巽卦自初爻至上爻纳丑亥酉未巳卯一样，自丑开始。京易巽卦云：“建始辛丑至丙午（大寒芒种）”而巽卦初爻亦纳辛丑。但建起世爻，故论建，巽卦上爻辛丑，初六壬寅，九二癸卯，九三甲辰，六四乙巳，九五丙午。巽宫各卦可排列于下：

巽卦，建辛丑至丙午，大寒到芒种（自上爻至五爻）

小畜卦，建壬寅至丁未，立春到大暑

家人卦，建癸卯至戊申，春分到立秋

益卦，建甲辰至己酉，清明到秋分

无妄卦，建乙巳至庚戌，小满到寒露

噬嗑卦，建丙午至辛亥，芒种到小雪

颐卦，建辛亥至丙辰，小雪到清明

蛊卦，建庚戌至乙卯，寒露到春分

再看离宫各卦。离宫本卦建始戊申，与巽宫本卦建始辛丑相距七辰，这与巽卦和坤卦建始甲午相距七辰同。京易离卦云：“建始戊申至癸丑（立秋至大寒）。”其余离宫各卦建始皆依次而

进一辰。离宫诸卦建候情况如下：

离卦，自戊申至癸丑，立秋至大寒（自上爻至五爻）

旅卦，自己酉至甲寅，秋分至立春

鼎卦，建庚戌至乙卯，寒露到春分

未济卦，建辛亥至丙辰，小雪到清明

蒙卦，建壬子至丁巳，大雪到小满

涣卦，建癸丑至戊午，大寒到芒种

讼卦，建戊午至癸亥，芒种到小雪

同人卦，建丁巳至壬戌，小满到寒露

最后一宫兑宫，兑宫本位卦建候起始于乙卯，乙卯与离卦建候始于戊申亦相距七辰。京易兑卦云：“建始乙卯至庚申（春分立秋）。”兑宫其余各卦建候之始亦相次而进。此列于下：

兑卦，建乙卯至庚申，春分到立秋（自上爻至五爻）

困卦，建丙辰至辛酉，清明到秋分

萃卦，建戊寅至癸未，立春到大暑

咸卦，建戊午至癸亥，芒种到小雪

蹇卦，建己午至甲子，大暑到大雪

谦卦，建庚申至乙丑，立秋到大寒

小过卦，建庚午至乙亥，芒种到大寒

归妹卦，建甲子至己巳，大雪到小满

这里萃卦的建始，实为特异。但京易萃卦亦云：“建始戊寅至癸未（立春大暑）。”其特异在于它前面的困卦建始丙辰，其后面的咸卦建始戊午。丙辰与戊寅相距二十二辰，戊寅距戊午四十位。因此这很可能是错写，应该是建丁巳至壬戌。如此一改，则前与咸卦建始相次，后与困卦亦只相次一辰。而建丁巳至壬戌，则于节气历小满至寒露。

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京房的建候安排还没有成熟。比如建始之天干，乾卦始建甲子，坤卦始建甲午，两者天干同；震卦始建丙子，巽卦始建辛丑，两者天干不同；坎卦始建戊寅，离卦始



建戊申，两者天干同；艮卦始建庚寅，兑卦始建庚申，两者天干亦同，唯震巽二卦异。因此有疑巽卦是否建始在丙午。又从建始地支来看，乾震二卦同在子，坎艮二卦同在寅。但从阴宫四卦来看，建始地支坤为午，巽为丑，离为申，兑为卯。但若将巽卦建始改为丙午，则丙午距坤卦建始之甲午十二辰（或十二位）；而距其后之离宫本卦建始之戊申二辰（或二位）。这和阳卦之乾宫本位卦的建始甲子与震宫本位卦建始之丙子相距十二辰，而震卦建始与其后之坎卦建始戊寅相距也是二辰完全相同。从阳宫的坎宫本卦建始出发，则与其后的艮宫本卦之建始相距十二辰（由戊寅至庚寅）。又从阴宫而言，由离宫本位卦的建始出发，到其后的兑宫本位卦相距七辰（由戊申至乙卯）。如果与阳宫进行对照，考虑到建始之天干，兑宫应与艮宫同为庚，而兑宫与离宫建始之支相同，于是兑宫本卦之建始应为庚申。如果将兑宫本位卦之建始改为庚申，则其与离宫本卦建始相距正好十二辰（戊申至庚寅）。如此一调整则与阴阳诸宫完全相同。如果可以确定京房当时正是想作这样的安排，那么就要考察巽卦与兑卦现存的建始错写了的原因。否则就要考虑到京房关于阴宫诸卦的安排另有考虑。但无论怎样，《京氏易传》关于建始的安排是尚未成熟的最后结果，反映了京房对此问题的研究过程。

### （三）积 算

建候六辰，分配六爻。建始一辰受气，中间经历四辰皆积气，末一辰成象立体。《京氏易传》于坎宫既济卦云：“建丙戌至辛卯（寒露春分），卦气分节气，始丙戌受气，至辛卯成正象。考六位，分刚柔，定吉凶。积算起辛卯至庚寅，周而复始（土木见运入卦）。”京房从此例说明建候及积算之基本法则。积算之法是从建候成正象之干支起算。即如既济卦，从丙戌受气为建候之始，历丁亥、戊子、己丑、庚寅为积气，至辛卯成正象。故积算

从辛卯起。若从乾卦看，《京氏易传》云：“积算起乙巳火至戊辰土，周而复始（吉凶之兆，积年起月，积日起时，积时起卦入本宫）。”也是从建候结末之干支起积算。乾卦初爻始建候甲子，二爻建候乙丑，三爻建候丙寅，四爻建候丁卯，五爻建候戊辰，上爻建候末己巳。积算从己巳起，周而复始至戊辰土（乾五爻）。晁公武云：“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黄宗羲说：“曰‘积算’，以爻直日，从建所止起日。”故积算谓积日。从乾卦上爻，即建候结末之己巳算起，顺乎六爻，每爻一日，看所论日之干支与积算干支和所在爻位而论。为求吉凶之兆，要分阴阳，配五行，定岁月日时节候运气，以推吉凶休囚。首先是求积日，要顺乎六爻周而复始，循环十周（依乾卦例）：

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  
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  
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  
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  
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  
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  
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  
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  
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  
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

此中天干六周，谓之六甲；地支历五周，故谓之五子。积算可不止算积日，亦可用于算积年、积月、积时。故一爻可表一日外，也可代表十日（一旬），也可代表十五日（一节气），三十日（一月），三百六十五日（一年），还可以表十二分之一日（一时）等等。

若以乾宫本卦论积算之法。如论积月，则每爻一月。从己巳至戊辰共经历六十个月，历时五年之久。如论积旬，则六甲共六旬，每爻十日。若论积时，则自己巳至戊辰历六十时，共计五

日，每日十二时。每日从子时起至亥时止，故历五子而终竟。若论纪年，则从己巳至戊辰六十年而周。六虚周甲，皆以戊己干配虚辰。虚辰者，六甲第一旬甲子至癸酉，戊亥为孤，辰巳为虚，戊己干配辰巳。六甲第二旬甲戌至癸未，申酉为孤而寅卯为虚，戊己干配辰巳。六甲第三旬甲申至癸巳，午未为孤而子丑为虚，戊己干配子丑。六甲第四旬甲午至癸卯，辰巳为孤而戌亥为虚，戊己干配戌亥。六甲第五旬甲辰至癸丑，寅卯为孤而申酉为虚，戊己干配申酉。六甲第六旬甲寅至癸亥，子丑为孤而午未为虚，戊己干配午未。故戊己干恒配虚辰。乾卦建候始甲子，甲子旬中辰巳虚，故戊辰己巳。戊己为土，乾卦属金，土金相生。又辰土从巳火生，即积算首尾地支相生。乾居西北戌亥之地，与东南辰巳二位对冲。以甲子建始，为一阳初生，至巳为极。辰巳为虚，乾坐孤击虚亦为吉。坎纳戊离纳己，乾出入坎离，正十一月冬至至四月立夏也。

按陆绩注说：“吉凶之兆，积年起月，积日起时，积时起卦入本宫。”似乎是说，京氏积算法可以从年起月，即先积算年数，得所论年之爻位，即从此爻位起计月。又积日起时，得所论日之爻位起计时，再由所在时的爻位入卦。入卦者，即由所在卦之卦爻关系推占吉凶休咎等。

由各宫各卦的积算论吉凶，《京氏易传》并未详述，虽陆绩有注，又过分简略，故只能从各卦对积算之描述，稍作了解。

京易乾宫一世姤卦积算起乙亥至甲戌，陆绩注说：“灾福之兆，生乎五行升降也。”故福之兆在生，灾之兆在克，视五行之变化而定。以此例说明推占吉凶祸福主要是从五行生克而论。乾宫二世遯卦陆绩注积算说：“火土同宫，天与山遯。”遯卦内艮而外乾，艮土而乾金，故应是金土同宫。乾卦象天，艮卦象山，故天与山遯，可见亦要论及上下卦之五行属性。乾宫四世卦观卦积算起戊寅至丁丑，卦体内坤而外巽，两者皆为木与土。但陆绩注

于此说：“用金为首”，即指明观卦虽木土合体，但仍为乾宫之卦，乾属金，故用金为首。这里也显示积算地支五行在论占时要考虑到卦之五行。乾宫归魂卦大有积算起癸未至壬午，午火生未土；如同乾卦积算己巳至戊辰，巳火生辰土。陆绩注说：“吉凶与乾卦同用”，即指积算二地支皆火生土。在剥卦和晋卦中，京易均直接注明积算之五行，可见积算之五行是推占吉凶之重要因素。对于震卦之积算，《京氏易传》说：“积算起辛巳至庚辰，土宫配吉凶，周而复始。”陆绩注说：“吉凶配木宫以土用事。”震卦属木，积算辛巳火庚辰土，火生土。故主要是木与土的关系，所以土宫配吉凶。陆注也说木宫以土用事。震宫一世卦豫卦，京易云：“积算起壬午至辛巳，以六爻定吉凶。”陆绩注说：“火土算休咎。”积算巳午皆火，豫卦内体坤土，外体震木。木与火相生，火又生土。故陆注火土算休咎。在此强调以六爻定吉凶者，指示壬午正在豫卦之上爻，豫卦上爻纳庚戌土，午火生戌土，亦以火土算休咎。此说明推断吉凶要考虑到积算所在爻位之干支五行，当然仍以地支五行为主。震宫五世卦井卦，《京氏易传》云：“建辛巳至丙戌（小满寒露），积算起丙戌至乙酉，周而复始。”陆绩注曰：“火土入卦起算数。”积算戌土酉金，戌土生酉金。但戌土是由建始辛巳之火生，故说火土入卦起算数，这里已暗示建始也可参与论占。震宫游魂卦大过卦，《京氏易传》云：“建丙戌至辛卯（起元气从丙戌至辛卯为卦建，建者则所生之位。今立建起至辛卯，取阴阳至位极处也）（寒露至秋分）。积算起辛卯至庚寅，周而复始。”陆注云：“土木入卦用事。”通过大过卦，揭示卦建之意义，而重要的是在于示明建始之干支五行要参与论算。大过卦积算卯寅皆木，陆注云其土木入卦用事者，乃指建始丙戌而言。以上两卦乃陆注示建始五行参与论占之例也。坤宫一世卦复卦，积算起庚子至己亥，陆注云：“积算起庚子至己亥，十月至十一月，年亦然。”此陆注以复卦为例，示积算之用于论月或年之法。坤宫五世卦夬卦，《京氏易传》说：“建始己亥至甲辰，

积算起甲辰至癸卯，周而复始，金水分乾兑入坤象。”陆注云：“入坤宫起积算。”夬卦内乾外兑皆属金，又属坤宫土，土生金。金木分乾兑者，世爻九五丁酉金在上体兑卦之中，应爻壬寅木在下体乾卦之中。故说金木分乾兑入坤象。此京氏示世应二爻在论占中亦不可忽略。世爻往往是建候之始，而建末为积算之始，故世应二爻固为京氏易系统中之基本数据。巽宫二世卦家人卦，《京氏易传》云：“建始癸卯至戊申，积算起戊申至丁未，金土入离巽。”陆注云：“金土入卦同积算。”家人卦上巽下离，积算戊申金在家人初爻，丁未土在家人上爻，故云金土入离巽。陆绩云“金土入卦同积算也”。巽宫三世卦益卦，《京氏易传》云：“建始甲辰至己酉，积算起己酉至戊申，周而复始，土金入震巽。”积算戊申己酉皆金，皆居益内体震卦之下两爻。世爻庚辰土为建始甲辰所在，二辰皆土；应爻上九丁未土为卦建丁未所在，两未皆土。故云土金入震巽。离宫二世鼎卦，《京氏易传》云：“建始庚戌至乙卯，积算起乙卯至甲寅，周而复始，分土木入离巽。”鼎卦下体巽而上体离。积算之首乙卯木在鼎初爻，积算之尾甲寅木在鼎卦上爻；建始庚戌土在鼎卦九二世爻，建候癸丑土在鼎卦六五应爻。故鼎卦上两爻为甲寅木癸丑土，下两爻为庚戌土乙卯木。所以说分土木入离震。此以建候、积算、世应所组成之爻象而论者。又如兑宫一世困卦，《京氏易传》云：“建始丙辰至辛酉。积算起辛酉至庚申，周而复始。土金入坎兑。”困卦上兑下坎，积算辛酉金在困上六，庚申金在九五，皆在上卦兑。建始丙辰土在困初六，建候丁巳火在困九二戊辰爻位，戊辰土，丁巳火又生辰土，皆在坎卦。故说土金入坎兑。但困卦属兑宫金，故陆注提醒道：“分土金入坎兑，配金宫起算。”

由以上诸例，大体上展现了京房积算用于推占吉凶祸福的方法。不过京房并没有将这些方法作系统而完整的说明，仅仅是在具体卦中作一些示例性的解说。这说明京房在试图用他建构的系统对推占吉凶，并向这个方面作了一些研究和探索。他将五行引

入了他的卦爻系统中，希图按五行生克原理，按卦爻与年月日时的某种配应，对吉凶祸福作出解释和预测。至少从建候积算的卦爻关系中寻找出一些线索，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正如前述，京房还没有取得完整的成果，甚至可以说距他想达到的目标还差之甚远。对于京房来说，占推吉凶祸福也是一个困难万分的课题。不过他却开辟了占推吉凶的新的概念。后世人们往往把京房看成是预测大师，占推吉凶的祖师，也正是由于他这一并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不过当时京房虽然对此感到十分困难，却并不打算放弃他的研究，他只是暂时搁下。他强烈地希望能参阅更多的资料，能接触更多的学者和奇材异能之士，他希望能广阔地展开自己的视野。他仍是信心百倍地继续着他的探索。

## 七 星宿和气候分数

京房在其《京氏易传》下卷的开头就写道：

夫易者象也，爻者郊也。圣人所以仰观俯察，象天地日月星辰草木万物，顺之则和，逆之则乱。夫细不可穷，深不可极，故揲蓍布爻，用之于下。筮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序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定天地万物之情状。故吉凶之气，顺六爻上下，次之八九六七之数，内外承乘之象。

京房在这里明确说明：卦爻之象和天地万物之象是一致的。由于天地万物之象“细不可穷，深不可极”，所以只有在卦爻上探赜索隐，以求对天地万物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正是京房易学思想的核心。他确信天地万物和卦爻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他的易学系统正是要找到并掌握这一关系，从而对天地万物，对人世上的一切作出完整而洞彻的了解。他试图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和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来规定天地万物的情状。前节中已经说过，周乎一卦，顺乎六爻上下定吉凶的探索，再加上爻的阴阳、老少变化、内外相承相乘等等对卦爻的运作，显示天地人的变化法则，显示吉凶之气。

京房关于上述思想又写道：

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立，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

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于乾坤，通乎万物。

他强调卦爻告人以吉凶，是本于天时和气候的变化。星辰的运行示人以灾异，这是有形可见的，即是从无入有。卦爻的变化则示人以阴阳，无形可见，即是从有入无。这里明确说明天象，天地万物与卦爻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对应关系，只不过天象是有形的，而卦爻是无形的。无论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都是本于阴阳二气的变化，而卦爻的变化也是本于阴阳二气的变化。阴阳二气的变化决定了年月节气的区分。例如夏季昼长而夜短，冬季昼短夜长是天象的变化；夏季炎热而冬季寒冷则是气候的阴阳变化；夏日植物繁茂，冬季植物枯衰则是物候反映的阴阳变化。这些有形的变化是人们可以预测到的。卦爻也体现出阴阳变化，但这一阴阳变化不是在自然界表现出来，只在卦爻的结构关系上表现出来，因而可说是无形的。京房认为阴阳二气的变化，是在时间的行程中展示出来的，因此人们划分年月节气来表示阴阳二气的进程。历法对人们是重要的，吉和凶，祸和福正是在时间行程中显示。而卦爻象也会随着时间的行程展示其阴阳变化之象。一卦之六爻，其上下变化可以表述天地日月之运转，而可示人以灾异，也可表明人世的情况。观察天象的变化由于人，告人以灾祥在于天，而卦爻既能考察天象之灾祥，又能考察人事之吉凶。《京氏易传》井卦说：“天地之数，分于人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吉凶之兆，定于阴阳。”其解卦则说：“推吉凶于阴阳，定运数于岁时。”其师卦又说：“升降得失，吉凶悔吝，策于六爻，六爻之设出于蓍，蓍之得象而卦生，积算起于五行，五行正则吉，极则凶。吉凶之象显于天地、人事、日月、岁时。”这还说明五行的运行也在卦爻的变化中显示出来，而五行运行则告人以吉凶。

因此在诸卦中，要讲星辰，讲阴阳之气，这是京房易学中特有的内容。



## (一) 星 宿

《京氏易传》的每一卦中都说到五大行星和二十八宿。如乾卦说：“五星从位起镇星，参宿从位起壬戌。”即是说五星以土星入乾卦，而二十八宿以参宿起乾卦。京房将五星和二十八宿入卦，不是考虑有形的一致，而是考虑有形与无形的配合。即是京房不认为天上星辰运行的具体情况要在卦象中有相应的表现，但是却要求天界星辰运行所反映的阴阳二气的变化，在卦爻象中有充分的反映。特别是五星入卦，更考虑到卦象五行的变化与之配合。

先说五星入卦。五星就是五大行星，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但在西汉时期，水星称为辰星，金星称为太白，火星称为荧惑，木星称为岁星，土星称为镇星或填星。这五颗星的五行性质，可能正是京房参与确定的。京房考虑五星入卦的办法是按五行的次第，即依董仲舒按五行相生的次序，为土金水木火。他所以将土星排在第一位，或许是接受了董仲舒以来的“五行莫贵于土”的观念，因为到东汉时的《白虎通德论》中仍然说：“地，土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又说：“土尊，尊者配天。”而京氏八宫卦以乾宫纯卦排为首卦，而乾者天也。所以按相生之序，乾卦之后的姤卦就排金星（太白），姤卦之后的遯卦，就排水星（辰星）入卦，《京氏易传》遯卦云：“五星从位起太阴”，他不称为辰星而称为太阴，由于五行的方位对应为北方水，北方虽一阳生仍阴甚于阳，水为坎卦，坎虽阳但被阴所挟持。故把水星称为太阴。再下一卦是否卦，就以木星（岁星）入卦，《京氏易传》云：“五星从位起岁星。”否卦之后是观卦，应排上火星入卦，故京氏说“五星从位起荧惑”。观卦之后为剥卦，火生土，又当是土星（镇星）入卦，故《京氏易传》说：“五星从位起镇星。”以后之五十八卦就这样顺五行相生次序排下去，循

环周转，最后兑宫归妹卦入岁星而止。以土星始而木星终，土金水木四星各周十三转，火星只周十二转。京房作了这样的安排后，想看一看有什么意外的效果。他认为乾卦世爻上九壬戌土配镇星（土）是个好的开端，但是第二卦姤卦世爻初六辛丑土就不与太白（金）相合，此后他一卦一卦排下去，结果是很不令人鼓舞的。在全部八宫六十四卦中，乾宫连同本位卦有三卦是世爻与五星之五行合，即除乾卦外，还有否卦和晋卦，否卦世爻六三纳乙卯木，而岁星入卦；晋卦世爻九四纳己酉金，而太白入卦。其余各宫就愈来愈不合了，震宫只有解卦和归魂卦随卦相合，坎宫亦只有屯卦和丰卦两卦相合，艮宫只有渐卦，坤宫也只有泰卦相合，巽宫只有无妄卦和噬嗑卦相合，离宫又只有一卦即讼卦相合，可兑宫却没有一卦相合。因此全部六十四卦只有十二卦才有人卦五星之五行和卦的世爻五行相合，还不到五分之一。但是京房并不放弃他的设想，还想从其他角度来看看有什么效应。《京氏易传》复卦云：“积算起庚子至己亥，周而复始，土水见候。五星从位起岁星。”陆注：“岁星（木星）入复卦，合水土配吉凶。”陆绩的注未必是京房的原意，但是京房确实作了这方面的考虑。如观卦，京氏云：“积算起戊寅至于丑周而复始，金土火互为体。五星从位起荧惑。”所谓金火土互体，因观卦属乾宫金，故用金为首。观卦四爻辛未土，四爻即观卦之世位；观卦初爻乙未土（应爻）。世应皆属土，按京易每卦皆有一爻为主，姤卦说：“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即吉凶之占也主要定于此为主的一爻之象。所以土是观卦之主要爻象。那么火呢？从爻象来说，观卦五爻为辛巳火，二爻为乙巳火。辛巳火与辛未土组成观卦上体的下面两爻；乙巳火与乙未土组成观卦下体的下面两爻。这似乎是土火二体，可是作为积算的戊寅木却被排除在外，似亦不甚合理。而若除世应二爻外，其他爻象若不作勉强解释，只有采用南方荧惑火星入金宫而组金火土之合体，似乎更可以接收。京房将五星引入其卦中，表示了他有些更为深刻的考虑，然而当时却没

有达到他的目的。因此他也暂搁于此，以便作一步探讨。

他对二十八宿也像五星一样作了处理，即也将之引进了他的卦爻系统中。而且他主要考虑的也是起始点，即以什么星宿入乾卦，一当这个起始点确定下来，余下就是二十八宿依其排列次序对应于八宫卦次序排列配应下去。二十八宿的排列次序按照成例是从东方的角宿开始。古人将二十八宿分为四象，即东宫苍龙，北宫玄武，西宫白虎和南宫朱鸟。二十八宿分布于四象为：

东宫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

北宫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宫白虎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

南宫朱鸟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所以这样分为四宫，因为是以春天的观测为基础的，初春黄昏时分，朱鸟七宿正在南中天，它的东面是苍龙七宿，西面是白虎七宿，北面（北方地平线下面）是玄武七宿。

至于八宫卦之排列，前已说明首宫为乾宫，乾宫首卦为本位卦乾卦。而乾宫位于西北方，于五星属金，因而应取西宫白虎的星宿相配。乾卦又位于西北戌亥之位，故应取室壁奎娄之宿与之相配。但京房坚持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所以要考虑到乾卦的主爻即世爻，而且以后各宿入卦都要入位于世爻。乾卦世爻为上九宗庙壬戌，所以他就取西方七宿最末之一宿参宿与之配应，即取参宿为起始星宿。京易乾卦说：“参宿从位起壬戌。”陆绩注说：“壬戌在世居宗庙。”即指明京房的这一设想。不过这是将星宿纳入八宫卦之后的解释，京房作此设想时可能有更多的考虑。首先关于参宿，《左传·昭公元年》：“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实沈，而不相能。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故参为唐星。”唐为商灭夏后在其地建立的方国。周成王封其弟虞于唐，故为唐叔虞。《左传·定公四年》说到：“封唐叔于夏墟。”后来在此建立晋国。故郑玄注《周礼·保章氏》说：“参为晋星。”再看京房

故里为东郡顿丘，顿丘原属卫地，《汉书·地理志》说：“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续汉书·天文志》说：“星官之书自黄帝始。至高阳氏（即颛顼大帝）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时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汤则巫咸……皆掌天文之官。”昆吾氏行夏政，当以观测参星授时，卫人因之。京房自小生长于此，受此地文化之熏陶，自然对参星十分熟悉，故用参星作为起首星在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仅仅因此就将参星作为起首星。他还注意到另一方面。参星及其附近之星，当时人们都认为它呈现斧钺之形。《鹖冠子·天则》说：“前张后极，左角右钺。”这里张就是南宫朱鸟七宿的代表，极则表示北天极。左面（东方）是东宫苍龙的代表角宿，而右面（西方）是西宫白虎七宿的代表参宿。对于坐北朝南的观测者，如他面对着南宫朱鸟时，所见的星象就是如此。要紧的是《鹖冠子》将参宿直接呼为钺。在考察甲骨文的十二支时，戌就显示斧钺的形象，与仲冬十一月见于东方之参宿三星是同一形象。京房取其为首宿从位入乾卦之上爻壬戌，就不是一种随意的选择，而是考虑了星象的因素。同将五星引入八宫卦中的设想一样，他希望看看这会起到什么效果。大概也同五星一样，并不令他鼓舞。因此他也暂时将之保存，等待他有机会再作深入的研究。

由以上可以看到，京房的上述这些易学构思和设想，常常将其家乡的文化遗产，自觉或不自觉地揉进其研究之中。例如他关于建候的设想，就以正月建寅为首，这正是古六历中颛顼历之特点，而他的家乡正是称为“颛顼之墟”的顿丘，所以他习惯于以正月建寅为首。

在确定了参宿作为为首星宿并与为首卦乾卦世爻相配之后，以下就是逐个相配。如紧接着参宿的是井宿，所以井宿就入乾宫一世卦姤卦之世爻辛丑土。陆绩注说：“辛丑入土，元土临母也。”辛丑为姤卦初爻，而初爻为元土。井宿为南宫朱鸟之首宿，于五行属火。姤卦之应爻九四壬午火，与井宿相协。而世爻丑土

由火而生，故云：“元士临母。”井宿之后接鬼宿，“鬼宿入位降丙午”，即入乾宫二世遯卦之世爻六二丙午，二爻为大夫，居于元士爻之上，故说：“临大夫而乘元士。”如此一一对应下去，凡二十八宿轮两周，而西宫之参宿和南宫朱鸟七宿，共八宿轮三周。最后兑宫归妹卦降轸宿而止。尤堪注意者，第十六卦即震宫归魂卦随卦，《京氏易传》云：“计都从位降庚辰”，此处庚辰当随卦世爻九三。如依二十八宿顺序，当此卦者应是斗宿。斗宿应轮两次，其后当是第四十四卦巽宫三世卦益卦又当斗宿入位，但《京氏易传》云：“计宿从位降庚辰”，陆绩注说：“二十八宿分计宿入风雷益六二庚辰土上。”按六二当为六三，计宿亦与入随卦之计都不同。按《史记·天官书》关于斗宿说：“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正义》说：“建六星，在斗北，临黄道，天之都关也。斗建之间，七耀之道，亦主旗轸。”《晋书·天文志》云：“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关也。斗建之间，三光道也。”《史记·律书》说：“东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大吕者，其于十二子为丑。”所以在京房时代，将建星视为斗宿的宿星，尤其是在夏族后裔分布地区。而建星又称为天之都关，所以很可能所谓计都或计宿，只是建宿或建星之讹。

## （二）阴 阳 之 气

京房的系统中强调天度要与气数相应。当天度与气数不相应时，就会认为出了什么问题。对于天度和气数是否相应，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汉宣帝的丞相丙吉在春季出巡野外时连续碰上了两件事。他先碰上一群人在打群架，已经有人死伤在道路上，但他却不予理会，继续前行。后来又碰见一个人赶牛，而牛喘吐舌。丙吉这下停了车，命人问赶牛的赶牛走了多少里路。他的随从们感到奇怪，认为丞相该过问的不过问，不该过问的反而

过问起来。丙吉不同意，他说：民斗相杀是长安令或京兆尹职责内的事，应由他们来过问。对于他们是否称职，每年年终进行考绩，到时定其赏罚就可以了。宰相不能什么小事都管，所以不该在道路上过问打群架。但现在时令正是少阳用事，天气还没有热，如果牛没有走很远的路就气喘吐舌，就应是时令节气失常带来了伤害。三公之职就是要调和阴阳，这正是我的职责，所以应该过问。可见在丙吉的心目中，时气失节，阴阳不调是国家的大事。京房在考虑气数时，努力建构建候和积算的系统。这在前面已经详加介绍，而且指明京房并没有完整地或最终地解决，所以本书对分散于各卦中的一些资料，作一些必要的说明。京房设计建候积算时，比较多地考虑了干支五行和爻位变化，无论《京氏易传》的原意或是陆绩注都显出这一倾向。这相对来说却较少地考虑了《周易大传》上十分强调的阴阳，未能设计出一种将阴阳也与建候积算糅合起来的方法。或许京房有他自己的考虑。如果从京房的角度考虑，他或许认为卦爻本身就已显示出其阴阳，卦分父母男女，爻位的奇耦和爻自身的刚柔，无不显示着阴阳的变化。因此他希望在建候积算与卦爻配应时就自然透露出阴阳消息。还有，京房也许以为他始终一贯坚持天左行而地右旋的原则，这就已经将阴阳原则糅合进八宫卦的深层结构中去了。基于他这两方面可能的考虑，他在论述卦时都强调其阴阳。现在将京易中乾宫和坤宫各卦讲述阴阳消息的过程摘录如下：

乾宫各卦阴阳消息

乾卦：“纯阳用事。”

姤卦：“阴遇阳。”

遯卦：“阴荡阳，阴来阳退。”

否卦：“内象阴长。”

“阴气浸长。”

“阴阳升降，阳道消铄，阴气凝结。”

观卦：“内象阴道已成。”

“阴道浸长。”

剥卦：“柔长刚减，天地盈虚。”

“天气消灭。”

“阳息阴专。”

晋卦：“阴阳反复，进退不居、精粹气纯，是为游魂。”

大有：“阴阳升降，六位相荡，反复其道。”“六五阴柔为日照于四方，象天行健。”

“阴阳交错，万物通焉。阴退阳伏，返本也。”

坤宫各卦阴阳消息

坤卦：“纯阴用事。”

复卦：“阴极则反，阳道行。”

“阳来荡阴，阴柔反去，刚阳复位。”

临卦：“阳长阴消。”

泰卦：“阳长阴危。”

“阳气内进，阴气升降。”

大壮：“阳胜阴而为壮”

“阳升阴降，阳来荡阴。”

夬卦：“刚决柔，阴道灭。”

“五阳务下，一阴危上。”

需卦：“天凝于阴而待于阳。”

“三阳务上而隔于六四。”

比卦：“反本复位，阴阳相定。”

“阴道将复，以阳为主，一阳居尊，群阴宗之。”

“归魂复本，阴阳相成，万物生也。”

从以上两宫各卦之阴阳消长，可见京房对八宫卦之阴阳消息，还是基本上停留于对卦象的说明，尚没有形成一种合乎他自己体系的系统的解释。不过也不是拘泥于传统的《易大传》的说法，而是有所发挥。在《京氏易传》卷下中，京房写道：

积算随卦起官，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

天地宇宙之中阴阳二气交互不停，阳入阴，阴入阳；而八宫卦也不停地相盗，不停地变化。所以说生生之谓易。又说：

阴阳二气，天地相接，人事吉凶见乎其象。六位适变，八卦分焉。阴虽虚，纳于阳位称实。升降反复，不能久处，千变万化，故称乎易，易者变也。

六爻不断地变化以适应阴阳二气的不断变化。从而使卦也不断地相盗而变。爻位升降反复，不可能长久地处于一定状态。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所以易者变也，实际上反映了阴阳二气的不断变化。

京房所论述的阴阳二气的变化方式可能稍微复杂一些，但主要只有相盗和聚散两种。所谓相盗就是阴入阳，阳入阴。这有升降，消长，隐显等方式。如前乾坤两宫的阴阳消息过程，主要是升降和消长。关于隐显的例子，如离宫本位的离卦，其说为：“离本于纯阳，阴气贯中，稟于刚健，见乎文明。阳为阴主，阳伏于阴也。是以体离为日、为火。始于阳象而假以阴气，纯用刚健不能照明，故以阴气入阳，柔于刚健而能顺柔，中虚见火象也。”他说离卦本于纯阳，阴气贯中为文明之象。何以如此而为



文明之象呢？他认为这是由于“阳为阴主，阳伏于阴也”。就是说其六五爻为阴爻居阳位，表示在六五阴爻后面潜伏着阳气而起决定作用，亦即阴气显而阳气隐伏。也可以说是阴爻居阳位称实。其关键是京房提出单纯纯阳之体，必须贯以阴气才能明亮而致发光照物。若无阴气贯入，则光强热暴，会使物损伤。

阴阳二气还有一种运行方式，就是京房提出的聚散。京房认为当阴阳二气聚合时，是为天地宇宙的本原。积聚之气必散，由阴阳本原之气散而形成天地之气。但阴和阳不能处于分离状态，所以又要有聚合，所谓聚散有时。《京氏易传》解卦说：“解，阴阳积气，聚散以时，内险外动必散。”解卦内体为坎，坎为险；外体为震，震为雷为动，故云内险外动。又说：“易云解者散也。解也品汇甲坼，雷雨交作。积气运动，天地剖判。”内险外动亦有如雷雨交加（震为雷，坎亦为雨）。此时草木甲坼，生长而出。这也是一种积气散开的运动。故解的意思就是散。此外他还认为“必专者败”，就是阴阳二气散后，就会有阳入阴或阴入阳的推盪，阴阳互相消长。如果散后阳气和阴气分开，阳者有阳而无阴，阴者有阴而无阳，这就叫做专。如果老是处于专的情况就会必败。《京氏易传》遯卦说：“阴阳消长，无专于败。系云能消者息，必专者败。”这是对聚散方式的一种补充，以充分强调聚散方式表明阴阳二气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原则。

### （三）成卦之主

京房八宫六十四卦无不有成卦之主。但《京氏易传》所明确说到的约十之二三。所谓成卦之主，即如前所引之离卦，《京氏易传》云：“阳为阴主，阳伏于阴也。”所以离卦之二五两爻为成卦之主。《京氏易传》中明言成卦之主者，计有：

乾宫四世观卦：“阴阳升降，定吉凶成败，取六四至于九五，成卦之终也。”

乾宫五世卦剥：“成剥之义，出于上九。”

乾宫归魂大有：“分六五阴柔为日照于四方，象天行健。少者为多之所宗，六五为尊也。”

震宫一世豫卦：“豫以阳适阴，为内顺。成卦之义，在于九四一爻，以阳荡阴。”

震宫二世卦解：“成卦之义在于九二。”

坎宫本位卦坎：“成坎之德，在于九五九二也。”

坎宫二世卦屯：“子午相敌见吉凶。”

艮宫二世大畜：“二阴犹盛，成于畜义。”又云：“以柔居尊，为畜之主。”

艮宫三世损卦：“损，泽在山下，卑险于山，山高处上，损泽益山，成高之义，在于六三。”

坤宫一世复卦：“一阳为一卦之主。”

坤宫二世临卦：“用于阳之爻，成临之义。”

坤宫三世泰卦：“乾坤二象合为一，运天入地交泰，万物生焉。小往大来，阳长阴危。”又说：“存泰之义，在于六五。阴居阳位能顺于阳，阴阳相纳，二气相感，终于泰道。”

巽宫一世小畜：“小畜之义在于六四。”

巽宫二世家人：“酌中之义在于六二。”

离宫本位卦离：“阳为阴主，阳伏于阴也。”陆绩注说：“成卦义在六五。”

离宫一世旅卦：“火居山上，为旅之义。六五为卦之主。”

离宫归魂同人：“吉凶之兆，在乎五二。得时则顺，失时则逆，阴阳升降，岁月分焉。”

兑宫五世卦谦：“一阳居内卦之上，为谦之主。”

以上十八个卦中，剥、大有、豫、复、小畜、同人、谦都一爻成卦而为卦主。而这一爻在卦中是唯一的阳爻或阴爻。剥卦上爻是卦中唯一阳爻，豫卦九四为卦中唯一阳爻，大有六五为卦中唯一阴爻，小畜六四为卦中唯一阴爻，同人卦中六二为卦中唯一

阴爻，谦卦九三为卦内唯一阳爻。以上七卦中唯一之阴爻或阳爻即是卦主。其中同人卦说：“吉凶之兆，在乎五二”，似说该卦有二爻同为卦主。其实成同人之卦者只有六二一爻。言五者，因其为二爻之应爻。

除上七卦外，还有观、解、坎、屯、大畜、临、家人、离八卦，每卦有两阴爻或两阳爻。观卦唯九五上九两阳爻，解卦九二九四两阳爻，坎卦九二九五两阳爻，屯卦初九九五两阳爻，大畜六四六五两阴爻，临卦初九九二两阳爻，家人六二六四两阴爻，离卦六二六五两阴爻。但是并非这些卦都是以两爻同成卦，有些只有一爻才是成卦之主。观卦实际上说到了三爻，即六四，九五和上九。按《京氏易传》大有卦说：“少者为多之所宗，六五为尊。”即观卦应以两阳爻为少者，但其中九五是尊位（即辟爻），故九五为观卦成卦之主。但言六四者，因乾宫变至四爻而得观。所以或以五爻尊位，或以世位，在诸成卦之爻中为主之爻。解卦就是以世位为成卦之主爻。解卦为震宫二世卦，世爻九二为卦主，故说成卦之义在九二。坎卦就是九五九二两爻为成卦之主，但九五尊爻更为重要。屯卦自身为坎宫二世卦，处于少者为二阳爻，一在初，一在五，而京易屯卦云：“子午相敌见吉凶。”屯卦初爻庚子，六爻中还有上爻为戊子，但无午爻。故主爻当是初九。大畜卦六四六五二阴爻中，又以六五为主，盖六五居尊位也。临卦为坤宫二世，两阳爻皆在下面，当以九二为成卦之主，因其当尊位之应位也。家人卦为巽宫二世，有两阴爻，而取其居世位之九二爻为成卦之主。离卦为六二六五两爻为成卦之主爻。虽坎离两卦均以二五两爻为卦主，但坎阳卦，以九五更尊；离阴卦，以六二阴爻更为重要。

其他各卦均可依循以上诸原则求成卦之主。例如坤宫归魂比卦，《京氏易传》云：“水在地上，九五居尊，万民服也。”陆注云：“此卦一阳五阴，少者为贵，众之所尊者也。”《京氏易传》又说：“阴道将复，以阳为主，一阳居尊，群阴宗之。”又如兑宫

二世卦萃卦，九四九五为卦中之二阳爻，九五为尊位，故《京氏易传》萃卦说：“阴气盛，刚柔相应，合九五定群阴，二气悦而顺。”陆注：“萃卦丁酉金（萃九五爻纳辰）（其应爻六二）乙巳火，二象刑而合也。”

以上还有泰卦，损卦和旅卦的成卦之主。这三卦均是阴阳爻等，即一卦中有三阳爻和三阴爻。泰卦取六五爻为成卦之主，因为“阴居阳位，能顺于阳，阴阳相纳，二气相感，终于泰道”。故取居尊位之阴爻六五。损卦，因为“山高处上，损泽益山”。所以成卦之爻在下体泽上，下体泽之上爻为六三，故云“成高之义，在于六三。”旅卦也是三阳三阴爻，因《京氏易传》旅卦云：“火居山上，为旅之义。”所以以上体离卦火之中爻，即旅卦六五尊位为成卦之主。凡三阴三阳爻组成之卦，成卦之主要看卦义。如咸卦，属兑宫三世，《京氏易传》咸卦说：“咸，山下有泽，虚己畜物，阳中积阴，感于物也。阳下于阴，男女之道，内外相应，感类于象也。六二待聘，九五见召，二气交感，夫妇之道，体斯合也。”故咸卦成卦之主为六二九五。

成卦之主是京房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解释卦义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特别重视少为尊、五为尊，世位为尊。这正是：“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陆注说：“多以少为贵”，不可等闲视之。

#### （四）气候分数

《京氏易传》每卦都要提分气候三十六或分气候二十八。在前面讲积算时，已引过晁公武的话，即此分气候三十六或二十八是由“其建刚日则节气，其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有八，盈则三十有六”。关于刚日节气、柔日中气，在建候中已讲述过，这里主要讲述气候分数。

按其各卦情况说，乾卦建始甲子，刚日则起节气，甲子则当

为十一月节大雪，但《京氏易传》乾卦陆绩注说：“十一月冬至一阳生。”因此建始甲子是指冬至，还是指十一月节就没有说清楚，因而乾卦之气候分数是三十六还是二十八也就没有写下来。从姤卦始，每卦都记下了该卦的气候分数。姤卦说：“天风气象三十六候”，因此建始庚午为刚日，故自五月节芒种起。建候之结末为乙亥，亥为十月，乙亥当指十月中气小雪（十月节为立冬）。自芒种至小雪共历十二节气。每一节气十五天多，下分三候，每候五日余。十二个节共有三十六候，所以说天风气象三十六候。天风者姤卦。乾宫二世遯卦，建辛未至丙子。辛未当是六月中气大暑，丙子则是十一月节气大雪，故共历十个节气，即有三十候。而却说：“阴阳分数二十八候”，何以要减去两候，这由于遯卦本身为阴虚之卦，起建之时，初候不足；止建之时，末候又不足，故已缩其二候。遯卦之后为否卦，建候起壬申至丁丑，即从七月节立秋至十二月中大寒，共历十二节气，故“气分气候三十六”。乾宫四世卦观卦，建癸酉至戊寅，秋分至立春，共历十个节气，如同遯卦一样又为二十八候。五世卦剥卦，建甲戌至己卯，自九月节寒露至二月中春分，又历十二个节气，故“分气候三十六”。乾宫游魂晋卦，建始己卯至甲申，春分到立秋，共十个节气，故又为“二象分候二十八”。乾宫归魂大有卦，建始戊寅至癸未，立春正月节至六月中大暑，又共十二节，故又是三十六候。由乾宫之气候分数看来，确实尊守建始刚日则数盈，建始柔日则其数虚。盈则分气候三十六，虚则分气候二十八。由遯卦示例云遯为阴卦，遯何以为阴卦？京易遯卦云：“遯，阴爻用事。阴盗阳。山在天下为遯，阴来阳退也。”乾宫各卦建始柔日者还有观卦，京易观卦云：“观，内象阴道已成。”又有游魂晋卦，京易晋卦云：“晋，阴阳返复，进退不居，精粹气纯，是为游魂。”陆注云：“为阴极剥尽，阳道不可尽灭，故返阳道，道不复本位，为归魂例入卦。”即虽然晋卦之四爻变阳，即返阳道，但道不复本位，只能是游魂，所以也是阴卦。

其他各宫情况又如何呢？

震宫八卦中，建始为阳日干支者有：震卦，解卦，升卦，大过卦；而建始柔日者为：豫、恒、井、随四卦。凡建始刚日者气候分数三十六，建始柔日者气候分数二十八。但是这里取柔日建始的四卦，却未见得是阴柔之卦。例如震宫三世卦恒，建己卯至甲申。但京易说恒卦：“雷与风行，阴阳相得。”即恒卦是阴阳相得之卦。所以从三十候缩减为二十八候，未必是建始柔日又逢阴卦，可能还有另外的理由。一种可能是建刚与建柔都得取周天之数，进行数字的比附。三十六是指六个月，每月经历两节气六候，一共形成六六三十六之数，这正是周天度数三百六十的简缩形式。而二十八则与二十八宿有关，而二十八宿正布满一周天。所以阳盈采用三十六，阴虚取二十八数。而且三十六为四乘九，二十八为四乘七。用四来乘，表示一年之四时。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性的说法。另一种可能就是京房从阴阳二气的观点来看，阳卦气盈，阴卦气虚；又同时坚持八宫六十四卦分阴阳。《易纬·乾凿度》说：“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而象阴阳也。”这正是《京氏易传》卷下中的言论。如果将六十四卦分阴分阳，取其平均，阴阳各得三十二卦。所以可将三十二视为阴阳平均之数，从此按阳盈阴虚的原则，平均数加上一些数表阳盈，而减去一些数表示阴虚。于是得阳盈之数三十六，阴虚之数二十八。以四加减，实因一年分为四时，或者说出于四象。而最后三十六与二十八的和为六十四，即与八宫六十四卦之数相等。虽然这是根据京房自己的思想作的推断，但毕竟只是推断。

京房当时没有作出解释，或者是他没有来得及作出解释。

京房的气候分数是为了说明卦的阴阳变化的程度，大约是配合建候积算等占断吉凶祸福之用。可以看出他想将这些进一步与八宫卦融合起来。但是他没有对此作更具体的说明，这反映他碰到不少要解决的难题，他的研究还远没有完成。

从第三节至此，讲述了目前唯一存留的京房著作——《京氏易传》的主要内容。这一著作中的主要内容当系京房少年时代在家中勤学苦读之时，对《周易》探索研究之所得。由于在这一著述中既有令他鼓舞的独创，也碰到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正由于此，才使他下决心去小黄拜焦贛为师，以求深造。

### 第三章 京房的卦气说

京房离开故里去小黄拜师求学时，是一个意气风发、满怀豪情的青年。虽然顿丘离小黄不算太远，但对于青年京房来说，却是生平第一次背井离家。特别是这趟旅行要渡过黄河，所以还是有点远离的气氛。古代渡河对人们的活动来说是件大事，整个《易经》六十四卦中，有十个卦讲到涉大川的事。在十一条涉大川的占词中，有两条是不利涉大川外，其余均是利涉大川。这反映了古代人们对渡过黄河是何等的关注。京房时代渡河的条件可能比远古时代要好不少，但渡过黄河仍然是一件壮举。

有理由相信京房在这次包括渡黄河的旅行中，大大开阔了眼界。在与社会的初步接触中，他可能感到自己一直关在书斋中的学子生涯过分脱离了现实。以至于对于自己精心设计的易学系统，是否能够像他设想的那样，能够描绘这么广大的世界，能有效地描绘天地人的一切，似已不像刚离开他的书房时那样信心十足。特别是和他的老师焦贛接触后，他更是感觉到正接触着一个新的世界。焦贛当时当是小黄县令，是一个令盗贼畏惧而百姓爱戴的地方官。他算不上当代的易学大师，也不是学术界名门的传人。但是他受过梁王的资助，有机会接触当世的大学者，也有机会接触古往留传下来的一些“绝学”，使他在学风上显得别致，在学术上别树一帜。他不拘守某一家师门之学，而是从他接触到的学问传授中，提炼出一种与当时社会联系较切近的学问。《汉书·京房传》上说他学成后“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他的这种“以候司先知奸邪”就是一种新学，以致他



在小黄令任上使一县之内“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即他传授给京房的以风雨寒温为候，以六十四卦直日用事的这一套占验之学，还有声律之学等均非当时列于学官的名门之学，但是却切世用。京房之所以投奔焦贛，可能正是因为焦贛这些别树新帜的，具有新的非世俗学者能有的学问。因而他在焦贛那里，确实大大扩大了他的知识领域和视野。

京房离开他的书房时，考虑得最多的还是那些与卦爻相关的建候、积算、五星、二十八宿，特别是阴阳之气的相盗和聚散等如何在其八宫卦的系统中更为有效地被解释或说明。他投焦贛学习易学的目的主要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来解决他所碰到的一系列困难。可能焦贛对京房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他介绍了孟喜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主要内容，或许还向他介绍了当朝丞相魏相关于阴阳学说的一些思想。

焦贛确实向孟喜请教过易学，《汉书·儒林传》说：“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这里说翟牧、白生不肯，意思应是不肯承认焦贛传授给京房的易学是孟喜的易学。孟喜又已过世，这事似乎已无法说清楚。而且“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汉书·儒林传》）即刘向认为京氏所学不唯与田何、杨叔元、丁将军等所传之《易》不同，而且虽托之孟氏，亦与孟氏易了不相干。于是刘向考察的结果，不仅否定了京房之所学与孟氏易有任何相干，也否定了孟喜曾经与《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有任何相干。大约《汉书·儒林传》不同意这个说法，所以他对孟喜的介绍作重说了他与候阴阳灾变书的事情。至于《汉书·艺文志》，则载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则不只说明京氏学与孟氏易有深刻的关联，而且说明京氏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继承了孟氏易。据此我们只能作出一个简单的判

断，即假定孟喜易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应是孟喜从田何所受之《易》，大概可说是孟氏前期所治之《易》。另一部分则是《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所述之《易》，应是孟喜后期所治之《易》。其前期所治《易》为刘向所考察，后期所治《易》则为焦贛所承受，并以之传授于京房。但后世所说的《汉易》卦气说，无论孟氏还是京氏皆为京房所整理。

## 一、孟喜易学

孟喜与焦贛不同，他是知名的大儒，是汉代《易》学三大博士之一。当焦贛向京房讲述孟喜关于《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内容时，京房是心情激动的。他觉得受到很大启发，也觉得孟喜的考虑确实比他深刻和明白，确实是体现了一种大儒的气象。因而他沉湎于孟喜的卦气说之中，直到他初步整理出《孟氏京房》十一篇和《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这些著作现已散失殆尽，但当时却是易学领域的新著，或者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易学新书。从后世学者们对孟喜学说的回忆和追述中，孟喜的卦气学说主要有：十二消息卦，卦气学说和六日七分等。本节也主要在这几方面作尽可能详细的介绍。

### （一）十二消息卦

“消息”的名称可能是战国时的学者，阴阳家的主要代表邹衍最早提出。在本书第一章中，摘录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关于邹衍的资料，其中说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史记·历书》中又有两处提到“消息”，一是“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一是写战国时期，诸侯并争，无暇顾及历法，“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所以“消息”是一种与历法有关的名称和概念。孟喜将此概念引入他的易学系统中，建立了他的卦气说的基础。后代易学学者解释“消息”，说是：阳息坤谓之息，阴消乾谓之消。按《易·系辞下》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虞翻说：“乾为寒，坤为暑。谓阴息阳消，从姤至复，故寒往暑来也。阴消阳信，从复至泰，故暑往寒来也。”按此说，从姤卦䷫一阴生，


历遯卦䷠二阴，否卦䷋三阴，观卦䷓四阴，剥卦䷖五阴，坤卦䷁全阴而后到复卦䷗一阳生。这一过程是阴消乾的过程，乾寒去而坤暑来。从复卦一阳生开始，历临卦䷒二阳生，泰卦䷊三阳生，大壮䷡四阳，夬卦䷪五阳至乾卦䷀全阳，又至姤卦䷫一阴生。这一过程是阳息坤的过程，坤暑去而乾寒来。如《周易集解》中引虞翻注，临卦谓“阳息至二”，泰卦谓：“阳息坤”，大壮卦谓：“阳息泰也。”夬卦谓：“阳决阴，息卦也。”姤卦卦辞谓：“消卦也。”遯卦云：“阴消姤二也”，否卦谓：“阴消乾。”剥卦亦谓：“阴消乾也。”


《易·系辞》又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九家易说：“范者法也，围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过于十二辰也。辰，日月所会之宿，谓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之属是也。”此即说消息只在十二辰中变化，或阳息坤或阴消乾。《周易集解》又引干宝注乾六爻说：“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泰来也。阳在九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再引干宝注坤六爻说：“阴气在初，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在二，六月之时，自遯来也。阴气在三，七月之时，自否来也。阴气在四，八月之时，自观来也。阴气在五，九月之时，自剥来也。阴在上六，十月之时也。”

就以上所说，可列出十二消息卦如下：


复卦	十一月	䷗
临卦	十二月	䷒
泰卦	正 月	䷊
大壮	二 月	䷡
夬卦	三 月	䷪
乾卦	四 月	䷀

以上为阳息卦，

姤卦 五 月 

遯卦 六 月 

否卦 七 月 

观卦 八 月 

剥卦 九 月 

坤卦 十 月 

以上为阴消卦。

此十二消息卦也称作十二辟卦，《尔雅·释诂》谓辟为君，就是十二月当位之卦。此十二卦又当每月之中气。一个月包含两个节气，一为节，一为中。中气为该月之代表。如冬至为十一月中，即为十一月或建子之月的“候”，这个“候”表示该月气候的特征。大寒为十二月中为建丑之月的“候”，雨水为正月中，即建寅之月的“候”等等，故凡中气代表这个月份。又十二卦共七十二爻，代表七十二候。这是五天多构成的一候，代表一个时间单位。

在第二章第七节中已经讲了京房关于阴阳之气的论述。已经接触到阴阳消长的观念，但是他没有能讲到十二月消息卦，这说明十二消息卦非出自京房。同时也可看出京房在接触到十二消息卦后，没有再回到《京氏易传》。否则他会将十二消息卦的概念引入《京氏易传》的。因为这十二消息卦简明扼要地把阴阳升降与月份气候联系起来，而且触及本质。事实上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京房如何熟练地使用消息卦的情况。如果严格考察起来，“消息卦”这一名称，可能就是京房最先使用。京房本传载房上封事说：“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说：“房以消息卦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阴，消卦曰太阳，其余卦曰少阴少阳，谓臣下。”可见消息卦的名称为京房所加，非孟喜本人所定者。

## (二) 孟氏卦气

孟喜之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即是将阴阳观念引来解《易》，从论述和推测气候的变化而进一步论证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唐朝僧一行《大衍历议》之六，《卦议》说：“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并且引孟喜之卦气说如下：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固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正南，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始动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新唐书》卷二十七）

由此可知，孟喜特别关注历与卦的联系。就历而言，一年有四时，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每月三十日，一节气十五日有余，一候五日有余。所以与卦联系起来，就是一个月之策当九六七八之数，这四数相加为三十，即一月之策数。而又说“卦以地六，候以天五”者，即是说每个月配五卦，每卦六日有

余；而每月有六候，每候五日有余，由于六为地数之中数，五为天数之中数<sup>①</sup>，故说“地六”，故说“天五”。五六两中数相乘得三十，为一月之日数。一个月气候的变化谓之“消息一变”，经历十二个月即经过消息十有二变，又开始新的一年。因而他取坎震离兑四卦主二十四个节气，每卦主六个节气，亦即主三个月。四卦共二十四爻，每爻配应一个节气。坎卦以阴包阳（䷜），从正北起始，此际微阳动于下。故坎初爻应冬至，九二爻配小寒，六三爻配大寒，六四爻配立春，九五配雨水，上六配惊蛰。即为坎卦主管的六个节气，从十一月至正月。然后是震卦，万物出乎震，一阳主于内（䷲），群阴化而从之。其爻从初九至上六配应于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从二月至四月。离卦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其诸爻与节气之配应，初九夏至，六二小暑，九三大暑，九四立秋，六五处暑，上九白露六气。从五月至七月。然后是兑卦，自兑初九至上六所配之卦为：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六节，从八月到十月。如此配应，一目了然看出这四卦的初爻正在二至二分。故说“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孟喜称此四卦为“四正卦”，或许由于四卦居于四正方位，或由于这四卦之初爻当二至二分之正位。当然也有可能这四卦当老少阴阳之正位。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七八为少，九六为老，少静而老动。故七为少阳不变，九为老阳必变；八为少阴不变，六为老阴必变。故说：“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盖坎震为阳卦，离兑为阴卦也。《汉书》孟康注说：“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魏正光历》

① 《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中偶数为地数，奇数为天数。地数五，六居中；天数五，五居中。

说：“四正为方伯。”《易纬·乾凿度》说：“四维正纪，经纬仲序，度毕矣。”郑玄注说：“四维正四时之纪，则坎离为经，震兑为纬，此四正之卦为四仲之次序也。”所以坎震离兑四卦，既主四正方位，也主四时，还主四时或四方专王之气。

除四正卦当四时、四方之应外，其余六十卦与月份、节气乃至七十二候的对应，孟喜易称之为六十卦用事月。这是孟氏卦气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处理方法是将六十卦分为五类或者五等，即按辟（君）、公、侯、大夫、卿五等爵位来分，称为五等卦。并规定每个月中气配应公卦初爻起始，依公、辟、侯、大夫、卿的次序排列。这样就可以按历法顺序将卦逐个排列起来。现将这五等卦从冬至所在之月（十一月）起始，顺月份次序排列于下：

五等卦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辟卦	复	临	泰	大壮	夬	乾	姤	遯	否	观	剥	坤
侯卦	屯	小过	需	豫	旅	大有	鼎	恒	巽	归妹	艮	未济
大夫	蹇	谦	蒙	随	讼	师	家人	丰	节	萃	无妄	既济
卿卦	颐	睽	益	晋	蛊	比	井	涣	同人	大畜	明夷	噬嗑
公卦	中孚	升	渐	解	革	小畜	咸	履	损	贲	困	大过

由于每卦六日，又自中气配公卦初爻为始，则自中气日始历六日公卦当值毕，次辟卦又历六日，次侯卦只历三日，即到下月之节气。因此本月中气后侯卦只占三日，其余三日则在下月节气之后，故在下月计值。故每月节气之初的三天是侯卦的外卦当值。再回观上表，十一月节气大雪，其开始之三日是侯卦未济卦的外卦当值（未济卦是十月的侯卦），其后是大夫卦蹇卦六日，卿卦颐卦六日，共十五日而至中气冬至，中孚卦初爻当值，历六日交辟卦复卦当值，又历六日至侯卦屯卦当值，只历三日，即只经侯卦屯卦的内卦三日，至十二月节，屯卦外卦属十二月。要注意侯卦的这个转折。

将六十卦作了五等分之后，还要考虑卦与七十二候的配应。因每一节气有三候，即初候、次候和末候；将卦与之对应则称为



始卦、中卦和终卦，于是将六十卦配七十二候时，初候为始卦，次候为中卦，末候为终卦。凡初候二十四配公卦和侯卦，次候二十四配以辟卦和大夫卦，末候二十四配以侯卦和卿卦。六十卦配七十二候，卦较候少十二，但六十卦与七十二候之日却相当。处理的办法就是将侯卦分成两半，半个侯卦为三日。一节气当日为三候，当卦则两卦半。这就相当于将侯卦增为二十四个，但这样的“卦”每卦只有三日。此所以中气配公卦初爻，侯卦分在两个月的原因。僧一行依孟喜之说制一卦气图，现抄录于下：

孟喜卦气图

节气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终卦
常气 中 卦						
冬至 十二月 中 卦	蚯蚓结	麋角解	水泉动	公中孚	辟复	侯屯内
小寒 十二月 中 卦	雁北乡	鹊始巢	野鸡始鸣	侯屯外	大夫谦	卿睽
大寒 十二月 中 卦	鸡始乳	雉始雊	水泽腹坚	公升	辟临	侯小过内
立春 正月 中 卦	东风解冻	蛰虫始振	鱼上冰	侯小过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正月 中 卦	獺祭鱼	鸿雁来	草木萌动	公渐	辟泰	侯需内
惊蛰 二月 中 卦	桃始华	仓庚鸣	鹰华鸣	侯需外	大夫随	卿晋
春分 二月 中 卦	玄鸟至	雷乃发声	始电	公解	辟大壮	侯豫内
清明 三月 中 卦	桐始华	田鼠化为鴽	虹始见	侯豫外	大夫讼	卿蛊

续上表

谷雨 <small>三月中</small>	萍始生	鸣鸠拂其羽	戴胜降于桑	公革	辟史	侯旅内
立夏 <small>四月中</small>	蝼蝈鸣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	大夫师	卿比
小满 <small>四月中</small>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内
芒种 <small>五月上</small>	螳螂生	鵙始鸣	反舌无声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small>五月初</small>	鹿角解	蜩始鸣	半夏生	公威	辟姤	侯鼎内
小暑 <small>六月中</small>	温风至	蟋蟀居壁	鹰乃学习	侯鼎外	大夫丰	卿涣
大暑 <small>六月中</small>	腐草为萤	土润溽暑	大雨时行	公履	辟遯	侯恒内
立秋 <small>七月中</small>	凉风至	白露降	寒蝉鸣	侯恒外	大夫节	卿同人
处暑 <small>七月中</small>	鹰祭鸟	天地始肃	禾乃登	公损	辟否	侯巽内

续上表

白露 <sup>八月节</sup> <small>上九</small>	鸿雁来	玄鸟归	群鸟群羞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蓄
秋分 <sup>八月节</sup> <small>中九</small>	雷乃收声	蛰虫培户	水始涸	公贲	辟观	侯归妹内
寒露 <sup>九月节</sup> <small>上二</small>	鸿雁来宾	雀入大水为 蛤	菊有黄华	侯归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 <sup>九月节</sup> <small>上三</small>	豺乃祭兽	草木黄落	蛰虫咸俯	公困	辟剥	侯艮内
立冬 <sup>十月节</sup> <small>上四</small>	水始冰	地始冻	野鸡入水为 蜃	侯艮外	大夫既济	卿噬嗑
小雪 <sup>十一月节</sup> <small>上五</small>	虹藏不见	天气上胜地 气下降	闭塞而成冬	公大过	辟坤	侯未济内
大雪 <sup>十二月节</sup> <small>上六</small>	鹖鸟不鸣	虎始交	荔挺生	侯未济外	大夫蹇	卿颐

### (三) 六 日 七 分

孟喜以六十卦配历，最终是要以卦爻来配日。所谓“天五地六”，每月配五卦，每卦管六天。不过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说法。如果从一年来看，六十卦只管三百六十天，而一年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日还有余零。因此必须将六十卦与三百六十五日及余零配应满足。古代行用四分历，四分历的一年长度为 365.25 日。因此除了将 360 整数日分布于六十卦，每卦得六天外，还要将余零的 5.25 日分布到六十卦中去。如此取每日八十分，5.25 日共得 420 分，将 420 分分布于六十卦，则每卦得七分。于是总起来每卦得六日七分。因此六日七分法是将日数与卦配应的法则。

汉朝最初行用的是颛顼历，武帝元封七年改历，改历后的历名为太初历。太初历作者主观上仍采用原来颛顼历的基本数据，即一年取 365.25 日的长度和十九年置七个闰月的成法。只是将其朔望月的长度修改为  $29\frac{43}{81}$  日。之所以取这个数值，一方面是

它与原来颛顼历朔望月的长度  $29\frac{499}{940}$  日相差甚微，但它却较为简明，运算起来较为方便；另一方面是采用 81 这个数据还有较深的意义。首先是朔望月长度中的分母 81 称之为“日法”，是当时时间系统的基本单位，与长度、体积、权衡等构成当时的度量衡体制。即将时间单位与长度、体积、重量等单位构成统一的制度。而使这些度量衡单位统一的基础是律数，就是起于音律之数。《汉书·律历志》说：“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这里的“黄钟之数”就是音律中黄钟律的律数。在音律体制中，将一个音级（oktave, octave）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称为一律。黄钟律是取一根长为九寸，径为九分的均匀竹管吹

出的声音。在古代将此作为基准音，并由此用三分损益之法推出其他十一律，故称黄钟为五声之本。汉人据董仲舒的三统说，以黄钟为天统，对应于赤统，以十一月仲冬为正，即谓之天正。以林钟律为地统，相当于白统，以十二月季冬为正，即谓之地正。以太簇律为人统，对应于黑统，以十三月（翌年正月）孟春为正，即谓之人正。故《汉书·律历志》云：“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大簇寅为人正。”因而汉代太初改历时，就“以律起历”，将历的基本时间单位与其他度量衡单位作对应，《汉书·律历志》说：“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又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所以生权衡度量，礼乐之所由出也。”还说：“黄钟纪元气之为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因而律是一切度量衡的基础，也是纪时日的根本法则。这里说的一“龠”，是当时容积的基本单位，或说是“量”的基本单位。一龠是九寸长，围九分的管子的容积，大约装得下一千二百粒谷子。所以黄钟律数是九寸长度的自乘，九九八十一取作日法，就是取黄钟律数为日法。《淮南子·天文训》说：“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可见当时将律和历联系起来是一种思潮，一方面与统一度量衡体制相关，亦与天人相应有关。但将黄钟律数引入历法，以黄钟律纪元气，将会给历法带来某些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由于一个朔望月的长度改为  $29\frac{43}{81}$  日，而十九年加七个闰月的闰法不变。这就使得一年的长度变长，虽然当时看起来差别甚微，但毕竟是会产生影响的差别。下面就可立即看出卦气说所受的影响。

一个卦平均管六日七分既定，接着就是要确定起始卦和各卦的排列次序。所谓起始卦就是与一年起始节气相对应的卦。古代历家所选定的年的起始点是冬至，即是要选一个与冬至点相对应

的卦。按十二律配十二月，是以黄钟配建子之月，即配十一月。《史记·律书》说：“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因此配冬至点的卦，必须是配十一月的卦，就必然与黄钟律有关。对于黄钟，《淮南子·天文训》说：“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踵也。日冬至，德气为土，色黄，故曰黄钟”，即说冬至时律中黄钟。黄钟为黄色，正是五行中土的颜色，亦为中和之色。《汉书·律历志》也说：“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钟是气之所踵，阳气种于黄泉即谓黄钟。这也正是冬至一阳生的写照。因此要用一个什么卦来作配应呢？《汉书·律历志》言：“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因而选择了中孚卦，中者谓中和，亦为中和之色，即黄色。孚者谓信，而土为信。因而中孚卦既表示土，又表示阳气踵于黄泉，所以无论从卦义和气候都表示冬至与黄钟的对应。所以孟喜认为：“自冬至初，中孚用事”，即以中孚卦配冬至初候，为一年卦气之初。扬雄《太玄》中首之辞亦说：“阳气藏于黄宫，信无不在其中。”因而以卦配日，选择中孚为起始卦。这是根据太初历以律起历的原则进行的选择，说明孟氏卦气是根据太初历的思想体系来安排的。

对于各卦如此的排列次序，现时没有任何资料作出完整的说明。《易纬·稽览图》也有一个卦气序列，但亦未作出何以如此排列的说明。为作比较，将《稽览图》的卦气排列抄出如下：

	侯	大夫	卿	公	辟
(寅)	小过	蒙	益	渐	泰
(卯)	需	随	晋	解	大壮
(辰)	豫	讼	蛊	革	夬
(巳)	旅	师	比	小畜	乾
(午)	大有	家人	井	咸	姤
(未)	鼎	丰	涣	履	遯
(申)	恒	节	同人	损	否
(酉)	巽	萃	大畜	贲	观
(戌)	归妹	无妄	明夷	困	剥
(亥)	艮	既济	噬嗑	大过	坤
(子)	未济	蹇	颐	中孚	复
(丑)	屯	谦	睽	升	临

这六十卦的排列次序与僧一行为孟喜卦气所作的卦气图的排列次序相同。只是这个卦序排列与孟喜卦序排列有一点差异，就是它将十二支与六十卦相配，又同时配以十二月。例如复卦配子为十一月辟卦。姤卦配午为五月辟卦，中孚配子十一月三公卦，小畜配巳四月三公卦等等。孟氏卦气图中则没有这一类配应。当然这中间也还有一点另外的小小的差异，即《稽览图》卦气对五等卦以天子、诸侯、三公、九卿、大夫称之，而孟喜卦气称为辟、公、侯、卿、大夫。

《稽览图》还说：“坎六震八离七兑九。已上四卦者，四正卦为四象。每岁十二月，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而孟喜卦气说：“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即坎七震九离八兑六，此两者亦相差较大。前者《稽览图》之说基于五行成数，如坎为水，水之成数六；震为木，木之成数八等等。后者孟喜之说，基于阴阳老少之数，少阳数七，老阳数九，少阴数八，老阴数九。这是关于四正卦而言。



所以就六十卦配日而言，《稽览图》与孟喜之说相同，其差异甚小。不过卦爻配十二支始自京房，因此《稽览图》卦气当在京房之后，增益孟喜卦气而成者。

六日七分各卦的排列次序，实际上是将卦分五等，每月每等各一卦，组成值该月之五卦，每月五卦是按侯外卦（三日）、大夫、卿、公、辟、侯内卦的次序。只有各月辟卦的确立，在十二消息卦中作过说明，其余各杂卦如何分配至各月则没有直接作出说明。

关于六日七分，僧一行在大衍历议《卦议》中报导了京房的算法说：“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于占灾眚与吉凶善败之事。……又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之候，其说不经，欲附会纬文七日来复而已。”僧

一行说的京氏六日七分法，实际是从二至二分前的卦中扣去 $\frac{73}{80}$

日给以初爻代表二至二分的坎离震兑四卦。这样似乎唯一的改变就是将一年之日数配上了所有六十四卦。京房这样调整的意义是否就在于此呢？关于六日七分，黄宗羲说：“六日七分之说，相传最久，其余卦气皆自后起。有自乾至未济，并依易书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值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济值癸亥，乃尽六十日。六周而三百六十日，四正卦则直二分二至，坎冬至，离夏至，震春分，兑秋分，不在六十卦轮直之列者，焦氏之法也。”<sup>①</sup>看来，焦贛从孟喜处接受其卦气说时，四正卦并不参与值日。但焦贛可能考虑到四正卦不直日但又表示二分二至不太妥当，所以就以四正卦直二分二至，其他各卦轮值，最终各当六日。这样也只有364日入卦，还有1.25日未有安排。大约焦贛即以他的考虑授予京房。但京房觉得不妥，因为毕竟有1.25日即100分未

①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卦气二”。

作安排。于是作了上面的考虑，使得既使六十四卦皆入历，又可将分至之气与常气有所区分。不过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自乾卦至未济六十四卦，按序卦传的顺序，每卦直一日，即乾直甲子，坤直乙丑等等，这应是焦贲的设计。因为孟喜没有运用干支与卦相配应，他也没有考虑以卦值日，而是每月五卦，每卦六日七分。而京房呢，他创纳甲法以干支配卦爻，是依据于他的八宫卦，而不是依据各卦轮值以配干支。另外京房法依孟氏一月五卦，这五卦又与该月之斗建相配，如十一月建子，配未济外卦，蹇、颐、中孚、复、屯内卦。可见京氏的设计是为改进焦氏设计而拟议的六日七分算法。

大约京房开始接触孟喜的卦气说时，发觉孟喜在阴阳卦气方面考虑得比他深刻，精密而且简明。他也看到孟喜的设计更直接地与太初历相联系。而他的卦气说看来有点乱，正因为他未能直接与当时的天文历法水平相衔接，这正是他的知识结构中所缺乏的。以上所说的十二消息卦，孟氏卦气和六日七分应是构成孟喜卦气说的主体内容。京房后来对孟喜的学说，特别是对孟喜的易家候阴阳灾变方面的许多内容作过整理。所以后来的京房学说中的卦气说内容，应该包含着孟喜卦气说。

## 二 以风雨寒温为候

焦贛与京房的关系当更为密切，毕竟是直接的师生关系。焦贛之学按京房本传所说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他实际应用的，即“以候司先知奸邪”，这一学问使他成为使盗贼畏惧而百姓爱戴的地方官。第二方面是他授给京房的，以致使京房得其道而亡身的学问，即“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焦贛的第三方面的学问则是京房也相当有根基的钟律音声。焦贛的这三方面的学术之间有什么关联，史料上没有明白的叙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京房学习了焦贛所有这三方面的学问。对于其“以候司先知奸邪”和钟律音声这两方面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本节主要论述其“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的方面。

本书自本节至以后各章节的叙述中都有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是直接有关的资料过分简略，因此每当进行较深入的讨论，就必须作一些必要的推论。即使本节有关的资料，也主要是纬书中一些十分简略的叙述，以及京易承传者传记中一些零星的材料。不过由于京房在西汉易学的特殊地位，所作的推论当不致有太大的偏差。

### （一）魏相易学

在叙述焦贛传授给京房的以风雨寒温为候的占验易学之中，蕴涵着汉宣帝的第二任丞相魏相的易学思想，所以要对魏相易学稍作介绍。魏相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任丞相，这时京房还只是十一岁的少年；魏相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去世，京房已是十九岁的青年。这八年京房虽在学术研究上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但是对他书斋之外的易学发展却知之甚少。不过当他赴

小黄到焦贛处求学时，可能魏相的易学已经稍稍传开，焦贛可能直觉地理解了魏相易学的大概。魏相在任丞相前，在河南郡任太守。焦贛所在的小黄属陈留郡。陈留与河南是紧邻的两个郡，一在东一在西。因此对于魏相的易学，焦贛有可能更早一些知道声息。约在魏相进京任职之前<sup>①</sup>，即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上交朝廷，宣帝下示博士，博士集而读之，然后《易》、《礼》、《尚书》各增一篇。而次年即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魏相由河南太守入京为大司农。河内郡与河南郡亦紧密相连，一在北一在南。因此魏相可能在进京前对此事或有所闻，一入京都就自然十分关注此事，因而有可能参考了易传中所增加的说卦等篇，而建构或增益了他的易学。魏相易学的核心内容，正是《易阴阳》及《明堂月令》，这些与《说卦传》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魏相在他为汉宣帝出谋划策中，常常以阴阳之气的观点来论述。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元康年间（公元前65—62年），匈奴骚扰车师的屯田部队。汉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商量，是否利用这个机会乘匈奴衰弱之际，派兵袭击匈奴右地，迫使匈奴再也不敢骚扰西域。魏相不赞同这个意见。他以为对外用兵有五种情况：“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兵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sup>②</sup>他认为匈奴骚扰车师屯田部队只是一件小事，因此而愤怒，恃国大人众，贪西域之利，愤然出兵，不仅不

---

① 魏相有两次任河南太守，第一次是丞相车千秋（《汉书·百官公卿表》为田千秋）去世之时，当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前后。第二次大约在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

② 《汉书·魏相传》。

是胜利之道，而且还会带来莫大的后患。他特别指出用兵打仗不仅仅是人事，而且是天道。他又引《老子·道德经》：“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说民众因战争而来的愁苦之气，会伤阴阳之和。出兵即使取胜，也要担忧大兵之后的灾害之变。魏相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及官吏状况作了分析，说：“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sup>①</sup> 魏相认为这种子弟杀父兄和妻杀夫的案件，也是属于阴阳不和，气变乖戾所致，这正是灾害产生的预兆，官吏们对此不加注意，反而为了发生在西域边荒地区的小小愤恨而兴兵动众，实在不很明智，他以为这可能就是“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可见魏相关注的是阴阳的和谐、人间社会中出现的乖戾之气，如同兵战产生的愁苦之气，都会破坏阴阳的和谐而导致灾害。因此他以为阴阳谐和是为相者首先要认真注意的。阴阳不和，灾害不息是自己作为丞相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是自己“奉职不修，不能光宣教化”的表现。他多次引录《易阴阳》及《明堂月令》来说明政事制度，提请皇帝和其左右治国者们的注意。

首先他引豫卦象辞：“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说明：“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即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变化是由于宇宙天地间的阴阳变化，而阴阳的变化可以由太阳的运行看出。一年中太阳在天空中运行，当其中天时达到其最高点（即最靠近天顶）时为夏至，而当中天达到其最低点（即最靠近地平）时为冬至。除此二至点外，其他时间太阳中天时的天空位置都在这两个至点之间。夏至点为阳气极至之时，冬至点为阴气极至之时。据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原则，这两个至点又是阴阳始生之点，即

<sup>①</sup> 《汉书·魏相传》。

夏至点为一阴生，冬至点为一阳生。二至点间的其他位置则阴阳互渗，形成各种阴阳比例的情况。由于阴阳的正常变化而形成了正常的八风秩序，也形成了正常的万物生长化育收藏的次第，一般正常的年份，这种次序是不会混乱的。他进一步以为这种以太阳运行为标志的正常秩序是由五帝掌管，所以说“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他摘引《淮南子·天文训》中的话说：“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此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当春季时，如果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来司理，那就必然树木庄稼不长；反之，当秋季时，如果东方之神太昊乘震卦执规来司理，那么正待收获的庄稼，也会过早地发芽开花。因而魏相认为：明智的帝王，总是尊天养人。立天文之官以掌握节令，让人民遵守节令行事，这样君王就能“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反之，如果君主不能遵守天道节令，就会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异不息。所以他说：“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又说：“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他建议宣帝：“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以上均引自《汉书·魏相传》）

魏相以五帝乘卦执度衡之器司掌四时，焦贛京房亦以六十四卦直日用事，皆以卦论时节风雨寒温之变。魏相之“奉顺阴阳”，主要在于日月是否光明，风雨是否符合时节，寒暑是否及时而且调和，这又与焦京以风雨寒温为候的论述若合符节。因此焦京之学或受魏氏之启迪，或对魏易有所承受。但可肯定，京房和焦贛的测候中蕴涵了魏相易学的主要内容。

## (二) 天文与风雨寒温

《汉书·天文志》说：“一曰月为风雨，日为寒温。”先说日为寒温。《周礼·地官司徒》说大司徒之职有：“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这就是立竿见影之法。按《汉书·天文志》说，夏至，日在井宿，此时太阳近北极，太阳在天空位置高，投影短；冬至日在斗宿，距北极远，太阳在天空位置低，故投影长。井宿为南方朱鸟之宿，故说日南；斗宿为北宫玄武之宿，故说日北。如果竿长八尺，即所谓“立八尺之表”，夏至时日影长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时日影长一丈三尺一寸四分。秋分时日躔东方角宿，春分时日躔西方娄宿，娄宿和角宿距北极居于井宿和斗宿距北极之中，其时日影为七尺三寸六分。<sup>①</sup>所以日影之长短，表示太阳远离或靠近北极的程度。按孟喜、焦贛、京房，包括魏相的考虑，如果太阳在各节气所测的影长是合适的，即如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值（这个值当是西汉首都长安的实测值，并为西汉时的标准值），那么气候的阴阳变化是和谐而正常的，这就会岁美人和，百事顺利；如果所测的日影长度不合适，即不与标准值相同，就会岁恶，人民不讲真话，政令不平。当然标准影长应是政府天文机构或专家测定的。由此进一步考虑，太阳为阳的表现，当太阳在天空中由南向北运行，实际在子午线上（即中天时）是太阳由低向高运行，这叫做“日进而北”，即由冬至到夏至阶段，这时天气逐日温暖，叫做阳胜，或为阳用事。反之，如果太阳在天空中由北向南，在子午线上（中

<sup>①</sup> 冬至和各节气之晷（日影）长不同，以冬至论，则周髀说长一丈三尺五寸，何承天说长一丈三尺。祖暅铜表长一丈三尺，这里取《汉书·天文志》之值。注意，其与所测地区的纬度有关。

天)是由高向低,就是“日退而南”,即由夏至到冬至阶段,这时天气逐日变寒,叫做阴胜,或为阴用事。故若太阳南北之运行失节就会产生阴阳失调的情况。就太阳之运行而言,它在黄道上每日行约一度,不会出现什么运行失节,自然也不会有阴阳失调。但是由于每年交节时刻之差异,可能出现正午日影长度的差别,于是焦京认为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即影长短于标准值,即“当至而不至”;影长长于标准值,即“不当至而至”。对于这两种情况各有占验。《汉书·天文志》说:“晷过而长为常寒,退而短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为寒暑。一曰晷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扶者,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晷就是日影,奢就是过分,如果日影过分长就是扶。这样就不仅是寒温,而且是表示水旱,更进一步表示人事。往往从冬至日的晷长可测一年的气候。《汉书·天文志》又说:“冬至日南极,晷长,南不极则温为害;夏至日北极,晷短,北不极则寒为害。”即从晷(日影)看,如果这年冬至日影不足标准长度,那么则来年多温害;日影过于标准长度,则来年多寒冷之灾。所以《尚书·洪范》说:“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易纬》列出了所有二十四个节气晷长的标准值,以及“当至不至”和“不当至而至”时的占验。这些很可能出自京房的整理。

再说月为风雨。西汉时代天文家对月亮在天空的运行,认为是“月有九行”,即月亮在天空运行在九条道上。这九道是:黄道,在黄道之北的是两条黑道,在黄道之南的为二赤道,在黄道之东者为二青道,在黄道之西者为二白道。《汉书·天文志》说:“月有九行者;立春、春分,月东从青道;立秋、秋分,西从白道;立冬、冬至,北从黑道;立夏、夏至,南从赤道。然用之,一决房中道。青赤出阳道,白黑出阴道。若月失节度而妄行,出阳道则旱风,出阴道则阴雨。”其说用之则主要观测月亮通过房宿的情况。房宿共四星,为现时所说天蝎座中的 $\pi$ 、 $\rho$ 、 $\delta$ 、 $\beta$ 四星。这四颗约略成一直线作南北向排列,垂直于黄道。黄道贯穿



其间。《星经》说：“房为四表，表三道，日月五星常道也。”<sup>①</sup>即说日月五星正常的视运动是要在房宿四星间通过的。《观象玩占》说得详细一点：“房又为四表，中间为天衢大道，亦谓之天关，黄道所经，日月五星之所行也。”房星在古代很重要，它有很多名称，如天驷，天府，天龙，明堂等等。《国语》曾载周景王问律于伶州鸠，伶州鸠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即是说武王伐纣时的天象为太阳在析木之次（当尾宿和箕宿），月亮在房宿。岁星（木星）在鹑火星次（当柳宿、星宿和张宿），北斗星的斗柄指在日月相会之处，当在玄枵星次，即在天鼋之域。又说：“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是说月亮在房星是农事吉祥之预兆。因而古代人们认为月在房宿为风雨调和的星象，象征着农业的丰盛和吉祥。因而说“一决房中道”。但具体的如何决定于房中道呢？由于房四星排列几乎成一直线，四颗星为“四表”，四颗星之间有三个间隔称为“三道”，亦称为南间、中间和北间。南间亦称为“阳环”或“阳间”，北间亦称为“阴间”或“阴环”。将房星称为天驷，亦称之为天马。于星占主车驾。这样房四星最南的一星（房宿一）叫“左驂”，次南一星（房宿二）称为“左服”，再往北一星（房宿三）称为“右服”，最北的房宿四星称为“右驂”。这个象形马的房宿名称可能更常用，如《唐开元占经》说：“房两服之间是中道。”即是说房宿二和房宿三之间称为“中道”，即“中间”。这样，当观测月亮行经房宿中道时，就是“辰马农祥”的吉祥预兆。《史记·天官书》说：“月行中道，安宁和平。”如果月亮运行经房宿时未行中道，靠北则行经阴间，靠南则行经阳间。如果行经阴间则多阴多雨；如果行经阳间，则多风多旱。但是月亮行经房宿时还会出现偏离整个房星的情况，或偏出房星之北，或偏出房星之南。偏北称为太阴，偏南称为太阳。太阴则大

① 《通占大象历星经》，[明]程荣辑《汉魏丛书》。

雨、多水等等；太阳则大旱大风。《史记·天官书》说：“月行阴间，多水，阴事。外北三尺，阴星。北三尺太阴，大水，兵。阳间，骄恣。阳星多暴狱。太阳，大旱丧也。”可见月亮运行经过房宿的情况不仅有风雨之兆，而且有人间事务的对应。古代著名天文家石申于其《星经》中说：“天道四表之间，三光之正路，人天之定位也。”<sup>①</sup>《汉书·天文志》则说：“月出房北，为雨为阴，为乱为兵；出房南，为旱为天丧。”

除了看月亮在房宿的运行情况外，天上还有几个星宿，当月亮行经时也与风雨有关。首先是东方七宿的箕宿。箕星又名风星，石申说：“月宿之必大风。”<sup>②</sup>箕有四星，其排列形状很像簸箕，故《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簸扬就是扬去米糠等，这自然需要风。因此从其形状而推认箕宿与风有关。《步天歌》说：“箕四星形状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粒是糠皮。”又箕宿位在东北，故称为东北之星。《尔雅·释天》云：“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一曰天市，主八风。”天汉即天河或银河，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间通过。箕在东方苍龙之尾，居东方木位；斗为北方玄武之首，居北方水位。故在东北也。《汉书·天文志》说：“箕星为风，东北之星也。东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注说：“东北阳，日月五星起于牵牛，故为天位。坤在西南，纽于阳，为地统，故为地事也。”这里说日月五星起于牵牛，是说冬至时，日躔牛宿（其实应是斗宿）。斗宿和牛宿都近东北，故说东北天位。

其次是轸宿，《汉书·天文志》说：“及《巽》在东南，为风；风，阳中之阴，大臣之象也，其星，轸也。”《史记·天官书》说：“轸为车，主风。”宋均注说：“轸与巽同位为风，车动行疾似之也。”因此轸宿之为风有二义，一是轸宿位于东南巽卦

① 引自《唐开元占经》。

② 引自《唐开元占经》。

之位，巽为风，因而轸亦为风；二是轸本像车，车动行疾如风，故轸为风。

对于箕星和轸星，《汉书·天文志》说：“月去中道，移而东北入箕，若东南入轸，则多风。”这是说月亮主风的两组星。这两组星与房宿有关，当月亮运行偏离房宿时，在房宿以南，即太阳或阳星时，就会“若东南入轸”，即会多风。若偏离在房宿以北，即“移而东北入箕”也会有风。所以之时别提出箕宿和轸宿，因为这两宿与风有关。

此外还有主雨的一组星，即属于西宫白虎的毕宿。毕宿由八颗星组成，还加上一颗附耳星。《诗经·小雅·大东》篇说：“有救天毕，载施之行。”《渐渐之石》篇说：“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毕就是毕宿，由于这八颗星排成的形状像古代弋猎用的长柄网，这种网古人称之为“毕”，这就是毕星的本象。所以《史记·天官书》说：“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即据毕星形似弋猎之网而言。《观象玩占》说毕星：“又主阴雨，天之雨师也。”但朱熹却以为，毕是漉鱼的叉网，漉鱼则其汁淋漓而下，若雨然。毕星的含义盖取于此。今毕星上有一柄，下开两叉形，亦类“毕”，故月宿之则雨。总之，毕宿位于西方，《汉书·天文志》说：“西方为雨。雨，少阴之位也。月去中道，偏北移而西入毕，则多雨。故《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传》曰：‘月入毕则将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阴盛也。《书》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言失中道而东西也。’”

### （三）卦气与风雨寒温

从天象论风雨寒温是鉴于月亮运行偏离中道而有风雨之征兆，太阳失晷度而有寒温之异常。这些对于焦贲、京房而言，自认为应该在卦象上有其适当的反映，这就是京氏卦气的着力所

在。不过这时京房不再只作简单的对应，而是考虑到太阳之失晷度或月亮之偏离中道如何可能在卦上反映出来。于是京房或者焦贛作了卦象与风雨寒温的关连。京房在《京氏易传》中就已说过：“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人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人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这里说八卦告人以吉凶，是本于气候的变化，即风雨寒温的变化，而气候的变化又本于天时，而天时之变化又以日月星辰的运行来显示。而卦象的变化虽只示人以阴阳的变化，也能告人以吉凶之兆，但却不是有形可见的。京房即努力在这有形和无形间建立起一种必然的联系。

在对卦象作过考察之后，京房说：“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即认为乾坤两卦是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基础。这在前面已有所阐述。《易纬·乾凿度》介绍了京房的这种思想，并有所发挥：

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阴阳，因而重之，故六画而成卦。三画已下为地，四画已上为天。物感以动，类相应也。

这里强调了乾坤卦象从无形中产生。京房认为从无人有和从有人

无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所以他追溯到宇宙的开端。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阶段的划分未必出于京氏，但是这四阶段设想了宇宙从无人有的演变过程却与京氏合拍。郑玄曾研究过京氏易，《后汉书·郑玄传》说他：“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郑玄注这一段《乾凿度》原文说：“太易之始，漠然无气可见者。太初者气寒温始生也。太始有兆始萌也。太素者质始形也。诸所为物，皆成苞裹，元未分别。”在注《乾坤凿度》中又说：“太易无也，太极有也，太易从无人有。圣人知太易有理未形，故曰太易。”就是说郑玄将上述四阶段划分为两大阶段，太易阶段和太极阶段。太易阶段漠然无气可见，故“太易无也”。太极阶段是太初，太始，太素三个阶段的总和，这三阶段已具气、形、质，但这时是“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的阶段，这浑沦的阶段就是太极。郑玄的这一注释是与京房的观点相一致的。

接着《乾凿度》解说如何从无人有。虽然“易无形畔”，但是却有变化，即“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而后又“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这里，形变之始的一与前面的“易变而为一”的一不同。形变为“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对此郑玄注说：“太易变而为一，谓变为太初也。一变而为七，谓变为太始也。七变而为九，谓变为太素也。乃复变为一，一变误耳，当为二，二变为六，六变为八，则与上七九意相协。”又说：“二言形之始。……易之变一也，太易之变。……乃复变而为二，亦谓变而为太初。二变为六，亦谓变而为太始也。六变为八，亦谓变而为太素也。九，阳数也，言气变之终。二，阴数也，言形变之始，则气与形相随此也。”郑玄将这个复变的一改为二，就与《易·系辞》所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规定相协。而据说圣人作此规定后说：“明天地之道，本此者也。”

从无人有到太极阶段，也要经过太初、太始、太素三个时

期，这就是形成天地和一切有形之物的过程，也就是“物有始，有壮，有究”。有了阴阳之分，有了天地之形，也就有乾坤的卦象。一七九为阳数，形成乾卦；二六八为阴数，形成坤卦。

无论是《乾凿度》的论述，还是郑玄所作的注，都是基于《京氏易》的原旨，也遵循了京易的基本方法。即坚持天地人三者在深层本质上的一致。这里更为明确地说出卦的产生是与天地形成相联系的。再具体一点，即使是气的寒温也是在气形成时就自然具有。即应是在太初阶段气始生时就有了气的寒温。只是《乾凿度》乃至郑玄注都没有更进一步说到风雨。然而风雨寒温均为气候状态，指出了寒温也就说明了风雨。当然这只是从本质而论。就焦贛和京房而言，日主寒温和月主风雨者还是显然有差别的。日为阳，是从易变一到九的变化阶段就形成的；月为阴，则是形变从二到八的变化阶段才形成的。似乎相对于寒温，风雨更为有形。从基本卦象上说，离为日，坎为月，《京氏易传》说：“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所以日为寒温与月为风雨代表着阴阳的基本表现。这正是京氏《易》学的基本观点。

#### （四）八卦卦气之应

第一章中，在叙述京房离开京都后，在赴魏郡太守上任的路上，不断地向汉元帝上封事，具体地介绍了京房以风雨寒温入占的一些例子。京房从消息卦（即辟卦）和杂卦（非消息卦）的关系，解说气候的变异情况，并以此讲灾变，占测吉凶祸福。这里则要就有关的材料，对如何从八卦卦气相应与否入占作稍微有系统的说明，以便稍稍窥其全豹。

《易纬·通卦验》叙述了八卦方位与阴阳的关系。首先说：“冬至之日，立八神，树八尺之表。日中规，其晷之如度者，则岁美，人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其岁恶，人民为讹言，政令为

之不平。”又说：“晷不如度数，则阴阳不和，举措不得。发号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时，则晷为之进退，风雨寒暑为之不时。”晷就是日影，前已说明二十四节气日影长度有一定标准，如果实测日影长度与这标准长度有偏离，就叫不如度。日影长度较标准长度为长，即晷进，称之为赢；晷退为缩。如果晷如度数，“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据此《通卦验》将八卦引进来，说：“夫卦之效也，皆指时。卦当应他卦炁，及至其灾，各以其冲应之。此天所以示告于人者也。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炁出直。乾此正炁也。炁出右，万物半死，炁出左，万物伤。”郑玄注说：“立冬之左，霜降之地；右，小雪之地。霜降物未遍收，故其灾物半死；小雪则杀物矣，故其灾为伤。”《通卦验》还说：“乾炁不至，则立夏有寒，伤禾稼，万物多死，人民疾疫，应在其冲。”本节开头述说的魏相易学中说到魏相以为“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正与此意相同。但魏相只言四时，而这里将四时引申为八节。郑玄注更扩展到二十四节气。在魏相只言其应在冲，即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等等，而这里则言卦炁稍有前后偏差，就会有“他卦炁”之应，但是若发生到有灾，则以其冲位应之。所以郑玄注云：“卦炁进则先时，谓见其时之前，乾炁见于冬至之分是也。退则后时，谓见于其时之后也。”又注云：“冬至之分，大雪小寒之地，分属于坎，乾炁见为四阳相得，故为火盛。当藏者，蛰虫冬行。阳生出之夏，夏至即灾行矣。”乾卦主立冬，若乾卦卦炁进，则乾炁见于冬至之分。冬至由坎卦主之，于是乾炁见于坎卦之地。坎卦见乾炁为四阳相得，因为坎卦本身只有一阳爻，而乾卦三爻皆阳，故曰四阳相得。阳为火，故火盛。冬季火盛为温，蛰虫不蛰而出。阳亢而发展到夏季时，即有灾害出。以上是说乾炁进。若乾炁退，则万物伤，此谓乾炁见于秋分之分。《通卦验》对所有八卦的这种炁进炁退情况都作了介绍。郑注说

乾炁进，则为小雪（立冬前之一气），乃至小寒（冬至前之一气）之地，小雪仍在乾地，而小寒属坎地。

“坎，北方也，主冬至。夜半黑炁出直，坎此正炁也。炁出右，天下旱，炁出左，涌水出。”郑注说：“冬至右小雪之地（张惠言说小当作大，即谓冬至右为大雪之地），大小雪二炁方凝，其下难，故旱。小雪（张惠言说雪当为寒）水方盛，水行而出，涌之象也。”《通卦验》又说：“坎炁不至，则夏至大寒雨雪，涌泉出，岁多大水，应在其冲。坎炁见立春之分，则水炁乘出。坎为沟渎。于是岁，多水灾，江河决，山水涌出”。郑注云：“亦寒不见，对受其灾。立春之分，大寒惊蛰之地，分属于艮（大寒实应属坎地），坎炁见焉。是谓水炁乘出。故岁多水灾，江河决，沟渎坏也。”对于坎炁退，《通卦验》还说：“坎炁退则天下旱”，郑注云：“谓见于立冬之分，霜降小雪，乾又为冰，皆凝雨难下之象。”

对于艮卦，《通卦验》说：“艮，东北也，主立春，鸡鸣黄气出直。艮此正炁也。炁出右，万物霜；炁出左，山崩，涌水出。艮炁不至，则立秋山陵多崩，万物华实不成，五谷不入，应在其冲。艮炁见于春分之分，则万物不成。艮为山为止，不止则炁过山崩。艮炁退，则数有云雾霜。”

对于震卦，则说：“震东方也，主春分，日出青炁出直。震此正炁也。炁出右，万物半死；炁出左，蛟龙出。震炁不至，则岁中少雷，万物不实，人民疾热，应在其冲。震炁见立夏之分，雷炁盛，万物蒙而死不实，龙蛇数见，不云而雷，冬至乃止。震炁退，岁中少雷，万物不茂。”

对于巽卦，则说：“巽东南也，主立夏，食时青炁出直，巽此正炁也。炁出右，风樵木；炁出左，万物伤，人民疾湿。巽炁不至，则岁中多大风，发屋扬砂，禾稼尽，应在其冲。巽炁见夏至之分，则风炁过，折木。巽炁退，则数有云雾霜。”

对于离卦，则说：“离南方也，主夏至，日中赤炁出直，离



此正炁也。炁出右，万物半死；炁出左，赤地千里。离炁不至则无日光，五谷不荣，人民病目痛，冬无冰，应在其冲。离炁见于立秋之分，兵起。离炁退，则其岁日无光，阴必害之。”

对于坤卦，则说：“坤西南也，主立秋，晡时黄炁出直，坤此正炁也。炁出右，万物半死；炁出左，地动。坤炁不至，则万物不茂，地数震，牛羊多死，应在其冲。坤炁见于秋分之分，则其岁地动摇，江河水乍存乍亡。坤炁退，则地分裂，水泉不泯。”

对于兑卦，则说：“兑西方也，主秋分日，入酉白炁出直，兑此正炁也。炁出右，万物不生；炁出左，则虎害人。兑炁不至，则岁中多霜，草木枯落，人民疥瘙，应在其冲。兑炁见于立冬之分，则万物不成，虎狼为灾，在泽中。兑炁退，则泽枯，万物不成。”

以上八卦炁应是《通卦验》整理的系统，未见得是京房八卦气应的本来面目。《通卦验》的主题是通释卦气的占验，即认为万物甚至万事都与卦气有关。明代讖纬学者孙穀在《古微书》中说：“阴阳律历皆祖于《易》，气也者，物之先者也。故物无以验，则验之气。气无以验，则验之风，而其朕其几，集动于卦。此王者所以体天元而圣人所以法天行，必谨于卦气也。”这正是京房卦气思想的一种注解。京氏风雨寒温的占测，正是基于这个卦气气应说的基础之上。因而将《通卦验》的八卦炁应全部抄录于上。京房的卦气气应说，是想以他的八宫卦推演阴阳消息，他将阴阳消息散播于四时八节，观四时八节天地万物之情状得阴阳消息的变化。无论是魏相易学的四时气应，《通卦验》说的八卦气应，或是郑玄的二十四节气的气应都是本于京房的这一思想。京房作八宫卦时已然论述八宫阴阳的气应，但他没有能说得既简明又清楚，因为他觉得没有触及本质。他之外出求学，至少这是一个原因，即他想求得八卦气应更为本质的解释。后来他追随焦贛学习时，碰到了孟喜的卦气说。孟喜的十二消息卦，六日七分和系统的卦气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此进一步发展了他的

八宫卦气气应的学说。因此京房从卦气气应说来考察天地人三界的  
关系，是受孟喜卦气说的启发。他在以风雨寒温为占时，将消  
息卦（辟卦）与非消息卦（杂卦）对立起来，也是在孟喜卦气说  
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以各卦值日用事，也是以孟喜的六日七分法  
为基础。可能只有以风雨寒温为候的那一部分，是得自焦贲的传  
授及他自己的研究。京房的八卦气应虽然是建基于他的八宫卦的  
思想，但显然得到《魏相易学》和孟氏卦气的强烈启发，以及对  
他们论述中的许多内容，作了直接的借鉴。所以京房在师事焦贲  
学习时，表现出他的基础深厚和敏于接受名家的学说。

由于本段主要引了《易纬·通卦验》来表明京房的八卦气应说  
的内容。因此要稍微说明一下京氏易与《通卦验》的关系，其实不  
只是《通卦验》，还有下一段阐述以风雨寒温为候时引用的《易纬·  
稽览图》，还有《易纬》中最重要的《乾凿度》等与京易的关系都要  
作一说明。在下一节论述《易纬》与《京氏易》的关系时，将要稍  
微详细一些作这方面的叙述。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以说明引用  
《易纬》来阐明京氏易学之有据。《易纬》在西汉末和东汉时流行起  
来，而孟京易学在这之前，即已被认为是官方经学之一种。因而京  
易不可能得自纬书。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使得后来逐渐活跃起来的方士们，想方设法依附儒术以求得发展，  
因而有了谶纬的流行。谶和纬是两回事。谶是神的预言，谶书是一  
种预示未来的寓言之书；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比附于经，对经  
作出某种解释。由于方士们是鼓吹神仙说的，他们依附儒术就是大  
量抄袭儒者之说，附以谶言，这就是纬书的主体内容。由于孟京论  
卦气，将阴阳五行与《周易》结合起来，而京房更将干支五行引入  
卦气。这更加使方士们感兴趣。因为这使他们本来神秘无稽的谶言  
有了很好的寄托。这样，使得《易纬》中保留了某些孟京卦气说的  
当年的素材。当然《易纬》或其他《纬书》也已不是全篇，更非纯  
然本来面目。要从这些残篇断集中建构出京房著述当年的原貌，其  
困难自可想见。

### (五) 风雨寒温入占

京房本传中还有他以风雨寒温进行占测的事例，将这些占例与主要讲述卦气的《稽览图》所说联系起来，大抵可以推出京房以风雨寒温与卦爻间的关系进行占测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稽览图》讲卦气，以《易》之卦爻与历法结合，进行节候占测，亦正是京氏卦气的核心内容。不过其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却与京易卦气有根本区别。

从一年四季而言，春季则正月辟卦为泰卦，二月辟卦为大壮卦，三月辟卦为夬卦。这春季三卦之三爻皆为刚爻，其上爻皆为柔爻。故皆为九三上六之卦。夏季三个月的辟卦是：四月乾卦，五月姤卦，六月遯卦。这三卦三爻均为刚爻，上爻也均为刚爻，故皆为九三上九之卦。秋季三个月的辟卦是：七月否卦，八月观卦，九月剥卦。这三卦三位是柔爻，上位是刚爻，故均是六三上九之卦。冬季三个月的辟卦是：十月坤卦，十一月复卦，十二月临卦。这三卦三位与上位皆是柔爻，故均为六三上六之卦。这样区分之后，还要进一步对十二辟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叫太阴卦，一部分叫太阳卦。《易纬·稽览图》郑注说：“太阴谓消也，从否卦至临卦为太阴。”“太阳谓息也，从泰卦至遯为太阳。”故十二辟卦亦称十二消息卦。其三爻决定该卦之寒温，刚爻为温，柔爻为寒；其上爻决定该卦寒温之微或决，刚爻为微，柔爻为决。郑玄注认为：“九三上六决温，九三上九微温，六三上九决寒，六三上六微寒。”于是“决”的意思是寒或温明显地上升，而“微”的意思是寒或温未来的趋向。如春三月辟卦皆九三上六，当为决温，因为三位刚爻决定其为“温”，上位柔爻决定其为“决”。决温是指春季，从正月至三月气温明显地上升。而夏季的三个月辟卦皆九三上九，当为微温。所谓微温是指其气温上升趋势减缓，气温将逐渐下降。秋三月辟卦皆六三上九决寒之

象，盖秋季寒气正处上升之趋势，即明显地日益变寒。冬三月为六三上六微寒之卦象，此际寒气上升之势渐尽而趋于转温。这里郑注的太阴和太阳之卦与孟喜消息卦的太阴太阳卦略有不同。孟喜十二消息卦本义，复卦为一阳生，临卦为二阳生等等，至乾卦六阳爻俱全，于是复卦、临卦、泰卦、大壮卦、夬卦和乾卦六卦为太阳卦；姤卦一阴生，遯卦二阴生等等，至坤卦六阴爻满足，则姤卦、遯卦、否卦、观卦、剥卦和坤卦六卦为太阴卦。这里郑玄注谓春三月辟卦和夏三月辟卦为太阳卦，即泰、大壮、夬、乾、姤、遯六卦为太阳卦，而秋三月和冬三月辟卦为太阴卦，即否、观、剥、坤、复、临六卦为太阴卦。这个不同反映了焦贛或是京房对“以风雨寒温为候”作的相应的调整，目的是与历法和实际的气候能同步起来。

《稽览图》还说：“唯消息及四时，各当尽其日”，郑玄注说：“寒温之气，消息尽六日七分，四时七十三分也。”这里的四时卦，即四正卦坎离震兑。一个消息卦当六日七分，一个四时卦则当一日之七十三分，即 $\frac{73}{80}$ 分。这正是京房的说法。所谓“卦当尽其日”，是说寒温之候，对辟卦（消息卦）而言，要尽其一卦之日才算见效。即对消息卦而言，则要尽六日七分；对四时卦而言，则要尽七十三分。对于非消息卦且非四时卦而言，则只要一时辰或谓一日之效即可。《稽览图》说：“非太平而杂卦，以其度效一辰则可矣。”郑玄注说：“六日七分中，一辰效则可也。”这是指以寒温为占而言。

上面只讲了将卦分为寒温，尚未涉及风雨。即只讲了太阳与卦的联系，还未讲到月亮与卦的联系。但在名词上，《稽览图》用了另一些词汇。它用“形体”来叙述。所谓形，是指“可得而见”者。形分为两类，即白浊和清静，即指以风雨为代表的气候情况。与形对应的体就是指寒温，所以说寒温为实，即为体，而清静白浊为形。以风雨寒温为候，在此即说为要以形体相应为

占。形体相应和不相应是占测的标准。《稽览图》说：“凡形体不相应，皆有其事而不成也。其在位者，有德而不行也。”郑玄注说：“形谓白浊、清净，可得见。故言形体者，以身体寒浊（张惠言谓浊当为温）也。不相应者，温不清净，寒不白浊也。”意思就是：温而清净，寒而白浊谓之形体相应；温而白浊或寒而清净即形体不相应。形体相应就是正常情况，形体不相应就是反常情况，就会有事而不成，也表明在位之帝王，不行正当之道。因此寒温清浊，即卦气之形体。

形也称之为“貌”，体则亦称之为“实”。看人要貌实相当。《稽览图》说：“有貌无实，有实无貌，故言从其类也。上为貌也，寒温为实。”郑玄注说：“白浊清净效，寒温不效，此佞人之类也。寒温效，白浊清净不效，此贤者之类，屈道仕也。白浊清净，其上貌；寒温者是为实。”从形貌体实而言，寒温为实为体，白浊清净为貌为形。有貌无实为佞人，有实无貌虽为贤人，但为屈道人。

对于实或体的寒温而言，《稽览图》说：“温为尊，寒为卑。”郑玄注说：“温喻君，寒喻臣。君当施生，臣当奉命，尊卑等也。”由尊卑而又论及寒温。《稽览图》说：“尊见卑，益自尊；卑见尊，益自卑，则寒温决绝矣。”郑注说：“九三应上六，六三应上九，则寒温决绝可知。”即说明何以三爻与上爻阴阳不同为“决”的原因。即若九三为尊，则上六为卑，尊见卑则更显自尊；六三为卑，见上九之尊，更见自卑。于是寒温之“实”明显增升。如果不是尊见卑或其相反卑见尊，而是“两尊两卑无所别”，即六三应上六，或九三应上九，“则寒温微，不决绝”。即尊见尊或卑见卑。尊见尊并不更显尊，卑见卑亦不更自卑，因而寒温变化不明显，故寒温微，不“决”绝。即是说尊卑必显，若尊卑不显则表明深层的阴阳不相应。《稽览图》说：“阴阳升，所谓应者。地上有阴而天上有阳曰应，俱阴曰罔。”即所谓阴阳相应，必有寒温增升，或谓寒温“决”。“地上有阴而天上有阳”即是六

三应上九，六三为寒，上九为决，这时称为阴阳相应。而“俱阴”是指六三与上六，两阴无相见之意，而尊卑不显，寒只有微变或不变，故无应。故俱阴曰罔。郑注说这种无应为“天郁然而罔”，即寒微而不决绝之意。《稽览图》又说：“地上有阳而天上有阴曰应，俱阳曰罔。”这说的是九三与上六之阴阳相应，则当清静而温，温候明显而决。俱阳谓九三与上九，即两阳无相见之意，此亦叫“罔”。郑注还说：“罔故为亡也。”即言温候逐渐停止上升而趋寒，温候逐渐消去。

若再论及风雨，则其以卦气论风雨寒温而后以人事明之的一套占法，就更趋复杂。按《易纬·稽览图》说：“降阳为风，降阴为雨。”郑玄注关于降阳为风说：“上九用事，卦效后一百二十日，降为卒风。其不效也，后九十一日降为灾风。”意思似说，若卦效则一百二十日起卒风，是为正常的风，若卦不效，则其后九十一日降为灾风。是谓恶气不得上天中，故九十一日为灾风。对降阴为雨说：“上六用事，卦效后一百二十日降阴为雨。”（张惠言说还有“其不效，亦后九十一日降为灾雨也”）

对于风雨，还有“阳还”和“阴还”的概念。《稽览图》说：“升气上，降气微。是故阳还，其风必暴；阴还，其雨亦暴。”据郑玄注说：“君弱臣强，不得以时升降。升气喻君，降气喻臣也。”气分阴阳，阳升阴降。即阳气有上升的本性，阴气有下降的本性，故而上升之阳气为君，下降的阴气为臣。阴阳升降，君令臣行才有正常气应或正常的秩序。所以当升气上而降气微时，而至阳气上积，而产生“阳还”。故郑玄注说：“还，暴也。君弱臣强，还而不行，阳气道积，不以时降。后得同类并下，故暴也，故曰令还也。”当阴阳不和或阴阳不得相应之时，阳气在上不断累积，对应于君道在上而不能施行，君王的命令不能被臣下执行。君道或君令之不得行，是因为强臣之阻挠，即阴阳不交，或说阳气不以时降，这就是君弱臣强。这样积累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暴发。阳为风，故有暴风。所以郑注又说：“君弱臣强，

君令不得行，降气积后，一百三十日内（张惠言说是消息四卦），阳得同类并下，故薄。故必暴也。”“阳还”暴风之应必历一百三十日或许是卦应有变，如自乾卦说，历四卦至观卦，则原来九三上九微温，变为六三上九决寒等等；也许是气变要历经一定的时日，阳气积要历四个月以上等等。但是并非一定是阳积四月余之后必有暴风，还要有一个条件才行。这个条件就是：“阳得同类并下。”

对于阴还，郑玄注说：“臣强君弱，君泽不得行，降气道积后，一百三十日内，得同类并下，故薄也。一曰升降气为阴阳，卦升于九三六三，寒温过，暴疾起时，降气而上也。”阳还为君弱臣强，阴还为臣强君弱，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阳衰而相对阴盛，后者是阴盛而阳相对为衰。两者虽皆为相对阴盛，但其形式表现却不同。阳衰表现为阳还，阴盛表现为阴还。

关于风雨，《易纬·通卦验》进一步从卦气的气应方面来作说明。它说：“游气蔽天，日月失色，皆是知风雨之候也。”又说：“天气下降，地气未升，厚则日紫，薄则日赤，于夜则月白，此皆阴少而雨多之象。天气未降，地气上升，厚则日黄，薄则日白，于夜则月青，将旱且风，亦为日月晕之候，雨少而阴多之象。天气已降，地气又升，上下未交，日青色，于夜则月绿，将寒之候。天地气虽交而未密，则日黑，于夜则月青。将雨不雨，变雾雾晕，皆虹蜺之属。”这意味着《稽览图》所述的风雨寒温的变化与天地之气的升降有本质的关联，而天地之气的升降，又可从日月之变色加以推测。《京氏易学》和京氏星占正是希图从实际可观测到的天象或其他自然现象通过卦气的机制来探求深层的宇宙天地机制。焦贛传授给京房的是“以风雨寒温为候，而后以人事明之”的占测体系，京房发展为将一切自然现象都纳入到他的卦气机制系统，风雨寒温之候与日月之色，与天气之升降乃至卦象和人事。京房大大发展了孟氏卦气，也大大发展了焦贛的风雨寒温的测候之术。他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探测他的八宫卦体

系和他后来发展的卦气系统对宇宙天地机制的解释能力，也试图将他的八宫卦和卦气作深入一步的联系。

京房的卦气学说涉及更广泛的内容，这在以后的章节中会看到一个大概。这是由于京房的著述大部分已经佚失，难以作具体的深究。虽然如此，仍可看出京氏发展了的卦气说在历史上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影响。



### 三 京房卦气说的补充

京房的卦气说是继承孟喜《易》家候阴阳灾变术，焦贲的以风雨寒温为候占测之术。因此京房的卦气说应是以占测为主的一种占术。人们也都以为京房的卦气说应是一种占测之学。但是前一节我们论述了京房的卦气说已经涉及更为广阔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已经发展为一种学说。虽然它与占测有关，但它却大大超出占测的思考和占测的范围。在京房卦气说建立和传播之后，曾引起很大影响。从一些史料上看，它之所以引起很大影响，并非由于它有什么神奇准确的占验效果，而在于它的一种新颖的思想，和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尚称严密的设计。

西汉元帝立《京氏易》，京易立即传播很快，原来有名的施孟梁丘之学相比之下就黯然失色，成为当时非常时髦的学问。京房被处死后，可能将京易取消过一段时间。所谓取消是将京房的易学博士地位取消，可是为时甚短。但可能在这一短时期内，京氏的著述和整理的资料遭受了损失。东汉光武帝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在东汉时期，《京氏易》是官方《易》学。后代亦视《京氏易》为汉易的代表。

从以下的名单中可以看出京易在当时的盛况。京房死后不久，京易就流传开来。西汉时最大的京易学者是谷永。京房死于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 37 年），经过七年，在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 30 年），谷永就由阳城侯刘庆忌推举进入朝廷，并经大将王凤的推荐，擢为光禄大夫。《汉书·谷永传》说：“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还有扬雄，创作了巨著《太玄》，《太玄》无论在原理上或建构上都受京房的启发或影响。扬雄也是在成帝时进入朝廷，在哀帝时创作他的《太玄》，距京房亦不甚远。

东汉时代明习京氏易的就更多。其著名者如前已说及的郑

玄，他虽师承马融，但亦曾从第五元先习京氏易，并以京易本旨注《易纬》。另一著名的学者崔瑗，他是张衡和马融的密友，《后汉书》本传说他：“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再一个著名学者叫杨秉，是东汉著名大儒，太尉杨震的儿子，《后汉书》本传上说他：“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还有郎宗、郎顗父子。郎宗“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后做了吴（今苏州市）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而表上，以博士征之。宗耻以占验见知，闻征书到，夜悬印绶于县廷而遁去，遂终身不仕”。（《后汉书·郎顗传》）郎顗少传父业，兼明经典。他似乎认真钻研过京房的某些著述。观其奏章、条对、言论中常引《易内传》、《易中孚传》、《易传》等，皆为京房言论，可能史书上记载据京房易言灾异者，郎顗最为完整且系统。除了这些著名的学者外，还有不少虽不那么著名但亦甚有根基的学者都与《京氏易》有联系，如光武大帝之子沛献王辅，《后汉书》本传上说他：“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后汉书·儒林传》中还报导戴凭、魏满、孙期等皆习《京氏易》。方术中有谢夷吾，会稽山阴人，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太守第五伦擢为督邮。后第五伦任司徒，令班固为文荐谢夷吾，说他：“阐弘道奥，同史苏、京房之伦。”（《后汉书·方术列传》）。折象亦能通《京氏易》。樊英是少受《京氏易》，兼明《五经》，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著《易章句》，世称樊氏学，以图纬教授。樊英的学生陈寔、郤巡也都传樊英之学。唐檀是当时著名的星占家，他在汉顺帝永建五年举孝廉，除郎中。对当时发生的“白虹贯日”天象，曾上便宜三事言其咎征。对虹霓占测是京房星占的特色，这与他习《京氏易》有关。《后汉书·方术传》说他：“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

又《后汉书》刘昭注引《谢承后汉书》说：“刘宽少学京氏易”，又《徐穉传》说：“少为诸生，学《京氏易》。”刘昭注引《续汉书》，度尚通《京氏易》。东汉一代是《京氏易》弘盛时期，习《京氏易》者众多，载不胜录。

《京氏易》在东汉后期逐渐衰落，那时古文经学兴起，《费氏易》转盛。属于今文经学的其他诸家易湮没了，但《京氏易》仍有传习。至晋代，《晋书·儒林传》说：“董景道明《京氏易》，精究大义。”《晋书·隐逸·郭琦传》说：“郭琦注《谷梁》、《京氏易》百卷。”《晋书·艺术·吕产传》说吕产“少传《京氏易》，善图讖、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直到东晋还有《干氏易》，即干宝《易》学，仍为京易的后劲。在这些众多的治京易者的论述中，保留了一些可能是《京氏易》的原来内容。本节对此稍作考察，以求对《京氏易》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 （一）谷永与《京氏易》

大概由于京房之被杀，一方面是京房著述和待整理材料的严重损失；另一方面则是学术界对京易采取否定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京氏易》的卦气部分实际上是继承了孟氏易的。但孟喜的入门弟子们不肯承认京房继承了孟氏易。刘向校书，考《易》说，更进一步认为孟喜易只是田何的正传，而不及候阴阳灾变，即根本上否定了孟喜曾言卦气或《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事。他不仅否定京房与孟易相干，而且说“房以明灾异得幸”。似乎在刘向看来，京房根本不能列入《易》家的行列，他只不过是明灾异得幸者。大概“以明灾异得幸”是一种贬词，所以东汉郎宗“耻以占验见知”。

大概谷永最早应用京易来论述灾异以及政治和社会。谷永似乎对《京氏易》特别有兴趣，《汉书·谷永传》说：“永于经书，

泛为疏达。……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他在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任北地太守，当时正值灾异频仍。汉成帝派卫尉淳于长至其任所征求他对这些频发灾异的占验。谷永回答说：“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sup>①</sup>，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踰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逃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著尤，上天震怒，灾异娄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涌出，妖孽并见，彗星耀光，饥谨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妖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予宅。’”谷永在这里提出天道不私一姓，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姓一家之天下。如果得天下者躬行道德，博爱仁恕，顺着天意去做，自己不奢侈纵欲，对人民施恩少取，使人民和睦相处，那么卦气理效，事物生长符合时令节气，百姓寿考，生物蕃昌，符瑞并降。这就得到天的保佑。如果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沉湎于酒色，诛逐忠良，使小人用事，严刑峻法，百姓愁怨，那么卦气悖乱，出现凶兆，上天震怒，屡降灾异，则会百姓饥谨，万物夭伤。如果再不改悟，上天就不再谴告，而会另外让有德者来治理天下。并引《诗经·大雅·皇矣》之篇，说天以殷纣王为恶而不知悔改，于是眷顾西方的有德者周文王，使其领有天下。谷永的这一段话实际上强调了一种“革命”的思想，这里“革命”是革去现任天子所受的“天命”，使新的有德者来受“天

---

<sup>①</sup> 《汉书》本传注，师古曰“《诗·大雅·行苇》之篇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虽草木至贱，无所残伤。”意即恩惠施及草木至贱之物。

命”。因此卦气合理而见效与否，与“受天命”有了联系。那么谷永所说的这种“革命”思想是纯然他自己的观点，还是与《京氏易》有关呢？

著名现代历史学家蒙文通曾撰《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sup>①</sup>，文中说：“京房作易传，曰：‘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不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知京易亦主受命之说。”他在此文中又说：“干宝传京氏易，而与‘三基’、‘六情’之说相应，是齐诗京易同法。”蒙文中所引《京房易传》的这段话当是引自《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许芝条，魏代汉，见讖纬于魏王，引京房作《易传》云云。即说明《京氏易》本有“革命”的思想，谷永籍成帝询问灾异而发挥之。此处蒙文通先生说“齐诗与京易同法”，而齐诗的主要传人在汉代是与京房同时的翼奉。而“三基”和“六情”正是翼奉所传齐诗之根本。既然京易与齐诗同法，故应对齐诗，主要是翼奉所传之齐诗稍作考察。

《汉书·翼奉传》载翼奉奏封事云：“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示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以欲了解齐诗如何“考天心，推得失”，必须了解其所说的“诗之五际”。《汉书·翼奉传》注引孟康之说：“《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后汉书·郎顗传》引《诗纬·汜历枢》之说：“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

<sup>①</sup> 《志林》第二期，四川三台国立东北大学，1940年。

亡。”宋均对此作注说：“神，阳气，君象也。天门，戌亥之间，乾所据者。”所以《诗》之五际当是：亥为革命一际，戌亥之间为天门二际，卯为阴阳交际三际，午为阳谢阴兴四际，酉为阴盛阳微五际。《诗·汜历枢》又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政，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又说：“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故王命一节为十岁也。”又说：“阳生酉仲，阴生午仲。”《后汉书·郎顗传》言诗三基，但称：“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sup>①</sup>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臣以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从郎顗这次上封事之年为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癸酉，往回推至延光三年（124年）甲子，应为戌仲之始，即郎顗所说之“今在戌仲十年”。癸酉年以后为甲戌年，辰戌为季，故郎顗讲“戌仲已竟，来年入季”。由此可再往上推，一直推到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其具体推之如下：

延光三年（124年）甲子为戌仲之始，由此上推十年为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甲寅，当为酉孟之始。再往上推十年至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甲辰为酉季之始。再往上推十年至和帝永元六年（94年）甲午又为仲始，这时应是酉仲。因而元初元年甲寅当为酉孟之始，和帝永元十六年甲辰为酉季之始。由此可知每隔三十年为一仲。以后往上推，即可以三十年一步。如前往上推三十年为永平七年（64年）甲子，入申仲。又前三十年为建武十年（34年）甲午，入未仲。又前三十年为元始四年（4年）甲子，入午仲。又前三十年为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甲午，入巳仲。又前三十年为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甲子，入

<sup>①</sup> 汉高祖元年为公元前206年，郎顗上封事为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故说汉兴以来339年。

辰仲。又前三十年为后元二年（公元前 87 年）甲午，入卯仲。又前三十年为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甲子，入寅仲。又前三十年为景帝中三年（公元前 147 年）甲午，入丑仲。又前三十年为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甲子，入子仲。又前三十年为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甲午，入亥仲。由此可知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 206 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由以上之推求可知，“三基”之法者即每三十年历一仲（或历一季或历一孟）。凡甲子、甲午为旬首者谓之仲，甲戌、甲辰为旬首者为季，甲申、甲寅为旬首者谓孟。每隔十年一移，由仲而季而孟，复又为仲，故谓之“三基”。由以上之推求，亦可证郎颢之说有据。

干宝《周易注》对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注云：“阴在上六，十月之时也。爻终于酉，而卦成于乾，乾体纯刚，不堪阴盛，故曰龙战。戌亥乾之都也，故称龙焉。阴德过度，以逼乾战。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维，而气溢酉戌之间，故曰于野。未离阴类，故曰血。阴阳色杂，故曰元黄。言阴阳离则异气，合则同功，君臣夫妻，其义一也。故文王之忠于殷，抑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盖欲弥缝其阙而匡救其恶，以祈殷命，以济生民也。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干宝的这个注，足以明京易之义，也正是“大明在亥”之事。按《诗·大雅·文王之什》大明首章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其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燹伐大商。”是说威严显赫的天帝，明白地监察下土。天命难以有常，作国王可真不容易。上帝使殷纣做了王，但使他不能拥有四方。由于纣王无道，上天命文王，使莘国国君的长女嫁到文王所在的周国京城，生了周武王，天命周武王征伐殷商。蒙文通以为“齐氏京易之秘”正在于说天命有变，要革去现时受天命的帝王，改立另外的贤者为王。即京易和齐诗对于政治的见解，贯穿了“革命”的思

想。

蒙文通先生揭示谷永继承了京氏易中的政治方面。即是谷永阐述的“革命”的政治观点，是本着京易的基本思想。这是很深刻的见解。由此可以推想，京房的被弃市，固然由于石显等人的谗害，也可能其所持的“革命”政治思想，也引起皇家的疑忌。《京氏易》的丢失，固然因历史悠久而散乱殆尽，但也由于持其“革命”之说，而难见容于当世之君主。京氏之学现在所能见者，无论是较为集中的著述，如《京氏易传》，或是其分散的论述，诸如《汉书·五行志》，星占、风角之属，似乎其主体内容是阐述具体的占测，间或说到一些占测原理。不仅无有涉及政治者，甚至与人事有关的占测机理都不涉及。从现在所见有关京房的材料中，京房似乎连《易》章句都没有作注，尽管孙堂等纂辑过京房周易章句，但只是零碎的片断，有些地方甚至难以句读，好像是零碎的字集。由于这样，京房有许多可能重要的著述遗失，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使得京房学者的形象受到了怀疑。有许多人就怀疑他到底属于儒生还是归于方士之列。

## （二）《易纬》与《京氏易》

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盛行于东汉时期，在其盛行时期曾形成一股社会思潮。上一节已经约略说过谶纬的性质，它是一种神学迷信的占验系统。但纬书依傍经学，因而其中抄袭有不少儒者的著述。京房所治之学是探索天人之际，又是自古以来就以占筮为目的的《易》学，因而就更多地被纬书抄引，为其“诡为引语，预决吉凶”效力。因而纬书，特别是《易纬》中，保留了许多京房易学中的素材。上一节大量引用了《通卦验》和《稽览图》，还有前一章引用过《乾凿度》，所引素材都与孟京易学有关。

谶纬之学的发展与盛兴正值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和东汉王朝



建立这一政治动荡的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都想利用谶纬中的那些神秘莫测的语言和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谋求王权。后汉光武帝刘秀的兴起，就是利用了谶语。他利用李通的谶语：“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从河南南阳起兵。后来他又以《赤伏符》即皇帝位。《赤伏符》是一种图谶，是他在长安时的同舍生强华由关中送到鄯（今河北省柏乡县），奉劝他登皇帝位。《赤伏符》中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于是他就在鄯南千秋亭五成陌设了坛场，燔燎告天，即皇帝位。他在即皇帝位的祝文中还要引谶言说：“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sup>①</sup>刘秀通过图谶论证自己的皇帝位置是命定的。但当时还有一个公孙述，王莽时任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王莽灭亡后他自立为蜀王，后来又自立为天子，国号成。他既自立为天子，也要有图谶的根据。如他引谶记之说，“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一姓不能再受命，即是刘姓不能再当皇帝，所以刘秀虽以《赤伏符》受命，未见得其君位就成立。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说“西方太守而乙卯绝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以上均引自《后汉书·公孙述传》）公孙述据此大力向中原地区展开宣传，使得汉光武帝刘秀很为不安。于是写信给公孙述，说“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自己还署名为“公孙皇帝”。他说《西狩获麟谶》上说的“乙子卯金”，是汉高帝乙未年受命；“光废昌帝，立子公孙”是霍光废掉昌邑王而立皇孙病已（汉宣帝）。“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是姓公孙的黄帝作土德之君，与自命为应金德，色尚白的公孙述无关。可见当时谶纬之学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影响之大。后来光武帝灭了公孙

<sup>①</sup> 所引刘秀之谶语等，均引自《后汉书·光武帝纪》。

述，证明他对讖言的理解正确，以致他更加崇信图讖，大力提倡讖纬。同时西汉末年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农民起义，当时著名的有南方的绿林起义军，东方的赤眉起义军和北方的铜马起义军数十部。农民起义在根本上动摇了汉王朝和王莽政权。对于夺得政权的汉光武帝而言，对此是特别重视的。他以为自然灾异不仅带来具体的灾害，如农业歉收，风雨不调，水旱灾祸等，而且还意味着上天对帝王的警告。因此东汉时期，对灾异的预报，和对已经发生了的灾异的处理，显得比西汉更加重视。对于政权的争夺，对于灾异的预报这两件大事，讖纬之学都有用场，这也是东汉时期讖纬之学兴盛的主要因素。因而能预言灾异，并能对发生的灾异作出恰当解释的经术之士也就特别受到重视。习京易或传授京易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受到礼遇的。京房的《易》学，正是对灾异作出适当解释，又能对灾异进行预报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因此无论是相信讖纬的儒生，或是谋求附会儒术的方士等等，会尽量援引《京氏易》作为自己的论据。因此在继续发展的讖纬之学，也就会大量抄引京氏的著述。并不是说京房的著作在东汉时期才被引入纬书，只是在这时的纬书中，特别是《易纬》中已经大最地充斥了孟京易的内容。

对此众多的学者都有共同的论述。朱伯崑先生在其所撰《易学哲学史》中就说：

纬书已失传。关于《易纬》部分，后人辑有逸文。其中有《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图》，《通卦险》，《是类谋》，《坤灵图》等。其它纬书，如《河图纬》等，也有解说《周易》的（以上见《黄氏逸书考》）。《易纬》乃孟京易学的发展，出于孟京之后，或刘歆《三统历》之后，《乾凿度》乃《易纬》解易的代表著作。

他又说：

孟京皆以章句解易，并以卦象占风雨寒温。而《易纬》则发展了孟京的卦气说，特别是京房易学。并且吸收了西汉的元气说、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董仲舒和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将卦气说从理论上作了一次大总结。同京房易学相比，《易纬》解易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将《周易》神秘化，或者说神学化；一是以象数解易，并将其理论化。

钟肇鹏先生在其《谶纬论略》中亦详细考察了孟京《易》学与《易纬》的关系，他列出了八条证明，说明《易纬》为孟京易学一派。他说：

孟京《易》学虽早已失传，但我们从《易纬》中还可以看出其主要内容。清末吴翊寅作《易汉学考》，他说：“《易纬·乾凿度》为孟喜所述，《稽览图》、《通卦验》皆京房所述。”（《易汉学考一·易纬考上》）。其说主名虽未必是，但是《易纬》为孟京《易》学一派是可以肯定的。

无须再作更多的引证，即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证已可见《易纬》及纬书中其他有关《易》的论述，都与孟京《易》学有直接的关联。

在第二章中已经论述京房的八宫卦，这是京房《易》学的基础。京房在其八宫卦系统中就强调八卦之气。此后京房接触到孟喜卦气，魏相卦气，焦贛卦气等等，京房始终坚持他自己的八宫卦卦气。孟喜的卦气应该说主要是十二月卦气，魏相卦气应该是以四时卦气为主，而焦贛则以风雨寒温为候，借用卦之三爻与上爻论事。只有京房才是正规的八卦卦气。我们在上节已经看到

《通卦验》正是讲的八卦卦气之应。《通卦验》说：

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弘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故设卦观象以知有亡。夫八卦谬乱，则纲纪坏败，日月星辰失其行，阴阳不和，四时易政，八卦气所效，则灾异气臻，八卦气应失常。

这正是京房八卦卦气有应无应的基本观点。其他如孟京卦气说在《乾凿图》和《稽览图》都有明确的记载。《汉书·京房传》京房上封事说：“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后汉书·郎顗传》郎顗上书言七事，其二事说引《易传》曰：“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郎顗引之《易传》即为《京房易传》。而《稽览图》说：“有实无貌，屈道人也；有貌无实，佞人也。”二者如出一辙。这种例子还可列举很多。

京房《周易章句》，对乾卦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注曰：“易有君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兴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人德备五也。”《易纬·乾凿度》卷上说：“孔子曰：《易》有君人五号也：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与上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变文以著名，题德以别操。”可见《乾凿度》也是本于《京氏易》之说。

又如京房《周易章句》说：“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乾凿度》则说：“大衍之数必五十，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此中说“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因古代将二十八宿分于四方，每方七宿。再如《京氏易传》说：“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若天地不变易，不能通

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而《乾凿度》则云：“光明四通，效易立节，大地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纬顺轨，四时和栗，四渎通情，优游信洁。……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观此《乾凿度》的两段，比京氏原话略有引申。所引申者即“五音”，“六律”，“律历调列”等。这似乎也反映了京房在从师焦贛之前尚未深究律历之学。但在师事焦贛之后，对律历与卦气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可能对早先的说法作了修正和补充。《乾凿度》利用京氏著述时，正是从京房后来作了补充的材料中抄录，再附加以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整体来看，孟京卦气说的原著材料丧失殆尽，其残余散见于各处，唯《易纬》中保留最多，亦相对完整。由于纬书广泛而且几乎是抄录式地吸取孟京卦气，特别是《京氏易》。后来由于纬书遭受到学者们的批判，从而使京氏易学严重地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特别是东汉初，当时的官吏俗儒广泛地习学讖纬之书，论事常据讖纬，起草文件等亦引讖纬作据。官家立仪礼制度也以讖纬为经典作为立论之根据。例如侍中曹褒奉命对《汉仪》进行修改，他“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讖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又前面提到后汉通京易的沛献王刘辅，他曾撰《五经通论》，其中多征引讖纬。有些图纬学者将《京氏易》引于自己的论述，以加强自己的论据。如东汉初学者苏竟，在劝刘龚（刘歆兄子，即刘歆侄）不要为延岑护军邓仲况作谋主的信上说：“今年《比卦》部岁，《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灭火，南方之兵受岁祸也。”比卦上体坎而下体坤。坎于京易为北方卦，主冬至；坤卦在十二消息卦中为十月辟卦，十月节立冬，故坤主立冬。立冬与冬至皆在北方，北方水。水性灭火，南方火气，故说南方之兵受岁祸，这正是京氏易之说。《后汉书》苏竟本传上详细录了这封信，苏竟先以讖言，后以星占，律历，继之以卦气论述当时军阀彭宠、董卓、延岑等

必亡。他将京易作为讖言的辅助或佐证。由此可见在讖纬之学盛行时，京易只剩下占验的躯壳，并成为讖纬之学的附庸。而京氏易学也整体上被讖纬之学所窃据。

也是在这一期间，许多学者在尖锐批判讖纬之学的同时，对京氏易却持肯定态度。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是坚决反对讖纬之学的，他见到当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法，乃上疏曰：

此（指图讖等）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禁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公，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后汉书》张衡本传）

所谓不占之术，是指讖筮图纬。故张衡是注意到将律历、卦气等同讖纬图录区别开来，并对前者加以肯定。

东汉著名的哲学家王充也对讖纬之学加以批判。他在其巨著《论衡》中说：“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又说：“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复变之家以刑罚喜怒，两家乖迹。”（以上引自王充《论衡·寒温》）王充认为京房是依据天地二气的升降，阴阳之气的移易而论寒温的变化，所以他肯定孟京的卦气说。但他认为“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一语需稍加分析。他肯定卦爻的变化可以相当准确地描述寒温的变化，即卦气在本质上确能反映天地二气的升降和阴阳变易。可是另有一种“变复”之家，大抵是讖纬之学的衍化物，认为寒温的变化与君王的喜怒有关。其说是君王之喜怒发于胸中，行出于外，而成为赏罚，故而赏罚为喜怒之效。王充认为

这种“变复”之家所说的寒温变化出于君王之喜怒，表现为赏罚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变复”之家的风雨寒温只能是一种比喻，并非是真的寒温风雨。而孟京卦气所言的风雨寒温之变却是真实的天气变化，描述了天地之节气，与人力无关。而天道自然应是“无为”的，所以言其不关政治。但是京房认为人世间的政治，也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变化，它虽与风雨寒温的自然界的气候不同，处在不同的层面上。但在更深层面，在天地宇宙的本质深处，有其共同的本质，即它们都受同一宇宙力量的支配。这两个不同层面的表现，又都可以在卦象上表示出来。在卦象上，可以从风雨寒温的变化推测到人世间的变化，或许也可以反过来推，从人世间的政治变化推测天气的风雨寒温的变化。京房坚信他设计的八宫卦系统及其发展的卦气说能够反映这个统一的宇宙力量，而这个力量至少表现为宇宙天地间存在的阴阳五行机制。这个力量及其机制既支配着自然界风雨寒温的变化，也支配着人世及社会的变化。京房否定了上帝和神灵，代替以表现为阴阳五行机制的宇宙力量，表现了与谶纬神学的根本差别，也表现了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根本差别。但是京房认为通过他建立的八宫卦系统，通过纳甲纳支将阴阳五行纳入八卦系统，就将宇宙力量的这种阴阳五行机制在其系统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从而使得他的系统能解释和说明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这显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设想。因为宇宙间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将所有事物的特殊性都抹去，即否认事物间的差别和事物的特殊性，显然是一种空想。此外宇宙统一的力量及其表现出的阴阳五行机制，只是一种哲学见解，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想以此作出一切事物本质的说明，从而由此得出不同类事物本质一致的结论只能是一种猜想，而不是科学的见解。但应该肯定的是，京房在他的努力中始终坚持着从客观存在的现象中寻求他从不怀疑的统一的宇宙力。除了其阴阳五行的机制而外，还有一种《易》学的机制，即他设计的八宫卦的机制，

和后来的卦气机制。他将八卦通过纳入干支五行而建立八宫卦机制，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将卦气和八宫卦两种机制作进一步的综合。

所以王充理解的孟京卦气说是从其论天气风雨寒温变化与卦气的对应而言，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但他又认为孟京卦气无关政治却是不全面的。这似乎反映了京房以卦气论政治，或者以风雨寒温为候占测人事是在一种更为深刻或者更为复杂的意义上来论述的，不像当时流行的讖纬之说或“变复”之家那样庸俗。可能郎宗耻于以占验成功而取得博士也是出于对《京氏易》的看法。因为他是治京易出身，觉得《京氏易》有深刻而广博得多的内容，不能以偶尔准确的占测或对当时一些事件作庸俗的解释来理解京易。

### （三）郎顗与《京氏易》

郎顗就是这个郎宗的儿子。《后汉书》本传说他“少传父业，兼明经典”，即他主修的仍是京氏易系统。他于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正月被征到京都，即“诣阙拜章”，在这封奏章中他就引《易内传》之说：“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这正是京房《周易章句》中的说法。而《易纬·稽览图》说：“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变之则除；其不可变，施之亦除。”郑玄注说：“改其政者，谓失火令则行水令，失土令则行木令，失金令则行火令，则灾除去也。不可变谓杀贤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复生，封禄其子孙，使得血食，则灾除也。”大约京房在世时，论及灾异已然发生当如何消除。可能见贤良大臣如萧望之、周堪等屡遭磨难，而提出“变之则除，消之亦除”的原理。“变之则除”诚如郑注之说，以五行相胜之理变之，则灾可除；“消之亦除”则为封禄无辜被错杀者之后人，亦可除灾。



郎顗同京房一样，根据当时的气候用卦气进行占测，他说：“窃见正月以来，阴闇连日，《易内传》曰：‘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又曰：‘欲德不用，厥异常阴。’夫贤者化之本，云者雨之具也。得贤而不用，犹久阴而不雨也。”《易纬·稽览图》则说：“日食之比，阴得阳，蒙之比也，阴冒阳也。”郑玄注说：“蒙，气也。比非一也。邪臣谋覆冒其君，先雾从夜昏起，或从夜半，或平旦。君不觉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复不觉悟，下为雾也。”这里所说的蒙或比均非卦名，蒙是大气昏暗的状况，一种阴暗的景象，出现这种天气，比之于人事即君臣上下相冒乱。意味着邪臣阻止君王任用贤臣。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讲到过这个内容，此处不赘。这是他仿京房风雨寒温占测。

郎顗进一步又说：“今立春之后，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而刑罚必加也。”立春为正月节，泰卦用事。泰卦为九三上六决温，卦象如此。但实际情况是天气寒冷，违反时节。郎顗以为这是由于有功不赏而刑罚必加的原因。这是阳嘉二年正月，正是他刚进入京都的时候。

他在这封拜章中，还向汉顺帝提出：“伏见往年以来，园陵数灾，炎光炽猛，惊动神灵。《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又曰：‘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皆引京房之说，对园陵殿阁火灾作出解释。

他对顺帝说：“臣伏案飞候，参察众政，以为立夏之后，当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这是郎顗根据京房卦气，即“伏案飞候”，又观测荧惑（火星）在天空之运行（参察众政）而作的推测。他观测到荧惑（火星）在鬼宿（当巨蟹座）留，后逆行至轩辕（狮

子座)，又转为顺行的天象，他称为荧惑失度。由于荧惑失行，故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后汉书》本传注云：“荧惑，南方，主夏，为礼为视，礼亏视失，不行夏令，则荧惑逆行也。”从天象看是如此。再案京房卦气，“正月三日至九日三公卦当值”。按孟京卦气正月公卦为渐卦（上体巽而下体艮），当雨水节。查张培瑜撰《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阳嘉二年正月初二癸卯交雨水中，故郎顗云正月三日到九日是渐卦当值。而“三公上应台阶”，台阶亦名泰阶，亦名三台。台阶六星，两两而比，故曰三台。在大熊座，位于北斗斗魁之下，在轩辕星（狮子座）之上。《黄帝泰阶六符经》说：“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为士或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sup>①</sup>三公在天上象天之三台，而在地下则与人君同体。盖因三公地位显赫，天下之人共景仰，视三公为人君的左臂右膀。《尚书》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sup>②</sup>，意为君主为一身之首，三公为人的四肢，故说三公与君主同体。但这时三公卦当值，却显示出三公卦当值时“寒应反节”，即当温之节候反而寒冷，在人事政治上就表示“政失其道”。所以郎顗认为是由于“今之在位，竟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即在位之高官厚禄者，虽当位却不能谋其政，一味高乐忘忧，那么要想“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

郎顗一到京都，诣阙拜章，向皇帝论述了当时的政治。在这封奏章中可以看出，郎顗对《京氏易》的娴熟，他完全从京易的观点和方法，论述涉及政治的事务。由这封郎顗所作的奏章中，可以窥视《京氏易》论述人事和政治一斑。可以说，郎顗之学是直接继承于京氏。但是郎顗并不拘泥于京氏之学，因其“明及经典”，所以他常常涉及《诗》、《书》、《礼》诸方面，对京易也

① 引自《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注。

② 引自《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注。

稍稍作了扩展。在他著名的《条便宜七事》中，有更明确的体现。

在条便宜七事中，第一件事是顺帝多饰宫室，而又频发陵园宫殿火灾。对此他先引《易内传》之说：“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接着论事例。说：“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风从寅来，丑时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灾，必当为旱。”阳嘉二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午为南方火，火音徵，故为徵日。按诸风角地支十二辰五音法，丑为阳徵火主旱主火灾，寅为阳徵火主火主烽燧，申为阴徵火主旱火。故说丑寅申皆徵也。这正月十七日正当惊蛰，雷出声之始。按此占郎顗又引《易·中孚传》说：“阳感天，不旋日。”郑玄注说：“阳者天子，为善一日，天立应以善；为恶一日，天立应以恶。”这亦当为京房之说。

第二事，主要言诏令虽宽而无其实。他说：“去年以来，兑卦用事，类多不效。《易传》曰：‘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寒温为实，清浊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故清浊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阴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则有妖风，日蒙则有地裂。’如是三年则致日食，阴侵其阳，渐积所致。立春前后，温气应节者，诏令宽也。其后复寒者，无宽之实也。”按兑卦为四正卦之一，主秋令，当七月、八月、九月，这三个月的辟卦各为否卦，观卦，剥卦，皆为六三上九决寒白浊之候。但三公皆以佞治事，貌为清静，而其时实当为阴寒，故有貌无实，佞人当道。至立春前后，当为温气应节，但后即阴寒，表示虽有诏令为宽，却没有宽的实际。这第二事纯从京易卦候占测立论。

第三事亦用京易法劝皇帝俭省少剥削。他说：“天道不远，三五复反。今年少阳之岁，法当乘起，恐后年已往，将遂惊动，涉历天门，灾成戊己。今春当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阳嘉二年为癸酉年，次年当甲戌，后年为乙亥，戊亥之

间为天门，故云涉历天门。按十干戊亦当天门。戊己者为土，郎顗说“土者地祇，阴性澄静，宜以施化之时，敬而勿挠”。灾成戊己，当为施化不效之灾。对今年少阳岁，按六日七分法，《稽览图》：“太阴用事，如少阳卦之效也一辰，其阴效也尽日。”郑玄注曰：“杂卦九三，为少阳之效。杂卦九三，行于太阴之中，效微温一辰，其余皆当随太阴为寒。”又说：“九三俱当温，乾之温当有不效者，至冲事发矣。”又说：“一曰少阳卦不效为水，太温甚者为旱。少阴不效为旱，为贼为兵。”由此可知，少阳者，杂卦中三爻为刚爻。如少阳不效则有水灾，且于冲位发。故郎顗说春少阳不效，夏必有水。因而他说：“水旱之灾，虽尚未至，然君子远览，防微虑萌。”即要以少取于民而保天和。

第四事是谏顺帝内宫宫女太多，要将她们放出。他说：“仰观天文，太子不明。荧惑以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五度，推步《三统》，荧惑今当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则不及五十余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东去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后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轩辕，绕还往来。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其意昭然可见矣。”郎顗从天象作论。他首先说“仰观天文，太子不明”，古代星占学认为心宿三星之中大星（心宿二，即天蝎座 $\alpha$ ）为天王，其前星（心宿一，即天蝎座 $\sigma$ ）为太子，后星（心宿三，天蝎座 $\tau$ ）为庶子，心宿一不明，应太子未立。荧惑（火星）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宿（白羊座），而现在按《三统历》应在翼宿（在巨爵座）九度，而实际观测在柳宿（在长蛇座靠近巨蟹座处）三度，则荧惑迟行五十余度。所以行迟五十余度，是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火星）经鬼宿到了轩辕，在后星（轩辕十四，狮子座 $\alpha$ ）之北，往东行走四度，又复回入轩辕宫，即火星在此逆行。他认为这是上天“遣荧惑入轩辕，理人伦，垂象见异，以悟主上。……今陛下多积宫人，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因心宿一之不明和荧惑行迟太甚，淫于轩辕之

天象，与顺帝多积宫女，而生子多夭联系起来。

第五事是他观天象预言该年秋后，赵、魏、关西将有羌族叛戾之患，要太尉行祀上天，以消除灾患。他观测的天象是：“去年闰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左足，入玉井，数日乃灭。”天苑在昴宿，属波江座靠近金牛座，这里有白气出现，左足指参宿七（猎户座 $\beta$ 星），其旁有玉井四星（属参宿），白气历经数日乃灭。据此他引《春秋》之说：“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又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何以会连说三个大辰呢？郎顗认为这三个大辰，虽位置不同，但却是相连的。三个大辰中的北极（亦称北辰）为王者之宫，“凡中宫无节，政教逆乱，威武衰微，则此三星以应之也”。其中一个大辰是伐，伐亦为罚。《史记·天官书》说：“参为白虎，下有三星曰罚，为斩刈之事。”因而主兵事。于星土则昴毕之间，赵、魏之分也。因而有星孛于大辰，则孛一宿而连三宿，今白气孛于罚，则连及北辰，是反应了中宫（即指皇廷）情况。白色为金，故白气为金气。凡金气变，发在秋季。故他说“臣恐立秋以后，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他又说：“金精之变，责归上司。”注云：“上司为司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韩诗外传》曰：‘司马主天，阴阳不调，星辰失度，责之司马。’”故他提出在火最旺的五月丙午日，遣太尉穿上吉服，带着斧、楯，拿着画上井宿（南方火宿）和鸟隼的旗旆（鸟为朱雀为火），并携着写了祝辞的玉版，到京都西郊，祭拜皇天。这样通过以火胜金消除妖氛，转祸为福。

其四五两事纯系星占，未涉及京易。但郎顗之学本来善星算、风角、望气。录此以见一斑。

第六事是关于一次白虹贯日的观测。他说：“臣窃见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时，白虹贯日。凡日旁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贯日中者，侵太阳也；见于春者，政变常也。”他认为这次白虹贯日的天象是阴侵阳，虹贯日中为阴侵太阳。又见于春季，春季五谷草

木生长之时。白虹有金气，金胜木，故必有兵气。因而他以为白虹贯日不仅意味着五谷不殖，草木不茂；而且会使政治失去常轨，要引起注意。特别是去年（阳嘉元年）闰月己丑夜有白气流入玉井，这次正月十四日乙卯巳时又白虹贯日，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两次金气的天象，金胜木，可能还会出现兵事。他建议“宜黜司徒以应天意”。《后汉书》注云：“时刘崎为司徒，至阳嘉三年策免。”

第七事是他据《齐诗》三基之说，自高祖元年为亥仲二年，至阳嘉二年为戌仲十年，次年即入戌季之年，即已介于戌亥之间。据《诗纬·汜历枢》说：“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即行年正在戌亥之间，是为神在天门（戌亥之间为天门），此时神在“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而他又引《易雄雌秘历》，说“今值困乏”。于是他建议：“宜因斯际，大蠲法令，官名称号……改元更始，招求幽隐，举方正，征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第七事中关于齐诗三基、四始、五际之说，已在本节第一段论述谷永与《京氏易》时谈及，此处不赘。

郎顗所条陈的便宜七事，其论述之主旨和占测推论的方法，乃至论占风格都完全继承京房。他的这便宜七事也确实触动了顺帝。顺帝向他提出了质问，问他何以出现白虹贯日就要变常？何以到这个年代就要大蠲法令，革易官号？为什么要更始改元？这些质问实际上触及了皇权的根本。这正反映了“齐诗与京易同法”。而他便宜七事中，主要的观测依据还是自天苑出白气入玉井和白虹贯日两条天象，在下一章论述京氏星占时可以看到虹蜺之占正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郎顗上书推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又条便宜四事，其第二事，他引孔子说“雷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而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壮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当发声，发声则岁气和，王道兴也。《易》曰：‘雷出地

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雷者，所以开发萌芽，辟阴除害。王者崇宽大，顺春令，则雷应节，不则发动于冬，当震反潜。故《易传》曰：‘当雷不雷，太阳弱也’。今蒙气不除，日月变色，则其效也。”此亦据京易卦气。可能是永和元年（136年）二月他上此条<sup>①</sup>，说大壮用事之日雷当发声、发声岁气和。引京易之说，当雷不雷则太阳弱，于人事则君弱臣强。而当时的气候是“蒙气不除，日月变色”。由“当震反潜”之说看来，也没有雷声。故他认为“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

综上所述，郎顗之所陈，每事皆依京易，间用齐诗，杂以星占、风角。论事必依经典，不用谶纬。郎顗进入朝廷后一年，就有张衡奏请禁绝图谶，盖郎顗与有力焉。郎顗在其具体占测中，总是将其所学与图谶等区别开来。由此亦可见京易与谶纬实非一类。但诸纬采纳京易之论，京氏自身材料又散失殆尽，京易与诸纬混杂，而造成后世对京易的怀疑。

《京氏易》还有很多保留在星占书中，也有不少保留在诸史五行志中，更有其他零散的材料散布各处。在本书下一章中将分别讨论其星占、气候占、风占乃至物占等。这些就不在本章赘述。

---

<sup>①</sup> 这一条奏在元嘉二年条陈七事之后，查历书，元嘉二年后，春分在初九之前者，只有永和元年。按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永和元年二月初五己丑春分。按京氏算法，春分日 $\frac{73}{80}$ ；晋卦五日十四分，故云九日至十四日大壮用事。

## 第四章 京房星占及灾异占

古之星占诸书；自京房以后，均将京氏视为天文或星占之一家。例如唐朝著名天文星占家李淳风，撰《乙巳占》一书。由于他采摭颇严，又注重与经传相容，故其书为儒者所重。《乙巳占·天占第三》载其说：

自黄帝占已后，向数十家，其间或真或伪，不可悉从。今略取其理当者，删而次比，以著于篇。其间亦有出自经传子史。但有关涉，理可存者，并不弃之。今录古占书目于此：

黄帝（占）	巫咸
石氏	甘氏
刘向洪范	五行大传
五经纬图	天镜占
白虎通占	海中占
京房易妖占	易传对异占
陈卓占	郗萌占
韩扬占	祖暅天文录占
孙僧化大象集占	刘表荆州占
列宿占	五官（星）占
易纬春秋佐易期占	
尚书纬	诗纬
礼纬	张衡灵宪



其中《京房易妖占》和《易传对异占》都与京房有关。由于李淳风严格选择而录，使得京房作为星占家的地位也显得重要。

京房并不是一个职业星占家，他之所以成为星占家，是由于他沉浸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试图通过某种符号系统，即他根据周易卦爻系统改建的八宫卦及其卦气系统来接连天地人三者。使这三者在深层结构中表现的一致性，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表现出来。例如观测者观测到某种天象，相应地在地上观测到某种气候或物候现象，在人世社会中有什么反应，都能从这个符号系统中作出说明和解释。因此京房星占学有他注重的重点，他不像其他职业星占家那样，关注于天象吉凶的占测，至于占测对象和天象的对应关系却不作更深入的透视。而京房是力图从他所关注的天象中找出地面人间的对应，并从这些对应中寻求其符号系统的解释。因而京房的星占学反映了他的兴趣的焦点和他的研究工作的进程。其实在表面上，京房与其他星占家并无二致，都关心灾异和君臣关系，前者反映整个社会情况，后者则反映统治机构——朝廷的情况。只是京房更注意天象与这两方面在对应关系上到底存在个什么机制。他不想简单地归结为上天对帝王或其臣民的警告，有时甚至是谴责。由于京房正在他努力作这方面的探索时，遭到迫害致死，可能尚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或者它的成果被粗暴地散佚了。

京氏星占乃至任何星占学都不注意描述天象的详细情况，对于占词与天象的关系尤吝于说明。而京房的星占资料，是后世星占家之摘引，尤为支离破碎。在第一章中已经说到，王保训曾全面编集过京房的资料。他辑为八卷，除卷一为京氏《周易章句》外，其他七卷每卷都有星占或灾异占的材料。其第二卷为《易传》，当是其他星占书上说的《京房易传》，这与我们第二章说的《京氏易传》不是同一回事，要加以区别。第三卷为《易占上》；第四卷为《易占下》；第五卷为《易妖占》和《易飞候》两部；

第六卷为《别对灾异》、《易说》、《五星占》、《风角要占》等篇；第七卷为《外传》；第八卷为《灾异后序》、《周易集林》、《易逆刺》、《律术》四部。这样的分章，很可能是由于材料来源中注明来自京氏何书，或者是某书中注明是京房之所述。如第八卷的《律术》，明显是摘自《后汉书·律历志》，《律术》篇名为王保训所加。但是其所辑占测材料，与《唐开元占经》、《乙巳占》等对照起来，可能较多的与京氏原著篇名相合。如果确是这样，则可大致推断，京房的原著，是将某一类材料集中在一起，间或也作一些说明，有些可能是经过研究而获得结论性的看法。由于被征引者各取所需，把原来可能是有系统的材料，也弄得七零八落。

总之，现今留存的京氏星占或灾异占测的材料，既非原貌，亦非全豹。在散乱零落的材料中，看看我们能说些什么。

## 一 京氏日占

京房本传中强调，京房从焦贛所学的是“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而月为风雨，日为寒温，可能因此京房对日月之占十分关注，从而对日月食之占也较注意。

京房的日占是从太阳颜色变化的角度入手的。《唐开元占经》卷五中引《京房易传》说：“日者众阳之精，内明玄黄，五色无主，以象人君。光照无主，不可以色名也。”又说：“圣主在上，则日五色备。”又说：“日大光，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寿，世无极。”这种表述方式正是京房所特有的。他先将太阳的基础形象立定，即：太阳是众阳之精，内明玄黄。表现为五色俱备，没有一种颜色突出。因而不可以说太阳是什么颜色，只是一片光明。对应于这样的太阳形象，大地景物蕃盛，人世和平昌明。他对太阳基础形象是从太阳日面颜色的角度描述，不像其他星占家那样，首先从太阳的形状、运行、亮度等方面来描述。这正反映了京房的一贯观点，就是要将太阳的变化情况纳入它的那一套符号体系，即纳入到阴阳五行的机制之中。在西汉时代，阴阳五行说在董仲舒儒学的推动下，正如日中天那样，处处都有它的影响。特别是各种事物与五行的配合，几乎已经遍处皆有。颜色与五行的配合，即木青色，火红色，土黄色，金白色，水黑色的对应关系，已经成为定式。京房在此再加强调，太阳作为众阳之精，应是五色齐备，那么如果太阳显示某种颜色，就是有某种颜色偏胜，这意味着众阳之精受到了某种阴气的干扰，或者是太阳自身的阴阳平衡受到破坏。在京房的时代，前已述及是灾异频仍，政治也不怎么清明的时代，于星占而言，作为天象的太阳自应不会无偏色。京房在实际对太阳的观测中，也确实经常观测到太阳颜色的变化。因而他的日占系统，实际上是从注意日面颜色变化开始。但是后来的发展，使得他更多地注意日面的变化，注

意地球大气变化对可视日面形态的影响。而在占测上，他注意到日面活动与灾异的联系。

### （一）京房日面变色占

太阳圆面在正常状态下是明亮无偏色的，可是京房所指的这种正常状态实质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不常见到的。大多数情况下，日面表现为呈现各种颜色，或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变异。

京房首先从五种基本颜色出发，每一种颜色的变化，有着相应的占验。他作了基本性的说明：

日变色，青为饥与忧；赤为争与兵；黄为德与善；白为旱与丧；黑为水，民半死。（《唐开元占经》）

大概这只是从日面颜色情况而言，还要考虑太阳在天空上什么方位，可能其日面颜色有微微而相应的变化。例如京房说：“日者太阳之精，萌于东，盛于南，其色赤，今乃青。青，东方少阳色也。谓人君微弱，国无贤辅，则致此灾。不救，日食为灾。其救也，率股肱，正台辅，任忠直，报功能，立将军，修城郭。”从这一占例可看出，太阳从东方升起，到南方日居于最高点，色微赤似乎不作变色论，而是显出青色，为少阳色就不好，或许他在此指出少阳色是想说杂色干扰正常的颜色，犹如杂卦破坏消息卦者。对于日面变色而得凶占的情况不只青色一种，京房还有《救黄经》、《救赤经》、《救黑经》、《救白经》，这一占例当是《救青经》。其《救黄经》说：“贤者之言，行之而蔽。其人有以其美自扬，厥异日色黄。黄者中和色，喻美行也。人君内有贤臣，卒得其位，保其社稷。人君自知非其德行所能设，称扬其人则复矣。”当日面出现黄色，意味着有重大能臣表功自扬，而君王却倚恃他

保有君位社稷。对此只有君王也称扬他才能消除灾异。《赦赤经》则说：“人君不学道无以教下，发号令动害百姓，日应之而赤。人君听用人贤，尊之如宾客，避寝思道则复矣。”人君不学道，乱发号令，太阳圆面变赤。这时要听用仁者和贤者，对他们尊敬如宾客，而君主自身也要勤劳体会天道，那么日赤的变异就会消去。其《救黑经》说：“臣不能进谏，其君怨，下见百姓，故日黑。人主当忧劳求贤，将左右强臣，则黑除矣。”意思是对君主的不当之处无人提出意见，君臣关系不好，而人民又都知道，太阳就变黑。所以人主要忧劳求贤，将左右强臣，即将堵塞忠良进谏者罢掉，太阳变黑就会消除。其《救白经》则说：“人君软弱，海内咸贫，日白六旬不可复变，未满六旬求任贤臣，抗武扬威，诛罚为非则复矣。”当君王软弱，全国贫穷，那么就会日色白。日色变白超过六旬，就无可挽回；若不满六旬，可求任贤臣，君主变强，诛杀那些为非作歹之徒，那才可以挽回。京房关于月变白还说过一些占词，例如他说：“上微弱，无法制，则日白。六十日万物无霜而死。”（以上关于五救经等均摘引自《唐开元占经》卷五）或许其他各家占经记录有失，但确都没有关于日色白的占验记录，这是京氏占所特有的。京房对日色白的占主要是旱与丧，而在政治上则是君微弱，人民贫困。其他诸家论占君主弱的也不以日变白为占。例如《春秋·感精符》说：“主弱则日色黑赤如灰。”又说：“君不聪明，无智德，为臣下所侵，则日光青赤，后大旱。”又说：“妻党翔，群臣恣横，则日黄无光。偏任权柄，大臣擅法，则日青黑”等等。因此京房关于日面颜色之占，可能是其实际观测的现象。进入宫廷后看到弘恭、石显等专权日甚，元帝被他们蒙蔽。于是有意将此两者联结起来立出占辞以警戒元帝。而后世遂引以为据。

颜色的变化往往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从一种基本颜色到另一种基本颜色的直接过渡，如从赤色一下子变到青色，而是常常表现为一种混杂之色。京房注意到这一点，比如他有一条论占说：

“日赤如赭布如灰，不出其岁，有大将死于野。”赭色当然不是五种基本色，它最接近的基本色是赤色，因此说“日赤如赭布”，按京房定义，赤色主战争和兵事，如果赤色明亮，那么可能是一种胜利之占，但现在是赭色，赤色不明亮似掺着一种灰色，则有兵凶战危，故占为大将死于野。所以京房认为有杂色是不吉的。由于杂色的存在，京房不得不更加细致地观察。所以虽然他强调五种基本颜色的基础性占测，但他很清楚他所说的基本色并非单纯的 basic 色，只不过是一时占支配地位的基本色。京房有一条日占说：“察天不顺，厥异日赤，其中有黑。”大抵蒙气重时，太阳可见亮度下降，太阳会显现出某种颜色，例如太阳在升起或下落时，往往显出红色。由于日面亮度下降，肉眼可直接观察日面，他看到了其中有黑色。由于在一般生活经验中，黑色的东西在燃烧时，会显出红色。因而他认为太阳显得为赤色时，其背景是黑色，或者说是黑色的氛围。另外他那么注意到日色变白的占测，也是由于他在水汽浓时观测日面呈白色，虽为白色但太阳却不明亮，即“色白无光”。由于京房注意日面颜色的细致变化，他总是在早晚“蒙气”较重时观测日面，而且观测杂色情况。

### （二）京房日面观测

京房日占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他观测日面的结果。他从观测日面颜色的变化，进而观测日面的现象。他大概最早观测到太阳黑子。

他是从两种不同现象的区分中推进到对日面现象的研究。一种现象是黑暗，一种现象是黑色。易经中曾记载有“日中见斗”，“日中星见”的说法，京房认为这是一种黑暗，而非颜色。黑暗只是日光的微弱。他说：“国有谗佞，朝有残臣，则日无光，暗冥不明。易曰日中见斗，日中星见，明其冥也，故贬之为暮也。其救也，远佞谄，近忠直，修经典，闭私道，则日光明。”京房

以为白昼太阳突然昏暗，以至于说“日中见斗”，“日中星见”，是太阳昏暗得太厉害，连星星都可看到，这就是说日昏暗得像是晚上。因此京房“日中星见”等的“日中”是指白昼，而不是指日面之中。这时不仅不能观察到颜色的变化，也不可能观察到日面现象。但黑色却是能够在日面上观察到的。他的一条著名日占说：“祭天不顺，兹谓逆，日中有黑子。”又说：“臣不掩君恶，令下见于百姓，百姓恶君则日变（中有黑者阴也，皆日出入时也）。”<sup>①</sup>这是京房对最重要的日面现象——黑子所作的正面描述。他说君王昏乱作恶，而臣下不为之掩盖，而让老百姓都知道了，从而厌恶君王，那么日面就有变化，中间有黑子，表示阴气干扰阳精，这都发生在日出日落时。这一条记录，反映了京房利用早晚蒙气直接观测日面的事实，也说明了他直接在日面上观测到黑子。这里还引了一条京房日占说：“日中有黑云，若赤若青若黄，乍五乍十乍三十，天子崩”，开元占经加注说：“按晋中兴书曰，升平三年（359年），十月丙午日，有黑子如卵，少时而孝宗崩。太和四年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明年海西公废。”加这个注的意思似乎强调京房占测的重要性和准确性。京房观测到日面有黑子，并对之作出占验。后世因见其有效，多仿之。如后来的《洪范五行传》说：“人君有过，故不循天治，则日黑居侧大如弹丸。”即在日面边缘见到弹丸般的黑气。《荆州占》（东汉后期作品）说：“日中有黑气，大如桃李者，臣散主明。”就京房那一条加注的占验而言，说明京房对日面黑子现象作过认真细致的观察。太阳黑子从开始出现到消失要经过一系列发展过程。它最初出现是一个小的圆形黑点或小斑，逐步发展，分裂成两个大黑子，前面的叫前导黑子，后面的叫后随黑子，其间又充斥着很多小黑子。前导黑子逐渐增大，后随黑子离之越来越远，且又逐渐

<sup>①</sup> 《唐开元占经》卷六。还记录了其他各家关于日面现象的占测，但只说日中有立人之象，日中有王字，有行者等，都没有直接说黑子。

分裂成更多的小黑子，这种现象称之为黑子的分裂现象。京房实际上描述了这种黑子分裂现象。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载：“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时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京房易传》曰：‘美不上人，兹谓上弱，厥异日白，七日不温。顺亡所制，兹谓弱，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亲伐，兹谓不智，日白，体动而寒。弱而有任，兹谓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动。辟鲁公行，兹谓不伸，厥异日黑，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暗。不难上政，兹谓见过，日黑居仄，大如弹丸。’”《五行志》的这一段《京房易传》的话，在京氏日变色占中或已见到，如日色白仍表示君弱等，自毋庸多说。但这里谈及“辟鲁公行”和“不难上政”，指君王公开妄行和不注意政事，前者则说“日黑”，后者则说有黑子出现在太阳的边缘，其大小如弹丸。看来这条占词只说到日色白和日色黑两种情况，而且色黑又分两种，一种“日黑”，后面特别指明了“日光暗”；另一是“日黑居仄”，特别指明其大小和形状（弹丸）。这应当是实际观测的记录，或说是有实测基础的占词。如果这一实测记录发生的时间不错，那么要比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的记录“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要早15年。而河平元年的记录被认为是世界对太阳黑子最早的观测记录。当然河平元年的记录比较正规，有具体发生的时间。

永光元年正是京房在朝廷任职期间，正好出现一次太阳变色和可见到太阳黑子的事件，京房记录了这个事件，并且作了占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当时正是干这个差使。即使后来河平元年正式的黑子记录（京房此时已死去好几年），《五行志》仍引《京房易传》为说：“祭天不顺，兹为逆，厥异日赤，其中黑。闻善不予，兹谓失和，厥异日黄。”《五行志》报导的京房对日面变色和黑子现象的解释是可笑的，只是用以猜测一下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和吉凶。但是京房从日面变色顽强地进行观察，导致他对日



面现象的更加深入细致的观测，使他最早确定了太阳黑子现象的存在。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京房生活的时代正是灾异频仍的时期，京房本来就是为朝廷占测灾异的学者，奇怪的是他从观测太阳日面现象着眼作占测，而且也正在这个时候，太阳黑子现象被人们观测和记录。现在人们都知道地球灾异与太阳活动的相关性，在二千年前发生这一巧合，即汉元帝及其以后时期的灾异频发与太阳黑子增多的相关现象，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京房之所以注意到太阳黑子，不能不提到在京房时代之前很久就有太阳中有三足乌的传说。马王堆帛书出土的帛画，就有三足乌的图形。《淮南子·精神训》说：“日中有踰乌”，注曰：“踰犹蹲也，谓三足乌。”但说在日面土见到（观测到）三足乌或乌的记录却很难看到。据说是先秦时代就有的《黄帝占》，虽然提到了三足乌，但却算不上是观测的记录，其说曰：“日中三足乌见者，其所居分野有白衣会，大旱赤地。三足乌出住日外者，天下大国受其灾，戴麻森森，哭声吟吟。”京房占中也提到乌，他说：“日中有乌见，主失明，为政者乱。”这在占测上与他的太阳黑子占本质相同。只不过在其《京房灾异》中则说：“日月薄赤，见日中乌。将军出旌，举此不祥必亡。”这里不是占人主，而是占将军。似乎此时日面占支配地位的基本色是赤色，赤色占战争及军将。后世见乌之占多效京房。如东晋葛洪在其所撰《抱朴子》中说：“吴赤乌十三年（250年）日中乌见三足，吴然，魏蜀不见，孙权死。”（按孙权死于赤乌十五年，即在这次日面出现三足乌之后二年）葛洪此说似乎在于说明京房据太阳黑子之占确属有效。京房据太阳黑子之占皆与君主有关，多反映君王之失。其后果最严重的是“天子崩”，最少也是政事混乱。又如《日旁气图》说：“日中乌见，其国君死，期三年。”也是据京房而推衍。从京房将乌见与太阳黑子见占测相同看来，可能京房视乌与黑子同类。唯凡言乌者均与乌的形象联结在一起，星占诸家或可能见到太阳黑子，但不类飞鸟，故不视其为乌。复又不知太

阳黑子，故往往视其为别的形象而论占，如在京房前石氏占（即战国时星占家石申）中就说：“日中有立人之象，君慎左右急。”京房能定出“黑子”概念，固然由于他不拘于成见，也由于他观测之细所致。

说到京房观测之细乃是由于他“观察唯勤”之故。他在其观测实践中，是由被动观察逐步进展为主动观察。所谓被动观测，即从天气自然消光中观测太阳日面，所以他有时在记录中注明是早晚所见，而早晚正是蒙气较重，对太阳消光较多，而肉眼能看到日面。当然有时在日月薄赤的自然消光的情形下也可观测日面较多的细节。在具体的观测中，他发觉通过大气自然消光直接观察日面，会有大气抖动或闪烁的影响，往往由此会造成观察上的错觉，故而必须设法将此种错觉消除或加以改正。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京房尚不可能全部严格区分日面现象和大气抖动、闪烁等效应造成的错觉，因而不免会将一些大气现象与日面现象混同起来。但是在历史上，正是京房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唐开元占经·日占二》中记载着京房的一段话，他说：“日斗，常以日出至食时以斗，斗后乌见。六十日王者亡地。若乌不见不为斗。凡日斗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战，齐燕多水。”这里说的“斗”，《史记·天官书》正义注云：“斗，谓光芒相及。”因而这种日面现象似指若即若离的双极黑子，两极之间有许多小黑子。肉眼看来两个大黑子光芒相及，若即若离，在大气抖动和闪烁之际，很像两只乌鸦相斗。这样的“相斗”之后，即到大气相对稳定，大气抖动和闪烁大大减弱之后，还能看到乌，这才算是乌斗，否则就不是乌斗。同时这段也报导了他利用早晚蒙气现象较重时的大气消光来观察日面的事实。大概他早上观测次数多，所以说得较具体，指明是从日出至早饭时。这一段话的占测之词则

是：日斗后不到三年，其下方有拔城大战<sup>①</sup>，过了六十日王者亡地，还有就是燕齐多水。按京氏日变色占，日色黑变主水，民半死。所以这条占辞是以两种基本色立论，第一是赤色，太阳通过蒙气，亮度减低为赤，故有拔城大战之占；第二是黑色，故齐燕大水；乌见则王者有失，故王者亡地。由于京房的这一条占测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以下的叙述只是一种推测。按《汉书·元帝纪》记载：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癸酉），“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初元二年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可能在这之前京房观测到“乌斗”的日面现象，初元元年二年之应如此。因而京房的占词有其观测资料 and 现实情况的遇合基础，从而在那个时代产生较大的影响。

京房对日面观测的被动情况，后来发展到主动。这在现代看来可能不足为道，就是所谓盆水观日法。据说在盆里面贮上水，或者还在水上面洒几滴墨汁或油，观测太阳投射在盆水中的投影，可以起到消光作用，能看见日面细节。由于盆水法不限于早晚或日月薄食时使用，所以要观测日面，即可随时将盆水置于观测场地进行。由被动观测进入主动观测。京房对日面的主动观测在后面日食占中还要谈及。综观京房对日面的观测，虽然其目标是为了占验，但他的效果应认为是当时科学发展的反映，他对日面观测所得的观测结果是应予肯定的，他想通过日面现象和太阳颜色变化来探讨当时的自然灾异的想法也是不错的。还有他的根本目的，正如前几章一再提到的是企图探求天地人三者在宇宙深层的结构中本质上的一致。因而占测之词在他看来不是占得准确与否的问题，而是是否表达了天地人三者本质上一致的那种情况。他并不在意占验的准确，但他在意如何才能准确地说明天地人三者的本质关系。当然他更在意他的八宫卦系统能否也接纳他

---

<sup>①</sup> 此下有拔城大战之“下方”是指日斗时，太阳所在星宿，该星宿的分野之地，即所说之“其下方”。

在日占上的探讨和努力。他的这些思想鼓舞了他大胆的探索精神。

### (三) 京房日旁气占测

关于日旁气，古代星占学上是相当重视的，这可能是京房重视日旁气占最初的动力。《史记·天官书》说：“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王朔就是那时对日旁气占测的专家。由于日旁气与人主有关，其意义当不言而喻。另外《周礼》有“眡祲氏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觶，四曰监，五曰暗，六曰瞢，七曰弥，八月叙（序），九曰济，十曰想。”《晋书·天文志》说：“《周礼》，眡祲氏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谓阴阳五色之气，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璫之属，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谓云气成形，象如赤乌，夹日以飞之类是也。三曰觶，日傍气，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觶。四曰监，谓云气临在日上也。五曰暗，谓日月食或曰脱光也。六曰瞢，谓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弥，谓白虹弥天而贯日也。八曰序，谓气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璫，重叠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济，谓晕气也。或曰虹也，《诗》所谓‘朝济于西’者也。十曰想，谓气五色有形想也，青饥，赤兵，白丧，黑忧，黄熟。或曰，想，思也。赤气为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可见十辉所说的大都是日旁气，古代对日旁气的观测是相当注意的。唐李淳风更进一步归结为十二种日旁气，了解这十二种日旁气有助于理解京房对日旁气的观测和占验。因而摘其于《乙巳占》中所说的这十二种日旁气如下：

一为冠气。“青赤色立在日月之上，冠带之象也，天子当立侯王”。这大概与王朔所说的“日旁之气，人主象”有关。

二曰戴气。“青赤色横在日月之上，而小隆起，其分当有益土晋爵推戴之象，亦为福佑之象。黑则有病，青则多忧。”

三曰珥气。“青赤短小，在日月之旁，纓珥之象也。”又说：“其色黄白，女主有喜。纯白为丧，间赤为兵，间青为疾，间黑为水，间黄为喜。”

四曰抱气。“青赤而曲，向日抱，扶抱向就之象也。日月旁有抱，邻国臣佐来降，亦有子孙之喜，臣下忠诚辅主之象。”

五曰背气。“青赤而曲，向外为背叛乖逆之象。其分有反城叛将。”

六曰玦气。“青赤，曲向外，中有横枝似山字。玦伤之象也，君臣不和上下伤玦，两军相当，所临者败，有军必战”。

七曰直气。“青赤色一丈余，正立日月之旁。直立之象也，其分有自立者。”

八曰交气。“青赤色，状如两直相交，淫悖之象也。人主有淫悖之行，则有此气。常以九月上旬两日候之。日旁有交赤云，其下有兵。”

九曰提气。“日月四旁有赤云曲向，名曰四提，提似珥而曲。不出其年兵起，王者死，赤为亡地，有自立者。一云气形如三角，在日四方为提。”

十为纓组承履（《唐开元占经》为日履组纓），“气青赤色，在日下。上曲为纓，下直立为履。在日下两边，交曲而双垂为组，皆喜气也。”“气如半晕，在日下为承。承者，臣承君也，为君臣相承有喜。青赤气横直在日上下者为格，格者格斗之象也。”

十一曰晕气。“晕周而匝，中赤外青，军营之象也。”

十二曰负气。“负气者，青赤如小半晕状，而在日上则为负，负者得地为喜。”“戟气者，青赤气长而斜倚日旁，为战戈戟相伤之象。”

以上这十二种气，在实际占测时，单纯只见其中一种气的情况很少，大部情况都是几种气的混杂情形。京房对日旁气的占测，事实上也总结在李淳风的这十二种之中，因而不必再多引京房对珥抱戴背，提玦直交，晕负冠履等的定义或说明，而要介绍

一下京房对这些气的特别的认识。

京房大约观察或说得最多的是日珥。战国时著名星占家甘德和石申就注意到日食时日面边缘有“群鸟”或“白兔”之类的东西，这是否就是日珥或日冕，已难以稽考。但说明在京房以前很久，人们就对日食时的日面情况进行过观测，京房在这方面总是紧随前人的步伐。由于他观测日面积累的经验，使他在观测时比较注意大气现象与日面现象间有那么一点区别，虽然他当时还根本不懂得地球大气现象与日面现象的本质差别。还是从他对日珥观测和论占说起。

日珥的特征是在日面两旁，中间呈红色而外边呈青色的短小气状物，就像人有耳朵在头之两旁。京房对日珥的基本占辞是：“日两珥，且有大□，使一日两珥，焰焰如光，为人君有喜。”又说“春有二珥，人君听事”。所以京氏认为日有两珥是吉，至少是对人君为吉。但大多数星占家认为是有关军事，例如石氏占就说：“有军。日有一珥为喜。在日西，西军胜；在日东，东军胜。南北亦然。无军而珥，拜将。”著名日旁气专家王朔说：“日珥等，两军相当，无相奈何。”郗萌占说：“日珥，人主有喜，兵在外亦有喜。”石氏和王朔均在京房之前，二家均言日珥与军事相关。郗萌为东汉星占家，在京房之后，故两者皆言，既言人主有喜，复言兵在外亦有喜，由此可见京氏日珥之占自有他自己的章法，后人从而因之。有些直因京氏之占，如《洛书》云：“日两珥中赤外青，色黄白润泽，天子喜。”等等（以上均引自《唐开元占经·卷七》）。

但是对于多于两珥的情况，京房的占断均不能作吉，如他说：“有三珥，人君有女子忧。”又说：“日出四珥将军亡，日入四珥有大兵。”又说：“日朝五珥，国有兵起。”等等。但石氏却说：“日有四珥，天子拜将，太子立王侯。”甘氏则说：“日四珥，天子有子孙喜，期不出三年。”这种情况是京房认为日珥与兵事有关，但他的前辈却反而认为与天子有关；京房认为不吉，但其

前辈却认为是喜庆。京房可能认为如果称为珥，像人那样有两个，是一种正常的形象，如果有多个耳则是不正常的。太阳虽不是人，但却是众阳之精，也应该有一种正常的形象。这种正常现象反映了深层次的正常结构。而甘石等人可能接受的是更古老的一种吉凶观，所谓逢单为凶，逢双必喜，后来以阴阳相配为吉的观念则可能基于此。

京房对于日珥的占测，包括对它的十分简单的描述，有些与现今活动日珥很相类似。活动日珥在日面边缘任何部分都有可能出现，且其活动形状多种多样。有时候似乎有气流从太阳上某一点沿着确定的曲线轨道流到另一点；有时候日珥内有物质流向太阳表面的一个或几个确定的点；有时候物质从太阳表面的某一点沿着曲率很大的曲线轨道上升，上升到某一高度停住，过一段时间再沿着原来的轨道返回。这种日珥是较为常见的。看来京房和古代其他星占家所描述の日珥，形态上与现时所见日珥相同。其中尤堪注意者是京房提到四个同时出现的日珥，还有五个日珥的情况（注意京房提到出现的时间，日出时，日入时和朝），呈现了某种圆弧状。在今日所见日珥中，有一种爆发日珥，其中有一种就呈现圆弧状，在爆发时，整个圆弧膨胀，弧峰上升，物质沿着弧的两翼向下流动，这与四背珥的情况十分相似。由于珥和抱、背等日旁气本质相同，其出现变异很快，形状常很接近，有时掺杂在一起形成很多呈圆弧状的爆发物。京房特别提到有两珥出现且熠熠发光的情况，这大概是另一种形态的爆发日珥。这种爆发日珥像火焰一样，从太阳表面的一个确定点，有物质向上喷发，高达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公里，然后又落回日面。除了这两个熠熠发光的日珥，只有京房提到外，其余各种日珥和抱、背等情况，京房以前的星占家们就已经提到。但京房报导了观测到这些现象的时间，所以可以设想古代观测者主要是利用蒙气。但利用蒙气消光观测日珥等，除了那种爆发性日珥，其他就很困难。因此那么众多的日珥观测占词是如何取得的呢？很可能就是

其中有很多非我们今日所认识的日珥。

京房对于日晕的论占也是十分活跃的。日晕是日旁气之最大而最明显者。它形成一个大圆圈（圆而周匝），内赤外青。李淳风视日晕为军营之象，但在京房认为“日晕若井垣若车轮”。无论说其形象如何，都是圆而周匝为其主要特征。但是京房把日晕和负气（不完整的晕，常居日上）看作是地球大气现象，他说：“日晕重，有四负，殃大国乱。若三日大雨不占。”（《唐开元占经》卷八）日晕重重，还有负气在晕上，这是殃国大乱之征，但是若三日内下雨，就不是殃国大乱之征，而只是雨征。如果日晕时又同时见到日珥、戴气、抱气等等，就是形成一种能消光的蒙气，透过这层蒙气而见到太阳上的活动现象。如京房说：“日晕而珥，宫中多事，后宫分争，七日不雨，审察中。”又说：“日晕有四珥，各四背玦，期六十日，群臣有异谋者。有急事，闭关不行，使天下更命。三日雨不占。四背，白气干之，其端青赤，是妃与臣下共弑其君。”（《唐开元占经》卷八）这两条说明京房将晕看成蒙气之类，而珥抱戴玦等气则是日面现象。他之所以作这样的占测，四珥前已说明京氏不以为吉，四背，京房以为“日中赤外青曲向外名为背”，背有背叛或背离的意思，而玦为有损伤之意，所以其占为群臣有异谋等等。而日晕而珥之占虽已七日未雨，但似乎还没有肯定，说在“审察中”。但是如果日晕不那么浓重，但又能看到戴、抱、珥等被认为是祥和一类的日面现象，京房说：“日晕戴抱珥，其色皆赤，内青，外清明，即国家有吉，贺喜。”（《唐开元占经》卷八）

京房注意到日晕与日珥、抱、戴、背、玦等的差别，是京氏日占中很重要的方面，这是 he 与其他星占家的主要区别所在。其他星占家也同时论占日面现象与日晕同时出现，但不大注意甚至不管这两者的区别。石申认识到日晕是大气现象，因此他的日晕占测与天气有关。如石氏说：“日有青晕，不出旬有大风，采贵十倍，人民多疾病，凶。”又说：“日有黑晕，灾，在用事臣。”



但他没有注意区别日晕与日面现象的珥、抱、戴等气，如他说：“日晕而珥，合国有谋反。”又说：“日晕且冠且戴，天下有立侯王若自立者，分必益土。”又说：“日晕四提，必有大将出亡者。”（以上石氏诸占均引自《唐开元占经》卷八）京房也有在占词中未提及晕与日面现象之区别者，如说：“日晕而且冠三重，日下有虹行，正长数丈，不出其年有反者，贵人绝后，有兵饥。”但这条占词的要点是“日下有虹行”，这就指出其为大气现象（虹蜺之占后面要讲到）。因而其占辞会说到有兵饥。按《后汉书》说：“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而日有晕，虹贯晕在毕八度。毕，边兵。秋，器反，侵安定。”这一段话是《唐开元占经》作者瞿昙悉达引来置于京房这条占词之下，意思是此占词有应。这说明在众多日晕中，京房又区分出一种虹晕。虹晕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如京房说：“日晕，直气贯晕，中白，其色将失，顺其气攻，破军。”又说：“凡日出虹晕主分地，日入虹晕诸侯分地。黑者以兵分地，白者以丧分地。”显然直气跟虹气一样是大气现象，在前引《乙巳占》中所说直气，其实也说是大气现象。（以上均引自《唐开元占经》卷八）附带说一句，京房对各种气均有定义，《乙巳占》将其整理成十二种气，与京氏所说大体一致，因此未重述京氏之定义。很可能李淳风即依京氏所说为据。

## 二 京房日食占及月占

日食和月食在京房看来，月影蔽日产生日食和地影遮住，太阳光而使月光尽是没有疑义的。但星占家们作了一个补充，即食只是一种极端情况，而使日月昏暗的各种情况，都认为是与日月食同类，他们称为“薄”。他们认为“薄”，正如京房所说：“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犹掩薄日光也。”所以“薄”是日、月不交之食。作了这个补充之后，就可将地球大气对日光亮度的影响与真实的日食在占测上同列起来，甚至在占测上比真的日食用得更多。这其实反映了京房时代天文历法的发展，对真的日月食，已能以算理推求，可以作出相当准确的预报，而且推知食分。在这种情况下再用日月食作为偶然发现的天象作预测就不合时宜了。星占家们提出“薄”的概念，实际是对古来一直重要的日食占的一种怀念，并注入了新的内容，维持了传统日食占的延续。《史记·天官书》已经提到：“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故甘、石占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食，皆以为占。”这里提到“薄食”，其注引《集解》孟康曰：“日月无光曰薄。《京房易传》曰：‘日赤黄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韦昭曰：“气往迫之为薄，亏毁为食。”因此食和薄的区别京房十分清楚，看孟康引京房说来解释薄，足见京氏关于薄食概念的权威性。其实关于这两者的区别，《京房易传》还说过：“食皆于晦朔，有不于晦朔者名曰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犹掩薄日光也。”京房知道且严格区分薄和食，但他对薄食之占都十分重视，且明显的更重视薄的占测。这有他深刻的思想感情原因。

### (一) 京房日食占

还是摘录一下李淳风在《乙巳占》中关于日食占的话，他说：“夫日依常度，食者，月来掩之也。臣下蔽君之象。日行迟，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二十九度余。月行疾，二十七日半一周天。二十九日余而追及日。及日之时，与日同道，而在于内映日，故食其象。大臣与君同道，逼迫其主，而掩其明。又为臣下蔽上之象，人君当慎防权臣内戚，左右擅威者。”正因为日食是臣下蔽君之象，是京房最为敏感的一环，他在思想感情上痛恨当权的弘恭和石显，而弘恭、石显还有五鹿充宗等正肆无忌惮地蒙蔽汉元帝。当时，就是京房进入朝廷之后到京房去世前的八年间，据古籍记载，日薄、食记录就有十八次之多，这为京房提供了观测日面现象，特别是日珥、抱气、戴气、背气等的机会；也提供了京房论证邪臣当道，欺蒙君主的星占学根据。

不过京房心里十分清楚，从事先可以推知的日食事件，来预测君臣之际还是有点玄乎乎的，因此他更重视那些“薄”的事件。因为从现象上看，食是太阴被月影遮蔽，薄是太阳光被云气蒙蔽，在蔽日的现象上两者同类，自然两者都意味着邪臣蒙蔽君王。这样他就更加注意于日旁气变的观测。《唐开元占经》卷九一开头就报导京房候日食的方法：

日之将食也，五龙先见于日傍。青龙见于日左以春食，赤龙见于日上以夏食，黄龙见于日中央以六月食，白龙见于日右以秋食，黑龙见于日下以冬食。欲候此龙见日食，法当以五寅日候之，春以甲寅，夏以丙寅，六月下旬以戊寅，秋以庚寅，冬以壬寅，此所谓五寅也。置盆水庭中，平旦至暮视之则龙见。欲知何月，孟月以孟，仲月以仲，季月以

季。欲知何日食，龙以上旬见，日以朔食。龙以下旬前，日以晦食。龙以日出见，以日出食；龙以日中见，以日中食；龙以晡时见，日以晡时食；龙以日入见，日以日入时食。

看来京房是在异想天开地将日食与一种使日光大大减弱的蒙气现象混同起来，用一种观测日旁气的带有点神秘意味的方法，进行这两种天象的预报方法。但京房想的是，既然将薄和食联结起来，就得有一个贯穿其间的预测方法。可是将这两不相干的事件串起来又怎么可能呢？京房大概尽可能地考查了古代（京房以前）星占家们的说法，并作了一些设想。他从占测的效果上看薄和食，均是臣蔽君，君臣之位反，不行正道。从天象上看，食是月往蔽日，薄是气往迫日；食必在晦朔（其实只应在朔，由于古代历法尚不完善，而有食于晦的情况，晦为每月最后一日，朔为每月第一日），而薄却未必在晦朔。但是他又以为无论食薄均有大气变化的先兆，薄的气变先兆自不必说，而食有气变先兆，则古来有证。《春秋纬》说：“君不聪听，无知德，威令不严，舒懦为臣下所侵，则日光青赤，其后久旱，地动摇宫，阴气盛下，臣大恣横，阳精挑夺，日行失度。不得，则日月薄于晦，阳为臣所悦，故以晦日食之，失后也。”这一段引自《唐开元占经》卷九的《春秋纬》的话，说明有的星占家注意到日食前有大气变化的现象。《春秋·感精符》对日食前的大气变化现象说得更加直接：“日将食，必先青黄，不卒灭，渐消也。日光沈掩，皆月所掩毁伤。雌为政，伐其雄。”又说：“日食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日黄无泽，则日以晦食，其发必于眩惑。二曰偏任权柄，大臣擅法，则日青黑，以二日食，其发必于酷毒。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国，则日赤郁，快无光色，则日以朔食，其发必于嫌隙。”（以上引自黄奭《汉学堂丛书》之《春秋纬》）京房感到这些材料支持了他日食与日薄同样有气变先兆，因而应该可以从气

变先兆的观测，对日食和日薄作出预测。大概京房并不满足仅仅从这个推论出发，他可能直接进行过观测。《唐开元占经》卷九专列一栏为《日食变色十一》，全是引录京房关于日食时的气变占测。大概京房觉得日食时颜色变化（自然与气变有关）本身也反映了人世和地面上的某种情况，可以进行占验。他的直接观测可能也使他更加确信日薄和日食确实可以从大气先兆的观测中作出预测。特别是他利用盆水观日法观测，能从太阳一出直到日落均可随时监测太阳周围情况。这更加鼓舞了他“候日食”的信心。

再回过头来看他提出的候日食的方法。所谓“五龙见于日旁”，就是在太阳视方向有相当浓的云气，浓重的云气呈现出“龙”的形象。云气的浓重，使得太阳呈现出颜色的变化，大概先显出赤黄色的变化，《京房易传》说：“日月赤黄为薄。”就是说这时已经是“薄”的情况。太阳颜色的变化与五行的标准色配应就是青赤黄白黑，“龙”呈现为这五种标准色时，可能是日食的先兆。《春秋·感精符》说：“君不聪明，无知德，为臣下所侵，则日光青赤。后大旱，地摇动。日青赤黄白黑乍连于气，茫茫不可自类推象度。三十日以往，食无期，此治乱，故比年日食。”这个说法不太好懂，特别是后半段。但是京房说的“五龙”与这里说的“日青赤黄白黑，乍连于气”显然是有关连的。因此这段话似乎是在说，先发生日光青赤的现象，这也可称为薄。然后若五龙见于日旁，这就可能是日食的前兆了。至于日食具体地发生在什么季节和时日，则要根据“五龙”所见时间和方位来确定。此外他还作了一个观测时间的限制，即在和各季节相应的寅日（例如春季是甲寅日，夏季是丙寅日等）进行。选择五寅日可能是受董仲舒的影响，因按三统说，汉得黑统，以寅正，即以正月（斗建寅）为岁首，以平旦为朔，即以寅时为一日之始。寅日正是黑统的表征。

京房的盆水观日法是一种主动观测日面的设施，除了观测预

测日食发生要有一个寅日的限制外，其余日面情况均可从“平旦到暮视之”，一旦见到太阳方向有“龙”，而太阳色变赤黄，或青赤等，那就将发生“薄”，“薄”之后如果有“五色龙”在日周围“活动”，就要考虑到日食的可能发生，就应在各季相应的寅日仔细观察，如果这时与季节颜色相应的“龙”，在与五行标准色相配应的太阳周围方位出现，就可看出哪个季度有食否。若是某季度有食，那么再看发生在该季度的什么月，这由观测月份的孟仲季来决定。再根据“龙”出现的时间，再确定日食发生的时间等等。京房当然不会考虑我们今日对他的候日食法的严重怀疑态度，他当时是信心十足的。在后面关于“妖星”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还要再用这种方法。

在思想感情上，京房很想将他发明的方法，观测到的太阳情况，以及这种现象所反映的人世政治情况与宫廷中邪臣石显等擅权情况直接联系起来。可是似乎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下什么功夫，他大概不想找点理由凑合着满足这种思想情绪上的企求，而是坚定地着眼于天地人三者基本关系的探求。当然，如果他果然揭示了天象与人事关系的本质，那么对于擅权蒙蔽君王的邪臣石显五鹿充宗之流的揭露就不在话下了。所以对日食时的各种现象他都勤于观测，而且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这可从他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看出个大概。

循着他的思路，他对日食发生的时间进行过整理。对日食发生在哪个月份有什么占验作了“日十二月食占”。按《唐开元占经》卷十的这一条目下，只有石氏、陈卓和京房三家做过这项整理。将京房列在首位，次石氏，次陈卓。其占验三家显然有区别，京房只注意朝廷和君王；石氏显然偏重于灾异；陈卓则着重于占见食地域情况。例如正月日食，京房占为：“大臣出走，不然大臣一人死。”石氏占为：“不见光，人多疾。”陈卓占为：“齐大凶，五谷贵。”只是要提醒一点，由于开元占经是星占类书，可能他摘引各家占时注意其相互补充，而略去重叠，所以未见得

京房在日十二月食占中只占朝廷君王，石氏只占灾异等等。但《开元占经》作这样的选择只是他以为京氏占朝廷，石氏占灾异，陈卓占地域较为全面而已。京房又对六甲之食进行整理。“日六甲食”是六十花甲子一周（即六十个干支对）各日发生日食的占测。按京房八宫卦的思想，干支五行是其八宫卦结构的运算基础，因此京房的这个整理是必然的。在《唐开元占经》卷十中这一题目下，除了起头一条是甘氏的简短占词外，以下每一干支对都有京房一条占和《春秋·潜潭巴》一条占，将潜潭巴的占放在前面，京房的占放在后面。但是京房的占词涉及君主、宫廷、灾异各方面，潜潭巴则各条占词只是有重点的占验某一方面，或朝廷，或灾异，非如京氏之兼占各方面。由此可见，京氏之日六甲食整理是有他的更深入一些的考虑的。与日食时间占测资料相对应的是日食空间资料的整理。在开元占经摘引的材料中只有日在二十八宿食占，分为“日在南方七宿食”，“日在北方七宿食”，“日在西方七宿食”，“日在东方七宿食”。似乎京房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整理，他只对日在角宿（东方七宿的第一宿）食有占词，说：“日食角中，其国不安。一曰贵臣有忧；一曰主农之官忧。”由此可见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日食在空间方面的占测。而且他作了整理的材料也只是初步的，只是一种材料的编排。日占和月食占是京氏星占的主要方面。在天象上，太阳是众阳之精，在人间代表君王，而万物生长，气候变迁都与太阳有关。日占有可能最快地纳入其八宫卦或卦气卦候系统，有可能成为他设想的总体模式的突破口。后面可以看到他的其他方面的占测总与他的日占和日食占有联系。

在《唐开元占经》中，在全部有关各家日占和日食占的材料中，京房的材料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有些类目只有京氏一家占词，除了刚刚已经说过的《日食变色》外，还有《日食而珥有云冲之》一类，也是只有京房之占。综观此两类日食占，从现象上说既有薄也有食，如为薄也主要是食前之薄。大抵《日食变色》

一类主要说由薄而食；而《日食而珥云冲》一类则多说食。对《日食而珥有云冲之》稍作考察，可知他将日食而珥有云冲的情况列为：（1）日食有二珥、四珥两种情况；（2）按其出现日的日干，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类日；（3）有什么颜色的云冲出（五行标准色）；（4）只有庚辛日，按二珥和四珥的情况分别加上“食从下始”和“食从上始”；（5）对于四珥情况，有一条特别提“食从上而下”和“食从下而上”，且各有占；（6）有一种春日二珥、三珥和四珥的食，分别对应为食从下始，食从上始，食从下始，并各有占。例如京氏《易妖占》说：“以甲乙有二珥而食，东西南北有白云冲之，天下有兵”；“以甲乙有四珥而食，有白云冲出，四角青云交贯中央，天下有兵”。按甲乙为木、色白为金，故有金克木之象，金有兵象，故论占天下有兵。对于庚辛日，《易妖占》说：“日以庚辛二珥而食，从下始，又有赤云冲出，东南西北三邑兵作”；“日以庚辛有四珥而食，从上始，有赤云出西方，天下有乱王。”这是火克金之象，故占有兵作。在占日食从下开始时，京房占为：“日食从下起失民，人君疑于贤者为不肖，不用其政教，故天见亡民之象。”又说：“食从下起多死，一曰下人为寇。”可见庚辛日食有二珥兵作的占辞，是指民反对君王之事，严重到要派兵。对于日食从上始，京房占说：“日食上者，君为其伪佞人用之，故尊卑失礼，责于尊者。故天见亡君之象。”又说：“凡日食从上失臣。”因此说赤云出西方，为克金之火，用兵之象；而食从上始是问题出在君主，所以说“天下有乱王”。一般说食出四珥的情况，比出现二珥的情况严重，京氏《易妖占》对于日四珥的情况特作一占说：“日四珥从上而下，天子起兵；从下而上，天子有大丧。”对于春日食的三条占词为：“日以春二珥而食，从下始大半，邑有死主。”又说：“日以春三珥而食，从上始大半，天下邑有小兵，重以丧。”还说：“日以春有四珥而食，从下始大半，天下凶。”这三条反映了同一种日食，即无论日食从上部边缘开始，或从下部边缘开始，食要过半，才各有所占。从“日食而珥有云冲之”的这—日食占测类可知两点：第一，其天象的观测



基本根据是食而不是薄。因为说到食是日面上边缘或下边缘开始,还说食要过半,当不是大气变化现象,如浮云蔽日那样;第二,这一类材料应是经过整理的材料,而不是仅仅简单的归并和编排。它是根据五行生胜的机制推理进行整理的。在今日人们感到只是迷信的陈词滥调,可在京房那里却还是一种新的探索。

经过据五行原理整理后的各条占词,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原有的观测依据和细节都被淹没了,或者说是被“平滑”掉了。比如说“日食而珥有云冲之”这一类日食现象中说到有云气从中冲出的“珥”,有可能是一种古代观测者极难观测到的日冕现象。但是这一整理后的材料中却无法准确判断。《汉书·五行志》关于日食的占测,似乎主要是依据京房,那里大段地引了《京房易传》关于日食的占辞:

亡师兹谓不御,厥异日食,其食也既,并食不一处。诛众失理,兹谓生叛,厥食既,光散。纵畔兹谓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专禄不封,兹谓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烛。君臣不通兹谓亡,厥食三既。同姓上侵,兹谓诬君,厥食四方有云,中央无云,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兹谓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诸侯相侵,兹谓不承,厥食三毁三复。君疾善,下谋上,兹谓乱,厥食既,先雨雹,杀走兽。弑君获位兹谓逆,厥食既,先风雨折木,日赤。内臣外乡兹谓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鸣。冢宰专政兹谓因,厥食先大风,食时日居云中,四方亡云。伯正越职,兹谓分威,厥食日中分。诸侯争美于上兹谓泰,厥食日伤月,食半,天营而鸣。赋不得兹谓竭,厥食星随而下。受命之臣专征云试,厥食虽侵光犹明,若文王臣独诛纣矣。小人顺受命者征其君云杀,厥食五色,至大寒陨霜,若纣臣顺武

王而诛纣矣。诸侯更制兹谓叛，厥食三复三食，食已而风，地动。嫡让庶兹谓生欲，厥食日失位，光晦晦，月形见。酒亡节兹谓荒，厥食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发雾而寒。”

《五行志》说“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是说《京房易传》上述之二十条日占。这二十条日占在《唐开元占经》分列在各类中。例如这里的第一条，在开元占经列于《食既》类，写为：“亡师兹谓不御，厥异日食，其食既也。”两者虽稍有差别，但大体一致。又如这里的第二条“诛众失理”，开元占经也列于《食既》类，写为：“君诛杀失理，臣下有叛心，则日食尽而光散。”在开元占经《食既》一类中，还有“君臣不通”，“弑君获位”等占，与《五行志》相同。在开元占经《日食而地鸣震裂》一类中还有“内臣外向兹为背”，“公欲弱主位”“冢宰专政”，“酒亡节”，“诸侯更制”“伯正越职”等占。在《日食而寒风雨雹雷》类中有“同姓上侵”等。在《日食而晕珥彗虹蜺》中还有“嫡让庶”之食，但是其形为：“日食转为五色而食，白虹见，日傍光揜揜”，与《五行志》“嫡让庶兹为生欲”之占略异。又有一些条说法稍异，但所占相同就不一一注明。于此可见有三点须注意者，第一是京房对于日食之占，开头是按日食的形态进行占测，而后试图按五行原理进行整理，但是没有完成。第二是这二十条日食占有二十四种形态，可能不完全是食，其中食既当是指日全食，或指日光尽，这应是食。但有些形态如“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厥食四方有云，中央无云，其日大寒。”等则多半可能是薄。《唐开元占经》注意到了薄和食的区别，因而其分类法与《汉书·五行志》自是不同。第三是京房注意到日食伴随现象，如《京房易传》中说：“日食后雾，雾不解，地必震，不过旬中。”等等。这就反映了京房的观测基础。

## (二)京房月占

京房的占测有比较明显的针对性,他对月亮的占测也和他对太阳的占测一样,也着重于君臣关系。京房对月占的基本态度正如他在《京氏对灾异》中说:“人君好用佞邪,朝无忠臣,则月失其行。”即他是从月亮运行状况为主来进行人事占测。将之与《汉书·天文志》的月占相比较,天文志说:“月失节度而妄行,出阳道则旱风出,阴道则阴雨。”也是从月亮运行占测,但不占及人事。不过京房也不只谈人事,他说:“月行南为旱,行北为水。当道天门、驷之间,天下大安,五谷大得。”(京房《易妖占》)这里京房所说与天文志所说实为同一天象及占。这是观测月亮在天空运行,通过角宿和房宿的情况。角宿两星,两星间为黄道所经过。角宿一为室女座 $\alpha$ 星,在黄道南;角宿二为室女座 $\epsilon$ 星,在黄道北。由于此两星扼守黄道,星占学谓之天关,其间称为“天门”。当月亮在天空运经角宿时,若运行在角宿一之南,即谓行阳道,或谓行南;运行在角宿二之北,即谓行阴道,或谓行北。驷为房宿,房星又名天驷或为天马,房宿有四星,黄道贯穿于房宿三与房宿四之间,房宿三为天蝎座 $\delta$ 星,房宿四为天蝎座 $\beta$ 星。若月亮从天门和天驷之间运行,这就是正常的运行,不是邪行或妄行。京房对太阳的运行情况未曾提及,亦未入占,而对月亮的运行却作为月占的基本点。所谓基本点,就是其他形态、颜色等等的占测,都以其运行状态之占为主。

开始,京房以为他对太阳占测从颜色占入手还是有意义的,因此他也将日占中的色变占的基本情况引用于月占,即在京房《易妖占》中所说:“月变色,青为饥与疫;赤为争与兵,黄为德与喜;白为旱与丧;黑为水,民半死。”为了占测月亮的亮度及颜色变化,他也按日占中所做那样,将正常的月亮情况作了定义,《京氏易飞候》说:“月之光如张芒,所宿之国立君。”意思是月亮皎洁明亮,臣下会有效地协助君王。可是这虽是正常状况,却并不是经常见到的情

况。但从颜色变化来占测月亮,京房却碰到了困难,因为月亮的颜色变化不像太阳那样明显和多样。可他并不因此放松对月亮的颜色和亮度变化情况的观测。在《唐开元占经·卷十一》中,有一类占测叫《月变色》,共有八条占辞,其中京房占词有三条,《河图·帝览嬉》三条,《荆州占》二条。其中京氏三条的第一条是前征引的《易妖占》的月面五行标准色之占。其第二条是“君幼弱,月青色。”第三条是引《易飞候》说:“月生八日,当玄兔色,上旬余贵;无,则上旬余贱。不尽八日,色,下旬余贵,无则丰而下旬贱。”似乎再没有直接论及月色变化的占词。但对于月亮亮度的变化,京房说了五条:《京房易占》两条:“月大无光,国无王,民不安,天下有兵”,和“月昏无光则渊涸山崩,王者恶之”。《易妖占》一条:“月无光,臣下作乱,教令不行,民饥国亡。”《易飞候》有两条:“月不光,贵人死”和“月生无光,君子徒凶。”这五条说月亮“大无光”、“无光”、“不光”、“昏无光”、“生无光”,其中的区别从其入占中可以大略猜测,但无光的具体情形就很难明白了。虽说京房对月变色和月亮亮度的占词并不多,但在各占家中还是相当活跃的。前述在日占中,京房对日面和日面方向大气变化的关系尤为活跃,但在月面与月面方向大气变化相互关系却显得有点黯然失色。这大概由于京房对日面的观测,找到一系列消光方法,而其他星占家虽也积极努力观测,但方法上却不及京房先进。但在月亮的观测上,是可以用肉眼直接观看的,因而京房就不占优势,相对而言也不那样突出了。

京房从日占中得出的日面现象与日旁大气现象的区别,使他在日占中显得特别出色。显然他也想在月亮占测上取得同样的效果。因此他又注意月旁云气的情况,在这方面他有两条占词:一是“有黑云状如群羊豕,如飞鸟,如鸣鸡,在月及月旁,三日五日不雨,匈奴兵起”。二是“赤气覆月,如血光,大旱,人民饥千里”。(以上引自《京房易传》)这显然说的是地球大气现象,而不是月面现象。作为日面现象的抱戴珥背玦气等,京房也在月亮观测上尽量寻找,似乎没有找到。他也说过月珥背玦之占,这共有两条占词,即是

《京房易传》的：“月珥，期三十日兵起。”和“月背玦，其国有反者。”这两条占词都过分简单，看不出他说的珥和背玦是个什么性质。月面如果有珥，有背和玦仍应是一种大气现象，不会是月面喷射出来的。其他各家也说到月亮的珥戴抱玦提背等，但都未细致描述。例如，《黄帝占》说：“月珥而冠者天子大喜或大风。”《荆州占》说：“月昏而珥者兵半起，夜过半珥者边地恐。”但若仔细考察起来，似乎都与地球大气现象有关，即无论《黄帝占》或《荆州占》所述都没有说这是月面现象。由于京房试图找出与日面现象相对应的月面现象，又因他当时还不可能弄清太阳和月亮的本质区别，所以他的这种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依京房的一贯风格，很不情愿将地球大气现象与月面现象混为一谈，于是在月占中，他不仅不显活跃，甚至是沉闷的。

对于认真探讨诸种现象间本质关系的京房来说，这可不是个小问题。为什么日面上那么活跃的“气”的变化，而在月面上却见不到呢。是不是太阳为众阳之精，因为是阳而显得活跃；而月亮是太阴之体，阴气显得安静呢？而阴是成形的，阳可能只是“气”。可是太阳也具有一定的形状，那么太阳中是否也有阴气呢？当然太阳是圆形，圆就是阳的形状。然而太阴之体月亮的形状也是圆形，也具有阳的形状。京房大约经过长久的思索，最后他作了历史上著名的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本质的判断：“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镜，照日即有影见。月初光见西方，望以后，光见东，皆日所照也。”（刘向《别录》引《京房易说》）即京房已经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之光。只是他把星也搭进去，认为星也反照日光。如果对行星而言，则是正确的；若对众恒星而言当然不对。由于古代星占家认为众恒星是经星，是列布在天上的背景，只有众行星才在天空背景中运行，因此京房心目中的“星”，可能只是行星。

由于月亮也在众恒星间运行，可能在其运行过程中与其他行星会合，也自然会不断地与众恒星会合。星占家们对于月亮和行星

的每一次会合都要加以记录,并作出占测。对于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是以月亮在什么星宿来确定的。如果月亮与列宿恒星靠得太近,称之为月犯某星,有时称“月宿某星”,“月食列宿”“列星贯月”等,也要加以记录并作占测。这大概是古代星占家们的重要领域之一。可是京房在这方面留下的材料不多,似乎只是偶尔提及。对月犯五星,如在京氏《易妖占》中说:“月犯荧惑,天下有女主忧。”又说“月犯辰星,天下大水”。还说“月食辰星,其国女以战”。就这么三条。而对月犯列星的占测,《唐开元占经》卷十三也只摘引了三条:“月以子丑申入南斗,后百八十二日赦无余囚”,又引京氏《易妖占》说:“月犯毕,天下有变令。”又引《京房易传》曰:“月食参,天下有小兵。”这么三条加上前面月犯五星的三条共计六条,在《唐开元占经》卷十二至卷十四四百余条占测中,实在算不了什么。比起前面日占中总共近二百条占词中,京房就有近八十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古代星占学中关于月亮的占测还有重要的一类就是月晕占,月晕是月旁大气现象,也是属于地球大气的变化,《唐开元占经·卷十五》引石申对月晕的定义是:“月傍有气,圆而周匝黄白,名为晕。”京房开始对月晕还是很注意的,《京房易传》说:“凡月晕七日,无雨,大风,兵作,土功起。”即月晕长时间,如果不下雨就会刮大风。会有兵事和土功事。可是后来他也打不起兴致来。特别是在月亮带着月晕与行星或某恒星相会时,这称做“月晕五星”和“月晕列宿”,这是指月晕与星相会而非月犯或月宿某星。这也是古代星占中相当看重的一个类别。《唐开元占经》用了两卷(卷十五和卷十六)的篇幅,列举了三百五十条各家占词,但京房只占其中七条,只有五十分之一。而且这七条内容相对而言都是不重要的,例如《京房易传》说:“月晕翼轸,军在外战,亡其偏将。”《易飞候》说:“月晕参,其有兵,则战无师,是年三操土功事。”这些都不像京房在日占中那样,占必提及君臣之际,国家危亡等等。为什么京房在月占各方面显得如此黯然失色呢?看来这确实反映了京房当时的心态。当京房对日面和日食占测充满希望时,他也期望通过

对月面和月傍气的观测,达到对于月亮占测的新的'高度。可是情况却未能如他设想,因而像失去了主心骨那样,对月占的一切都显得茫然失措。只是在碰到具体占测时,漫不经心地说那么几句,或者只是注意要累积一些材料。

同样在月食的占测上,京房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占测工作材料,比起他对日食的占测工作,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在月占和月食占碰到的困境,却使他对太阳和月亮的本质关系进行了思索。这一思考的结果,即如前面所述,他对太阳和月亮的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使他在天文学领域中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前列。这从他对月食的看法上,似乎可以摸索到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前列认识的思考方式。《京房易占》说:“月与日相冲,分天下之半。循于黄道,乌兔相冲。光盛威重,数盈理极,危亡之灾,一时顿尽。遂使太阳夺其光华,暗虚亏其体质。小潜则小亏,大骄则大灭,此理数之常然也。”这一段话当是京房尚未达到月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的认识之前对月食的看法。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这是很早时人类就有的认识,京房首先点明这一点。在望时,西边日落,东边月出,几乎同时,所以说“分天下之半”。太阳在神话中是三足乌,月亮在神话中上面是捣药的白兔。月亮在天空中运行的轨迹称为白道,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视轨迹称为黄道,两者有平均为五度九分的交角,由于这一交角很小,古代人认为两者都在黄道上运行,故说“循于黄道,乌兔相冲”。这时月亮的形状正是满月,故“光盛威重,数盈理极”。由于数盈理极,事物发展到极至,自然就“盈则有亏”,而可能发生“危亡之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有月食,而使其光华一时顿尽。接着他说“太阳夺其光华,暗虚亏其体魄”,这充分反映了京房当时还认为太阳为君,月亮为臣。月亮显得光盛威重代表臣子权大威重,就会威胁君主的地位,君主就得夺去臣子的威权。这时被夺去威权的臣子会受到更多的攻击,或此谓亏其体魄。他又说:“小潜则小亏,大骄则大灭”,则进一步论证只有满月(望)时才会发生月食。因而他将月食与人事对应得如同符契。可是他

有些困惑的是太阳怎样夺了月亮的光华,亏其体魄的暗虚又是什么呢?大概就是通过类乎如此的解释和对解释的怀疑,又引发新的思考,使他作了月亮是反射太阳光的论述。但是京房对“暗虚”的解释或定义没有留传下来,当时及以后也没有人说到它。直到一百多年后,东汉张衡在其《灵宪》中说:“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张衡将“暗虚”解释为地蔽日光,也有说为“地影”。或谓张衡“暗虚”得自京房,那么京房的“暗虚”是否也指“地影”呢?从其“小潜则小亏,大骄则大灭”之说看来,或以为前半句似说月亮的盈亏,后半句则说是望时才发生月食。但众所周知,月亮的盈亏并非地影的遮蔽,只是月亮、太阳和地球三者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呈现出月相的变化。只有月食,才是地影遮蔽了射向月球的阳光,这时日、月、地三者应当处于一直线上。又以为京房的“暗虚”除有地影的意义外,还认为月亮平时(不发生月食时)也受其影响,使月亮有时有“小亏”,这种“小亏”自然不是食,可能就是所谓的薄。可是京房对薄的概念主要只用在日上,看京房对薄的解释有二:一是“日月不交而食曰薄”,二是“日赤黄为薄”。因此京房应该没有“月薄”的观念。日月相交而食只能是日食,发生月食则应是“月与日相冲”之时。所以产生“月薄”的概念,是《史记·天官书》注引孟康的话:“日月无光曰薄”(参见本章本节开头),按此说可理解为日无光为薄,月无光亦谓薄。孟康虽引京房话为其证,但京房却没有“月薄”的意思。

月食时日月在天空所居之星宿,往往是星占家们关注的方面,但京房却等于没说。只有京氏《易妖占》有短短的两条,一是“月食于房,天子有丧”。二是“月食于毕,天下有小兵”。但京房对月四时食却有简短的说法,《唐开元占经》卷十七“月四时食”引京氏说:“月春食,岁恶,将军死,一曰有忧;夏食,旱,忧谷;秋食,羌兵起;冬食,其国饥,有女丧。”又引京房《易飞候》说:“春食有忧,夏食有兵起,民无有一月粮,余贵。”这里只说了两季。可见京房对月食发生



的季节作过考虑,可能他想根据四时五行的旺相休囚等考虑月食之占,即将月食发生的季节资料纳入其五行八卦系统。但是看来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只是开了个头,或者只是有这种考虑。《易飞候》所说只有两季,可见这都是尚未完成的工作。

### 三 京氏杂星占

《吕氏春秋·慎大览》说道：“武王胜殷，得二虜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虜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虜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从星占的角度看，此二虜之回答实为一事，即昼见星和天雨血之天象，其兆应是子弟不听父兄，臣民不听君令。大约那时视白昼见星为一种妖氛，其占为以下欺上的各种情况。京房对星昼见之占是：“昼星见，人臣有奸心，上不明，臣下纵横修撰。”或许他是受《吕氏春秋》记载的历史故事的影响，因而其与《慎大览》之占同。或许他是针对他当时的情况而言，如其说“纵横修撰”或有其时具体的对应。

要阐述杂星，可能要将星的一般情况稍稍说一下，当然我们仍从京房关于星的概念说起。《乙巳占》和《唐开元占经》都引用了京房的话：

星者，阴阳之精，万物之体，五行之形。其体在下，精曜在上。百官之命，各因其原星飞及行，万人不安。（〔唐〕李淳风《乙巳占》）

《唐开元占经》上引此话则稍有不同，主要是第一句。其第一句是：“星者，阴精也，五行之形。”大概《乙巳占》之引，更接近京氏本意，因为京氏从星占的观点看，星与万物确是精与体的关系。东汉张衡本京氏之说加以发展，其说：

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逋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

杨泉于其《物理论》中说：“凡无名之星，一见一不见，唯二十八宿度数有常，故曰恒星。”他认为二十八宿星，已经人们测定，不会或见或不见，故称为恒星。只有那些无名之星才会或见或不见。据上述诸家对星的论述可知，那时人们将恒星和五大行星之外的星称为杂星。而恒星除二十八宿星外，还包括中外星官，中官一般是拱极星，即在北极附近诸星官；外官一般是二十八宿之外诸星官，石氏、甘氏、巫咸三家星经都有明确星官名称和星数，也都属于恒星之列。由于杂星是无名之星，或见或不见，总与妖气有联系，正是石甘咸三家之后星占家们开拓星占领域的重要场所。京房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撇开恒星，而对具有妖氛的杂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杂星后来的分类比较复杂，但最初只有两大类别。第一类是关于星所呈现的状况，诸如星昼见，恒星不见，星斗，众星动摇，星陨、星坠等等。第二类则是不归类于恒星和五大行星的各种天体，这里有流星，客星，彗星，孛星等等。但从星占学角度可简单地分为瑞星和妖星。

京房有他自己的杂星系统，就是《晋书·天文志》所说：汉京房著《风角书》，有《集星章》，所载妖星皆见于月旁，互有五色方云，以五寅日见，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枪、天根、天荆、真若、天棖、天楼、天垣，皆岁星所生也。见以甲寅，其星咸有两青方在其旁。

天阴、晋若、官张、天惑、天崔、赤若、蚩尤，皆荧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两赤方在其旁。

天上、天伐、从星、天枢、天翟、天沸、精彗，皆填星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两黄方在其旁。

若星、帚星、若彗、竹彗、墙星、棖星，白藿，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两白方在其旁。

天美、天梯、天杜、天麻、天林、天蒿、端下，皆辰

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两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气所生，皆出于月左右方气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将出不出日数期候之。当其未出之前而见，见则有水旱、兵丧、饥乱；所指亡国、失地、王死、破军、杀将。

这里说的是：由五大行星生出三十五妖星，每一行星生出七个妖星。这三十五妖星皆出于月左右方气之中。其出有时，若未出之前而见，将有军国大灾。除这些外，余皆不明。《隋书·天文志》作了补充，其说：“天枪星生箕宿中，天根星生尾宿中，天荆星生心宿中，真若星生房宿中，天棣星生氐宿中，天楼星生亢宿中，天垣星生左角宿中。天阴星生轸宿中，晋若星在翼宿中，官张星生张宿中，天惑星生七宿中，天雀星生柳宿中，赤若星生鬼宿中，蚩尤星生井宿中（次为镇星所生七星，无生二十八宿中，故不录）。若星生参宿中，帚星生觜宿中，若彗星生毕宿中，竹彗星生昴宿中，墙星生胃宿中，棣星生娄宿中，白藿星生奎宿中。天美星生壁宿中，天兔星生室宿中，天杜星生危宿中，天麻星生虚宿中，天林星生女宿中，天高星生牛宿中，端下星生斗宿中。”此一补充，使京房三十五妖星中的二十八星与二十八宿相配，唯填（镇）星所生之七妖星不与二十八宿相配。

《唐开元占经》卷八十七“孝经雌雄图三十五妖星占”与前述京房三十五妖星大致雷同，所差别者唯星名微异和排列次序有别。其述三十五星：

1. 天垣；2. 天楼；3. 天棣；4. 首若（一本真若）（《晋志》真若）；5. 天荆；6. 天根；7. 天枪；8. 端下；9. 商若（一名天蒿）；10. 天杵（一名天林）；11. 天麻；12. 天杖（一名天杜）；13. 天棣；14. 天英（《晋志》天美）；15. 白旧（《晋志》白藿）；16. 星（《晋志》棣星）；17. 粪星（一本墙星）；18. 林若（一本作彗，《晋志》竹彗）；19. 若彗；20. 帚星；21. 若星；22. 蚩尤；23. 赤若；24. 天雀（一本赤雀）；25. 天惑；26. 官张；27.

晋若;28.天明;29.折若(一本云彗,《晋志》荆彗);30.天拂;31.天翟;32.天枢;33.天从(《晋志》从星);34.天罚(或伐);35.天社(一本天上)。

《晋书·天文志》按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之次序,来排列这三十五星;而《唐开元占经》是按二十八宿的顺序来排此三十五星。所以它将在角宿的天垣排于首位,接着是在亢宿中的天楼等等。东方苍龙七宿排完后,接着排北方玄武七宿,故以在斗宿中的端下为第八位,然后接着是在牛宿中的商若(一名天蒿)排为第九位等等。然后依次排西方白虎七宿,再排南方朱鸟七宿。最后才排填星(镇星)所生的七星,这七星不在二十八宿之中。

《晋书·天文志》云:“各以其所生星将出不出日数期候之。”此言不明,但《唐开元占经》对此却有涉及。它对候三十五星之法有所阐述。其对第一星天垣之说为“天垣星在角宿中,出月左方,日在甲寅。岁星将出而不出,其与日合二十日,其未出二日,必有灾云苍赤黑色三物厌日之光,青色之星有两青方在其旁,出而生天垣之星。所指之国消,主死。政星变色而青,期三年”。对于天垣星(京房三十五妖星,岁星生出之一)生出在角宿中,出现在月左方,在甲寅日那一天。其出生前,岁星与太阳同在一舍约20天,当岁星与太阳相去逐渐变远,岁星就会出现在天空,在岁星即将出现的前二日,有灾云苍赤黑三色形成的物象,压抑住日光。出现青色之星有两青方在其旁,就会出而生天垣星。这天垣星所指向之星宿,其下国亡,其主死。北斗第一星政星(即天枢)会变色而青,期三年。这大约就是晋志所说:“当其未出之前而见,见则有水旱、兵丧等,所指亡国、失地、王死”等等。

再举一例,即在亢宿中的天楼星,其说为“天楼星在亢宿中,出月左方,日在甲寅。岁星将出而不出,其与日合三十日,其未出三日,必有灾云苍赤黑三色物厌日之光,青色之星有两青方在其旁,出而生天楼之星,长八十尺(一本作八丈),所指之国,谷余大贵,法星变色而青,期三年”。关于天楼星与天垣星叙述上之差别,实际

上是：(1)出在亢宿中，而非角宿（天垣星之所出）；(2)岁星与日合三十日，其未出三日（天垣星所出，当岁星与日合二十日，其未出二日）；(3)天楼长八十尺（天垣未云长度）；(4)所指之国谷朶大贵（天垣星所指国消主死）；(5)北斗第二星法星变青色（北斗第二星天璇。而天垣是北斗第一星政星变青色）。除此五点不同外，余皆相同。在这五条不同点中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岁星与日合的天数和将出未出的天数，而这与该星所在的星宿有关。其次的不同点是该星的形状，天垣星的形状不清楚，而天楼长八十尺，肯定是像彗星一类的东西。但对天垣星说“所指之国”，似亦为一种长星。其余岁星所生之妖星也与上述二星差不多，如：“天棣星在氐宿中，……其与日合四十日，其未出四日，……出而生天棣星（一本长十丈），所宿之国有立王，令星变色而青……”这与前二星不同处也是五条，但这里说天棣星的长度只说“一本长十丈”，意思是本文作多少尺抄漏了（据天楼星之说推想当为一百尺）。另外这里不说所指之国，而说所宿之国。又如对首若星（晋志作真若）说：“首若星在房宿中，……其与日合五十日，其未出五日，……出而生首若之星六七尺（一本六丈），所指之国亡地，煞星变色……”这里说星长六七尺可能是六十尺之误。其余均与前述诸星保持五点差别。再一星是天荆星“在心宿中，……与日合六十日，其未出六日，……出而生天荆之星，所指之国亡，战不胜，主死。伐星变色……”这与天垣星一样，没有说其长度什么的，但说它所指之国如何。岁星所生的妖星还有两星，一是天根，一是天枪，按二十八宿之次序，天根在尾宿，天枪在箕宿；岁星生天根星要与日合七十日，其未出七日；而生天枪则要岁星与日合八十日，其未出八日。可见是随二十八宿之递进而增长，每进一宿，与日合增加十日，未出增一日。对应的北斗星天根为危星，天枪为应星。天根星是否有长度未讲，而天枪星说长数丈。

对于由辰星变生的七妖星是端下、商若（《晋志》作天蒿）、天杵（《晋志》作天林）、天麻、天杖（《晋志》作天杜）、天棬、天英（《晋志》

作天美)。这些星都“出月左方,在壬寅日,辰星与日合,其未出日必有灾云黑黄青三色物厌日之光,黑色之星有两黑方出其旁”,北斗七星皆变黑色,期一年。其格局皆与岁星所生诸星同,只是(1)妖星生出日为壬寅日;(2)是辰星与日合;(3)灾云是黑黄青三色;(4)黑色星有两黑方;(5)北斗诸星皆变黑色。对于由太白变生的七妖星是:“白旧(《晋志》作白藿)、星(《晋志》棖星,《宋志》权星)、粪星(《晋志》墙星)、林若(《晋志》竹彗)、若彗、帚星、若星。由于这七星出自太白,故在庚寅日见,在西方七宿,灾云为白赤黑三色,出白色之星有两白方在其旁,北斗七星变白等等。然后是荧惑变生的七妖星:“蚩尤、赤若、天雀(《晋志》天崔)、天惑、官张、晋若、天阴。”生在荧惑故以丙寅日见,在南方七宿之中,灾云为赤青黄三色,出赤色之星有两赤方在其旁,北斗七星变赤等。最后是填星所变生之七星,即折若(《晋志》作荆彗)、天拂、天翟、天枢、天从、天伐、天社(《晋志》天杜)。这七妖星与前二十八星最大之不同是无二十八宿对应,其余皆与前格局相同。因其由填星所生故在戊寅日见,黄色之星有两黄方在其旁。北斗七星变黄色。

将上述列成一表备查如下:

妖星名	所在宿	出现日	所 生 星 情 况					形状和占方	相应之北斗星
			星名	与日合日数	将出未出日数	灾云色	星和方色		
天垣	角	甲寅	岁星	20	2	青赤黑	青	所指	政星
天楼	亢	甲寅	岁星	30	3	青赤黑	青	80 尺所指	法星
天棣	氐	甲寅	岁星	40	4	青赤黑	青	十丈所宿	令星
首若 (真若)	房	甲寅	岁星	50	5	青赤黑	青	六丈所指	煞星
天荆	心	甲寅	岁星	60	6	青赤黑	青	所指	伐星
天根	尾	甲寅	岁星	70	7	青赤黑	青	所指	危星
天枪	箕	甲寅	岁星	80	8	青赤黑	青	数丈所指	应星
端下	斗	壬寅	辰星	20	2	黑黄青	黑	所指	政星
商若 (天蒿)	牛	壬寅	辰星	25	2	黑黄青	黑	三四尺所指	法星
天杵 (天林)	女	壬寅	辰星	36	3	黑黄青	黑	七八尺所指	令星
天麻	虚	壬寅	辰星	35	5	黑黄青	黑	七八尺所指	煞星
天杖 (天杜)	危	壬寅	辰星	40	4	黑黄青	黑	十余丈 勾曲所指	伐星



续上表

妖星名	所在宿	出现日	所 生 星 情 况					形状和占方	相应之北斗星
			星名	与日合日数	将出未出日数	灾云色	星和方色		
天棓	室	壬寅	辰星	45	4	黑黄青	黑	五六尺所指	危星
天英 (天美)	壁	壬寅	辰星	50	5	黑黄青	黑	十丈所指	应星
白旧 (白藿)	奎	庚寅	太白	10	1	白赤黑	白	所指	政星
星 (棖星)	娄	庚寅	太白	20	2	白赤黑	白	所指	法星
粪星 (墙星)	胃	庚寅	太白	30	3	白赤黑	白	十八丈 (或丈余) 所指	令星
林若 (竹彗)	昂	庚寅	太白	40	4	白赤黑	白	十余丈 (或七尺) 所指	熬星
若彗	毕	庚寅	太白	50	5	白赤黑	白	七八尺所指	伐星
帚星	觜	庚寅	太白	60	6	白赤黑	白	所指	危星
若星	参	庚寅	太白	70	7	白赤黑	白	所指	应星
蚩尤	井	丙寅	荧惑	30	3	赤青黄	赤	丈余 (或十七丈) 其下	政星
赤若	鬼	丙寅	荧惑	40	4	赤青黄	赤	其下	法星
天雀 (天崔)	柳	丙寅	荧惑	50	5	赤青黄	赤	所指	令星

续上表

妖星名	所在宿	出现日	所 生 星 情 况					形状和占方	相应之北斗星
			星名	与日合日数	将出未出日数	灾云色	星和方色		
天惑	星	丙寅	荧惑	60	6	赤青黄	赤	三角,长三尺所指,下	煞星
官张	张	丙寅	荧惑	70	7	赤青黄	赤	三角而勾所指	伐星
晋若	翼	丙寅	荧惑	80	8	赤青黄	赤	所指	危星
天阴	轸	丙寅	荧惑	90	9	赤青黄	赤	所指	应星
折若(荆彗)		戊寅	填星	40	4	黄赤青	黄	长五尺所指	政星
天拂		戊寅	填星	50	5	黄赤青	黄	所指	法星
天翟		戊寅	填星	60	6	黄赤青	黄	四角而勾中央有星长四、五尺,所指	令星
天枢		戊寅	填星	70	7	黄赤青	黄	三角而勾所指	煞星
天从		戊寅	填星	80	8	黄赤青	黄	长六七尺所指	伐星
天伐(天罚)		戊寅	填星	90	9	黄赤青	黄	所指	危星
天社(天杜)		戊寅	填星	100	10	黄赤青	黄	所指	应星

从上表可对京房三十五妖星有个总的了解。这一系列妖星的总体是由五大行星产生,其产生的先发情况是当太阳与该大行星相合之后(相合时间可推知或观测),将出未出之时(这一时间似乎与该行星与太阳相合时间成正比,且大抵为直线关系)。在这个未出之时,会有三种颜色的灾云出现,这些灾云呈现为某种物象,压抑住太阳的光芒。似乎这时就会出现与该大行星五行基本色相同颜色的“星”。例如岁星基本为青色,在岁星与日相合后,将出未出

之时,在太阳光芒受抑的情况下,会出现青色的“星”。还同时在其旁出现两青色方气。这时就可能会在月亮旁边见到妖星,至于是何妖星,要看它出现在何宿,呈现什么形状。对于岁星所生诸妖星出现的日期必须是甲寅日,这可是一个很严厉的约束性规定。由此可见,妖星的出现并不太容易,要注意到这三十五妖星一般说有三种形状,即长形,最长可达十余丈;勾形,有四角而勾,三角而勾和长而勾曲;还有一种未加说明的形状,尚难确定其具体形态。由上述可以看出,妖星在本质上只与行星运动的状况,和行星由伏而见前夕的大气变化状况有关。

《晋书·天文志》以前,在《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中均已对妖星作出记录,《晋志》则将所有恒星和五大行星以外的杂星列为一目,下分“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四个子目。在“妖星”子目下共列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二十一种妖星,其中包括彗星、孛星等等。所以说是传统妖星,因为从《史记·天官书》以来各史志都有记载。历史上已将这二十一种名目的星象列为妖星之类。第二种是《河图》所述四十妖星。《河图》四十妖星亦说是五大行星之精流散而成。第三种则是京房三十五妖星。为了进一步考察京氏三十五妖星,有必要对晋志所说之前两类妖星稍作考察。

从《河图》四十妖星的情况说起。《河图》四十妖星的情况,按《晋书·天文志》说:

岁星之精,流为天棓、天枪、天猾、天冲、国皇、反登、苍彗。

荧惑散为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棣、赤彗。

填星散为五残、猗汉、大赍、昭星、绌流、旬始、蚩尤、虹蜺、击咎、黄彗。

太白散为天杵、天柎、伏灵、大败、司奸、天狗、天残、卒起、白彗。

辰星散为枉矢、破女、拂枢、灭宝、绕纆、惊理、大奋祀、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长短，曲折应象。

《河图》总括的四十妖星，可能是将古来天文史志和诸家星占中之各种杂星加以整理概括而得。就其四十种妖星与传统二十一妖星相比，就有天棓、天枪、天冲、国皇、蚩尤之旗，昭明、天棬、司危、五残、六贼、狱汉、旬始十二种相同。而传统二十一妖星中列于为首的彗星和孛星二种，即所谓“偏指为彗，芒气四出曰孛”，实际上应是两类妖星。河图四十妖星中将彗星按五行基本色分为五色彗，即由岁星流散为苍彗，荧惑之精流散为赤彗，镇星之精流散为黄彗，太白之精流散为白彗，辰星之精流散为黑彗。孛星在河图四十妖星中看不分明。这样一来，河图四十妖星之半于传统妖星中得之。是以《唐开元占经》以两卷篇幅（卷八十五和卷八十六），共罗列五十三耀星，河图中除五色彗及蚩尤、虹蜺二星外悉皆列入。五色彗作为彗星列入其八十八卷彗星占中，虹蜺在晋志中列入“云气”一目中“妖气”支目，其说妖气“一曰虹蜺，日旁气也，斗之乱精。”蚩尤除见于京房三十五妖星外，别无所见。不过京房将蚩尤列在荧惑之气所变生，河图将它视为填星之精所流散，两者并非一样。由以上对河图四十妖星的考察可知，它本质上是以五星之精流散为妖星的观点为基础，将诸种妖星按星归类。就此而言，京氏三十五妖星却不是这样，他绝少有类同于史志所载妖星之名者，除三十五星中之天枪、天棬二名与传统妖星有所重复外，其余均是其独有。但两者有相同之处，即均将妖星归结为五大行星所变生。虽同为五大行星所变生，但其间也有相异之处。

据《汉书·天文志》说：“岁星赢而东南，石氏‘见彗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类星、末类彗，长二丈。’赢东北，石氏‘见觉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棓。本类星，末锐，长四尺’。缩西南，石氏‘见棬云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枪，左右锐，长数丈’。

缩西北,石氏‘见枪云如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棓,本类星,末锐,长数丈。’”这里说传统二十一妖星由行星生发的情况。岁星行东方时谓盈,而行西方时为缩。赢谓超舍而前,即超过了宿度;迟为退舍,即届时未至宿度。亦可从出见情况言赢缩,凡早出为赢,晚出为缩。《汉书·天文志》注引孟康说:“五星东行,天西转。岁星晨见东方,行疾则不见,不见则变为妖星。”又说:“岁星当伏西方,行迟早没,变为妖星也。”即当早晨见岁星出东方地平(或者伴随着某一星官),由于“天球”由东向西旋转,岁星绕日公转,表现为由西向东行。岁星行疾,很快没入地平不见,当见不见就出为妖星。岁星在西方伏(不见),由于行迟,故晚出而致提早没入地平,当见不见变为妖星。按岁星在天空运行之方位,而有各种妖星。岁星赢于东南则见彗星;赢于东北则为觉星,即天棓;岁星缩于西南则见天枪,缩于西北则有天棓。觉星或天棓的头类星,其尾尖,长四尺;天枪左右尖,长数丈;天棓星则头类星,尾尖,长数丈。《汉书》只说了彗星、天棓、天枪、天棓等妖星的变生。《河图》四十妖星,将苍彗列为岁星之精,天棓、天枪亦为岁星所流散,而天棓列为荧惑之散精。看来《河图》将妖星之分类亦有其自己的思考,但他没有作出说明。由于汉志摘引的是石氏和甘氏之说,这两位星占家不仅在京房时代具有权威性,即使在后世也视为星占之经典。所以其说对京房有很大影响,或许京房认为妖星由五大行星所生的思想由此而来。

在京房时代还有《黄帝占》一家也是比较古老的,它说了一种候彗星之法,“当以五寅之日视瓮水中,见两方气在日旁,则彗将出矣。其与北斗之星各有所主,乃视气之五色相象而定之。其彗星之出,以寅日见有青方气在日旁,此岁星之精将欲为彗。以寅日见赤方气在日旁,此荧惑之精将为彗。各以五色气候之。是则五星将欲为彗之变,先见其气,后见其彗”(《唐开元占经》卷八十八)。《黄帝占》的候彗星法原理是“五星将欲为彗之变,先见其气,后见其彗”。这一原理对京房有很大影响,回想前面京房候日食法,可

知京房占与黄帝占的关联。只是黄帝占说得比较扼要,不像京房那样详细而具体。《黄帝占》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它虽为先秦之书,但有不少内容是汉或汉以后掺入的。不过《黄帝占》的气变思想肯定是汉以前就有的,而且京房的时代,气的学说已很流行。将气的五色变化与五行变化联系起来,在当时也是自然而然的。这对京房三十五妖星系统的建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黄帝占》在这里还冒了一句话,“其与北斗之星各有所主,乃视气之五色相像而定之”。似乎是说气的五色变化与北斗之星的五色变化有相像之处。气有何色变,北斗星也有与之相像的色变,所以北斗星与彗星的生成有气色相像的关联。

《唐开元占经》卷八十八还引用了石氏对彗星的占测,说:“候彗灾应之法,各以十二辰所出之地,名属相连,冲破之下,当有兵诛。假令彗星出室壁而依戌地,奎本鲁分,室壁亥分,冲于寅,尾箕燕分;破于辰,角亢郑分。明鲁有兵诛于此国,他皆仿此。”石氏认为,彗星出于天空的某个星宿或星官,根据此星宿(或星官)对应的分野作出相应的占测。他假设彗星出于室壁,当十二辰为亥,据《晋书·天文志》“十二次度数”说:“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为诹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属并州。”又说:“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为降娄,于辰在戌,鲁之分野,属徐州。”诹訾与降娄二星次紧接相连,从而十二辰中亥亦紧靠戌。或许这是石氏说“依戌地”的理由。但若认真考察起来,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突出主要方面的表述。其实诹訾星次延续到奎四度,奎一度至四度当鲁国东海地区的分野,奎宿五度至十六度入降娄星次,即入戌宫,占奎宿整体的四分之三,对应于鲁国的主要地分。其余鲁国地区,有对应于娄宿者,甚至延续之胃宿,如鲁国胶东地区入胃一度。即是说这里以鲁国为主,以鲁国对应的星象奎宿为主,从而十二辰中的戌位突出起来。十二辰中的戌与十二辰中的辰位直接相对,一般谓之相冲,石氏谓之破。辰位与戌位相冲,其在天上则对应于翼轸之宿。具体说来,晋志十二次度数说是“自轸十二度至氏四度为寿星,于辰在辰,郑之分野,属

兗州”。所以石氏说：“破于辰，角亢郑分。”除此而外，古代星占中的建除家从北斗星的星占出发，说“对七为冲，隔三为破”所谓对七为冲，即如辰与戌之冲对。按十二方位而言共有六组对冲，即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相冲。所谓隔三为破，是说月建之辰，前三位为天罡为破，当破军星也。后三位为河魁，魁罡对冲。星占家按北斗七星之排列，第一星取为贪狼为魁，第七星取为破军为罡。当初冬至为岁首，太阳在星纪之次，按晋志十二次度数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之分野，属扬州”。故知星纪于十二辰在丑。丑之前三位为辰，后三位为戌，故戌为河魁，辰为天罡。后加变动，以斗建之辰为主，若正月雨水斗建寅，寅前三辰为巳为罡，寅后三辰为亥为魁，魁罡相对，即示为巳亥相冲。石氏又以彗星所出之辰为主，现彗星出室壁亥地，亥前三位寅为罡为破军星（所谓隔三为破，但石氏却说是冲），所以石氏说：“室壁亥分，冲于寅，尾箕燕分。”按隋肖吉《五行大义》言“冲气为轻，破气为重”。可能石氏以鲁分为主占测，其对冲之地当为害较烈，故言戌破于辰。而寅位较轻，故说冲于寅。石氏这一例占，实为彗星占测之基础方法的说明。其基本观点是彗星与二十八宿背景星有关联，还与北斗的星占情况有联系。这固然这是由于占测的需要，但也由于认定彗星，乃至一切妖星是由五大行星生出。由于五大行星在天空的运行基本上是循二十八宿，因而其生成者亦当在二十八宿附近。

在讲述了《河图》四十星，《黄帝占》候彗星法和石氏候彗星灾应法之后，就可看出京房三十五妖星是京房对彗星孛星为主的全天妖星作的一种系统的整理。他整理的思想基础正是河图所体现的一切妖星是五大行星所生。这在其《集星章》中也已说得分明（《河图》可能出于京氏之后，也可能吸取了京氏的观点）。同样《黄帝占》说了“五星将欲为彗之变，先见其气，后见其彗”的观点，京房依以为据。在这方面京房从易学的研究上和对太阳观测中有他自己更为深刻的体会，但是对五星彗妖之变，先见其气的思想却可能

受《黄帝占》的启发。还有就是石氏,在谈到河图四十妖星时,已经谈到《汉书·天文志》所引石氏和甘氏对彗星妖星之生出与行星运行的关系。而这里又进一步引了石氏关于彗星占测时强调了彗星所出之星宿。因而京房三十五妖星是五大行星生成,生成前在日旁大气有五色之变。因此它与五星五色气有直接关系,与行星的运行状况有关系,与太阳和五大行星的相对位置有关系。因而京房的三十五妖星是一种关于彗星和妖星的生成理论,是他的八宫卦系统对妖星的一种解释机制。

由于京房《风角书》及其《集星章》已经散失,其详细情况已不可得知,以上根据有关材料进行的探查,可以相信京房是在按照他所建构的以阴阳五行为机制,八宫卦为构架的系统对一类天象——即以彗星、孛星为主体的妖星系统,所作的全面的整理。所以以如此长的篇幅叙述这个相对沉闷的妖星系统,就在于描述一个可能的例子,说明京房的关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研究和努力。



## 四 京氏气候灾异占

本节所述是京房关于气候灾异占的一些主要内容。主要是从《汉书·五行志》提供的京房占测材料来对京房这方面的工作进行阐述。按照现存有关京房的占测材料看来,京房对于各种气候变异,诸如风雨雷电、霜雪冰雹、寒暑雾露、霰霏霆霾等等都作过观察和占测。这里只能就其材料尚存较多,且能观察其思想动向者稍作整理,以对京房的工作有稍多的了解。

在进入主题叙述之前,先将《汉书·五行志》约略说几句,以便对京房的气候灾异占的材料引用有一个背景情况的了解。《汉书·五行志》是按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歆的观点编纂的。刘歆认为《尚书·周书·洪范》所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响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即是《洛书》本文。他还说了与《洛书》并称的《河图》,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洪范》一共九条,所以亦称九畴,是苍天赐予大禹的九章大法。刘歆认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因此他直接将《洪范》九章作为大法,直接与各种事物联系起来,依《洪范》所示的图式,对事物分类、对应等等,并给予解释,自然也可作出相应的占测。可能京房对刘歆如此这般的设计不会同意。虽说刘歆认为八卦与九章相为表里,但他用《洪范》解说一切,似乎将九章置于比八卦更为重要的地位上。京房如果知道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同意。因为他更倾向于强调八卦系统更为本质,也更为重要。刘歆为了建立《洪范》模式,着重注意用《洪范》所说,来解释历史上或者当前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即是说他想用《洪范》模式来解释世界。可是京房着力于探求事件的深层结构,他建构的八宫卦系统和他的卦气系统,其实都是在深层

次上探求天地人三者根本上的一致。因此他不会认为《洪范》的九畴是这一深层机制的具体表现。但是九章大法中的五行机制却与京房的八宫卦系统有相通之处,所以京房的许多研究和叙述可以引用到九章大法的解释系统中来。这就使得《汉书·五行志》的作者能遵循刘歆原则的条件下,有选择地采纳京房的某些材料,敷衍成《五行志》的论述体系。这样一来,以下的讨论基础,是被《五行志》引用过程中支离了的那些京房材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看看能对京房说些什么和对他的讨论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

### (一)关于蒙气

在第一章中论述的京房最后呈送给汉元帝的几份上封事中,都是针对当时蒙气情况而作的解释和推占。在京房日占和日食占中,也看到京房对蒙气的关注。蒙气在京房卦气系统中显然居于重要的地位。王保训所集的《京氏易传八卷》(《木樨轩丛书》),将散见于《汉书·五行志》、《唐开元占经》等书中有关的内容,集录在一起,兹抄录如下:

臣私禄及亲,兹谓罔辟,厥异蒙;其蒙先大温,已蒙起,日不见。行善不请于上,兹谓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谋,臣辟异道,兹谓不见,上蒙下雾,风三变而俱解。立嗣子疑,兹谓动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兹谓不聪,蒙,日不明,温而民病。德不试,空言禄,兹谓主竊臣夭,蒙起而白。君乐逸人,兹谓放,蒙,日青,黑云夹日左右前后,行过日。公不任职,兹谓怙禄,蒙三日,又大风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兹谓闭上,蒙大起,白云如山,行蔽日。公俱不言道,兹谓蔽下,蒙大起,日不见,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云蔽日。禄生于下,兹谓诬君,蒙微而小

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兹谓盗明，蒙黄浊。下陈功，求于上，兹谓不知，蒙，微而赤，风鸣条，解复蒙。下专刑，兹谓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厌小臣，兹谓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风发，赤云起而蔽日。众不恶恶，兹谓闭，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见。漏言亡喜，兹谓下厝用，蒙微，日无光，有雨云，雨不降。废忠惑佞，兹谓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兹谓不明，蒙浊，夺日光。公不任职，兹谓不绌，蒙白三辰止，则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进善君不试，兹谓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众在位，兹谓覆国，蒙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风扬尘。知佞厚之，兹谓痺，蒙甚而温。君臣故弼，兹谓悖，厥灾风、雨、雾，风拔木，乱五谷，已而大雾。庶正蔽恶，兹谓生孽灾，厥异雾。

以上所引，京房一口气讲了二十五种蒙气。他在之前说了一句稍带定义性的话：“蒙如尘云”，这之后即讲了这二十五种蒙气。对之稍作观察即可知道：

1. 蒙气起必伴随日不明。即蒙气削减或抑制了太阳光。有时写为日无光，日不得见或云蔽日等。以上二十五种蒙气中，明确说明这种状况的有十三种，其中也包括“有逸民，兹谓不明，蒙浊，夺日光”中“夺日光”一种。

2. 蒙气与寒温。其中直接说到蒙气起之前后有寒温变化的共五种。

3. 蒙气与风。上述二十五条中，有六条明确讲到蒙气生后有风。

4. 蒙气和雨。其中有四条说到蒙气有雨相随；有两条说到“若雨不雨”和“有雨云而雨不降”。

5. 蒙气颜色变化。提到蒙气颜色的共有九条。另有一条说到

蒙气浊，而未明确其颜色。这九条说到颜色的蒙气中，赤色有三条，白色有两条，青色亦有二条，黑色一条，黄浊一条。如果加上“蒙起浊”，就有十条。

6. 蒙气的解或复。共有四条说到解或复。有一条说“蒙一日五起五解”，这是一种蒙气快速变化的情况。有一条“解复蒙”，虽说比一日五起五解慢，但也是间隔不长就蒙气解而又复蒙，也是较快变化的情况。有一条说“若解不解”，还有一条说：“风三变而俱解。”还有二条，虽不是说蒙气解复情况，而是说“蒙不解”，和“至十二日解”的话。其蒙不解是在“蒙三日，又大风五日”之后所说。其至十二日解是在“若雨不雨”之后说。这两条说明风雨和蒙气解有关，也是说蒙气慢变化的情况。

7. 蒙气与雾。一共有三条。二十五种蒙气中的最后两种，说到“厥灾风雨雾”和“厥异雾”。似乎起雾也是一种蒙气。但其“辟不下谋，臣辟异道，则上蒙下雾”，看来蒙与雾有别。

以上摘出的七条关于蒙气的状况，表明京房注意一种气候变化的状态与其他气候状况变化的相关，即注意伴随现象和相关的变化。在其他星占家那里，就很难找到这一类资料记录。《唐开元占经》是一种占测类书，对于同一现象的占测，将各派星占家的占辞集中在一起。其卷一百一中讲述了诸种气候情况的占测。在“蒙”这一目中，可以看到其他著名星占家有关蒙的占词。但大都注意蒙气的定义和占测，前述的京氏蒙气七条却基本上不相及。

京房对于占测资料注意观测，注意伴随现象，注意占测现象的变化过程的特点，反映他有更深刻的考虑。他可能更加关心对这些观测资料的系统的整理，而对其直接人事占测有时却不那么在意。例如这二十五条蒙其占中，“公不任职”之占就有两条，一谓“怙禄”，一谓“不绌”。对应的蒙气也不相同。对于不同的蒙气状态，为什么对应于同一种人事现象却未加说明。

再进一步看《五行志》怎样利用京房的这种蒙气资料。在《五行志》中，京房关于蒙气的叙述被列于“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

眊”这一类目之下。据《汉书·五行志》：“皇，君也。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眊就是眼睛迷迷蒙蒙看不清，悖是遮蔽的意思。所以《五行志》的观点是，君王不明或惑乱，就会出现蒙气。稍作推论，就可说蒙气是君王暗弱的表现。将京房关于蒙气的占词考察一下便知，京房不会反对这个观点。不过京房对蒙气的占测，从其 25 种蒙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与五行志的基本观点还是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京房除了同意蒙气表现了君王的不明智和暗弱而外，还认为有臣下蒙蔽君王的意思。当然五行志也不排除这一点，如它说“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只是它强调的是“上失中”这个前提。京房则认为蒙气表示臣下蒙蔽君王更为主要或切近。京房在建昭二年（公元前 37 年）所上的几次封事中，就强调了这个观点。在这年二月朔日上的封事中说“少阴倍力而乘消息”，又说“此（指蒙气）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接着在赴任途中至陕上的封事中说“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这都说明臣下竭力蒙蔽君王的情景。可见京房的观点，认为蒙气是一种气候的变化，而气候变化是阴阳二气相盗的结果。大气阴阳相盗或者取得某种平衡，或者是阳盛阴衰，或者是阴盛阳衰。而蒙气则是一种阴盛而阳衰的状况。《五行志》大概也同意这种观点，它说“天气乱，故其罚常阴”，又说“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等等。但将这种气变应用到人事时，京房强调的是“阴盛”，君为阳而臣为阴，即认为主要是臣下蒙蔽君王。《五行志》强调阳衰，故说“上微弱则下奋动”。京房观点和《五行志》观点的差别还可从一个例子看出来。《五行志》引昌邑王贺即皇帝位那一天“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这是一种蒙气现象。这位登了位的昌邑王想外出，光禄大夫夏侯胜挡驾，当车劝说“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夏侯胜的这一行为触动当时的权臣霍光，因他当时正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废去昌邑王的帝位。当霍光得知张安世并未透露他们的计谋，就立即召问夏侯胜。夏侯胜

呈上《洪范五行传》，其中有言“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他还解释说，不敢直说有下人伐上，只敢说臣下有谋。后来霍光、张安世他们果然废掉了昌邑王贺的帝位，正是蒙气或常阴的效验。但是《五行志》强调君主昏眊必有臣下伐上的《洪范五行传》观点。

京房的蒙气占是建基于他的卦气系统，从阴阳相盗的观点来看阴阳的消长。天气变化固有阴阳相盗的结果，人事变化也是阴阳二气相盗的结果，但表现出来的却诸如君臣之间的斗争，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斗争等等。在卦象上则有阴阳爻象相应的变化。但是《五行志》却是依据《尚书·洪范》或对洪范的解释来看蒙气。所以二者的区别虽然微小，但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 (二) 虹蜺之占

《史记·邹阳列传》说到邹阳上书中说“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其注中引应劭说：“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故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又引《烈士传》说：“荆轲发后，太子自相气，见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后闻轲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是畏也。”虹蜺之占自古有之。在京房看来，虹蜺只是一种大气现象，他对虹蜺说过稍带定义性的话，《唐开元占经》九十八卷引京房说：“虹，日旁气也。”《汉书·五行志》则引京房《易传》说：“蜺，日旁气也。”即京房认为虹蜺是一种与太阳有关的地球大气现象。其他有关星占书也说到这方面的情况，《汉书·天文志》说“虹蜺，阴阳之精。”《春秋·元命苞》说“阴阳交为虹蜺”。就是说虹蜺也是阴阳二气相盗的某种状态。它与蒙气的主要差别有二：第一个差别是蒙气是一种带有全天候性质的气变状况，而虹蜺只是在与太阳方向或其冲位有关的局部气变状态。第二个差别是蒙气是阴盛（《洪范五行传》说是阳衰），而虹蜺的阴阳状况则较为复杂。按蔡邕《月令章句》

说：“虹，蜺也，阴阳交接之气，著于形式者也。雄曰虹，雌曰蜺。常依阴昼见于日冲，无云不见，太阴亦不见，虹常依象阳，见于日旁，白而直者曰蜺。”这里讲了虹蜺的可见状态，一般是薄阴天气见于日的冲方，晴朗无云不见，过分浓重的阴天也看不到。虹也常依傍于太阳并向着太阳，白色的直气叫蜺。即蜺为偏阴之气，而虹为偏阳之气，当然都只是极其局部的偏阴偏阳之气。总之虹蜺只是局部气变状态。

不过京房对于虹蜺的观测可能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易飞候》中说：“虹凡相有五法，苍无胡虹也，赤无胡者蚩尤旗也，白无胡者蜺也，冲不屈者天杵也，直上不诘者天棓也。”前节中，在京房三十五妖星中有天杵，但是在《晋书·天文志》却不是天杵，而是天林。在河图四十妖星中，天杵是太白之精所流散。天棓为岁星之精所流散。蚩尤旗为荧惑之精所流散。因为这些都又是传统妖星的名称。因而京房以为传统妖星中（从而河图妖星，但应考虑到河图妖星之说可能在京氏之后）的一些重要名目，并非属于妖星之列，只不过是一种日旁气——虹蜺的一种。在京房看来妖星与日旁气的主要区别在于妖星由五星之气所生，而虹蜺却只是日傍气。

从日旁气的角度来看虹蜺，他立即对之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京房说：“虹春出西方，黑云覆之夏大水；白云覆之夏多寒，民病疟若温病者；赤云覆之夏多旱；黄云覆之夏大旱，谷不熟。虹夏出西方，黑云覆之秋多雨；白云覆之冬多风；青云覆之冬多寒，民病疟若病瘟；赤云覆之秋大旱，黄云覆之秋大收。虹秋出西方，黑云覆之冬多雨，白云覆之冬多风又多寒，民病疟若病瘟；赤云覆之冬大旱，若黄云覆之冬余大贱。虹冬出西方，黑云覆之春多雨；白云覆之春多狂风；青云覆之春多寒，民病疟若病瘟；赤云覆之春大旱，黄云覆之春雨和调。”对于四季虹出西方，五色云覆之的情况作了占测的整理。可以看出，虹春出西方没有青云覆之的情况，虹秋出西方也没有青云覆之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可能书写时有缺失，因为秋出西方的情况说“白云覆之冬多风又多寒”，按夏出和冬出情况看，都

是青云覆之多寒,民病疟等等,所以白云覆之多风,青云覆之才多寒。再看虹春出西方,说“白云复之夏多寒”,看来应是白云覆之多风,而青云覆之多寒,其中落失了“多风,青云覆之”六字。这正是京房的兴趣所在,将一切事情都像他的八宫卦那样,都能排列得规整有序。他对在西方出现的虹作了研究,可能由于他更习惯于早晨观测,这时太阳尚在东方,观测到在太阳冲位(西方)的虹。在太阳周围也会有虹出现,京房可能将之列为虹晕之类,这在本章第一节末尾已经提到。

京房也提到虹出南方和虹出北方的情况。他说:“虹出南方,无春夏秋冬所见之处,不出三年,民流亡不归收葬,风雨不时,民饥。”又说:“虹出北方雨,阴阳不调,当雨反旱,当旱反雨,冬夏不调,万人大愁。所照之国必有卖幼孙者,其岁多病疾,夏小雨,冬荒。不出三年,所照之国,民守其仓,暴骨惶惶,哭泣相望,童子行行。大旱二百八十日乃雨,所照之国尤甚。”大概对南北方出现的虹就说了这一些(引文自《唐开元占经》卷九十八)。这大概反映很少在南北方观测到虹,而且京房也缺少足够的材料,来进行他喜欢的规整有序的整理和研究。

按照京房风格,虹的出现一定有其伴随现象,和其特有的形态,而且总要对方位和对日、时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叙述。果然在《唐开元占经》卷九十八中,记载了京房这方面的叙述。关于伴随现象和虹蜺特有形态者,如说:“温而不雨,虹出无处者,下精不功之事也。”又说:“虹出横至上反入,又不曲,正直者,不出九十日,民多病死,不出三年大旱,民流亡,所照之国尤甚”;又说“虹出直上行名曰章,所出之处,民多病而死,民多瘟者,不然大旱千里”。关于虹蜺之出没说“五虹以甲乙出东方,岁若谷大贱,犬食人食;丙丁出南方,天下大旱;庚辛出东南釜不充,釜食多空,户五步六死人”。关于虹蜺出时、日说“虹以四月、五月、六月出西,麦贵;七月、八月出西,菜贵;九月出西,大小豆贵;十月出西,尽贵,一出一倍,再出再倍……饥民千里;十月虹出东北者,其国亡”。虽然这些材料很



不完整,但京氏特色历历可见。

《汉书·五行志》主要引用了京房关于蜺的叙述。可能由于京房自己建立了自己的三十五妖星系统,而将传统妖星天棓、蚩尤旗和天杵等这些著名妖星视为虹气,这就与传统的天文史志和星占家之说不同,《五行志》不能接受他的这种反传统观点,因而《五行志》几乎未引用京房关于虹占的任何占词。但是虹蜺之占是不可忽视的,因而《五行志》又引用了京氏蜺占,而且是大段地征引。京房的基本看法是蜺表示关于人君后妃的情况,他说:“凡蜺者阴挠阳,后妃无德,以色亲也。”《五行志》引的蜺的十四种情况,全是关于后妃方面的。如其所引的第一种情况说:“后妃有专,蜺再重;赤而专,至冲旱。”即认为出现两重或两重以上的蜺,则后妃有专。若蜺赤色而圆,那么至冲位时旱。按孟康注说:“专,员也。若五月再重,赤而员,至十一月旱也。”十一月是五月的冲位。五月建午,而十一月建子也。又如其所引的第九种情况说:“妇人擅国兹谓顷,蜺白贯日中,赤蜺四背。”这种天象即是白蜺贯日,同时还有红色的蜺四背。四背者,本章第一节说过,京氏对它的定义是:“日中赤外青,曲向外名为背。”因此四背即言有四个呈条状的青赤色气,曲向外,背对日面。又如《五行志》引京氏蜺占的第十四种情况说“尊卑不别兹谓牒,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则日出且雨”。他说的出现牒的情况,蜺出现三次,历三个时辰,蜺消除后,有日出而且下雨的天气。对这一条韦昭作注说“若从寅至辰也。蜺且见西,晏则雨”。也是说蜺出现在太阳冲位,早晨寅至辰时观测。故蜺在西方。除《五行志》引十四条蜺占外,京房还有几条蜺占未被五行志收入。例如京氏《对灾异》说“虹蜺近日,则奸臣谋;贯日,客伐主。其救也,释女乐,戒非常,正股肱。入贤良”。虽说蜺的出现主要是关于人主与后妃间的关系,戒人主好色,戒人主以色而亲无德之后妃、女乐等。然而他说到碰上奸臣谋、客伐主时,要挽救却要“戒非常、正股肱、入贤良”。即他指出要警惕奸邪之臣利用受宠后妃的阴谋手段。

京房的处境是受奸臣宦官石显等的排挤,因而他对奸佞之臣最为痛恨,因而他对蒙气、虹蜺等气候现象占测,均强调阴盛之为灾。在他看来,元帝时的灾异频仍,政治败坏均是石显等一般奸臣所致。而后妃之情况当时并不严重,故虽然也是属阴,按星占法则如果后妃有变,也是阴盛之灾,可他总是要与奸臣邪佞之徒相联系。刘歆就不同了,他活到王莽时代,看到了后妃对政治带来的影响,因而他比较注意京房的蜺占,在“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眚”这一类中,将京氏蜺占十四条置于京氏蒙气占二十五条之前,即他认为后妃干政的灾祸更为严重。很可能这是京房与刘歆在占测观点上的差别的原因。星占本质上决定于星占家自身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而非决定于遥远的天象。

### (三) 风和地震之占

《汉书·五行志》引述了《洪范》九畴中的第二畴:“次二曰羞用五事。”关于这五事《尚书·洪范》是这样说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又引其第八畴“念用庶征”,说:“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暘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将这两畴结合起来,构成了《汉书·五行志》中卷和下卷之上的叙述方式。本节所讨论的风占,是属于第二畴羞用五事中的第五事“思”,思曰睿(《五行志》为睿,读 xùn,此外睿读 ruì。两者用法相同,都是明智通达的意思),睿作圣。在第八念用庶征中,圣为“时风若”,与圣相对立的是“蒙”(《五行志》为霏,读 mǒu,和蒙的用法相同,于天气而言,是指天色昏暗,于人而言是指为人愚昧),蒙则“恒风若”。“时风若”就是及时的刮风,或及时有好风来。

“恒风若”就是不时地刮风，或常常乱刮大风。《五行志》注引师古说“凡言恒者，谓所行者失道，则寒暑风雨不时，而恒久为灾也”。

《洪范》九畴关于风就说到这里。《洪范五行传》因风与“思”一事有关，故将风占列于思心一类，其说“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厥咎霪，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在汉武帝时，夏侯始昌善推五行传，传族子夏侯胜，其传与刘向同。大概刘歆又有自己的看法，故刘歆关于《洪范五行传》有异于刘向和夏侯氏者。《五行志》说到刘向有云，“刘向以为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即刘向认为风还与木有关。对植物的开花结实有作用。《五行志》说：“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一曰地气盛则秋冬复华。一曰华者色也，土为内事，为女孽也。”意思就是草木花实与风气有关，与地气有关，所以风与土对应。为了强调这一点，五行志又说：“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则区霪无识，故其咎霪也；雨旱寒燠，亦以风为本，四气皆乱，故其罚常风也。”除了强调风与土的对应性外，还强调了风与五事相应的诸种气候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古代星占学传统中，对风的占测十分突出，以风来占测事情，是星占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称之为“风角”。在下一章中将对京房的《风角》作稍微详细的论述。本节中只把《五行志》中关于京氏风占的论述作一般性的介绍。

在叙述京氏风占之前，稍微说明一下前面讲过的蒙气与虹蜺，在《五行志》中是怎样归类排列的。在蒙气占测中已经说到，蒙是归类在“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一目中。虹蜺也归于这一类目之下。这一类在《洪范》九畴中属于第五畴“次五曰建用皇极”。不与风同，不属于“五事”和“庶征”之类。虽然前面说到蒙气时，曾说及蒙与风的伴随现象，但那里说的风与这里将说的风是有区别的。

历史上就风而言可能最早的记录是《左传·僖公十六年》所写的“正月，六鵠退飞，过宋都，风也”。鵠是一种高飞的水鸟，正在高

空飞行时,碰上了逆向大风,从而退飞,经过宋国的都城。通过这一事件,占测者以为这正是恒风之罚,象征着宋襄公区霭自用,容不得臣下提出的明智意见。果然过了六年,即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639 年)楚国执宋公而伐宋,这是六鵩退飞之应。《五行志》说过这一例后,即引京氏风占的大段论述:

《京房易传》曰“潜龙勿用,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毫,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焱发屋。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纬,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泽,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正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螟虫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谓叛,厥风无恒,地变赤而杀人。

京房一连说了十种风占的情况,其叙述方式与蒙气和虹蜺相同。这当然是《汉书·五行志》引京房占词的书写方式,但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京氏风格。《五行志》在引了京氏这段风占十种之后,接着引了四条例子,似意在证明京氏这十种风占的有效。这四条例子的第一条是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后来淮南王自称东帝,聚奸人谋乱,被迁至蜀,道中死。这一例似合于京氏风占十条中的“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飈发屋”。其第二例为:文帝五年(公元前 175 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乱,后被诛灭。这似是京氏十种风占中的“政悖德隐”和“臣易上政”之占。“政悖德隐”指吴王悖乱而无德,因而吴都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臣易上政”则

指吴王不听中央号令。同年十月(即文帝五年),位于吴西北的楚国,楚王戊刚刚接王位,王都彭城刮起了很大的东南风(从东南方来之风)。后来楚王伙同吴王谋反而亡,这条例子同上两条一样,只是加了一条风之来向。《五行志》说“吴在楚东南,天戒若曰,勿与吴为恶,将败市朝”。第四例是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树,坏城楼。后燕王旦谋反,卒被诛。于京氏占仍是“臣易上政”和“政悖德隐”这两条。由此可见,《五行志》有关直接的风占,主要是征引京房风占为说,但对京房《风角书》却只字未提。故可知《五行志》上的风占资料远非京房风占全貌。

从《五行志》所引京房风占资料中可以看出的京房风格之一是注意刮风的情况及其伴随现象的记录。对风的伴随现象的注意,较之蒙气或虹蜺的伴随现象的注意稍有不同。京房对蒙气或虹蜺的伴随现象注意的是其他天气现象,诸如风雨寒温,气变颜色,太阳亮度等等。但在风的伴随现象中除注意风雨寒温之外,注意于五谷、禾稼、草木等的生长状况,复又将这些与虫联系起来。前述京氏风占十种之中,就有三种讲到虫,另外还有“伤禾”和“谷不成”两条似亦与生虫有关。京房对风灾与生虫的伴随现象的记录,刘歆很是高兴。因为原《洪范五行传》中,将生螟虫之类列为“视”这一事的类别中,其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恒奥,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羸虫之孽……”《五行志》说:“温奥生虫,故有羸虫之孽,谓螟螣之类当死不死,未当生而生,或多于故而为灾也。刘歆以为属思心不容。”又在“思”这一事类中说“刘歆思心传日时则有羸虫之孽,谓螟螣之属也。”京氏风占记录生虫的伴随现象,似证实了刘歆将螟虫之属列为五事中的思和五行中的土的有效性。这一证实大大帮了刘歆关于动物与五行对应的大忙。

原来刘向和夏侯氏《洪范五行传》就动物与五事和五行的对应是:

五事	五行	虫孽	畜祸	罚	其 说
貌	木	龟	鸡	常雨	水类动,故有龟孽。
言	金	介虫	犬	常阳	介虫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
视	火	羸虫	羊	常奥	温奥生虫,故有羸虫之孽。
听	水	鱼	豕	常寒	鱼去水而死,极阴之孽。
思	土	华	牛	常风	华者色也,土为内事,为女孽。

刘歆认为上述《洪范五行传》这种对应并不确当,他认为这种对应应是下表所示:

五事	五行	虫孽	畜祸	罚	其 说
貌	木	鳞虫	羊	恒雨	于天文东方辰为龙星,故为鳞虫。于易兑为羊。
言	金	毛虫	犬	恒阳	于天文,西方参为虎星,故为毛虫。
视	火	羽虫	鸡	恒奥	于天文,南方喙为鸟星,故为羽虫,祸亦从羽,故为鸡。
听	水	介虫	豕	恒寒	大雨雪,未当雨雪而雨雪,大雨雹、陨霜皆常寒。
思	土	羸虫	牛	恒风	羸虫即裸虫,谓螟螣之属。

刘歆关于虫与五行的对应为后世所采纳,可以看出《五行志》至少将裸虫归于五事属“思”而五行属土这一项,是利用了京房关于风的占词。为什么说至少? 因为京房在这方面也是很注意的,可以相信他有他的想法,还有他所作的对应和排列。《五行志》引用京房的材料只是片断地摘引,而且支离了京房的体系。就如风占生虫的三条而言,一条是生虫(赋欽不理兹谓祸,……温即虫),未指是什么虫;一条是生虫蝗(公常于利兹谓乱……生虫蝗),即包括蝗虫,而蝗虫于《春秋》称螽,属于介虫之类;三条是螟虫起(弃正作淫谓惑厥风温,螟虫起),这才是属于羸虫之列的螟虫。由此可知,《五行志》取京房之材料,只视其有利于刘歆之论者用之。

更为明显的是,《五行志》所引京房的天气占均来自《京房易传》,但从以上所引各种占词,诸如蒙气、虹蜺和风占,都看不出与

《易》有何关联。只有风占第一条中说到“潜龙勿用”，是乾卦初九爻词之外，看不出其他方面与《周易》有什么关系。在《五行志》中，其他引京房占词的部分也有显示京房引用《周易》卦爻词者，诸如《五行志》引《春秋·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49年）》记录“败狄于咸”的事件。夷狄侵犯当时的鲁、齐、晋三国，后被击败。这一事件刘向认为当时天下的共主周室衰微，三国都想自己称霸，不把周王朝当作一回事，这是违犯天意的。夷狄侵犯这三国，表示天对这三国的谴责。刘向说“天戒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至危亡”，虽然狄人侵扰被打败，但之后不久这三国皆有篡杀之祸。对于这一段，《五行志》列为“皇之不极，是谓不建”这一类中，也引了京房《易传》的两条：“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又曰：“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世主虏。”这里第二条中的“丰其屋”是《周易》丰卦上六爻词。《五行志》引京氏这两句话的关键是话中说到“长狄入国”或“长狄生”的事。从而引出了“丰其屋”这一爻词。另一占例是“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又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睦孟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五行志》引此例列为“视”之一事之中，“视”与“奥”对应，奥是暖的意思，因天常暖，冬天也不冷，因而植物有复苏之变。这一占测应是成功的占例，但占测者睦孟被诛。《五行志》引京房《易传》说：“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京房之说中“枯杨生稊”是《周易》大过卦九二爻词。由这些线索可知京房《易传》是将一些天气情况的占测与《周易》卦爻辞相联系的，而其建立这种联系思考在其《京房易传》中应有所阐述。可是由于《京房易传》已经消失了，留下的片断已难以察知《京房易传》的本意和全貌。

包括在风占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地震，并包括山崩、川竭等地变现象。地震与风归为一类，可能是因为这两者都是于五行属土的原因。但当时也有人认为风于五行属木，刘向即依《周易》之说认为“于《易》巽为风为木”。《黄帝内经》一般被认为是秦汉时

成书,其中《五运行》篇中说:“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凭乎?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又说:“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由此而论,地震、山崩等均是风胜的原因。于五行若风属木,地仍属土,则木胜土,五行属木的风是造成地动的原因。仍可将风与地震列为一类。至于京房认为风是属土或是属木已很难弄清楚。但观其八宫卦中,巽卦为风为木的基本传统看法不变,或者他亦认为风属木。

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地震是《史记》所载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而后又三川皆竭,岐山崩。由于这是一次著名的灾变,周太史伯阳甫说:“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伯阳甫用阴阳的观点解释地震,当阳失其所而被阴所填(镇),使阳伏不能出,至阴迫阳,使阳不得自然地升起,于是有地震。阳被阴所镇,故“阳失在阴”。阳与火有关,阳不得出就使火气内郁,将水煎枯,所以水源必塞,原塞则川竭。山川连体,下竭则上崩,故山必崩。正在这年又发生月食辰星的事件,辰星于五行为水,后世称为水星,又为蛮夷。当时周幽王正迷恋褒姒,废其正后,正后之父申侯与犬戎(蛮夷)共攻杀幽王。故:月食辰星,国以女亡。幽王之败,女乱其内,夷攻其外。五行志亦引京房《易传》说“君臣相背,厥异名水绝”。京房注意的重点总是君与臣的关系。

京房于地震山崩等的论占,《五行志》还引了一些,如“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厥震摇政宫。大经摇政,兹为不阴,厥震摇山,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嗣子无德



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京房于此说了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地震之轻者，只是水有波涛，树木摇动，房子上的瓦会震落。这对应于那种办事还算正派，但不免专权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使宫殿震动或摇动。按《汉书·五行志》注引苏林说“大经，五行之常经也。在辟，众阴犯杀其上也”。又引师古说“常法僻坏而易臣也”。即此种地震对应于君臣对立，行事与大经乖违，君王撤换大臣而致臣犯其君。第三种情况是地震使山冈摇动而致涌水出，这对应于政令违犯了大经，违犯了根本原则。第四种情况是嗣位者无德，却获得很高的禄位，会震动丘陵而致涌水出。《唐开元占经》引京房《对灾异》说“山者，三公之位，台辅之德也。乃兴云出雨，漫漑万物，助天成功。今崩去者，此谓大臣怀叛不忠也”。京房将山与三公对应，地震至山崩，对应于朝廷之台辅大臣。可见京房是依地震的强烈程度，即现今所谓之地震级别来进行人事对应的占测。《五行志》对一次山林崩塌事件，引京房《易传》说“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其中“小人剥庐”是《周易》剥卦上九爻词。可以推想，京房也将地震这一类自然现象纳入卦象系统的设计。

京房关于气候的占测还涉及雷电冰雹，霜雪雨露等等，说明京房曾对各种气候变异作过观察。气候占测是京房卦气说的基础，因此其归于《京房易传》中的占测都与易卦联系起来是可想而知的。只是由于《京房易传》未能保存下来，京房的卦气说只剩一些片断，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片断，又是特别吝惜笔墨的占词之类。京房的著作被淹没了。

## 五 京氏物占

京房的星占系统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严格意义的星占,诸如日占、月占、五星占、恒星占,甚至彗星占等等。另一部分实际上是天气现象占,或叫气候占。这一部分在古代人们心目中列入星占似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古人把天气现象视为天界的现象。同属天界现象,自视为一类。至于地震、山崩、川竭等等,虽应属于地的系统,但由它们在五行说中属于风的一类,所以也连同属于天气现象的风列入天象之类。还有一类与人民生活或生产活动有较密切关系,列入与历法有关的岁时占系列。由于岁时实际与日月等天体的视运动有关,所以也可同星占联系起来。只是《五行志》或《开元占经》还征引了不少与京房有关的纯粹是物占的材料。对于这一类材料,虽说不能归于星占,但也应该对其作出介绍和说明。因而本节除简单地介绍岁时占外,还要介绍一下京房的物占。

### (一)京房岁时占

《史记·天官书》介绍了魏鲜正月旦决八风的事说:“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即魏鲜于正月初一日集众进行腊祭之后,于正月初一日观测八方风,以占年景和灾异情况。京房也延续了这个正月旦候风占测的方法,可能比魏鲜的占测内容稍微多一些。京房不仅于正月初一占,而且注意正月的云物风气,又很注意一年首季即春季的情况。故京氏的岁时占往往是在时间单位的起始,即一年之始,一季之始,一月之始,甚至一日之始。在本书第三章论述京房卦候时,已经说到京易与齐诗同法。齐诗重视四始五际,可能京氏易也很重视“四始”,即年始、季(时)始、月始、气始。而正月初一日正是“四始”的最集中表现。京房关于正月初一日之占说:“正月一日候风。平明和调不风,植稼蚕善;日中和调,中稼稚

蚕善。至暮无风，五谷桑蚕滋茂，人民六畜无病。”又说：“正月一日，云气五色备且精神，十二律气各具，岁则天下太平。风从西北起，余贵。”除对正月一日进行占测外，对一年之始的正月，特别是正月头几天。他有一条著名的占词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入，八日为谷。和调不风寒，即人不病，六畜不死亡。”这条占辞中，他明确说了正月初七为人日，这是延续至今的一种说法。不过一般均认为“人日”出于《东方朔占书》，其说为：“岁后七日，是日晴，所生之物育；阴则灾。”《东方朔占书》实际上是讲岁后七日天气之占，并未明确说是“人日”。所以从史料上看，“人日”的发明权应该属于京房。大概京房也是采纳了前人之说或者沿用了习沿已久的风俗。

除了一年之始外，京房也注意一时之始和一月之始。例如《开元占经》引京房占说：“五月朔日，当热而风雨者米贵，人食草木；风从北方来，禾大败，人民相食。”他还将岁时占与星占直接联系起来，如他占测说：“正月八日候月，在参东大善，在参西多水虫，在参北大恶。”即在正月和八月观测月亮与参宿的相对位置来考察年景。他还针对四时八节之日进行占测，如他说：“冬至后一日有壬无雨，二日有壬稚再生，三日四日有壬上下皆熟，……”（以上京房之说均引自《唐开元占经》）

这一类京氏占测是与京房的固有占测体系有联系的，他试图将星占、气候占、岁时占还有物占，整个连成一个对应关系的“网络”，或者说是他正设计编制这个网络。京房的网络不仅与《洪范》不一样，即与《管子》、《吕氏春秋》、《黄帝内经》、《淮南子》及董仲舒的系统都不相同。但京房的“网络”是否建成或者这个“网络”系统总体大致是个什么模样现在都难以稽考。

## （二）京房物占

根据《汉书·五行志》和《唐开元占经》所记录的京氏物占材

料,可以分成好多类,其中有很多畸形、怪胎、奇变之事,形成一种对怪异事件的占测。这类占测与前述的八卦卦气说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联系,特别是经过征引者支离后的占辞,甚至令人怀疑京房到底是否为《易》学的学者。

首先按类别介绍一下京房的物占。

第一类是关于人的怪胎、畸形及其他反常情况之占。

京房《易传》说:“人生而能言,天使代其言也。”即人一生下来就能说话的这种反常情况,是天使之代言。这条占测之词是有代表性的,即京房总是将天上关系放在当先的地位上进行占测。如他对男化为女或女化为男,也作这样的推占。如他说:“丈夫化为妇人兹谓柔胜强,阴胜阳,邦必亡。”又说:“女子化为男子谓阴昌,贱人为政,其邦必亡。”即将人性的变异扩展为一般的阴阳变化,从而论及到邦国。从阴阳变化作论占实即与天人相应之关系论占相同。

在人的变异中有一类谓之“人生子异形”,京房将之分为首、目、口、耳、鼻、手、足、腹、背等等的畸形。这些畸形主要表现为位置不当。如“目在项背”,“口在腹旁”,“鼻在四肢”等等。或者表现为人体的过多或缺少,例如“人生四头”,“生有二口”,“人生三臂”,“生子有一耳”等等。对于这种情况京房的占测似乎只是一种联想猜测,例如他说:“人生子有一耳是谓不聪。人生有三耳以上是谓多方,其国无王,又曰是谓多聪,国事无定。”又如器官不当其位之占,他说:“人生子目在项背,天子不安。”又说:“人生子目在踵足下,是谓下视,天下大兵。”其占总与国家、君王等联系起来。另外还有一种人生异物的现象,如人生家畜、野兽、甚至五谷等等。他亦将之与国家,君主等相关连。如他说:“人生六畜,是谓更有王,天下易主。”又说:“人生野兽,天下不通。”还说:“人生子尽为五谷,国民昌。”京房怎么会将这些生下的怪异或反常的孩婴与国家、君王联系起来的呢?其实这正表现出他一切占测的基本思想。他认为这些反常或怪异的现象,都是某种阴阳之气相错相盗的结果,也

即是某种阴阳变化的结果。只是其所以怪异和反常,则是阴阳错谬相滥的结果。这是宇宙天地间深层结构中某种不均衡的外部表现。这就会显示自然界的灾异和人世间政治的失误。京房将一切这种怪异反常现象都看成是宇宙深层发生的机制性变化的外部表现。由此进一步将这种同一机制性变化的外部表现互相联系起来作出占测。以下所谈的各种物占,都是基于这一思想。

第二类是关于飞鸟之占。星占家们多注意鸾凤等神鸟,或枭、雕等猛禽。还注意乌鵲之类的鸣禽。京房虽也注意这些飞鸟的占测,但更多的是注意普通飞鸟的占测,诸如燕雀鸠雉等等,尤其注意家禽,对鸡之占尤为著名。对神鸟的占测只有一条,京氏《易候》说:“鸾见于国,天下大安。”这类神鸟只要它出现,就是国家平安的征兆。大概京房没有见过鸾,因为他到京都做官后,天下从来没有大安过。但对凡鸟的占测,却可能大多是他经历过的。对凡鸟的占测不是从其存在与否,而大多是从其行为作占。如他说:“燕群斗,外内饥于寇,国兵起”之类。但京房的鸟类之占中,最多的是鸡占。《汉书·五行志》将关于鸡的占测列为“五事”中的第一事“貌”。于“五行”属木。《五行传》说:“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卦名,下体坤而上体巽,坤为地而巽为木)。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五行传》又进一步解释说:“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而在京房进入朝廷前后的七八年间,发生了三次关于鸡的变异事件。第一次发生在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第二次发生在汉元帝初元年间(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元帝初即位,初元共五年)。第三次发生在“永光中”(永光是初元以后的年号,永光也一共五年。如说永光中是永光三年,即公元前41年。这一次鸡变是“有献雄鸡生角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而京房自己知时,恐当此变。刘向认为京房之占测不对,而是当石显之事。他以为鸡为小畜,主司时,是小臣执事

为政之象,说:“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竟宁元年(这一年元帝逝世,太子骹即位,是为成帝。当公元前33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可是京房弃市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鸡变事件发生在汉元帝永光三年,距石显伏辜八年,距京房弃市四年。京房弃市更接近于鸡变之时。因为未必刘向之占准确,《五行志》引《尚书》之《牧誓》之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认为“黄龙、初元、永光鸡变,乃国家之占,妃后象也”。应该是应王家当权之征兆。(黄龙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为元帝。王禁女立为太子妃,故有黄龙元年未央殿中雌鸡化雄。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化雄。则应王婕妤为皇后,以其子为太子。永光中雄鸡生角则应王家当权。)导致后来王莽篡位。这一次著名的鸡占有三种不同的占测,《汉书·五行志》列出所有这三种占测。最后引京房《易传》作为总结:“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又曰:‘妇人颺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故房以为己亦在占中矣。”即京房占自己也在占中是根据“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之句,当是京房的占测是根据于他的易学和卦气系统,属于明夷卦,明夷卦在京房八宫卦系统中属于坎宫,坎为水。按《五行志》引《五行传》,“五事”之貌不恭时,咎狂,罚恒雨。刘向以为也会有大水。因而《五行志》引京氏《易传》时,是根据他自己的五行观点。但在鸡占这一点上,可能与京房《易传》恰巧相合。

第三类是关于兽占。如同飞鸟包括野鸟和家禽一样,兽占包括野兽和家畜。京房也谈到神兽麒麟,他说:“麒麟,麕身牛尾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尺,毛长。”只谈到形体而未及占。大概见到麒麟就是祥瑞之征,无需再论其占。他注意得多的野兽是:虎、麋、鹿、狼、狐、兔、鼠等;他注意得较多的家畜是:牛、马、羊、犬、豕等。

他对野兽的占测如说:“君行无道,将害民庶,虎食人。”干宝说:“虎,金精。南阳,火也。金入火刑,王室乱妖也。”(以上两则引

自《唐开元占经》。干宝之占是《唐开元占经》引《晋杂事记》，其云：“太康六年(285年)，南阳献两足虎”干宝对此所作注)干宝是京易传人，其说多据京《易》，可见《京氏易》中论虎之占，亦有据五行而论占者。京房《易候》关于狼占有云：“君失春政，则苍狼入于邑；君失秋政，白狼入于邑；失冬政，则黑狼见于邑。赤狼见于国，不出三年必有大祸，野人为政。”这即是京房以五行而立占之例。京房对鼠的占测，也是一种以五行立占的例子。他将鼠与五行中的水对应起来，因而其鼠占往往与水灾、丧事等相关。《唐开元占经》引京房鼠占说：“鼠群行，有水，期一年。”又说：“鼠无故群相随，朝夕鸣邑，且为湖泽，期一年至。”又说：“鼠无故舞于朝市，其邑有大丧。”等等。《五行志》亦引京房鼠占两条，一条说：“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一条说：“臣私禄罔辟，厥妖鼠集。”这两条在《五行志》中也列于“五事”中貌的一类，亦认为鼠与水有关。也有人认为这与王莽篡位有关，因为鼠集表示臣下“擅私爵禄，诬罔其君”，即私下封爵加禄，而置皇帝于不顾。

关于家畜之占，主要是占家畜之怪胎、畸形者。如京房《易占》说：“牛生八足，上有三首，邑增地；君任邪佞，则牛两头八足二尾。”马占也类乎如此，京氏《易占》说：“下不顺政，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说：“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驹。”仅举此两例以见京氏家畜占之一斑，其余犬豕羊等占亦不少，在此不赘。

第四类是虫占。虫占包括龙、蛇、鱼、蛟、龟、蛙、蚯蚓、蜈蚣、蝗虫、蚊、虻、蛾等等。《史记》载秦始皇八年，一次河鱼逆流而上。刘向以为鱼为阴类，庶民之象，逆流而上是民将不从君令。京房《易传》说：“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关于鱼孽，《五行志》列为“五事”之“听”，“听”如果有问题，就会有急咎，有常寒之罚，有鼓妖，有鱼孽，有豕祸等等。但其他属于虫占的，却不一定属于“五事”之“听”一类。如龟就属于五事中“貌”之一类；蝗虫等则为介虫，属于五事中“言”之一类；而蜈蚣等为蜃虫则属五事中“视”的一类等等。螟螣亦属蜃虫，京房占曰：“吏为贪狼多螟螣；宫室奢，虫食叶。”这

与《五行志》的分类是有出入的。

第五类是草木山石之占。《五行志》说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零陵地方有大树倒下,居民又将其锯断,断干皆枯。忽然于这年三月,这棵断了的枯树又自立于原来的地方。对于这一怪异事件,《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所说:“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续。妃后有颺(专宠),木仆反立。断枯复生,天辟恶之。”汉代枯树复活的现象不只一起,《五行志》还有一次更著名的记录。那是在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苑中有大柳树枯僵倒地,一朝自起立生枝叶;又昌邑王国社中有枯树复生枝叶。对此当时学者睦孟推占说:“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其时霍光秉政,以为睦孟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诛之。后五年,汉宣帝登位,他正是王孙后代,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这次推占与皇帝有关,因而很著名。《五行志》除引上述睦孟传上所述外,又引了京房《易传》关于石立的占断:“‘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说:“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大概京房《易传》只说石,未将石与木牵连在一起。对于石,又分为石崩和石立两种情况。对于石崩京房引了复卦卦辞,现在这条卦辞写的是“朋来无咎”,《周易本义》说:“朋类之来,亦得无咎”,朋是指朋友之类。现代学者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亦以为朋即朋友。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阴以阳为朋,剥穷上反下故曰朋来。”又说:“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读朋为崩,是用覆象,谓剥艮覆在下为山崩。而《易林》遇此象,亦往往曰山崩。”据《尚氏易》之说,京房当时如此注《易》,是说明京易自有系统。草木山石等物之变异均归类为某卦某爻。《五行志》将京氏石崩石立之占,悉引京房《易传》占词,或因京氏之占有其系统的说明。

除了上述的石占外,京房亦有草木之占。上述枯木复起事件,



《五行志》亦引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似未说“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的话头，或许是害怕陆孟的遭遇，或许是京房系统的推占不及于此。此外在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其时京房在世时作占说：“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后来平帝元始三年又有一次天雨草，《五行志》亦引京房此占。这天雨草之占在《五行志》系统属于“皇之不极，是谓不建”项中，皆指人君不明、软弱。京房则说“君吝于禄，信衰贤去”，两者基本相同，唯《五行志》强调君之不明，京房则强调“信衰贤去”，贤臣不能发挥作用。

第七类是城邑宫殿之占。这一类主要是对都城、皇宫各类事件的占测。京房将市民也列为这一类中。京房说：“市人无故自惊，叛兵起，失政之象。”城邑中除市民外就是大建筑，宫殿之类。京房注意这类建筑的门户情况。如京房占测说：“君门户无故自阖，臣弑其君。”又说：“国门无故夜自开，有昼闭之忧。”还对宫殿及城门发出声音进行占测，京房说：“邑城门无故夜鸣，邑有大丧。人家亦然。”宫殿中有声音也在其推占中，他说：“君室殿无故有哭声，国家大凶。”又说：“贱人将贵，城复于隍。”等等。（以上京房占词均引自《唐开元占经》）

以上七类物占，基本上是按事物归类，并非京氏物占的系统。京氏物占似与其八宫卦或其卦气系统相联系，即可能按卦爻排列。但现存京氏物占资料，都已支离，或按《五行志》体系归类（只是一部分），或按占经归类（也是一部分），均已非复原貌。

## 第五章 京房音律、风角和 考功课吏法

《汉书》京房本传上说房：“好钟律，知音声。”又说他向汉元帝“奏考功课吏法”。《晋书·天文志》特别引述了他著的《风角书》，其中的《集星章》我们在上一章里已作过讨论。以上音律、风角和考功三个方面，也是京房生平中的重要活动，而且不是他业余式的爱好，或是什么多才多艺的表现。如果说到多才多艺，京房大概算不上。只是京房接触到了当时最高统治，接触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而他自身又对自然和社会，对传统的经学，特别是《易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使他有可能构思了一个庞大的课题。这个庞大的课题在他那个时代是无法解决的，他却认真而且也相当努力地去进行他的研究。可是正如《汉书》赞对他的评论所说：“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他承担了他不堪承担的重担。

## 一 京房音律的历史背景

京房对于音律的研究，主要记录在《后汉书·律历志》上，其说为：

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仲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戏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旋）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

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故总其本要，以续前志。

观《后汉书》此说，京房对音律的研究要比刘歆所上奏的音律，而班固取以为《汉书》律志的音律内容来得详细。京房关于乐律的更多论述可能那时就已佚失，所谓“文多不悉载”。《后汉书》之所以将京氏乐律“总其本要，以续前志”者，完全是因为京氏律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的原因。

要对京氏音律有所了解，必须对京房以前关于律的发展作一点必要的交代。古代史籍和子书都说：“黄帝命伶伦截竹为十二律。”例如《汉书·律历志》说：“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箛以听风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虽说伶伦以竹为律之说，古籍言之凿凿，但毕竟缺少其细节的记录，难以详细了解其情况。而且唐虞以后，直至四周之末，几乎对乐律的进展未有提及，所谈的只是乐器、诗歌、乐舞，似乎西周之前只关注五声而未暇及于十二律。在此先将现有古籍中有关音律情况作一简明的考察。

### （一）《管子·地员》对五音的描述

古籍中对五声以数相求之法以《管子》为最早，其所说之定律法载于《地员》篇中：

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马鸣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窞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

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这段话已被视为早期求五声律的经典叙述，尽管其中有些语辞不是那么明确。其意思总起来说是：若欲求出五音应先以三乘一，自乘四次以合九九之数（即  $3^4 = 9^2 = 81$ ）。由此可得黄钟律数，是为正律宫音。这里的小素是指小弦。然后再“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即将宫音数 81，均分为三份，再加上其一份，就得  $108\left(81 \times \frac{4}{3} = 108\right)$  数，是为倍律徵音。然后是“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即是将倍律徵音数 108 分，均分成三份，去掉其一份而得  $72\left(108 \times \frac{2}{3} = 72\right)$  数，得正律商音。再后是“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而复于其所”是上面言去其一份，现在要增多其一份之意，故而将正律商音分成三等分，复加其一份得  $96\left(72 \times \frac{4}{3} = 96\right)$  数，是为倍律羽音。最后是：“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即由倍律羽音分成三份，去其一份而得  $64\left(96 \times \frac{2}{3} = 64\right)$  数，即为正律角音。

至于徵音如负猪豕，羽音如马鸣在野，宫音如牛鸣窳中，商音如离群羊，角音如雉登木鸣等，均非律学所能言，只是音色所引起之印象，故非本书所论述。而就以上《管子》的推律法而言，当是中国古代三分损益推律的具体表现。虽只推了五律，然其推律法之原理已历历可见。唯有争议者是《地员》篇到底是何时代的作品，若确系管仲所作，当在公元前七世纪。现一般均认为其最可能是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

现将《管子》五音相生次序，列表如下：

宫	徵	商	羽	角
(正律)	(倍律)	(正律)	(倍律)	(正律)
81	→ 108	→ 72	→ 96	→ 64

若依照五音高低次序排列，则列表为：

徵	羽	宫	商	角
(倍律)	(倍律)	(正律)	(正律)	(正律)
108	96	81	72	64

为了与上述作对比，兹引《史记·律书》“生黄钟”之所述，其生律之法似与《管子》相同。其说为：

生黄钟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

这里所谓“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者，即是用  $2/3$  去乘，所谓“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者，即是用  $4/3$  去乘。这也是三分损益法的表述。所谓“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上九是说由“宫五上生徵九”，再由“徵九”下生“商八”，又由“商八”上生“羽七”，再由“羽七”下生“角六”。又观《史记·律书》《律数》段说：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故可以证明其说“音始于宫，穷于角”的论述，亦是三分损益法

推五声律，与《管子》所述略同。可按其生律次序和音的高低次序排成两表，与《管子》五音律两表相对照：

《史记·律书》生黄钟术五音相生次序：

宫	$\xrightarrow{\text{上生}}$	徵	$\xrightarrow{\text{下生}}$	商	$\xrightarrow{\text{上生}}$	羽	$\xrightarrow{\text{下生}}$	角
五		九		八		七		六

按照音之高低排列则为：

徵	羽	宫	商	角
九	七	五	八	六

在五音之下配以五六七八九之数，可能是据《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意思，如其《季夏纪》说：“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孟秋纪》说：“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孟春纪》说：“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孟夏纪》说：“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孟冬纪》说：“其音羽，律应钟，其数六。”这样的配数完全是按五行成数配应原则，即春配木配角，木之成数八；夏配火配徵，火之成数七；秋配金配商，金之成数九，冬配水配羽，水之成数六。季夏配土配宫，土之五行数五。此处所引只是《吕氏春秋》之季夏、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五纪，其余凡属春，如仲春，季春，皆配木配角，凡属夏（只有孟夏、仲夏）配火配徵，凡属秋皆配金配商，凡属冬皆配水配羽。例如《仲冬纪》说：“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吕氏春秋》引入五行数后，则可列表如下以明之：

五行	土	金	木	火	水
五音	宫	商	角	徵	羽
数	五	九	八	七	六

由此表可见，《吕氏春秋》用五行数表示五音高低次序（宫五、商九、角八、徵七、羽六。）而《史记》则是以五行数表示五音相生次序（宫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

另按《史记·律书》律数一段，亦可列表于下：

宫	商	角	徵	羽
81	72	64	54	48
$\frac{72}{81} = \frac{8}{9}$	$\frac{64}{72} = \frac{8}{9}$	$\frac{54}{64} = \frac{27}{32}$	$\frac{48}{54} = \frac{8}{9}$	

将此与《管子》五音按音高顺序排列的情况对照：

徵	羽	宫	商	角
108	96	81	72	64
$\frac{96}{108} = \frac{8}{9}$	$\frac{81}{96} = \frac{27}{32}$	$\frac{72}{81} = \frac{8}{9}$	$\frac{64}{72} = \frac{8}{9}$	

由上述两表一比就可看出：（1）《管子》以“徵音”为五音中的最低音；《史记》以“宫音”为五音中的最低音。（2）从《管子》五音表中可看出，从徵到羽振动体长度比为  $\frac{8}{9}$ ，从羽到宫则为  $\frac{27}{32}$ ，从宫到商则为  $\frac{8}{9}$ ，从商到角亦为  $\frac{8}{9}$ 。振动体长度比为  $\frac{8}{9}$

时，音乐学上称为大全音，振动体长度比为  $\frac{27}{32}$  则称为五度律小

三度，或称为短三阶，短三阶在《管子》五音中在第二音和第三音之间。再看《史记》五音表中，短三阶在第三音角音与第四音徵音之间。由于这两点差别，一般称《管子》五音序列为“五声徵调”，称《史记》五音序列为“五音宫调”。

此外还有七声调等，是由五声调发展而来。但详细讨论需要待对十二律有进一步的了解之后。

## （二）《吕氏春秋》对十二律的描述

除《管子》外，言音律之书最早当推《吕氏春秋》，《管子》书只谈了五音相生，而《吕氏春秋》始言及十二律。《吕氏春秋》中言及音律于其《季夏纪·音律篇》，其说为：“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



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此说明由黄钟去求其他十一律之方法。黄钟律数是多少呢？按《吕氏春秋》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仲夏纪·古乐篇》）《吕氏春秋》用“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之说，表示“三分损益”之法，辞义较《管子》远为清楚明显。其谓：“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者，是说这些律由上生而得；其谓“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者，是指此五律由下生而得。黄钟一律是为始律或母律。其说甚为难解者是“其长三寸九分”一语，李光地注说：“黄钟长八寸一分，应钟长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即二律相较之数是也。”似乎他认为此长度表示半律黄钟。古代所认定的黄钟律管的长度为九寸。据此即可求出其余十一律律管的长度。以下将律名按音高次序排列，并注以生律次序，从而排出推演各律的表。即将上述《吕氏春秋》关于十二律的话以表列出。

生律次序	律名	各律管长	各律管长与黄钟律管长之比	音分值
(1)	黄钟	9. 00 (寸)	1	0
(8)	大吕	8. 42	$\frac{2048}{2189}$	114
(3)	太簇	8. 00	8/9	204
(10)	夹钟	7. 49	16384/19683	318
(5)	姑洗	7. 11	64/81	408

(12)	仲吕	6. 66	131072/177147	522
(7)	蕤宾	6. 32	512/729	612
(2)	林钟	6. 00	2/3	702
(9)	夷则	5. 62	4096/6561	816
(4)	南吕	5. 33	16/27	906
(11)	无射	4. 99	32768/59049	1020
(6)	应钟	4. 74	128/243	1110

关于这个表要作一些说明。

1. 三分损益生律法，即是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三分损一的意思就是将原律管的管长平分为三节，然后去掉一节，即产生的律管长度只是原来管长的三分之二。三分益一是原来管长平分为三节后，再加长一节，即为原来管长的三分之四。古代将三分益一称为上生，将三分损一称为下生，这是从管子长度的增减而言，管子变长为上生，管子变短为下生。但是管子增长则音高变低，管子变短则音高增高，故而从音高的增加和降低而言，管子变长则应是下生，管子变短则应是上生。若管子长度缩减为原管长的二分之一，其音高就增加一倍，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谓此时音高增加八度（Octave）。若管子缩减为原管长的三分之二，例如黄钟律管长九寸，下生林钟的管长得六寸，按毕达哥拉斯说，是音高增加了纯五度。若管长增加了三分之一，例如林钟律管长六寸，将其长度增加三分之一，即从六寸增加到八寸（ $6 \times \frac{4}{3} = 8$ ），就得到太簇律的管长，这样太簇律的音高比林钟律低，按毕达哥拉斯说低了纯四度。因而《吕氏春秋》上说的每下生一次，就是增加一个纯五度；而每上生一次就是降低一个纯四度。

2. 音乐学上将原音或称基音与比它高八度的音视为同音。

高八度的音除振动数（频率）比原音高一倍外，其余都相同。从原音或基音到高八度的同音之间组成一个音级。再在一个音级中安排各部分，每一部分称为一律。部分愈小，其律愈多。《管子·地员》篇实是将一个音级安排为五个部分，《吕氏春秋》则是将一个音级分为十二个部分，是即所谓十二律，或称为六律六吕，即六阳律和六阴律。所以十二律乃是一个音级中所分的十二个音。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则有京房将之分为六十个部分，即是京房之六十律等等。

假定在一个音级内，即一个八度内等分为 1200 个音分，每一个音分为一个音，则一个八度内就有 1200 个音。高一个“八度”从声音频率上讲是增加了二倍，即若原基音频率为 250 赫兹（频率单位），那么其八度音的频率就是 500 赫兹。西方音乐系统中以 C 音为 261 赫（实为 261.63 赫），则其高八度的 C<sup>1</sup> 音为 522 赫（应为 523.26 赫），以 261.63 除 523.26 得 2。即：

$$523.26/261.63=2$$

两边取对数有：

$$\log 523.26 - \log 261.63 = \log 2$$

得：

$$2.7187175 - 2.4176875 = 0.3010299$$

所以在八度音级内，两端频率的对数差为 0.30103。再以此除 1200，就得到一个比例常数：即 1200 个音分或相距八度的两音频率的对数差的比例关系常数：

$$1200/0.30103 = 3986.313$$

有了这个比例常数，就可以求得各音律之间用音分来表示的音程值。其求法即是从其频率比之对数值，乘上这个比例系数，就得两音律间的音分值。如纯五度律与基音之频率比为 3/2，因此其对数值为：

$$\log \frac{3}{2} = \log 3 - \log 2 = \log 1.5 = 0.17609$$

$$0.17609 \times 3986.313 = 701.955 \approx 702 \text{ (音分)}$$

又如求纯四度律的音分值，

$$\log 4/3 = \log 4 - \log 3 = \log 1.3333 = 0.12494$$

$$0.12494 \times 3986.313 = 498.045 \approx 498 \text{ (音分)}$$

以上是从频率比来求音分值，也可直接从频率来求音分值，即求其与基音频率的比。如求频率为 327 赫的音分值，因基音频率是 261.63 赫，所以两音的频率比为：327/261.63。取对数有：

$$\begin{aligned} \log 327 - \log 261.63 &= 2.51455 - 2.41769 \\ &= 0.09686 \end{aligned}$$

$$0.09686 \times 3986.313 = 386.114 \approx 386 \text{ (音分)}$$

表最后一行所给的音分值，是按律管长度的比计算出来。

3. 从表还可看出，从黄钟生律一次，即上生一个纯五度，或下生一个纯四度，即将黄钟管长乘以 2/3 或乘以 4/3，都包括八个律，这可从表上直接看出。如黄钟下生林钟，即包括黄钟、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八个律。若从林钟上生太簇来看，则包括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至太簇，亦包括八律。但林钟上生太簇，按毕达哥拉斯的法则是降低音高四度，即应从林钟历蕤宾、仲吕、姑洗、夹钟、太簇六律，这不是包括八律。但由于上生五度和下生四度只是互相转位，因此结果并无不同。如果从音分值来推算就比较容易明白。就以本表来说，由黄钟上生五度，即相当于增高 702 音分，到林钟律。亦即林钟较黄钟高一个五度律，高 702 个音分。从林钟律再下降四度，即相当于下降 498 音分。由 702 音分减去 498 音分，得 204 音分，即得太簇律。即太簇律低于林钟律 498 音分，但高于黄钟律 204 音分。如果不采取三分益一，而是继续上生五度，即再增加 702 音分，于是上升两个纯五度共得 1404 音分。因为一个八度音级只有 1200 音分，于是就超出原音级 204 音分。若将之归入原先的八度音级内，则太簇律仍与黄钟律距 204 音分。所以说上生纯五度与下生纯四度互相转位。互相转位的条件

是两者生律次数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互成转位的两律相加应是八度，或为 1200 音分。两者的频率比相乘得八度音对基音的频率比，例如五度音之频率比  $3/2$  和四度音的频率比  $4/3$ ，两者相加（即相乘），即  $3/2 \times 4/3 = 2$ ，即五度律和四度律相互转位。

4. 由于古时各朝代尺度之标准不一，长短不同，虽将黄钟律管长度定为九寸，但其准确长度到底是多少却无从考定，自然就难准确确定黄钟律的频率。为要将中国古乐制和西方乐制进行对比，以便于讲解音律，将黄钟律与西方 c 律相配应，西方 c 律的频率即为 261.63 赫，而黄钟律的频率却不能确定。西方乐制也是一个音级为十二律，这与中国相同。特别是西方古代采取五度生律法跟中国古代三分损益法相同。为便于对照，将《吕氏春秋》十二律与西方乐制律名进行对照。

生律 次序	律名	西方 律名	音分值	相邻两律 音分值	生律法
(1)	黄钟	c	0		
(8)	大吕	c <sup>#</sup>	114	144	$k^7/2^4$ 大半音
(3)	太簇	d	204	90	$k^2/2$ 大全音
(10)	夹钟	d <sup>#</sup>	318	114	$k^9/2^5$
(5)	姑洗	e	408	90	$k^4/2^2$
(12)	仲吕	e <sup>#</sup>	522	114	$k^{11}/2^6$
(7)	蕤宾	f <sup>#</sup>	612	90	$k^6/2^3$
(2)	林钟	g	702	90	$k$ 纯五度
(9)	夷则	g <sup>#</sup>	816	114	$k^8/2^4$
(4)	南吕	a	906	90	$k^3/2$
(11)	无射	a <sup>#</sup>	1020	114	$k^{10}/2^5$
(6)	应钟	b	1110	90	$k^5/2^2$
	黄钟 <sup>1</sup>	c <sup>1</sup>	1200	90	2 八度

其中  $k = \frac{3}{2}$ ，即纯五度，这是上升纯五度生律法。也可以从 c 音开始下降纯五度生律：

c 音下降一个五度，即  $\frac{2}{3} \times 2 = 498$ （音分） f 音

下降二个五度， $(1/k)^2 \times 2^2 = 996$ （音分）  $^b b$  音

下降三个五度， $(1/k)^3 \times 2^2 = 294$ （音分）  $^b e$  音

下降四个五度， $(1/k)^4 \times 2^3 = 792$ （音分）  $^b a$  音

下降五个五度， $(1/k)^5 \times 2^3 = 90$ （音分）  $^b d$  音

下降六个五度， $(1/k)^6 \times 2^4 = 588$ （音分）  $^b g$  音

由此表可得下述各音之间的关系，即：

(1) 太簇为 204 音分，西制谓大全音。全音当是半音的二倍，故半音应是 102 音分。但从 c 音下降五个五度得  $^b d$  音，为 90 音分，西制称为五度律小半音，而  $c^\sharp$  音为 114 音分，称为五度律大半音。这表示十二个律是一个八度音级内的十二个半音。观表可知，相邻两律间的音程，只有五度律大半音（114 音分）和五度律小半音（90 音分）。

(2) 大半音与小半音之差为 24 音分，这称为最大音差。从西方乐制说，如果从 c 音起上升十二次，即得  $k^{12}/2^7 = 24$  音分，这称为  $b^\sharp$  律。这个  $b^\sharp$  律已高出  $c^1$  律 24 音分。或说从 c 到  $b^\sharp$  有 1224 音分。所以若两律相距十二个五度级都可以构成最大音差。构成最大音差是西制五度律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五度律本身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由 c 出发，生律十二次，不能回到  $c^1$  音，只能到达较  $c^1$  音高 24 个音分的  $b^\sharp$  音。同样中国古代的三分损益生律法，从黄钟起生律十二次，也不能回到黄钟，而是到达“执始”律，执始律也比黄钟要高。这个不能回到 c 音或黄钟律的矛盾，给“十二律周而复始”或“旋相为宫”，即在十二律上循环构成各调音阶的理想，造成极大障碍。历代音律学家都力求解决这一矛盾，作过大量的探索工作，京房则应是其中较早的一员。

### (三) 其他典籍中关于音律的叙述

在这一段中，主要讨论一下汉代关于音律的著作，因为这对京房有直接的影响。汉代主要的音律著作是司马迁撰的《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两种。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亦颇言音律，其说亦有可供参考者。本段当对此三篇略作介绍，以补充前两段之叙述。

先录《史记·律书》“生钟分”一段：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这一段话如果列成句式就是：

子为基音，基音与基音律数比为 1。

丑为基音下生一次，即上升五度，其与基音的律数比为  $2/3$ ，若基音律为黄钟，则丑应为林钟。若论西制，如基音为 c，则丑当为 g 音。此后只记古律名称。

寅，丑上生一次，即下降四度，其与基音的律数比为  $8/9$ ，是为太簇。

卯，寅下生一次，其与基音比为  $16/27$ ，是为南吕。

辰，卯上生一次得  $64/81$ ，是为姑洗。

巳，辰下生一次得  $128/243$ ，是为应钟。

午，巳上生一次得  $512/729$ ，是为蕤宾。

未，午下生一次得 1024/2187，是为大吕。

申，未上生一次得 4096/6561，是为夷则。

酉，申下生一次得 8192/19683，是为夹钟。

戌，酉上生一次得 32768/59049，是为无射。

亥，戌下生一次得 65536/177147，是为仲吕。

然后再看《汉书·律历志》之所说：

如法为一寸，则黄钟之长也。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三分林钟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损一，下生南吕。三分南吕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损一，下生应钟。三分应钟益一，上生蕤宾。三分蕤宾损一，下生夹钟。三分夹钟益一，上生亡射。三分亡射损一，下生中吕。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

《汉书·律历志》之所言实与《史记·律书》相同。观这两篇所述，其阴阳相生是阳律生阴吕皆下生，而阴吕生阳律皆上生。故其午位蕤宾生未位大吕，是下生。但前述《吕氏春秋》之十二律相生中，蕤宾生大吕却是上生。此一差异是由于二者阴阳相生的观点不一致之故。《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的阴阳相生是从律的阴阳而言，而《吕氏春秋》却是从时令或方位的阴阳而言。从律的阴阳而言，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汉书》称亡射）为六律或六阳律；大吕、夹钟、仲吕（《汉书》称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六吕为阴。阳生阴下生，阴生阳上生。从时令或方位言，按一年之中阴阳之分界在于子午二位，或建子和建午之月。子为一阳生，午为一阴生。建子之月，斗柄正北向；建午之月，斗柄正指南。故于方位而言，午位在正南，为阴始生之处；子位位于正北，为阳气之所始。而于历而言，斗柄建午之月，律中蕤宾；斗柄建子之月，律中黄钟。自子至午为



阳，自午至子为阴；午正起阴，子正起阳。蕤宾起于阴生，黄钟起于阳生。故而由时令和方位而言，阴上生，故蕤宾上生大吕。这两者的差别是带原则性的。

再考察《史记·律书》“生钟分”段，当子位（假定为黄钟律）下生丑位（应为林钟律），从阳律下生阴律而言，当无问题。但若从时令方位阳生阴而言，则林钟律就不当在丑位（因丑位在阳界范围内），而应居于未位。同样，太簇下生南吕，太簇在寅位（阳界），南吕就不当在卯位（亦为阳界），而应居于酉位（阴界）。而蕤宾上生大吕后，大吕不是上生夷则。而因大吕居于阳位，夷则居于阴位申位，应改为下生夷则。从而夷则上生的夹钟律应居于阳位卯，而不应居于阴位酉。夹钟应下生无射，无射戌位亦在阴界。无射应上生仲吕（巳位）。如此一排就合《吕氏春秋》十二律之阴阳相生法。

《淮南子·天文训》则与《吕氏春秋》十二律阴阳相生之法同，其说为：

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故黄钟为子，其数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八，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吕，仲吕之数六十，主四月。

《淮南子·天文训》讲了各月律之所主。若知各月之月建，即与前述完全对应。所以《淮南子》所言的阴阳相生是按时令方位的

阴阳而言。

由于古律的阴阳相生实为从节令方位的阴阳决定其上生和下生，又且前一节中说到中国古代的生律法实与希腊古代毕达哥拉斯的五度律生律法相同。每隔五度生一律实包含着八个律，即如黄钟生律一次得林钟律，这包括了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八律，因而古代都说隔八生律，其上生下生相间，实是限其律在一个音级之内。因而中国古代往往用一个图概括之。

	仲	午	未		申		
巳	吕	蕤	宾	林	钟	夷	则
	姑					南	
辰	洗					吕	酉
	夹					无	
卯	钟					射	戌
	簇	大	吕	黄	钟	应	
太							钟
寅		丑		子			亥

观此图即可求得次律，只要知道由何律求之。例如由黄钟求次律，即依此图从子位黄钟算起数一，依次顺转（即顺时针向），大吕丑位数二，太簇寅位数三，夹钟卯位数四，姑洗辰位数五，仲吕巳位数六，蕤宾午位数七，到林钟未位数到八，故黄钟下生林钟。求林钟次律，则既可继续顺转，从林钟顺时针方向数八位到寅位得太簇律。也可退六位（纯四度），即由林钟沿反时针方向，历未午巳辰卯寅六位，亦得太簇律。故谓之“隔八生子”。

在此应稍作说明者，即本节先言五音生律，次言十二律相生，似乎给人以古人先有五音律而后发展到十二律之印象。但本节并无此意，只是从典籍记录的历史顺序而言。在此欲稍作伸言

者，即古人不仅有五音律，还有七音律。其实所谓五音，是指调式而言。即从十二律中取出五个律来组织一个调子，前面我们已举五音宫调和五音徵调之例。如以黄钟为宫，那么便是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其余大吕等七律，虽在此调中未采用，但并非其不存在。如以南吕为宫，上生姑洗为徵，下生应钟为商，上生蕤宾为羽，上生大吕为角等等，所谓“五声六律十二管还（旋）相为宫”。

以后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再加上变徵、变宫两音，即每个调子在十二律中取七律组成七音调。《国语》周景王问津于伶州鸠，“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帝之所建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伶州鸠似乎说七律的产生是来自一组天象，这组天象显示了周民族的兴盛和能取代殷民族入主中原的先兆。

据说武王伐殷之时，当时所呈的天象是：岁星在鹑火之次，按《晋书·天文志》说：“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于辰在午，周之分野。”故说“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月在天驷，《尔雅·释天》“天驷，房也”。即月亮在房宿。太阳在“析木之津”，《晋书·天文志》说：“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北斗斗柄所指与太阳所在星次有一个简单而粗略的对应关系，由于北斗随天左旋，而太阳右行。故当北斗斗柄指在子位，则太阳在星纪之次（丑位），而斗柄指丑，则太阳右行至玄枵之次（子位）。玄枵，按《晋书·天文志》说：“自须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为玄枵，于辰在子，齐之分野。”玄枵又名天鼋。天鼋为齐星，由于周文王的祖母太姜是齐人，所以说“姬姓从天鼋生出”。而月亮在天驷房宿，房宿又名农祥，是有关

农作的指事星，周之祖先后稷，曾为农官，故说：“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此天象之总体是岁星在南方午位（鹑火），月亮在正东方房宿，太阳在北方析木之津的南斗星中，而斗柄已指于玄枵之次，在危宿虚宿附近。所以说：“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从这一天象，伶州鸠看到：“自鹑及驷七列”，即自岁星所在之张宿，至月亮所在之房宿包括：张、翼、轸、角、亢、氐、房七宿。又看到岁星到斗柄指于子位，子位当玄枵之次，自鹑火至玄枵历经：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七次，伶州鸠说是“南北之揆七同”。由于这样得到七数，以律和其声而有七律。由此可看出音律在古代就不单纯是音乐学的内容。它与时令节气，与天象，与社会，与国家均有关系，这一思维方式对京房有极大的影响。

对伶州鸠的七律，三国时吴国韦昭注：“周有七音，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即是以宫、商、角、变徵、徵、变宫七音组成七声调。亦即十二律中取出七律来配调，其余大吕等律虽未采用，但在备用行列。若依“十二律旋相为宫”来配，则还有大吕为宫，夹钟为商，仲吕为角，林钟为变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等等。只要定下宫音，下生三次，上生三次便可得出这七个音。

## 二 京房六十律

按史籍所说，从黄帝时代到汉元帝时代，流行的乐律只有十二律一种。到京房才始创六十律之说。前已述及古代定律之法，从黄钟起行三分损益法十一次得仲吕，再由仲吕行三分益一法（上生）一次，再回到黄钟，是为一周。但是事实上回到原位的却并非黄钟，而是比黄钟高了 24 音分的另一律，这另一律在京房之前未有名称，京房始定其名为“执始”。古代所以没有认“执始”等律，是由于都以为仲吕上生一次，虽然不回到黄钟，却只有 24 音分之差。固然有此误差，但粗粗看来，相差还说不上太大，勉强当作回到黄钟，似乎也还可以马虎过去。但京房研究了音律之后，觉得这样不妥。或许他是从纯音律方面考虑，他认为同一律名有这样大的相差不是什么小事，不能马虎过去。或许是从当时普遍对音律的看法中，京房更觉得这一差别不能视而不见。

当时普遍对音律的看法是很严格的。不仅看作为音乐的核心内容，而且看作为一切度量衡的基础，甚至看作是天地宇宙自身内在规则的表现。《史记·律书》一开始就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汉书·律历志》更说到音律与天象和万物的关联：“玉衡构建，天之纲也；日月初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条畅该成。”这些说法，与京房思想可说完全一致。因为京房认为天地间各种事物的表现，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深层次的结构中，却遵循着同一的根本的法则。而音律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则，正是这种深层的根本法则的体现。这样看来，对音律表现出来的规则，必须足够精确地掌握，不能稍有马虎。因而当他从仲吕上生的律与黄钟律数不相同，他认为这里面可能联系着一种根本性法则的

问题。他从《周易》由八卦推演到六十四卦受到启发，八卦只能粗略地说明世界，而六十四卦却能相当精确地解释更多也更普遍的事物。是不是也由于十二律太少，不能精确反映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如果扩展到更多的律，就能更为精确一些地反映这些根本法则呢？从而也就能达到“周而复始”地旋相为宫地转调呢？所以京房在向韦玄成等人介绍自己的六十律时就说到：“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后汉书·律历志》）京房作这样的设想，是突破了当时律学的一般观念的。暂时回溯一下《淮南子·天文训》中某些有关律的叙述。其说如：“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率（即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十二各三成，故置一而‘一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之大数立焉，凡十二律。”这一段说了两点，其一说了黄钟管长九寸而黄钟之数81，这是较为明确地说明了九分为寸，九寸为尺的黄帝律尺。其二是说了以 $3^{11}=177147$ 为黄钟之大数。前已说过，《淮南子》求十二律与《吕氏春秋》同法而与《史记·律书》之求律法有差别。若按《吕氏春秋》求律之法，采用此黄钟大数求十二律，可使其余十一律的大数都成整数。即生至十二律的最后一律仲吕，仲吕律之大数仍为整数。仲吕再生之律，由于不能用三除尽，其律的大数皆非整数，即其大数均带有奇零。这就不能称作正律，也不能用作宫音。所以《淮南子·天文训》的用意是应用旋律法时，不用变律，专用正律或正半律，使十二律皆可配以五声。因此《淮南子》坚持只用这十二正律，称为“仲吕极不生”说。

京房正是突破了《淮南子》的这个“仲吕极不生说”。他利用当时已经成熟的律学成果“三分损益法”，又利用《淮南子》的“黄钟之大数”177147作为起律之数，来探索越出仲吕律之后所发生的情况。

《后汉书·律历志》说：

《律术》曰：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节，其性静。动者数三，静者数二。以阳生阴，倍之；以阴生阳，四之。皆三而一。阳生阴曰下生，阴生阳曰上生。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清。皆参天两地，园盖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黄钟，律吕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损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黄钟之实。又以二乘而三约之，是为下生林钟之实。又以四乘而三约之，是为上生太簇之实。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实。以九三之数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于律为寸，于准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为小分。以其余正其强弱。

京房详细说明了他的推律方法。并附会以阴阳动静、天地方圆等，说明音律与宇宙天地的本原相联系。关键是他采用了《淮南子》的黄钟大数 177147 为黄钟之实。又以九三之数 19683 为“法”，这个“法”就是在律为“一寸”，在准为“一尺”。不足一寸，就是分数，不足一分，就是小分之数。《后汉书·律历志》给出了全部六十律的数据，现列表于下：

原始 十二律	京房所 增律	音名	律 数	律 管 长 度	音分值
黄 钟 (1 日)		c	177147	9 (寸)	0
	色 育 6 日	c <sup>1</sup>	176776	8. 978	3. 56
	执 始 6 日	/c=b <sup>#</sup>	174762	8. 879	23. 45
	丙 盛 6 日	//c	172410	8. 756	46. 90
	分 动 6 日	///c	170089	8. 638	70. 34
	质 末 6 日	////c	167800	8. 522	93. 79
大 吕 8 日		c <sup>#</sup>	165888	8. 419	113. 68
	分 否 8 日	/c <sup>#</sup>	163654	8. 311	137. 13
	凌 阴 8 日	//c <sup>#</sup>	161452	8. 200	160. 57
	少 出 6 日	///c <sup>#</sup>	159280	8. 089	180. 42



续上表

原始 十二律	京房所 增律	音名	律 数	律 长 管 度	音分值
太 簇 1 日		d	157464	8. 000	203. 89
	未 知 6 日	d	157134	7. 980	207. 47
	时 息 6 日	/d= <sup>x</sup> c	155344	7. 892	227. 36
	屈 齐 6 日	//d	153253	7. 783	250. 80
	随 期 6 日	///d	151190	7. 679	274. 25
	形 晋 6 日	////d	149156	7. 575	297. 70
夹 钟 6 日		d <sup>#</sup>	147456	7. 492	317. 59
	开 时 8 日	/d <sup>#</sup>	145470	7. 388	341. 03
	族 嘉 8 日	//d <sup>#</sup>	143513	7. 289	364. 48
	争 南 8 日	///d <sup>#</sup>	141582	7. 190	387. 93
姑 洗 1 日		e	139968	7. 111	407. 82

续上表

原始 十二律	京房所 增律	音名	律 数	律 长 管 度	音分值
	南 授 6 日	e	139674	7. 093	411. 38
	变 虞 6 日	/e	138084	7. 013	431. 26
	路 时 6 日	//e	136225	6. 918	454. 71
	形 始 5 日	///e	134392	6. 825	478. 16
	依 行 7 日	////e	132582	6. 734	501. 61
中 吕 8 日		e <sup>#</sup>	131072	6. 659	521. 49
	南 中 7 日	/e <sup>#</sup> = <sup>x</sup> d	129308	6. 567	544. 94
	内 负 8 日	//e <sup>#</sup>	127567	6. 479	568. 39
	物 应 7 日	///e <sup>#</sup>	125850	6. 392	591. 84
蕤 宾 1 日		f <sup>#</sup>	124416	6. 321	611. 72
	南 事 7 日	f <sup>#</sup>	124154	6. 305	615. 28

续上表

原始 十二律	京房所 增律	音名	律 数	律 长 管 度	音分值
	盛 变 7 日	/f <sup>#</sup>	122741	6. 233	635. 17
	离 宫 7 日	//f <sup>#</sup>	121089	6. 150	658. 62
	制 时 8 日	///f <sup>#</sup>	119460	6. 067	682. 07
林 钟 1 日		g	118098	6. 000	701. 95
	谦 待 5 日	g	117851	5. 985	705. 52
	去 灭 7 日	/g= <sup>x</sup> f	116580	5. 919	725. 40
	安 度 6 日	//g	114940	5. 837	748. 85
	归 嘉 6 日	///g	113393	5. 759	772. 30
	否 与 5 日	////g	111867	5. 681	795. 75
夷 则 8 日		g <sup>#</sup>	110592	5. 619	815. 63
	解 形 8 日	/g <sup>#</sup>	109130	5. 541	839. 08

续上表

原始 十二律	京房所 增律	音名	律 数	律 长 管 度	音分值
	去 南 8 日	//g <sup>#</sup>	107635	5. 466	862. 53
	分 积 7 日	///g <sup>#</sup>	106187	5. 393	885. 98
南 吕 1 日		a	104976	5. 333	905. 86
	白 吕 5 日	a	104756	5. 320	909. 42
	结 躬 6 日	/a= <sup>x</sup> g	103563	5. 262	929. 31
	归 期 6 日	//a	102169	5. 189	952. 76
	未 卯 6 日	///a	100794	5. 119	976. 21
	夷 汗 7 日	////a	99437	5. 050	999. 65
无 射 8 日		a <sup>#</sup>	98304	4. 994	1019. 54
	闭 掩 8 日	/a <sup>#</sup>	96980	4. 925	1042. 99
	邻 齐 7 日	//a <sup>#</sup>	95675	4. 859	1066. 44

续上表

原始 十二律	京房所 增律	音名	律数	律管 长度	音分值
	期保 8日	///a <sup>#</sup>	94388	4. 794	1089. 88
应钟 1日		b	93312	4. 741	1109. 77
	分乌 7日	b	93116	4. 729	1113. 33
	迟内 8日	/b	92056	4. 675	1133. 22
	未育 8日	//b	90817	4. 612	1156. 67
	迟时 6日	///b	89595	4. 550	1180. 11

关于京房六十律的表稍作一些说明。所有的律名及律数均摘录自《后汉书·律历志》。其管长和音名抄自吴南薰的《律学会通》第二十七表。音分值是根据律数依前述求音分法推求。本表按音高次序排列全部六十律。从黄钟起生律十二次，即得第十三律执始（本表排在第三位），前已说明，按十二律还相为宫的算法，执始当还原为黄钟，但实际上执始比黄钟高 24 音分（本表算为 23.45 音分），于西制当为 b<sup>#</sup> 音。但为标号看起来明白，将此 b<sup>#</sup> 音仍记作 c 音，只在其左边加一斜线而为 /c=b<sup>#</sup>，表示比 c 高一个最大音差（即 24 音分）。可用数条斜线表示升高几个最大音差。例如当生律 24 次，得第二十五律丙盛，就写成 //c，表示比黄钟律高两个最大音差。

根据上表将京房六十律相生的次序排列起来，应是：

- (1) 黄钟<sub>下生</sub>——(2) 林钟<sub>上生</sub>——(3) 太簇——(4) 南吕——  
 (5) 姑洗——(6) 应钟——(7) 蕤宾——(8) 大吕——  
 (9) 夷则——(10) 夹钟——(11) 无射——(12) 中吕——  
 (13) 执始——(14) 去灭——(15) 时息——(16) 结躬——  
 (17) 变虞——(18) 迟内——(19) 盛变——(20) 分否——  
 (21) 解形——(22) 开时——(23) 闭掩——(24) 南中——  
 (25) 丙盛——(26) 安度——(27) 屈齐——(28) 归期——  
 (29) 路时——(30) 未育——(31) 离宫——(32) 凌阴——  
 (33) 去南——(34) 族嘉——(35) 邻齐——(36) 内负——  
 (37) 分动——(38) 归嘉——(39) 随期——(40) 未卯——  
 (41) 形始——(42) 迟时——(43) 制时——(44) 少出——  
 (45) 分积——(46) 争南——(47) 期保——(48) 物应——  
 (49) 质末——(50) 否与——(51) 形晋——(52) 夷汗——  
 (53) 依行——(54) 色育——(55) 谦待——(56) 未知——  
 (57) 白吕——(58) 南授——(59) 分乌——(60) 南事。

观此相生次序之排列，京房自黄钟起，计下生二十五次，上生三十四次，得到南事一律，是京房最终之律。如参见上表又可见，南事一律系在蕤宾之次，若再从南事用上生法推求一律，则可得：

$$124154 \times \frac{4}{3} = 165539$$

由此可由上表得知它按音高次序应排在大吕之次。其音分值为 117.24，比大吕律高 3.56 音分。这一差值甚微，较之黄钟与执始之间的差值要大大减小。同时从上面表上看，南事前七律色育之音高次序排在黄钟之次，黄钟和色育律间的差值也是 3.56 音分（色育高于黄钟 3.56 音分），同时林钟律与谦待律之间，太簇律与未知律之间，南吕律与白吕律之间，姑洗律与南授律之间，应钟律与分乌律之间，蕤宾律与南事律之间音高之差也都是 3.56 音分（间有差错系计算误差）。即从五十四律色育起到第六十律南事止的七律，都与其前一律音程差 3.65 音分，乐律上

称这 3.56 音分为一个“京氏音差”。对于相差一个“京氏音差”（有的书上计算为 3.51 音分）的两音，大约对于普通人的听觉而言，已难以区别为两音，因此将色育视为黄钟于听觉而言无甚妨碍。色育是由黄钟律起生 53 次得到的律，在京房六十律相生次序中是第五十四律。如果近似言之，至此才可以视为“旋相为宫”。但京房由于六十这个数与他对世界的思索有关，所以推求了色育律以下的：谦待、未知、白吕、南授、分乌、南事六律。自乐律学言，京房的这个作法实属赘举，对此京房自己也十分清楚。为什么说他自己十分清楚呢？因为他推求这六律，实在是以色育律起始。按《后汉书·律历志》，京房申言其推律法是“阳下生阴，阴上生阳”，自黄钟起生律五十二次得第五十三律依行，依行律于十二辰而言属于辰位。前面按音高为序的京房六十律表中，依行律排在姑洗律之下，而姑洗即是辰位（可参见前面隔八相生的生律图）。于是依行本该下生一律，但由六十律相生次序中，却是依行上生一律得色育。这表示从黄钟起始推演的律，推到第五十三律依行为止，而色育当为其下生律的二倍。观前表依行律数为 132582，若下生即将其乘以  $3/2$ ，得 88388 的律数。此律数近于半黄钟律（黄钟律大数为 177147，其半为 88573，与此 88388 极为相近）。将此半黄钟律上移一个八度音级，即可视为等于黄钟（只差一个“京房音差”）。若从十二辰的顺数次第而言，从依行（辰位）数至色育（子位）<sup>①</sup>，明明不是隔八而是隔九。这说明在京房看来，依行已是最后一律，色育已可看作与黄钟相等，如同前十二律中，仲吕为最后一律一样。这样就等于把色育看作黄钟为声气之元。再推六律以成六十之数。这一点京房是有点“内不自安”的，不过如果在他“以律建日时”上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话，或许他的“内不自安”会大大减弱。

<sup>①</sup> 由六十律音高次序表中可见，色育在黄钟下。前面隔八生律图可看到黄钟于十二辰在子位，所以色育在子位。

“京房音差”的名称是后来人起的，京房当日只将此称为“一日”。在《后汉书·律历志》上每一律后面都要附上日数，例如起首的黄钟律，是这样写的：

黄钟，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律数）下生林钟。黄钟为宫，太簇商，林钟徵。一日。律，九寸。准，九尺。

这里的一日，是指黄钟律与色育律之间相差一个“京房音差”。其第二律是色育，写为：

色育，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六（律之大数）。下生谦待。色育为宫，未知商，谦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准，八尺九寸万五千九百七十三（即 8 尺 9 寸  $\frac{15973}{19683}$ ）。

这里的六日，似应指色育与次律执始之间相差约二十音分，约合六个京房音差。

再看其十二个宫位诸律之分布。子宫黄钟律外，又加色育、执始、丙盛、分动、质末五声，共计六声。观六十律音高次序表律名后附的日数，即子宫合 31 日。其他诸宫连同子宫日数之分布为：

子黄钟计六声 31 日，

丑大吕计四声 30 日，（加分否，凌阴，少出）

寅太簇计六声 31 日，（加未知，时息，屈齐，随期，形晋）

卯夹钟计四声 30 日，（加开时，族嘉，争南）

辰姑洗计六声 31 日，（加南授，变虞，路始，行时，依行）

巳中吕计四声 30 日，（加南中，内负，物应）



午蕤宾计五声 30 日，（加南事，盛变，离宫，制时）

未林钟计六声 30 日，（加谦待，去灭，安度，归嘉，否与）

申夷则计四声 31 日，（加解形，去南，分积）

西南吕计六声 31 日，（加白吕，结躬，归期，未卯，夷汗）

戌无射计四声 31 日，（加闭掩，邻齐，期保）

亥应钟计五声 30 日，（加分乌，迟内，未育，迟时）

其中有一声五日、六日、七日、八日者。但细考起来，并不与“京房音差”的个数相符。首考其五日者，由京房六十律音高次序表得，注为 5 日的声律，只有四律，即形始，谦待，否与、白吕。其中辰宫的形始律与次律依行相差 23.45 音分，约含六个京房音差外，其余三律与其次律的音分值相差 19.89 音分，约五个半京房音差稍多。注六日的声律最多，共有二十一律。比较集于子宫位（五律），寅位（五律），辰位（三律），酉位（三律）。还有未宫（二律），亥宫（一律），卯宫（一律），丑宫（一律）。其中只有六律与其次律的音差 19.88 音分（或 19.89 音分），其余十五律均与其次律差 23.45 音分。注七日的声律共十一律，其中午位有三律，巳位有二律，辰、未、申、酉、戌、亥各一律。这十一律中，六律与其次律音分值差 19.88，五律与其次律的音分值差 23.45。注八日的共有十七律，其中丑位，卯位、申位、戌位各三律，巳位、亥位各二律，午位一律。其中有四律与其次律差 19.88 音分，其余十三律均与其次律相差 23.45 音分。从以上的统计情况来看，除两律相差一个“京房音差”的少数几个律而外，其余两律间相距或者 23.45 音分，或者 19.88（或 19.89）音分，所以两律间至多安排六日半，至少得安排五日半，绝难安排到八日。京房为了将六十律与一年的总日数相配合，将这六十律安排了 366 日。又按十二辰，将此六十律分配到十二月中去，使与月份对应起来，黄钟律对应于子，大吕对应于丑等等，并称此十二辰为十二宫。所谓建子之月律中黄钟，建丑之月律中大吕等等。每一宫安排为 30 日或 31 日

(参见六十律音高次序表)，但每月律的数目并不相等，例如黄钟子宫共有六律（连同黄钟在内），得 31 日；而大吕丑宫，总共有四律，也得 30 日。这两宫的总音分值也不相等，黄钟与大吕间音程相距 114 音分，约合 32 个“京房音差”，大吕与太簇间音程相距 90 音分，约合 25 个“京房音差”。所以按每宫一月 30 天或 31 天的安排，就只有放弃坚持一“日”表一个“京房音差”的原则。京房碰到的这个困难很大，需要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或一个全新的角度加以考察。可能京房还没有想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就奉皇帝的命令来对他的音律知识进行杂试考问了。

当然京房并不在意他们的“杂试”，但是他对碰到的困难却不能无动于衷。他据实回答了他们的“试问”，也谈出他碰到的困难。或许正是由于他据实讲出了他的困难，韦玄成就对他的六十律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导致在《汉书·律历志》上对于京房的律学根本没有提及。而京房对韦玄成，也因其阻碍试行考功课吏法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由此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对立原先也是政见不一所致。韦玄成由于有文采，而“素有名声”，《汉书》韦玄成本传上说他：“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足见其文采为一时所重。京房的六十音律被否定了。

《后汉书·律历志》记载的京房六十律一直是后代音律界批判的对象。对京房六十律批判得最严厉的当是南朝的何承天。《隋书·律历志》：“何承天《立法制议》说：‘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是古人简易之法。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后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谬为六十。’承天更设新率，则从中吕还得黄钟，十二旋宫，声韵无失。”何承天更设之新率，与京房的黄钟十二正律（即自黄钟至中吕的古十二律）的律长和律数对照抄录如下：

律 名	京 房		何 承 天	
	律 长	律 数	律 长	律 数
黄钟	9. 00	177147	9. 00	177147
林钟	6. 00	118098	6. 01	118296
太簇	8. 00	157464	8. 02	157861
南吕	5. 33	104976	5. 36	105572
姑洗	7. 11	139968	7. 15	147762
应钟	4. 74	93312	4. 79	94357
蕤宾	6. 32	124410	6. 38	125608
大吕	8. 42	165888	8. 49	167278
夷则	5. 61	110592	5. 70	112181
夹钟	7. 49	147456	7. 58	149240
无射	4. 99	98304	5. 09	100290
中吕	6. 66	131072	6. 77	133257
黄钟	8. 88	174762	9. 00	177147

这个抄自《宋书·律历志》的数据，可以看出何承天提出了一个办法，按原来十二律的相生次序，每生一次，在律长上增加 0.01 寸（即一厘）。例如由黄钟生林钟，生律一次，故林钟律增加一厘，林钟律由 6. 00 改为 6. 01 寸。由林钟生太簇，生律二次，故太簇律管又加长一厘米，而成为 8. 02 寸。即按生律次数递加律管长度的法则使得仲吕生律一次得原黄钟律长或律数。由于京房原先的十二律生律法，再回到黄钟律时，管长为 8. 88 寸，律数为 174762，于音分值而言则差了一个最大音差，约 24 音分。何承天看到律管长度经十二次生律后，正好差 0. 12 寸，即十二厘，故每生律一次加一厘，将这 24 音分的差值分散到十二律中去，一如孟喜六日七分之故伎。何承天奇怪地发现，京房是孟喜卦气说的诠释者，为什么竟会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他批评京房“谬为六十”。可是何承天却是从京房的以律建日时的困难中得到启发。京房的困难的本质在于以一个“京房音差”代表

一日的原则难以贯彻，如果求得这一原则的实现，就得舍掉律与年的日数和月的日数的对应，而这正是京房推演六十律所期望的目的。何承天认为京房正是陷于以三分损益法得出的律数或律长的数值之中。只要用一个适当的方法对这个数值加以改变，这个困难就可解决。京房羞答答地改换一律的日数，实际是一律“京房音差”的个数，却不敢更换律数或律长。何承天和京房都知道三分损益法已在音律界牢牢地被肯定，如果突破这一观念，在那时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京房根本没有想到更改律长或律数，三百多年后的何承天想到了这一点，但也只能“偷偷地”进行。表面上他坚持着三分损益法，每次推演后，所生的新律加一个微量的改变。从本质上说这已不是传统的三分损益法，而是加上了人为的造作。京房的“造作”并不明显，他只是将一律含有“京房音差”的个数作了人为的改动；何承天的“造作”虽来自京房的启发，但却是明显的造作。不过他的造作却对后代是一种启发，无论是五代时的王朴，甚或是明代的朱载堉的改律，都是沿着何承天的思路发展的。由此再回过来看，京房突破十二律，而在律的变化中探求其与历的关系，尽管碰到困难和麻烦，但正由于此，对后世律学的发展起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还得提一下京房说：“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京房大概是最早提出用“准”来定律的学者。“准”是一种弦乐器，“其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用弦来定律，可能在京房时代还是乐律学上一种新的想法，将弦长与律数对应起来，不仅仅是音律理论的推算，而且还是音律测量的实践。京房说：“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还是拘守着黄钟律数为八十一。《后汉书》在叙述了京房六十律之后，又说：“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

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观此立“准”的意思是其声“明畅易达”，容易定律，不像吹管子那样，声音既微弱，管子体形也小，测得准确不容易。但弦发出的声音还要用吹管子的声来校正。因而用弦定律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其辅助的办法是放长十倍，可能京房也认为这样一来，声音也会放大十倍。但是这却不是正确的管与弦关于音律的相互关系。所以人们怀疑京房并没有实际上解决这一课题。

京房并非是一个乐律学家，但他却在乐律学上大大忙了一阵。而且无论人们怎样对他的乐律有什么批评，他都是在乐律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位。那么京房为什么对乐律有如此大的兴趣呢？他在乐律学上主要忙的是什么呢？由前面的叙述，得知他主要忙于能从一律经过多次生律后，能返回到出发点的乐律，即所谓“还（旋）相为宫”。他还主要忙于找出音律与年月日时的某种本质上的对应关系。京房很拘守天道，对于天道的具体表现十分重视，他以为天道的具体表现应是“阴阳消息”。他在《京氏易传》中写道：“降五行，颁六位”，这既是对《易系辞》所说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一种具体说明，也是将干支五行配应于易卦六爻的根据和原则。京房关于六虚的看法，在本书第二章里已作了详细说明。六虚有四种表现形态，一是日月五星周流于天，终则复始；二是所谓的六甲孤虚；三是卦之六位；四是声音自低升高或自高降低，要历经音律之六律或六吕，这也是周流六虚的一种形态。京房坚持的周流六虚，是一种“原始返终”，即坚持事物的周期律。人类正是通过天体运行的周期性来认识天空世界。京房认为周流六虚的四种形态在其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通的。因而他十分关注最后一律返生首律，正是为了求得音律的周期，找出音律的周期规律。同时坚信音律的周期与时日的周期有着内在的本质的一致，因而他又那么关注各律与日的相配。在后人看来，他是忙于一种附会，似乎他有意在一些两不相干的事情间找出其相互的联系。可是在京房看来，他坚持探讨的是事物内

在的，深层的，本质的关联；是宇宙天地间的内在的根本法则。他在星占学上，在琐碎的物占上都表现出一种耐性和认真的探索精神，他注意观察，注意搜罗和排比资料。而在音律上，他也深入推求音律，对音律的周期表现作努力的追求。为了将音律与日时对应，他没有采取《淮南子·天文训》所说的方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来加以敷衍，而是坚持从对音律的深入研究中寻找出他坚信确实存在的律与时日对应的内在规律。他在音律研究上正是如此，宁可将他碰到的麻烦和矛盾公之于众，而不设法自圆其说。他在日占中发展出一种主动观测日面的条件和方法；在音律中他提出了以准来定律的设想。这表明京房在音律研究中也体现他的一贯方式和风格。

### 三 京 房 风 角

在第四章中，我们利用《汉书·五行志》的材料，讲述了京房的风占。但无论是材料上或是方式上，那都是《五行志》式的，并不是京房风占的原本情形。这里讲的京房风角，也不可能是京房的本来面目，但与《五行志》的京房风占比较起来还是有相当差异的。从这个差异中可能会看到一些较为实际的京房的风角学。

《晋书·天文志》直接讲京房撰有《风角书》，并引了其中的《集星章》入志。可是无论是京房本传，《儒林传》，《五行志》或《天文志》，《汉书》都没有提到京房与风角的任何关连。这就反映京房专门撰写的风角书，与他用于注解《易》的风占材料有差别，或者说两者不是一回事。

《汉书》在京房本传的同一卷中，在《翼奉传》中讲了风角的部分详细内容，而在《京房传》中主要突出了他的风雨寒温，即将焦贛的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的那一套作为京房的《易》学重点介绍。这就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京房的学术主要是以风雨寒温进行占测。甚至连京房的日占等都没有旁及，而在《五行志》中又突出了他的物占和有关的气候占，使人们觉得京房的占测既怪异又有点玄。于是将这两者加起来，就从根本上使京房作为学者的形象成为可疑。

可是如果仅从《风角》这一个窗口看，虽然无法判定京房的学者形象，但却可以从《汉书·京房传》说京房依据《易》卦和风雨寒温进行某种推理的占测，和《五行志》所引的物占及气候占的那种简单地直接对应的占法相比中，对其间的不相称的现象有所了解。因为《汉书》有一个极大的疏漏，就是无视《京氏易传》的存在。

京房的《风角书》可能像《京氏易传》一样曾经存在过。不

过后来丢失了，从其中现存的《集星章》可看出，其书当有一定的系统，有一定程度的推理，不像《五行志》所摘录的风占及其他占测材料那样零碎和片断。

### (一) 京房风角与音律

按照京房探讨事物的一贯方式来看，他要探讨风的情况，必定要对风的情况按某种方式加以分类，将其与观测资料作某种联系或作某种占测性的说明。

看来京房对风的研究，是从音律的情况出发，即将风和音律联系起来。唐代李淳风撰《乙巳占》，几乎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论风角，据《唐开元占经》记录的李淳风的话说：“巽为风，风占灾异最验。”所以他对风角的历史发展比较注意。他在《乙巳占·占风远近法第六十九》<sup>①</sup>中写道：

案京房风角所载，五音风发远近，皆以五行成数推之。其云远近及中者，皆以日时多少及势力强弱，以事推之。推其远近，皆变动其数，触类长之。而风所从来二十四处，皆须明知发止，审别支干，及以八卦所在。发时早晚，来从何处，息在何时，回在何日何辰，皆须审明知之。

李淳风又引京房说：

宫风近十里，中百里，远千里。羽风近六里，中六十里，远六百里。徵风近七里，中七十里，远

---

<sup>①</sup> 《乙巳占》共十卷，风角为其第十卷，全书共一百篇，风角从第六十八篇起至一百篇止。共有三十三篇。



七百里。角风近八里，中八十里，远八百里。商风近九里，中九十里，远九百里。

大概这是过分简单的介绍，所以李淳风加了三点说明：

1. 风远近的里数是以五行成数推得。宫音于五行属土，土的生数五而成数十。羽音于五行属水，水的生数一而成数六。徵音火，生数二而成数七。角音木，生数三而成数八。商音金，生数四而成数九。据此可知京房在风角中已采用了纳音系统。

2. 京房将风的远近分为三等，即近、中、远。这与刮风的持续时间和风的表现有关。风的表现是指刮风的后果和风的运行状态。其后果如大树拔根，飞沙走石等等。其运行状态诸如起始缓慢，后来逐渐加快转急者，则风自远处来；反之初急而后渐缓的风则是发自近处等等。

3. 要注意风所从来处，是指风来的方位。全天分为二十四方位，分别以八干（戊己二干不列），十二支和四隅卦（即乾艮巽坤）表示。如说风从戌上来，须在辰位上测得；说风自辛位来，必须抵其冲位乙方才是。只有如此交冲，才能确定其来处。当然还要审知风起风息的时间，其实还要注意风的方位变化情况。

由李淳风的说明，可知京房的“五音风发远近”是对风的声音与风的远近距离的关系所作的考察。虽然介绍过分简单，但约略可见京房的方式。

既然是按风声来察知风的远近，那么首先就应有风的五音定义和说明。《乙巳占》说：“太史必知风之情，晓风之声。宫声如牛鸣牢中，隆隆如雷鼓响（注云直如雷鼓也。）徵风声如奔马（注一作燎火上，如缚彘骇起）。商风声如离群之羊，如叩铜钟，如飞集之羽，如流水汲汲，咨嗟声感人。羽风声如击湿鼓，如流水扬波，激气相磋，如麋鹿之鸣子也。角风声如千人语，闾闾（Yin 银，和悦）然令人悲哀，如人叫啾啾，如千人呼啸，如鸡

登木。”《管子·地员》篇也用这种方式叙述过五音。如何实际上操作，即如何具体判断风的五声，《乙巳占》说：“夫听五音之法，必须以耳察其声，以牙（注古互字）大小。”因此判别风声的基础是仔细听风声，并将之与其他各种风声进行比较。这需要观测者先积累充分的经验，对各种风声较为熟习。可能古代灵台上有专司测风的专业人员，故而《乙巳占》讲太史知风情，晓风声，因为灵台是归太史领导的。可是即令是经验丰富，用羊鸣牛吼，猪叫马奔等来说明风声，也主要是“音色”所引起的听觉印象，与观察者的生理心理有关。所以京房认为以此来准确判断风声是相当困难的，他考虑要有一个大体上来说是客户的判别标准。由于风的声音常常大小不定，所谓“声体多别，商徵牙错”。京房认为要“推其清浊以知大小”，实际上就是将风声与律对应起来。所以京房测风声的清浊，就是以风合律，只是如何具体进行，现在已难以稽考。

《后汉书·律历志》在介绍京房及其六十律之后，又报导了后代对他用“准”测律的一些情况，其说在东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距京房已二百余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其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候气而已”。这里有两点可注意：一是京房曾著有音律之书，书中记有他定六十律的“准”的形制，大约具体运用方法后人难以理解，故说“不能定其弦缓急”。二是京房有候气之说。

京房候气之说历来有争论。由于《晋书·律历志》在《后汉书·律历志》对京房音律作评论说“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之后，紧接着说：“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效气，道之本也。”后世都认为这是京房关于音律书上的话，从此话而认定“候气之法，始于京房”。可是

有的研究者却以为这是“有善未扬，有恶皆归”<sup>①</sup>，大为京房鸣不平。按《后汉书》和《晋书》律历志之所说，这个候气之法，当是在一仔细封闭了的密室中，按方位排列木案，外高而内低。将律管置案上，并将一种草叫“葭莩”的灰塞住管的内端。每一月有一对应的律管，例如十一月对应于黄钟律。当符合月令的“气”到位，与该月令对应的律管，其塞在内端的草灰，就会扬散而去。《晋书·律历志》还说：“‘气’至者灰去，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晋书·律历志》还补充说：“杨泉记云：‘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管，河内葭莩为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随十二辰埋之，上与地平，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縠复律吕，气至吹灰动縠。”如果律管中的灰应节令而动，那么蒙于律管上的丝织品也相应而动。因此只要观察蒙于律管上的轻而薄的丝布是否颤动，就可知候气之应否。

这一候气法很可能是京房的设计。大约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均有相当困难，后世贬京房者必举此为例，褒京房者则否认京房有候气之法。但是从五音风以其清浊来定大小的设想来看，即将气动与律数对应的设想而言，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候气的意思。古代测风者公认，正常状况下在一个时期内（例如一个月或两个月），有一种比较固定的风，比如《史记·律书》就说十一月（建子之月）是广莫风当令，就是说十一月（或者整个冬季），主要是括北风。因此在一个时期中只有一种律的风。而当风转向时，就对应于另一个律。风的定义在古代是：“天地之气合。”因而风是气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候风也是一种候气。候气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实验的设计。即假定“气”随月有变化，而表现

<sup>①</sup> 吴南薰《律学会通》还认为：“照《易经》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声气之元’看，京氏分言声与气，一在于避免文字的含糊；二由于列吹时，经空气的作用，可使前声与后声相应，似无候气之意。所云候气之法，怕是后人的假托。”

在与各月所中之律共振，那么这种设计就是一种实验的设计。

京房以律测风的设想是有其渊源的。《吕氏春秋》就已将风和音律作了联系，其《季夏纪·音律》篇就说：“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律书》都将风与音律相联系。如《淮南子》说由春分起：“加十五日指乙（方位），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史记》则比如说：“广莫风居北方。东至于虚（星宿），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虚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钟，其于十二子为子。”《汉书·律历志》说得比较明白：“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无论京房或是翼奉，都受此种思想之影响，由于京房涉及音律颇深，特别着意于研究音律与日时之配应。而日时与方位，与斗柄所指，与什么律相应（即中何律）等等都连接在一起。因此从京房而言，将音律与风联系起来的思想，也是他音律研究的自然发展，实际上也是他探讨日时与音律配应的另一个可能的途径。

## （二）京房的五音风占

《乙巳占》在其“五音风占第七十二”中写道：

按京房、翼奉风角旧书，皆以此（按指五音之风，如宫音风，徵音风等）与五音相动风占相连，各在一音之首。后之学者，竟不能悟，浑杂推考，颇乖旧意。今辄总集之于此，别为条例，则使后学如是风声之占，不与彼日辰五音相杂矣。然即此风，虽知声之所主，发之祸福，皆须以日辰来处，相参课之。

《乙巳占》所总集的京、翼二家的五音风占，别为条例者，按其

所说即是：

宫风发屋折木（怒也），有土功（宫主土），人君内乱（宫为君，发屋折木，自动其口，故乱也）。不出十日、百日（宫数），有所之（风以动之，以其不安，故有所之）。且有急令（风为号令）。贵人相捕斩（乱则君臣相疾，疑虑忌恐，其伤亡递相捕斩）。天下兵起（贵贱相诛，下不堪命，故天下兵起也），盗贼满市，人饥不已（贵人诛，兵卒起，令不行，贼入市）。车驰马奔，流移不止（宫为土，土动，故人移居。乱则兵起车驰，但有急令应占，则下皆发。他皆仿此）。

徵风发屋折木，不出三日、三十日，若有大灾，吏忧自行。当四方有告急事，或有大火，妖言为幻，百姓恐怖惊乱。（凡言吏者，理人之官，上至三公皆是。）（徵主烽燧，故曰四方告急。）

羽风发屋折木，不出五日、五十日，余大贵，人以水为忧，有大丧，后妃黜，宝物出。

商风发屋折木，不出七日、七十日，有急令，兵大起，余大贵，国门四闭，兵从中起（四门闭者，备守御关梁要塞城邑）。

角风发屋折木，不出九日、九十日，有急贼盗斗战，余大贵，大饥，民相食。有大死丧，当有疾病之事。

这些当是从京氏风角书和翼氏风角书中抄来，《乙巳占》特别指明这是风声之占，不是日辰五音之占，二者不能混杂。大概后世将之与“五音相动风占”相连，即将之与日辰五音占，以及风所来方互相参课，而将风声之五音放在首位，以下将日辰和来方分

别与之相配作占。由于有人将五音风的两种情况，即五音风声与日辰五音风相混，所以李淳风特将京、翼二氏原风角书五音风声占录出，以资订正。据此可见，京、翼当时以五音风声占为主，或参以日辰五音和风所来处以为五音风占。

京翼二人风声五音与对应的事物当如上述，后人有所加减，至《乙巳占》，李淳风将五音所对应的事物及排列顺序定为：

宫数一，为君为身；

徵数三，为宗庙，为先人，又为号令；

羽数五，为境界，为妻财，为物；

商数七，为人臣，为吏仆；

角数九，为疾病，为死丧，为事。

这个排列次序，据《抱朴子》说：“一言得之者，宫与土也；三言得之者徵与火也；五言得之者羽与水也；七言得之者商与金也；九言得之者角与木也。”是按《玉策记》及《开明经》之所说。李淳风对此加以解说：“按五音所主，以宫为君体，象五行之土，地体与天体敌，故宫音于五音之内，为君之尊。土者火之子也，君国者必立宗庙，行号令。徵又为号令，故次徵。道不孤立，故立妃后。土以水为妻，羽亦为物，故羽又次之。百世本枝，当须子嗣，土生金为子，故次商而为臣子。易穷则变，物极则反，天道常运，万物随时，次及于事。事之大者莫过于病，病死之道，因于鬼刑。角为宫之刑，故角终其末。”

对于日辰五音，《乙巳占》称为“地十二辰五音。”其说曰：“子为阳宫土，丑为阳徵火，寅为阳徵火，卯为阳羽水，辰为阳商金，巳为阳角木，午为阴宫土，未为阴徵火，申亦为阴徵火，酉为阴羽水，戌为阴商金，亥为阴角木。”此处自子至巳为阳，皆为阴律所上生；自午至亥为阴，皆为阳律所下生。由此可知，地十二辰五音是将十二辰分阴阳两组，阳组自子至巳六辰，阴组为自午至亥六辰。将五音列入十二辰，则依上述五音之次序：即宫徵羽商角，依次排列，唯徵音有两位。阳组子位宫，丑寅二位

徵，卯位羽，辰位商，巳位角。阴组午位宫，未申二位徵，酉位羽，戌位商，亥位角。

《乙巳占》将京氏纳甲法与五音联系起来，称之为五音六属，所谓六属，即乾主甲子壬午，坤主乙未癸丑，震主庚子庚午，巽主辛丑辛未，坎主戊寅戊申，离主己卯己酉，艮主丙辰丙戌，兑主丁巳丁亥。这些在本书第二章中已作过详细介绍，此处不赘。但此纳甲与前述五音之数（即宫一徵三羽五商七角九）形成一种干支对的纳音五行。例如甲子，子属庚，因而形成甲庚的排列，从甲数到庚，历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干，即得七言。“七言得之者商与金”。即甲子得商音，商音属金，所以甲子的纳音五行为金。又如丁丑，丑属辛，得丁辛之排列，由丁到辛历五个干，即丁丑得五言，五言为羽音，羽属水，故丁丑纳音五行为水。纳甲法出自京房，但上述之五音序列和五音数，京房似无提及。《抱朴子》言其出自《玉策记》及《开明经》，不仅五音数和排列次序，甚至其干支六属亦出自此二书。《抱朴子·内篇》《遐览》所说道经诸书中有《玉策记》一卷。清惠栋《易汉学》引《抱朴子》曰，按《玉策记》及《开明经》皆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说：“案《玉策记》《开明经》皆周秦时书，京氏之说本之焦氏，焦氏又得自周秦以来先师之所传，不始于汉也。”王明于其撰之《抱朴子内篇校释》一书中，《对俗》篇注（二四）说：“惠栋谓玉策记周秦时书，其成书年代未免过早。”惠栋认为六属（即纳支干）之法是周秦时就有，而京房得自焦贛。这涉及到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京房的纳甲法源自何处，以及纳音法和纳甲法的关系。这里暂且搁下，还是先说五音风占。

在《乙巳占》的《五音相动风占第七十五》中，又谈到《风角书》，其说为：

《风角书》与乐产本多少不同，占验又异，今辄总括，除烦略秽。其有时下风来处同者为重。其

音，此谓时音，与风所发处同，故云重。如余所见，与日重与风重者为异。其阴阳五音，主亦不同。各须以阴阳分别也。

这说明李淳风撰写《乙巳占》风角篇时，除参阅了古《风角书》外，还参阅了乐产的风角本子。他发现两者分量多少有不同，占验也不完全相同。于是他将两者总括起来，除烦略秽，而成其篇。他在此具体地指出了几种情况，第一点，就是起风日的纳音（日辰纳音）与风所发处之音即风所来方之方位音同，而且时上音也同，这叫做“重”。他所见到的还有风声之音与风所来处之音同及时日纳音同亦为“重”。但这两者之“重”是有差异的，不能混同起来。其次，其阴阳五音也不相同，阳之所主与阴之所主有差别，必须加以区别。这是他具体指明的第二点。大概他将旧《风角书》的本子与乐产《风角书》的本子掺合整理，而成其《五音相动风占》一篇。如此则京氏原作的残余亦已泯灭。但李氏这篇却应看作是京氏风角的发展。

《五音相动风占》内容是：以干支纳音为时日之音，以地支十二辰五音为风起处方位之音，则其占测形式为：

宫日风自子午宫来，为宫动宫。主人君出行。  
急风急出，有急令。慢风慢出，有善令。以日干占知远近。从阳宫来山陵崩坏，人君出行，地动，有土工事；从阴宫来，地震裂，后出行，又为旱。时加子午为重宫，君欲行，大臣走，又为风雨不调。

当然宫日如有风，未必只从子午两方（宫位）来，只是这里讲的是“宫动宫”，即宫日风从宫位（子午方）来。若是时上也是子时或午时，那么就成了“重宫”。这里又说了自阳宫来（子上）和从阴宫来（午上）两种情况。



如果宫日从丑未寅申徵位来风，就称为宫动徵。徵为火，故占有火灾。有土工，有宝物出，有兵。时加徵为重徵，有义兵，有土工，有诏令。宫日风从卯酉上来为宫动羽，有大雨，不则大臣出走，或者为旱。这里说没有大雨就或为旱，因为宫土羽水，如土盛则大雨不下，土盛水衰则火起，故复为旱。宫为君，羽为臣为妃等，君怒则臣走，故说有大臣出走。若起风时加羽，则为重羽，则有雨，五谷熟。宫日风从辰戌商来为宫动商，有兵，且有客兵（外兵）来，时加辰戌为重商，有兵殃。宫日风从巳亥角来，为宫动角。有兵战，人主忧，客兵伤，有丧。从阳角（巳）来，边兵战有大丧。宫为土为君，角为木，土被木克，战不胜则君凶。木又主哭泣，故主丧。时加巳亥为重角，君不昌，有大丧。

其余徵日，羽日，商日，角日均与上述宫日相仿，这里讲的五音相动风占与京房翼奉时代有一很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测听风声，完全从纳音和十二辰五音来测定。即已脱离实际观测。

现在再返回来说一下京氏纳甲的来源。如果假定《玉策记》和《开明经》是周秦时书，那么其中有五音六属及纳音法，而京房或其师焦贛可能从其中学习了这种方法，这是完全可能的。似乎不仅仅《玉策记》和《开明经》，第二章中我们已经讲了《汉书·艺文志》就有《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的记录，这些书也都可能保留有五音六属及其类似的材料。按《晋书·束皙传》谈到太康元年汲郡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七十五卷时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为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又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太康元年三月……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与《纪年》最为分了。《周

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由此可见汲冢周书有遗《易》，如《阴阳说》，《易繇阴阳卦》等，京房时或有所见。这些书中偏重阴阳，甚至孟喜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也有所自来。但是有一点，即是否京房这些知识是来自焦贛或仅仅来自焦贛却有可议。京氏纳甲法主要见于《京氏易传》，其他书中搜集的京房材料或京房本传，《汉书·五行志》等书均未涉及纳甲纳支，因此京房似应更早一些，即比受学于焦贛要早一些就知道五音六属的有关资料。所谓六属只指子午属庚，丑未属辛，寅申属戊，卯酉属己，辰戌属丙，巳亥属丁。至于甲乙壬癸，《抱朴子》所引《玉策记》及《开明经》未曾提及。而京氏将之引进八宫卦中，或许是他始加上甲乙壬癸于乾坤两卦，或许是他另有所本。但于《京氏易传》中，却未提及五音，更无纳音之说。

因而京氏《风角书》在五音占风方面，就如前面所说，是以五音风声为首，而不是以日辰纳音为首。但京氏关于风的起处和时日五音似亦用地支十二辰五音。这是李淳风一再指出的事。《乙巳占》改为日辰纳音为主后，就与京房的五音占风无关了。按《乙巳占》法，只要刮风，知日辰、方位，时刻即可入占。并以日辰纳音为客，加时为主人。例如今日丙寅纳音是火，风起之时为卯或酉，即时加卯或酉。是为徵动羽。羽水克徵火，主人胜。若是时加辰戌，为徵动商，商金受制于徵火，是为客胜。另外，日辰纳音为客，风所从来之方为主人，如甲子日纳音为商为金，风从丑寅未申上来，为商动徵，徵火克商金，主人胜。若风从巳亥方来，即商动角，角木受制于商金，客胜。其余皆可仿此而推，只是主客要弄清。如果甲子日，商金为客，时加丑寅未申，当为主人胜；若风又从丑未寅申上来，即为两火共攻一金，则主人大胜。

### (三) 京房八卦八方风占

《乙巳占·八方暴风占第八十一》说：

北方坎，名曰广莫风，主冬至四十五日。京房云：“四时暴风起北方，主盗贼起，天下兵皆动，令人病湿饮带下，不能起居。”

其余七个方位，即东北方艮条风，东方震明庶风，东南方巽清明风，南方离景风，西南方坤凉风，西方兑闾阖风，西北方乾不周风。都如北方坎广莫风一样，附有京房占辞，此处不赘引。八方暴风占，实际上应是任何时候，只要在那个方位起暴风或大风，即应入占。例如夏季，比方说在夏至后，北方起暴风，即应按坎方广莫风的占辞入占。即所谓“四时暴风起北方”当有何事发生等。其他方位亦如之，比如春季春分后，有西南方暴风，亦即按坤方凉风占辞应占。这就是说，还最低限度地保留了京房风声占的原义。

《乙巳占》引京房说：“八方暴风之候乃八卦风别名”，似乎京房曾想将八方暴风与八卦作进一步的联系。以上八方暴风占只将方位、卦名和八方风名连在一起，而其八方风名正是《史记·律书》的八风。似乎他还进一步考虑将五行与八方风相连。《乙巳占》引京房说如果八卦之气“春白、夏黑、秋赤、冬黄，皆为凶，下逆上。兵革四动。”这个道理很简单，春为木旺，色白为金气胜，金胜木，故云下逆上，凶有兵革。其余三季也是如此。但京房如何进一步将之系统化就不清楚了。《乙巳占》还记录了另一种八风名称：“乾为折风，一曰冲风，坎为大刚风，艮为凶风，震为婴儿风，巽为弱风，离为大弱风，坤为阴谋风，一曰谏风，兑为小弱风。”按《黄帝内经·灵枢》的《九宫八风第七十

七》说：“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身湿。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这段话与《乙巳占》所引只有三处不同：一处是西方兑处之风，《灵枢》是刚风，《乙巳占》是小弱风。二处是西南坤方来之风谓谋风，而《乙巳占》是阴谋风或谏风，可能谏为谋之误。三处是《乙巳占》将此八风之排列从西北乾方折风开始，而《灵枢》是说风从南方来开始。风从某方来，对观测者而言是面对着风之来方。《灵枢》说：“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其实说风从南方来，即观测者在风来处之北方朝着它，所谓“坐北朝南”。因而从观测者来说，是从北方始。这一点差别似无关要紧，但反映了引用《灵枢》之八风入风角者的考虑和基本立场。即若是京房想将《灵枢》八风引入其系统，那么他已采用《史记·律书》八风系统于八方暴风之占，所以自然地将《灵枢》八风按《史记·律书》八风系统排列。

京房的八方暴风占基本上是只要有暴风即占。但是他想从风的情况来了解未来一段时间的灾异情况，例如未来一年或未来一季、一月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是仿照《史记·天官书》所载的“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之法。他也于正月朔旦候八风以决一年的情况，说：

风从乾来有忧、病。坎来有大水。艮来人民疾

疫，岁内有蝗蚩遍野。震来阳气干阴，其年大旱有丧。巽来年内多风，伤五谷。离来岁旱，大热多火灾。坤来有疾疫，道上多死人，兑来有兵事。

似乎“时间”也有一种“全息机制”，正月旦为一年的第一天，这一天的风向预示着一年的气候及灾异。循此想法而有《八节风占》。《观象玩占》卷三载有《八节风占》，但未必是京房的原作。它按立春正月节，春分二月中，立夏四月节，夏至五月中，立秋七月节，秋分八月中，立冬十月节，冬至十一月中之日，或许也是平旦，测风从何方来。例如说立春正月节之日。风从乾来，暴霜杀物；坎来多大寒，胡兵内侵；艮来五谷熟，震来气泄，物不成；巽来多风，有蚩；离来主旱，蚩生伤物；坤来春寒，六月大水，人愁，土工兴；兑来旱，霜为灾，并主兵起。其余七节亦皆仿此。八节风中最要注意的是冲方来的风，例如立春节艮卦王，风从其对冲的坤方来，即为逆风。反之立秋坤卦王，风从艮来即为逆风。逆风为凶。

由此八方风还衍生出一种三辰八角风占。所谓三辰是按五行生旺而言，如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故申子辰三辰皆水；而金之生旺墓为巳酉丑，火之生旺墓为寅午戌，木之生旺墓为亥卯未。八角是：辱、杀、反、吉、抵、诞、忿、争。将这两者配合起来形成一种占法。这不是京房所作，但却是从八方风占演变出来。这两者的配应可如下表：

八角 三辰	辱	杀	反	吉	抵	诞	忿	争
申子辰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巳酉丑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艮	震
寅午戌	坤	兑	乾	坎	艮	震	巽	离
亥卯未	乾	坎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此表三辰是指日，即申子辰日，巳酉丑日，寅午戌日，亥卯未日。辱是有耻辱之事，杀是有暴者相杀，反是有反逆不顺之事，吉是有喜庆事，抵是有非理抵触之事，诞是有欺诞不诚之人，忿是有非理忿争之事，争是有奸人来争财物。由于是看日子占风，所以不必有大风、暴风等，在院落，宫垣之中有风亦可占。这是将原先意义上的风角演变为民人日常使用者。这离京房当更远。

在《乙巳占》中有《十二辰风占第八十三》一篇，引了京房的一句话，说：

京氏云：“东方寅卯木之角，发风三日，发屋折木，扬沙石，国有大寇，疾病。”

这句话后面接着讲“五岳之音”。所谓五岳之音，是指东南西北中五方，每方五音。十二支方位，东方寅卯木，南方巳午火，西方申酉金，北方亥子水，中央辰戌丑未土。故上引京房所说，当为东岳之音的角音，还有寅卯之徵，寅卯之商，寅卯之羽，寅卯之宫诸音。南岳则有巳午之徵，巳午之商，巳午之羽，巳午之角，巳午之宫。其余西岳、北岳、中岳或称四季之五音。但是如“寅卯之角”具体所指到底为何呢？寅卯当是指方位，故寅卯之角当是指含寅卯的日辰纳音，故应是庚寅辛卯日。但京房或据京房而写的《乙巳占》均未如此指明，而是《观象玩占》明确指出各方之五音，为该方位地支与适当相配的干的日辰纳音。例如南方巳午火，其徵音就是乙巳、戊午，因这两个干支对的纳音为徵为火。其余均由此推出。但是京房本意是否如此呢？可能不是，因为《乙巳占》的“十二辰风占”，是以十二辰为主，这一篇的开头就说十二辰之风，如子日大风，丑日大风等等，不提日辰纳音。所以其说“东方寅卯木之角”，寅卯为方位，而角是角日。角日按地支十二辰五音法当是巳日和亥日。即是说巳日或亥日（注意分阴分阳）寅卯方（东方）有风，而不是说庚寅、辛卯日

（日辰纳音为木为角）刮东风。

由此可见，五岳之音可能是京房风角之旧，只是后来掺进了纳音法。可能真实的京氏风角原貌也不是地支十二辰，而就是风声五音。根据风声的五音来占，才是京房那个时代的特点。这是以实际观测为主，适当运用一些形式化的推理进行占测。而不像后世那样，主要依据一套形式化的推理机制。可能正是京房，由于引用了干支五行的推理，对以后形式化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四）六情风占

六情是人之好、恶、喜、怒、哀、乐六种感情的表现形态，占测家从天人一致的观点出发，以为天也有这六种感情表现。但天的六情不像人的六情那样随时变化而无规则。天的六情与十二支有一种对应规则，即“好”对应于申子二支；“恶”对应于寅午二支；“喜”对应于巳酉二支；“怒”对应于亥卯二支；“哀”对应于丑戌二支；“乐”对应于辰未二支。人带着某种情绪就会表现出其相应的行为，如果喜好某一物，就会表现出贪的行为等。天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六情所表现的行为分别是：好行贪狼，恶行廉贞，喜行宽大，怒行阴贼，哀行公正，乐行奸邪。风角家按六情与支的对应，即根据风的来向判断其六情，从而判断其行为的吉凶。

六情法首先是在《汉书·翼奉传》上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因而风角中的六情占法被认为是翼奉风角中的主体内容。《乙巳占》中“论六情法第七十八”，讲述了六情的定义和基础占测，其基础占测下都加了京房的注，当是李淳风加于下者。可见京房《风角书》中也有六情风占之术。

《汉书·翼奉传》中以较多篇幅介绍了翼奉的六情之说。翼奉说：“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又说：“治下之术，在于六

情十二律而已。”他又说：“执十二律而御六情”，“五行动为五音，四时散为十二律”。又说：“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由这些叙述可见，他的六情法主要是用于治道，用于人主独自掌握的治人之术。但这却不是风角。

从其“明主所宜独用”，又说“露之则不神”，又“唯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等语看来，是当时已有风角之六情法，翼奉据以作人主治下之术，使风角切于治道。如果设想六情法作为治下之术创于翼奉，因其为“明主所独用，难与二人共”，则不会公诸于世；而六情法始于风角，移于治道，则只有翼奉能用之，虽其他学者能掌握六情之法，却不能用于治道。这正是翼奉六情法的本质。

翼奉对于六情之叙述是当时最权威的，今录之于次：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

这里说六情就是：好、怒、恶、喜、乐、哀。其实就是好恶、喜怒、哀乐这三对情绪。但这六情与十二辰对应之后就是：好对应于申子，恶对应于寅午，喜对应于巳酉，怒对应于亥卯，哀对应于戌丑，乐对应于辰未。六情还表现为各自的“行”，好行贪狼，恶行廉贞，喜行宽大，怒行阴贼，哀行公正，乐行奸邪。



对于以上这些对应，《汉书》翼奉本传注作了注解。这些注均引孟康之说：“北方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水性触地而行，触物而润多，所好则贪而无厌，故为贪狼也。”“东方木，木生于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以阴气贼害土，故为阴贼也。”“南方火，火生于寅，盛于午，火性炎猛无所容受，故为恶，其气精专严整，故为廉贞。”“西方金，生于巳，盛于酉。金之为物喜以利刃加于万物，故为喜。利刃所加，无不宽大，故曰宽大也。”“上方谓北与东也，阳气所萌生，故为上。辰，穷水也；未，穷木也。翼氏风角曰：‘木落归本，水流归东’，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乐也。”“下方谓南与西也，阴气所萌生，故谓下。戌，穷火也；丑，穷金也。翼氏风角曰：‘金刚火强，各还其乡’，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时而受刑至穷无所归，故曰哀也。火性无所私、金性方刚，故曰公正。”

情绪的对立也表现为所对应干支的对立，例如贪狼之情好，对应之干支为申子；与之对立的情绪为廉贞之情恶，而恶行之干支为寅午。申与寅对冲，子与午对冲。其他两对情绪即喜为宽大，怒为阴贼；乐为奸邪，哀行公正。也是情绪的对立，所对应的干支也对立。

六情法用于风角和知人之术，《翼奉传》上的例子很能说明这点。其例说：“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未主奸邪，申主贪狼，风以大阴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对于这一占例，汉书翼奉本传注引张晏、孟康和晋灼三人的话。张晏说是这件事发生在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甲戌），“岁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阴在太岁后”。张晏说到“太阴”，但太阴何指却未明言，只说它在太岁后。孟康则说：“时太阴在未，月建在寅，风从未下至寅南也。建为主气，太阴臣气也，加主气，是人主左右邪臣验也。”指出这时太阴在未，又说建为主气，太阴为臣气。但太阴是什么仍未讲明。晋灼分辨之说：“癸

未日风，未辰也，时加申。张说是也。”其意思是癸未日，未是辰。当日刮风是在申时。申居西南，其冲为寅，寅为月建（正月建寅）。“有暴风从西南方来”，西南方可为未方，坤方或申方。申时西南风，故按六情法占，日辰为未（癸未日），未主奸邪。按风角说，辰为客，时为主人。而起风之时间为日加申，即申时。申为主人，又为贪狼。应是奸邪加于贪狼，为邪臣之气加于主气。风又从西南来，西南为下方，阴气所萌生，其情为哀，哀行公正。这似乎说明了汉元帝刚即位不久时的政治情况。但是孟康引月建，张晏引太岁，使解此例复杂化。但由此例可见，翼奉仍是以日辰，时间，方位为主的占法，只是从六情予以解释。

《乙巳占》所说的六情风占较此要复杂。其解释六情是基于三辰而言，四正方位取三辰之生旺而言，上下两方则各取水木之墓和火金之墓而言。因以六情人占，故立六情之基础占测云：

申子为贪狼，主欺给不信，亡财遇贼，主攻劫人也。京房云：求人财物，强取也。

巳酉为宽大，主福禄赏赐，聚集酒食，主贵人君子。京房云：酒食庆贺也。

亥卯为阴贼，主战斗杀伤，谋反叛逆。京房云：劫暴夺也。

寅午为廉贞，主宾客礼仪，嫁娶图议，为人诚信谦谦。京房云：为上客、迁官。

丑戌为公正，主报怨仇，主兵。京房云：仇谏诤。

辰未为奸邪，主欺慢人。京房云：淫佚，疾病，欺给。

这些看来并非对原文的抄录，而只是一种摘要。因而它不能清楚地说明京氏《风角书》中关于六情占风的情况，但是却说明京房

对六情占的基础占辞作过考虑。既有基础占辞，则说明必有六情相动的情况。犹如五音风相动占测那样。《乙巳占》载六情之日，时加何辰，风之来处，占测为何。如说：“奸邪之日，风从宽大上来，时加卯止亥，有人持酒食礼来，相候谋盗。”等。这与前述翼奉所说之例完全相同。

但是《乙巳占》中似又将干支纳音法掺入其中而加以发展。分为本情、合情、刑情、冲情和钩情五种。

本情是用本日干支，如今日辛未，未为奸邪。故用本情即今日为奸邪日。

合情是用与本日相合之日支。如今日辛未，未与午合，午为廉贞。故用合情即今日为廉贞日。合为六合，即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六合。

刑情是用与本日干支相刑之日支。如今日辛未，未刑丑，丑为公正。故用刑情，则今日为公正之日。按求得刑日之法，翼奉本传注引孟康说，孟康引了《翼氏风角》“木落归本，水流归末”和“金刚火强，各归其乡”之语。这四句实即是推刑日之提纲。亥卯未三辰皆木，木落归本者，按五行水生木，木之本为北方水位。故亥卯未三辰皆应归于北方，则亥为木之生气，本在北方，故亥自刑。卯为东方木之旺位，归于北方旺位子，故卯刑子。未在本居墓位，归于北方季位丑，故未刑丑。“水流归末”者，水旺子位，水生木，木为水子，为水末，所以水之三辰申子辰皆应趋于东方。申在生位，趋东方之生位寅，故申刑寅。子在旺位，故亦趋东方之旺位卯位，故子刑卯。辰为水之墓位，趋东方季位辰，故辰自刑。其余火金之辰，火还归南方火位，金返归西方金位。所以寅刑巳，午自刑，戌刑未；而巳刑申，酉自刑，丑刑戌。要注意刑情有四个自刑，故辰午酉亥之日，用刑情时，即用本日干支，与本情同。

冲情即相冲两位之互换，如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六对相冲。今日辛未，未为奸邪，未与丑冲，丑为公

正。若用冲情，则今日为公正日。

钩情，是以北斗星之冲破而论。以干分阴阳，以支取前后辰。甲丙戊庚壬为阳日，乙丁己辛癸为阴日。阳日支取支后第三辰为钩辰，阴日支取支前第三辰为钩辰。如今日辛未，为阴日，取支前第三辰，历申酉至戌，即戌日为钩辰。未为奸邪，戌为公正，故今日取为公正日。明日壬申，是为阳日，阳日取日支后三辰，即是巳日（由申至巳，历未午巳三辰）。申为贪狼，巳为宽大，故取用宽大日。

那么什么时候用本情，什么时候用合情、刑情、冲情、钩情呢？《乙巳占》说：“第一本情，甲乙主之；第二合情，丙丁主之；第三刑情，戊己主之；第四冲情，庚辛主之；第五钩情，壬癸主之。甲乙主本情，丙丁主合情，戊己主刑情，庚辛主冲情，壬癸主钩情。”清代汪双池撰《戊笈谈兵》云：“木角为民，以本情，本其性生。火徵以事以合情，合而事成。土宫为君，以刑情，君威之用。金商主兵，以冲情，兵战之功。水羽主物，则用钩情以相取。”因此这五种配情法，总共六十日，每一配十二日，可以用表列出，如同干支纳音法。这可能是后世的增益，非京翼风角之原貌。

大抵六情法占风，是据刮风的日时和方位进行占测。但后来有一种“六情风鸟所起加时占”，是说当日时已知，突然有鸟来鸣其上，即在观测者之附近有鸟鸣，亦可用六情法入占。此时由于不论风所来方，缺少了一个方位参量。而鸟鸣又未说鸟飞来之方。因而加上时之旺相休囚论占。如《乙巳占》说：“巳酉为宽大之日，时加巳酉，鸟来鸣其上，时加王相，当言为长吏。休囚废死，当有酒食。”所谓王相休囚当是五行或八卦之王相休囚，如立秋，坤卦王，乾卦相等，或如五行木，春王冬相夏休等等，此处说“时加王相”，当是指时辰之支的五行所属或时干支纳音五行所属。即将六情法还原为干支五行的推演。于此可见六情法本质上仍是干支五行的一种稍稍复杂了的推演方法。

京房的风角主要从五声出发。但是由于他探讨的大课题具有形式化的倾向，因而他试图找出一种普适的形式化推演的机制。风角是他这一大课题中的一个方面，可能还是较为重要的方面。所以他的《风角书》中收入了《集星章》，试图抽引出两者间共同遵循的推演机制。只是由于其原著的丢失，详情难知。他的风角坚持由从风的音律出发，说明他始终坚守着从观测实际出发，不仅风角，就是星占，物占也无不如此。可是翼奉则在形式化上走得更远，他并不关心风的原始声音或风的远近，效果，而主要关心刮风的时间，风起何方。根据其“观性以历，观情以律”的原则，进行占测。“观性以历”，翼奉本传注引张晏说：“性谓五行也，历谓日也。”引晋灼说：“翼氏五性，肝性静，静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礼，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坚，坚行义，乙庚主之；肾行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其“观情以律”，本传引张晏说：“情谓六情，廉贞、宽大、公正、奸邪、阴贼、贪狼也。律，十二律也。”由六情法可知，翼奉将律转化为情后，就将风声的测量转化为风的方位、日辰和时间的测量。这就又加深了其形式化倾向。

大约西汉从董仲舒以来，学术形式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京翼二人均受此风影响。京房从《易》学出发，翼奉从《诗》学出发，都想找出一种说明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机理。他们都企图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用一些简单的形式化的机制加以描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就有用神秘化来补充其机制的思想倾向。应该说这一方面翼奉取得的成果较京房更为受人关注。京房始终不愿意抛弃他观测者的立场，不愿意在简单化和神秘化方面走得太远。

风角学后世也有发展。东汉的张衡就对风角有较深的研究。《后汉书》张衡本传上在叙述张衡批判图讖后说：“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即他对风角是肯定的。他造候风

地动仪，有学者以为是候风仪和地动仪。<sup>①</sup> 只是候风仪没有记载其制作情况。地动仪则记载了制作情况。大约更多的学者以为候风地动仪是测地震的仪器。也有人认为候风地动仪也是测风的仪器。不管专家学者们的争论如何，但可证明张衡对候风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乙巳占》在其最后一篇，即“杂占王侯公卿二千石出入第一百”中写道：“京房善用德，张平子（张衡字平子）善用日辰，伏氏善用刑，翼氏善用温寒。谢临泰抄四家风角所长，有效验。略文取要，刑德王相，灾应吉凶，辞虑意深。”李淳风只举此四家为古代风角之代表。但其说京房善用德，张平子善用日辰等等则不相符，可能抄录有误<sup>②</sup>。但可见张衡在风角中的地位 and 造诣。由于提到刑德，在此要稍说几句。刑德是风角学中的重要内容。风从刑来则凶，例如《观象玩占》记载的《三刑相会风占》说：“假令今日是丑日，时加戌，风从未上来，大寒克者必大战流血，客主俱伤。所以然者丑刑戌，风从未上来又刑丑，而戌又刑未，此三刑俱会也，法主大战流血。”如果风从德上来则吉，《乙巳占》说：“占风之法，初起之时候之。若天气温和，不动尘埃，条风来者，皆为祥风，如更从日德上来者，必有大喜。若飞沙扬石，折木揭屋，东西不定，旗旛绕枪，皆为灾风。若风来飒飒，人尽森悚，皆为贼风。若更从三刑五墓上来，即须倍加提备。”又说：“凡风定后有雨者，不为灾，不占。若不雨或雨晴后风起者占之。”因此李淳风又回到对风的实际观测上来。附带说一下五墓和三刑。按五行十二生死所有“墓”之一所，故五行有

---

① 阙勋吾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1984年4月一版。《张衡传》注，云“候风，即候风仪，未记载其制作情况，地动仪，测定地震的仪器”。

② 京氏占测以风雨寒温，翼奉知人以六情时日，因此应是京房善用寒温，翼氏善用日辰。张衡似善用德，《太平御览·天部》引张衡《玄图》曰：“玄者包含道德，构掩乾坤，橐籥之气，禀受无源。”

五墓。按《开元占经》所说：“亥卯未木墓在未，寅午戌火墓在戌，申子辰水墓在辰，巳酉丑金墓在丑，土墓在辰。”土墓在辰，可能不是唯一的说法。再说三刑，十二支中有四个支为自刑，即亥辰午酉自刑；有两个支是互刑，即子和卯相刑；还有六个支为传播式相刑，此分为二组，即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为一组；还有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即刑有三种而称为三刑，但也有人认为只有传播式相刑者称为三刑。

本节不是关于《风角学》的系统叙述，只是关于京房风角的一个初步探索，而又只限于京房与风角之学的关系方面。但是从古代风角学而言，其主体方法和基本内容，本节却是相对完整地作了介绍。

## 四 京氏考功课吏法

考功课吏法是古代封建制社会中对各级官吏的一种考察制度和办法。封建时代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任用官吏的贤佞好坏，对王权统治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各朝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选拔和考察。官吏的选拔称为“选举”，选举的官吏，并不能保证其在工作职位上一定贤明干练，也不能保证他一贯保持初选时的谦谦君子的形象，而不在官场中腐败变质。所以要不断地对之进行考察，故而有考功课吏之法。据吕思勉《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说，是京房首创考功课吏之法。又在该书第六章第一节中介绍京房考功课吏法时说这项制度“实君主专制之世致治之基，为石显、王凤等所害而不能行，较之萧望之之见废，实尤可惜也”。

据京房本传所说，京房考功课吏法之规模为：

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

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

这是京房建议实施考功课吏法的计划，但没有被汉元帝接收，而是：

元帝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

而且元帝还特准他不属刺史部；能任用其他郡的人；郡的属县令长，均由他“课第殿最”。就是有考核本郡所属官吏之权；而且年终可以“乘传奏事”，即可直接向皇帝作出报告或建议。

实施这样一个全面性的一郡的考功课吏法，虽然是试点，但不能算是小事，可以推想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必然有其值得如此规模试



行的理由。但是关于京房的考功课吏法，目前尚没有找到有关材料，其实际情况，已难以知晓。

对于京房考功课吏法，东汉王符于其所著《潜夫论》中说道：“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无为自化，必自此来也。”可见对京氏考功法评价甚高。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其所撰《秦汉史》中写道：“考功课吏法亦代有师承，史言焦延寿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又言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盖皆非指《易》学言。疑别有督责之术，而房从而受之也。督责之术，实君主专制之世致治之基，为石显、王凤等所害而不能行，较之萧望之等之见废，实尤可惜也。不然元帝何至蒙威权堕损，为汉基祸之消哉？”这也高度评价了京房的考功课吏法。

第一章中将京房本传中叙述他向众官员阐述其考功课吏法时，遭到一片反对的情况作了叙述，其反对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1) “房言烦琐”，这是说京房讲得啰嗦呢，还是其考功课吏法烦琐呢？不能确知。但后世批评其考功课吏法的是指后者而言<sup>①</sup>。

(2) “令上下相司不可许”，这一条可能就是吕思勉先生所说的“督责之术”的一项内容，也许是京房考功课吏法的关键内容。或许这一项“督责之术”是遭到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在这两点反对的观点中，还有两点应加注意：

(1) 京房报告其考功课吏法时，大约是与会官员一致反对。但是汉元帝本人却“意响之”，即心中同意。还有就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而后善之。

(2) 京房在元帝召见他时说过：“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这段话可看作是他的考功课吏法的纲领。他将“以功举贤”和“以毁誉取人”作为对立的两极，说明考功课吏法是对毁誉

<sup>①</sup> 《八旗文经》第六卷载：平敏郡王撰《京房考功课吏论》，认为京房确有烦琐之病，“溺于小数而黜于大体”，故其法之所以不可行。

取人的风气的否定。这可能是导致普遍反对的根本原因，因为他把灾异与当时的官吏都直接关联起来。

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已经丢失了，但还有不少人对其十分注意，因而有关考功课吏法的一些简要而零散的材料，由于他们的论述或推测，也可能有些是回忆，大致上反映了京房考功课吏法一些原则。

首先是关于考功课吏法的重要性的看法：

(1) 考功课吏法的直接效果，京房坚信能判别出官员的好坏贤佞，从而达到选拔贤能的效果。

(2) 但是，京房认为，考功课吏法不仅仅是发掘贤才，而且是判定国家治乱的关键。如果国君注意考功课吏，那么就能任用贤才，国家就得治，否则就会大乱。王符在其《潜夫论·思贤》中说：“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病家之厨，非无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于死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即提出君主能否任用贤能的问题。

(3) 考功法不仅关系到选拔和任用贤人，而且只有通过考绩才能使政治清明，否则就会导致政治的腐败。比如一个大家庭，父母不对子女的勤劳与怠惰作考察，那么久而久之就会使勤劳者懈怠，而怠惰者更加为非作歹，最后会导致家败业破。同样对一个国家而言，则更是如此。故王符在其《考绩》篇中说：“是故大人不考功，则子孙惰而家破穷。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

其次是关于考课的对象。

京房本传上提到京房对张博（淮阳宪王之舅）说过：“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可见在京房心目中，这些在帝王左右的人是应该首先要对之考课的。王符也说：“夫守相令长，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宪（悉）聪明；九卿分职，以佐三公；三公总统，典和阴阳，皆当考治以效实为王休者也。”即王

符所说的考课对象，与京房所说相符。

当京房刚进入朝廷时，他碰见的是连续而来的各种灾异，惊慌失措的皇帝，束手无策而且只能自责求去的大臣，州郡上报的一片混乱的灾情。这些都使他深深感到在位多非其人，根本不能应付任何意外情况。王符也写道：“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职）所以数乱荒也。”

对于三公这样的重臣，京房特别指出要对他们要进行考课。他看到的三公大臣诸如乐陵侯史高，阳平侯王凤，丞相韦玄成（亦承父为侯）等结党营私，无功于民。由于他们居高位，搞私党蒙骗君王，无益于国家社稷，所以他们反对考功课吏，而希图任用私党。《潜夫论·三式》篇中写道：“《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公不胜任，则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载之后，宜明考绩黜刺，简练其材。”这里是用鼎卦四爻爻辞来论对三公必须进行考课。按《九家易》之说，三公职在典和阴阳，犹如鼎之调五味，而弄得鼎足毁折，鼎里的粥汤之类翻倒在地，这就是“形渥”。所以当三公不能胜任，会把事情弄得一败涂地。按孙堂辑《京房周易章句》是“其刑剕”，并说：“刑在颊为剕”，意思是对这样的“三公”应处以“剕刑”。按郑玄注，剕刑是在屋中诛之，即是不诛于市。

对于三公的考课，若他们有“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蛮之赐。其尸禄素餐，无进治之效，无忠善之言者，使从渥刑。是谓明德慎罚，而简练能否之术也”（王符《潜夫论·三式》）。即是对三公这种重臣的考绩，也是一点不能马虎，必须有益于民，才能保其位。不能无功受禄。

再次是关于考课的基本做法。据于振波《汉代官吏的考课时间与方式》一文分析，从秦汉简牍和文献资料的探讨，得知汉代实行的考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日计、月计、四时计，一直到岁计，从未间断。即对官吏的政绩考核，一年之中往往要进行若干次，或按月，或按季，甚至按旬按日。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

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试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于振波从对出土的汉简资料研究，证实董仲舒之说是符合实际的。另外于振波又说：“考课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下级向上级的汇报；一种是上级对下级的视察、检验。”<sup>①</sup>大抵史书上记载，对官吏的考课制度在汉以前就已实际上施行过。那么何以京房又煞有介事地提出考功课吏法，而且含有如此大的影响呢？一方面可能是考功课吏法在长时间执行过程中已经搞“油”了，各级考课可能已不如开始那么认真，而是逐步形式化走过场，甚至欺瞒上级，蒙混过关。致使必须亟加整顿。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京房所说的考功课吏法主要是针对高级官吏，针对朝廷中的腐败现象，针对佞臣当道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特殊的考课法。例如前引的令上下相司的考课方式，还有主要是针对考绩者的考绩，即对三公和丞相等中枢大员进行考绩，对州郡牧守和部刺史进行考绩。由于考绩对象的重点不同，其考绩的方式和内容，也就会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但是京房的考课法却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三国时魏明帝（曹叡）曾下诏作考课法。刘劭传云：“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杜恕评论说：“奏考功者缀京房之本旨”，杜预亦评论说：“魏氏考课，即京房遗意。”（以上见《晋书》本传）东汉王符所撰《潜夫论》，多言治道。前已引述，他充分肯定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又在许多篇章中谈到有关考绩的内容，除前已引述者外，尚有多处，由其所述亦可稍稍推想京房之考课遗法。

王符以为凡国君都想将他的国家治理好，但从历史上看，治好的不多，原因是没有能任用贤俊。为什么没有能任用贤俊呢？他在《潜叹》中说：“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即是说在位者妒贤。所以京氏考课法的对象，首先是三公丞相及朝廷大臣。针对朝臣的妒贤这一问题，王符引用孔子的话“众好之，必察焉；

<sup>①</sup>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众恶之，必察焉”来解决。群臣妒贤之法，首先是不让贤者与君王有接触的机会，若是君王已知道贤者，则组织奸佞私党对之进行攻讦。所以当群臣攻讦某人时，即此人处于“众恶之”的情况下，要仔细考察。若群臣都表扬某一人时，也要对此人认真考察，因为在位大臣任用私人时，也会发动私党对之“虚张高誉，强蔽疵瑕，以相诳耀”。王符指出：“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俦，是以举世多党而用私竞。”对结党营私，互相包庇的情况特别注意。

对于直接统理民众的方面大员，也是考课的重要对象。王符以为古代任用方面大吏是：“选练明德，以统理民，建正封不过百，取法于震，以为贤人聪明不是过也。又欲德能优而所治纤，则职修理而民被泽矣。”即是说古代任用方面大员，根据震卦卦辞，“震惊百里”，故其领管的地邑不超过一百里。并且认为一般贤人虽则聪明，也不能管超过百里的地区。而且还有一层想法，就是使德能皆优者，管理较小一些的地方，那么其才干对人民更加有利，可以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泽。而王符说当时的情况却是：“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权势力，盛于列侯。才明德义未必过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乱也。”王符认为汉宣帝出身于民间，知道这种情况，万民所以能安于田里无忧患者是由于“政平讼治”，而要做到或做好这些，必须选择良吏，任用贤才。汉宣帝是：“明选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见之。观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赏。奸宄减少，户口增息者，赏赐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者，皆衔刀沥血于市。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群臣畏劝，竞思其职，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凤凰而来麒麟，天人悦喜，符瑞并臻。”对这一部分官吏即直接统理民众的方面，守相等官吏的考课十分重要。如同噬嗑之卦，震下离上，震为雷为动，离为日为光明，故下动上明。噬嗑卦的《象辞》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王符论说：“夫积怠之俗，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故凡欲改变风俗者，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圣主诚宜明察群臣，竭精称职，有功效者，无爱金帛封侯之费。其怀奸藏恶，别无状者，图铁钺钺

之决。神明瑞应可期年而致。”这些与京房本传之所说相呼应，所以可能反映了京氏考功法的本旨的一些内容。

考课地方官吏既仿效噬嗑卦，则下动而上明，即从地方官吏的行为中考察其称职与否。从王符书上可摘数例于下：

(1) 要官吏爱惜民时，不能扰民。其本质意义就是让老百姓有充分的时间从事本业，即从事农桑。王符写道：“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如果老百姓有事要到公府，就要尽快为之解决问题，不得拖延。这似乎是考课官吏的一个要点。即从官长令首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对官员的考察。京房本传上对于其师焦贛的介绍说他“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其所治小黄就是官员与吏民关系较好的典范。与人民关系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但根本要看其生产情况和诉讼情况。王符《爱日》篇说：“所谓治国之日舒以长者，非谒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也。所谓乱国之日促以短者，非谒羲和而令疾驱也，又非能减分度而损漏刻也。乃君不明，则百官乱而奸宄兴，法令鬻而役赋繁，……故视日短也。”王符的这一段话及整个《爱日》篇，都将官吏之爱民与扰民和日长日短联系起来。这似乎也反映了京房的方式，将吏之治民与天界现象作某种关连并加以考察。

(2) 考课法的另一个要点是考察官吏是否认真执行法令。王符在《衰制》篇中写道：“行赏罚而齐万民者，治国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乱国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国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从封建专制社会而言，集权政府的法令是否得到认真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人臣不认真执行政府（即是皇帝）的法令，那么就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即无视最高统治者的存在。二是“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他从《易》坤卦《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渐矣，由

辩之不早变也”。<sup>①</sup> 引申说：“是故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诛也。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淑）世者之言也。”对于不能奉行法令的官吏处分极严。大概当时有人反对，认为不应以刑杀而应以德教来对付这些奉法不谨的官吏。所以王符认为这种反对意见“非叔世者之言”。大概京房考课法中也对这种情况作了很严厉的规定，或许有人也提出过反对意见。孙堂辑《京房周易章句》中有：“坤。东北丧朋。女既嫁，降父之服；臣既仕，先公后私。”做了官的人如同嫁出的女儿，就得以公家的法令为主，就得谨尊君王法令，认真奉行。如果臣子不谨奉“君令”，就会或者是无君，或者是否定了君令，而实行自己的“臣令”。这就积渐导致“臣弑其君”之后果。无论是京房或是王符，都用坤卦之卦爻辞来解说，就因为坤卦讲了这中间的道理，如坤卦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朱熹《周易本义》注解：“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也。”即是说当阴气开始时，是很微弱，如同有霜，但阴气逐渐发展，最终很盛，就如同结坚冰。为官不能谨奉法令，开始也是一些微小的过错或疏忽，但积久而至于反对上面的法令，推行自己的法令，形成反叛之祸。所以考课中对官员是否能谨奉法令是很认真而严厉的。由此又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就是要“慎微”。王符在《慎微》中写道：“积正不倦，必生节义之志，积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所以“圣人常慎其微也”。所以考功课吏法中很强调从细微处考察官吏，或许认为京房“烦琐”者在此。

(3) 从官的地位大小考察其德和才是否适应。凡做官者，要以他的官位高低来要求与他官位相应的功。王符于《忠贵》篇中写道：“处莫高之位者，不可以无莫大之功。窃亢龙之极贵，未尝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尝不蕃昌也。”这一条官高功大的原则，也

<sup>①</sup> 据《易》经本文，这后一句为：“辩之不早辩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注云：“辩读为辨，察也。”

是遭受高官厚禄者极力反对的。京房当时怎么说的不清楚，但王符引乾卦上九爻来作比喻，说明对于这一条考课是依乾卦而言。乾卦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亢者过度，亢位是过于上而致不能下。因而说：“阳极于上，动必有悔。”立大功者当然应当给予高位，但是不能过分。怎么不过分呢？就是要注意其德和能的情况，即现在说的德才是否兼备。王符引《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此为系辞下引孔子之语。德、智、力不足而当任者很少会不及于刑罚。所以王符接着说：“是故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理想的情况是官员的德和能是可以不断增益的，而随着德和能的提高，其官位也相应有所提高。可是一般情况下，王符说：“贫贱之时，虽有鉴明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损（捐）旧，丧其本心。”即不少人当官以后往往德行衰败，忙于财货狗马，骄肆争宠。一旦处于这种情况下，反而更加要求更高的官位和禄赐，于是想方设法窃取权位。王符认为：“窃位之人，天夺其鉴，神惑其心。”即在其谋取权位的过程中，必然导引他德和能的衰败。王符说：“前世贵人之用心与婴儿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婴儿常病，伤饱也。贵臣常祸，伤宠也。”因此考课官吏还要考课其德能增益与否。对其德能的考察大概也很细，比如要考课官员们对经义和法令的学习情况，还要考察其孝友之情，当然更要考察他们是不是阿党比周，更相毁誉等等。因此京房考课法的烦碎可以想见。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京房的考功课吏法与《易》学和卦象是有关连的。如同上一章讲述京房关于气候和物占时，无论从《汉书·五行志》或从《唐开元占经》中录引的大多数京房材料中，似乎只是一种事情与占测的简单对应，看不出有过什么编排或加工。可是正是在这些材料中却反映出它们原是归类于《周易》各卦之下，即按卦象进行分类的。只不过《五行志》或《唐开元占经》等在引用京房材料时，按自己的分类观点将其割裂了。从本节所述京房考功课吏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只不过《五行志》或《唐开元占



经》等是摘引，此处所反映的则是东汉时代的大学者王符，在论述他的思想时，顺便描述了他对京氏考功课吏法的了解和一些原则精神。因而京房考课法的原来面貌已经大大地隐晦了，可是还隐约看得出京房原先关于考功课吏法的特色，即考功课吏法与《易》学深刻的联系。

京房考功课吏法本质上是封建社会中，专制政权对其统治机构有效性的检查和强化方法。但是可以看出，封建统治的内部根本矛盾就在于它产生出一种对抗，对增强这种统治的力量的对抗。这种内部的矛盾对抗也一直在“考功课吏”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京房区区，不量浅深”，他一人朝廷就提出这个最敏感的课题，虽得到汉元帝的支持，但是终究还是以他自己的“弃市”而结束他的一生。王符也记录了京房之死，在《贤难》篇中写道：“京房数与元帝论难，使制考功而选守。晁错雅为景帝所知，使条汉法而不乱。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谓见知深而宠爱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错既斩，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卫身，故及难邪。”

但从考功课吏法本身而言，大约是京房首先作为一个课题提出，并且力争付之于实践，这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直接影响到后汉魏晋。但是始终不能发生效用的原因有二：一是自汉以来，阿党比周，私党牢固，力不能胜。二是考课之法专尚苛猛，而且长官的“私意”往往起很大作用。这就需要法律来解决，但当时唯有帝王的命令即为法令。所以说京房承担着他不可能承担的课题，他的悲剧虽无足轻重，但却引起了历代学者们深思。